

NO

Is

Not

Enough

Naomi Klein

不能光說 NO

如何力抗災難資本主義，
贏取我們想要的世界

"This is one attempt to uncover how we got to this surreal political moment. It is also an attempt to predict how, under cover of shocks and crises, it could get a lot worse. And it's a plan for how, if we keep our heads, we might just be able to flip the script and arrive at a radically better future."

—— From the Introduction

Resisting Trump's Shock Politics and
Winning the World We Need

娜歐蜜·克萊恩 著 朱崇旻 譯

Donald Trump's takeover of the White House is a dangerous escalation in a world of cascading crises. His reckless agenda—including a corporate coup in government, aggressive scapegoating and warmongering, and sweeping aside climate science to set off a fossil fuel frenzy—will generate waves of disasters and shocks to the econo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environment. Acclaimed journalist, activist, and bestselling author Naomi Klein has spent two decades studying political shocks, climate change, and "brand bullies." From this unique perspective, she argues that Trump is not an aberration but a logical extension of the worst, most dangerous trends of the past half-century—the very conditions that have unleashed a rising tide of white nationalism the world over. It is not enough, she tells us, to merely resist, to say "no." Our historical moment demands more: a credible and inspiring "yes," a roadmap to reclaiming the populist ground from those who would divide us—one that sets a bold course for winning the fair and caring world we want and need.

This timely, urgent book from one of our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s offers a bracing positive shock of its own, helping us understand just how we got here, and how we can, collectively, come together and heal.

《不能光說NO》

這是娜歐蜜寫給每一個人的希望守則

娜歐蜜·克萊恩這個人棒到沒話說。在《不能光說NO》一書中，她勇敢以閃亮動人的魔咒反制當今霸權，防止這個噩夢吞噬我們所有人。

—— 朱諾·狄亞茲 (Junot Díaz)

普立茲小說獎得主，《貧民窟宅男的世界末日》(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 作者

在這個危機重重的時刻，娜歐蜜·克萊恩是極其重要的思想領袖。隨著英勇的社會運動自上一輪選舉的餘燼復甦，她的聲音道出我們所需的話語。《不能光說NO》為我們提供觀察時事的新奇視角。克萊恩並不是在佈道，而是將鏡頭聚焦在當下、點出事件之間的關聯性，並用老嫗能解的明確詞句，概述未來等著我們去面對的挑戰。

—— 蜜雪兒·亞歷山大 (Michelle Alexander) 《新吉姆·克勞法》(The New Jim Crow) 作者

對他們的震撼教條說「NO」雖然必要，卻遠遠不夠。娜歐蜜·克萊恩的新書以出色的方式激勵我們拿出堅決與果敢，快速克服他們精心策畫的震撼，並在「NO」之中交織計畫性的「要」。這是一本解放說明書，教導我們使用唯一能對抗他們的武器——建設性的不服從——抵抗他們悉心規畫的厭世。

—— 雅尼斯·瓦魯法克斯 (Yanis Varoufakis) 前任希臘財政部長

從《NO LOGO》到《震撼主義》到《天翻地覆》，娜歐蜜·克萊恩的書記錄了企業飛速成長對文化、工作、和平與地球的負面影響。在我們現今的恐怖局面中，又有誰比娜歐蜜更能夠釐清癡狂，幫助我們找到出路？這本書是今年的必讀著作。

—— 麥可·史戴普 (Michael Stipe) 音樂人、R.E.M.樂團主唱

娜歐蜜·克萊恩寫了一本令人入迷的書，我們都必須閱讀此書，並在閱畢後有所行動。《不能光說NO》是寫給所有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必備手冊，它教我們理解過去導向現今危機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力量——也教我們如何有效地連成一氣，贏得更好的世界。

—— 丹尼·葛洛佛 (Danny Glover) 演員、政治運動家

娜歐蜜·克萊恩創造了所有人共同的故事，讓我們能夠保留震撼的效力，藉此有所作為。我們能用智慧與快樂，重新挽回我們的世界。

—— 蓋爾·賈西亞

主演《革命前



時報悅讀網

ISBN 978-957-13-7153-5 (570.16)

BID0004 NT\$380



娜歐蜜·克萊恩 Naomi Klein

作者

獲獎無數的記者、報業聯盟的專欄作家、紀錄片製片者，與國際暢銷書《NO LOGO：顛覆品牌統治的反抗運動聖經》、《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及《天翻地覆——資本主義VS.氣候危機》的作者。

她是《攔截》新聞網資深顧問，作品經常刊登在《紐約時報》、《世界報》(Le Monde)、《衛報》與《國家》等報刊，她同時也擔任《國家》報社特約編輯。克萊恩是氣候行動組織「350.org」理事會的一員，也是加拿大〈躍進宣言〉組織者之一。在2016年11月，她因「激勵我們在當地、在國內、在國際世界站起來，要求政府制定共享地球、尊重人權與平等的新計畫」，榮獲澳洲頗負聲望的雪梨和平獎 (Sydney Peace Prize)。

克萊恩的著作翻譯成超過31種語言，銷售至全球。

www.naomiklen.org

朱崇旻

譯者

曾在美國居住九年，以閱讀為樂，畢業於臺灣大學生化科技系。喜歡翻譯時推敲琢磨的過程，並認為無論是什麼題材的書，譯者都應該忠實表達出作者的立場。

興趣包含寫小說、武術、室內布置和冬眠。

年齡是個謎。

joycechuminmin@gmail.com

本書是抵禦新一波災難資本主義的領航圖，試圖理解我們如何踏上這條危險路途的因果、我們該如何撐過未來的衝擊；更重要的是，如何快速轉移至較安全的境地。

—— 娜歐蜜·克萊恩

2016年11月，唐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讓全世界陷入一個超現實的政治時刻，無論自願與否，我們都成了川普實境秀中的演員。其執政引發的危機，除了來自他將美國總統作為打造個人與企業品牌的工具，無視所有利益衝突；更來自他讓各種代表災難資本主義的勢力，堂而皇之入主白宮，掌握全世界最強大的軍事與政治資源……而這一切不過是現今安逸的體系初步瓦解的凶兆。

如果我們放任情勢繼續惡化，無疑地將面臨一連串更嚴重的災難。

包括各種以緊急狀態為名的反民主舉措；以反恐為名的緊張衝突；各方利益團體趁虛而入，使氣候亂象加劇；以財政或經濟危機作為掩護，放寬管制、削減福利，讓企業從中獲利；以救災為名的各種投機與詐欺；貧富與身分隔閡日益擴大，讓科幻電影中以高牆分隔的兩極世界成為現實；甚至還將面臨想像的危機，面對贏家與輸家的極端結局，自覺別無選擇……。

然而，在這本書中，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娜歐蜜·克萊恩要告訴我們：我們並非別無選擇，我們確實有能力改變自己，有能力修正過去的錯誤，修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修復我們與這顆行星的關係，並以此作為抵抗災難資本主義的基礎，走向不同的未來，而且這個未來不能是川普崛起之前的世界（因為那也是造就了川普的世界），它必須是我們從未到過的境界。

NO IS NOT
ENOUGH

各界好評

娜歐蜜·克萊恩是少數正直且有遠見的革新派知識分子，這本新書證實了她論述極為中肯且極為重要。

——柯尼爾·衛斯特 (Cornel West)，《種族議題》(Race Matters) 作者

急迫、適時且必要。

——諾姆·杭士基 (Noam Chomsky)，麻省理工學院榮譽退休教授，左翼理論大師

娜歐蜜·克萊恩是如何在川普就職後不久，撰寫出如此必要且扣人心弦的書籍？答案是因為，她身為知識分子的一生，都是為了這一刻做準備。川普是終極的商標，我們每天都能看到他一次又一次施行震撼策略。這是我們不得不讀的書——它不僅是與川普決裂的第一道聲音，更是影響最為深遠的結論。

——比爾·麥吉本 (Bill McKibben)，《自由佛蒙特》(Radio Free Vermont) 作者

娜歐蜜·克萊恩寫了這本給每個人的希望守則，非讀不可。

——阿蘭達蒂·羅伊 (Arundhati Roy) ·

微物之神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 《想像的終結》 (*The End of Imagination*) 作者

娜歐蜜·克萊恩以此書告訴我們，唐納·川普這隻怪獸並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數十年來經濟不平等、種族歧視、軍國主義與戰爭積累的產物。當川普當選總統的震撼轉變為憤怒與鬥志，《不能光說NO》急切地介入逐漸抬頭的各項運動。光靠「抵抗」是無法擊敗川普主義的，我們需要歷史、政治、策略，以及最重要的元素——我們必須深信世界能朝更好的方向邁進。現在，人們開始反對川普、反對造就了川普的經濟失調，克萊恩也為此做出極其重要的貢獻。

——基安格雅瑪塔·泰勒 (Keanga-Yamahtra Taylor)

《從黑人的生命平權運動到黑人自由》 (*From #BlackLivesMatter to Black Liberation*) 作者

娜歐蜜·克萊恩的書向來富有啟發性、大膽且必不可少。《不能光說NO》出色又易於理解，是引領世界反擊右翼企業霸權的必備藍圖。

——歐文·瓊斯 (Owen Jones) · 《權勢集團》 (*The Establishment*) 作者

推薦序

NO IS NOT
ENOUGH

醒醒吧！美國夢早已結束

陳光興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教授

娜歐蜜·克萊恩的《不能光說NO》是重要的政治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美批判圈對「川普現象」的看法、警訊與焦慮。克萊恩過去的成就眾所周知，特別是在環保運動上有很大的影響力。而對於住在北美以外的讀者而言，「川普現象」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是不是該有不同的看法？

我跟台灣一般的大學生一樣，一九八〇年代留學美國，學成後曾在美國任教，爾後的三十年間經常「回美國」，結交了不少朋友，對於美國有既內部又外部的理解。

還記得八〇年代雷根執政時期，他與英國首相奈契爾共同打造了今天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年代，弄得人心惶惶，那時我曾經告訴自己，如果他再度當選，就是離開美國的時候了，於

是一九八九年回到了故鄉，有幸碰上了台灣社會變動最快速的年代。為了瞭解、稀釋、解脫身上的美國性(Americanism)，開始在亞洲、第三世界遊走，深知亞非拉各地深厚的美國情結，但是在方法上難以分析、解套。今天的「川普現象」頗有點歷史重演的味道，不足為奇，只是大的世界局勢起了不同的變化，美國霸權已經在解體。

最早在精神思想層次上觸碰美國問題的是陳映真先生，他的《唐倩的喜劇》(一九六七)開啟了台灣社會美國夢的深度反思，至今未解¹。二十年後承繼著前輩的腳步，我個人陸續發表了數篇文章²，試圖再次開啟思想界的討論，終究沒有能夠打開局面，現在機會來了，得感謝川普再次提供了揭開美國夢的契機。

「川普現象」絕非突如其來，一條線索來自一九八〇的雷根時代，那是個認同政治大鳴大放的年代，我的美國同學們經常說：「你是男的沒有發言權」，逼得我跟她們說，「對不起，我是亞洲人跟你打平，(如果)我是男同性戀，妳輸了！」這樣膚淺無聊的爭執快速向「次／殖民地」(如台灣)擴散。記憶猶新的是一九九〇年代，在一場學術研討會私下的對話中，一位後來在朝為官的女性學者這麼說：「我(作為女性)權利還沒拿到，你們這些男人就用同性戀來質疑我們。」一直到今天的同志婚姻權，都是「美國主義」的延續³。

性別、階級、族群是認同政治的主要軸線，而種族問題一直是美國長期存在的定時炸彈。根據非洲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的分析⁴，美國至今仍然處於移住民殖民

主義 (settler colonialism) 狀態，非洲裔的「黑人」長期受到歧視，所謂印地安人（跟巴勒斯坦人）一樣，被關在「保留區」內，歐洲移入的「白人」是典型的殖民者，要解決美國的種族衝突困境必須重新打開歷史，展開全面性的去殖民工作。如果二次戰後的主導性去殖民是民族國家形式的獨立建國，那麼只有還政於印地安人才能說是脫離殖民地的初期階段，試問熱愛美國的人們如何面對這個近乎天方夜譚的命題？抱著美國大腿不放的民主自由熱愛者，又要如何處理自身的共謀？

從種族問題的視角來看，「川普現象」是歐巴馬兩次執政的引蛇出洞，帶出來一九六〇年代所謂人權運動所壓抑的白人優越感，川普正是跨階級、跨性別的頭號代言人，甚至是跨族裔的象徵——所有認同「白人優秀」的種族主義分子，甚至是「黑人」，都對歐巴馬這位「假美國人」總統感到焦慮。金恩博士的「我有一個夢」還在空中飄蕩沒有落地，「川普」的出現是壓抑者的

1. 參見陳光興（二〇一六），〈陳映真的第三世界：左翼的去殖民及其困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一〇五期（十二月號）：一五三—二二〇。
2. 如陳光興（一九九四）〈帝國之眼：「次」帝國與國族—國家的文化想像〉，《台灣社研究季刊》，一七期：頁一四九—二二二；（二〇〇一）〈美國想像的轉化〉，《讀書》（北京），一一期：二四—三〇；（二〇〇二）〈《帝國》與去帝國化問題〉，《讀書》，七期：六五—七四；（二〇〇四）〈嗆聲自身——民主運動與美國帝國主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五五期：二四二—二五二；（二〇〇四）〈從出兵伊拉克到麥克喬丹〉，《讀書》，八月號。
3. 參見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4, no. 3, Americanism 專號。
4. Mahmood Mamdani (2015), "Settler Colonialism now and then," *Critical Inquiry*. 中譯本，參見陳光興編（二〇一七）《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讀本》，台北：行人；《界而治之：做為政治身分的原住民》，北京：人民。

重返，匯聚了所有不滿、憤怒與報復，因為「川普」有強大的民意基礎支撐，所揭示的正是美國社會不願意觸碰的殖民統治。套用曼達尼的思維模式，只有當「黑人」、「白人」、「印地安人」消失時，美國的殖民時代才能宣告結束。

從大選至今接掌政權，川普總統近乎荒誕搞笑的行徑，正在快速沖垮長期建立起來的「美國民主」的夢幻，他的強大民意支持很明顯地反映出美國民主的虛妄性。所有我認識的美國友人都陷入愁雲慘霧，搖搖頭說：「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但是在國際政治的層次上，「川普現象」又何嘗不是「全球民主」的契機？川普本人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人，缺乏國際視野，更缺乏瞭解其他國家的能耐，他的政策是內向型的，沒有能力主導世界的發展，美國不再獨大的局面早在發生，他不過是臨門一腳，宣告美國引領風騷時代的結束。

危機在於那些國家地區長期養成的美國夢，不只是台灣，南韓更為嚴重，只要你是哈佛大學畢業，就算是傻子也一定可以取得教職。中國大陸問題尤其嚴重，表面反美，骨子裏親美到不行的心態隨處可見。九〇年代就有大陸知名作家感嘆說：「今天的美國就是明天的中國！」許多批判知識分子在二〇一〇年代也痛心她表示：「我的同事很多到美國生孩子！」眾所周知的江澤民政權是高度的親美。大陸的學者近二十年來在美國盤據要津，把大量美式思考方式注入中國，對社會主義時期的反帝思想進行反動，對於左翼分子與勞苦大眾真是情何以堪。吉見俊哉也早就從歷史分析了的日本長期無解的「美國主義」⁵。

美國夢是全球性的現象，超英趕美至今是第三世界普遍的心情，事實上無論是北京、東京、首爾、台北，還是曼谷、新加坡，物質條件也好，思想活力也罷，都早已不亞於英美。去年至今因為「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行動計劃，去了非洲烏干達、肯亞、衣索匹亞、埃及等地，也在印度、孟加拉、印尼、泰國、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等地持續遊走。發現例如歷史悠久的馬凱雷大學（Makerere University），與少數沒有經過外國勢力殖民統治過的泰國境內的百年學府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很多第三世界的大學機構都一樣，物質條件早已超過美國，只是人們還沒有從夢中醒來。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四日，美軍從南海不戰而退，宣告美國時代的正式結束，成為名副其實的紙老虎。關鍵不在於軍事實力，而是中國在美國的大量投資，一旦戰事發生，兩敗俱傷。而大陸為何將主要投資放在美國值得玩味，「一帶一路」或許是再次向第三世界轉向的契機，脫離「中西」二元思想結構走向以第三世界為基地的全球化（沒有亞非拉的全球化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延續），期待思想界能夠跟進改變一個半世界效法英美所造成的困境。別忘了，中國人欠人家的恩情：一九五五年周恩來代表出席萬隆會議時的座機差點被美軍打下，中國能重返世界舞台是蘇卡若、尼赫魯、納瑟等等第三世界有義氣的兄弟們努力的結果，最後阿爾巴尼亞案更是重返聯合國的關鍵。

5. 吉見俊哉（二〇一三），《親美與反美——戰後日本的政治無意識》，邱振瑞譯，台北：群學，pp. iv-xix。

所以今天的「一帶一路」必須以萬隆為前提，不是什麼勞動力、資金過剩，海外援助是大陸長期國家政策，不必然走向資本／帝國主義，在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中國只能選擇固有的第三世界國際主義道路。二〇一六年走訪位於衣索匹亞首都阿迪斯巴巴的非盟時才知道非盟是由中國資金、設計、製造、維持，但是中國建設公司的辦公室在大樓外面，這正是萬隆精神的體現，與弱小國家站在一起，共同抵抗強權。二〇一六年十二月與廣州社科院合作的「一帶一路」會議中，我們提出中國共產黨長期存在的集體領導模式，邀集亞非拉領導人、智庫、學界、業界、民眾，針對提案共商大計，我們不敢居功但是很欣慰看到去年六月間三世界領袖在中國會面；習近平先生將子女從美國知名學府撤回北京，贏得民眾的支持。過去兩年走遍中國東南沿海，發現國泰民安，沒有人餓死，老百姓對習主席愛戴中寄予厚望，期待中國能夠走出更為開闊的方向，為世界做出貢獻。

在世界各地參訪，看到的是世界正在往正能量方向前進，「低工資、低物價、高水準」是各地普遍的常態，說北京貴，東城區胡同裡六個烤餅三塊半人民幣；台灣其實是典型，王曉明教授來到台灣在各地觀察，最後說：「台灣的生活是歐洲品質。」我們的工資、失業率低，但是生活品質高是不爭的事實。在中和移民棧附近的眼鏡行，一副眼鏡連同驗光一百元台幣，各地的成衣店競相減價，其實反映的都是「過度生產」的結果。以前台灣做成衣代工，把剩餘商品拿出來賣，會受到歐美廠商的責難，經常銷毀商品來壓制市場價碼，但是現在資本、生產力一到

第三世界，大舉投資過度生產與後，在「暴殄天物被雷打」的思想下競相拋售，結果是窮人翻身。

但各地的認知還是有問題。雖然GNP、GDP以個人計算，但是第三世界家族的連結依然存在，買房子家裡全力支持。馬凱雷大學的司機一個月七十美元工資，足以養家活口，且整個人的氣質像個總統！訪問過台灣的阿爾巴尼亞教授Julian Bekko工資四百美元，妹妹失業了，就補貼她一百美元。這些都是第三世界的通性。

請大家醒醒吧！資本主義是唯一道路的美國夢早已結束，剩下是腦子問題。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九日，美軍從南海撤退幾日後，我在每廈門大學訪問，碰上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主任的演講會，會場中擠滿了哈佛夢的學子，場內人頭鑽動，場面熱烈。這位先生演講沒有內容，只是在推銷哈佛，但是中國人沒出息，像是在抱哈佛大腿一樣。我問這位東亞歷史權威，怎麼看七月十四日的事件，他不知道如何回應，我說：「美國時代結束了，哈佛也結束了。」這位加拿大籍的教授說：「哈佛永遠No.1」，我說，「對，哈佛是No.1，但是irrelevant(沒所謂)。」第二天晚間他的老師鄭振滿教授——我很尊敬的思想者——請客吃飯，論辨再度展開，這位先生最後居然拂袖而去！

二〇一二年，在上海上海雙年展辦「西天中土——印中思想論壇」時，有記者訪問，問我們要做什麼？我跟著名策展人張頌人回答：「當中國與世界走在在一起的時候，世界會改變。」幾年下來，讓我修正一下：「當印尼、印度、中歐與非洲走在在一起的時候，世界已經改變了！」非

洲是世界的未來，地大物博、人情互信普遍存在，人們的靈魂沒有被金錢吃掉，在開羅問路碰到年輕朋友，他們熱情洋溢，還給我一個三明治；在奈洛比，一位在數位科技業界工作的年輕女性告訴我，「失業不是問題，回家吃自己，有農地在，養家活口沒問題。」在中國傳統中城市一直是鄉村的延續，耕讀傳家、告老還鄉持續了幾千年，但今天不管是「鄉村城市化」或是農民工問題都一再顯示出對歷史軌跡的背離。

中國人不要太自我中心，「一帶一路」只是一個提案，印度「新香料」與印尼「新海洋時代」計劃，都是第三世界隱忍半世紀後在廢墟中崛起的表現，如何嫁接這些計劃突破民族主義，恢復萬隆相互扶持的精神，才是思想界的重要課題。

醒醒吧！請大家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愛台灣也好，在中國也罷，世界已經變了，歷史翻了一頁，我們得繼續前進，與讀者們共勉。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日於新竹寶山）

推薦序

NO IS NOT
ENOUGH

學會說NO之後呢？ 《不能光說NO》的掙扎

陳信行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所
教授

自從娜歐蜜·克萊恩的《NOLOGO》中譯本出版之後，我每年開的大學部通識課都會拿它當作教科書之一。相信很多社會學、傳播研究、文化研究相關領域的老師也一樣。作為一位面向北美主流閱聽大眾的記者，克萊恩的書在精彩豐富的資料與討論之後，往往有點讓人失望地結束在某種過度樂觀的「大家一起來！」的呼喊中。（相反地，社會科學學術作者則常會令人失望地結束在猶豫不決的「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儘管如此，《NOLOGO》仍然是迄今為止，能夠把當代全球化工業世界中，工人面對的殘酷趕工生產，與消費者失神似的不斷購買這個一體兩面的現象，以最清晰的語彙講清楚的作者。

而且她幾乎總是以局內人的身分在談「我們」的問題，而不是居高臨下地指控「你們」或「他們」，從而比許多作者更多了一份說服力。她的訊息向來清晰：資本主義危害人類、危害世界，而團結起來的「我們」有能力可以打造出不同的未來。一九九九年西雅圖反世界貿易組織的大示威標示著這個多元的「我們」成為一股難以忽視的力量，而二〇〇一年開始的「世界社會論壇」，一直高舉的口號「One No, Many Yeses!」則是「我們」的旗幟，一面多元、包容、人性、尊嚴、和平、反壓迫、反剝削的斑斕旗幟。

然而，二〇一六年前後，英國脫歐公投通過，其他歐洲國家與日本極右派勢力上升，乃至美國選出了川普當總統，這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冷酷地指出一個事實：儘管二〇〇八年以來的世界經濟危機已經使得絕大多數人看懂了、也親身感受了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殘酷及其自毀傾向，包括克萊恩（與我自己）在內的這個跨國界、跨議題的彩色全球反資本主義聯合陣線，並沒有提出能夠贏得飽受危機踐踏的勞苦大眾信任的另類出路。相反地，許多被糟蹋的人們，把他們的憤怒寄託到了販售虛幻懷舊情調與偏見仇恨的各種丑角身上，例如美國那個眾人皆知是自大的草包、肖似職業摔角選手的電視名人川普。川普的崛起與二十世紀中期經濟大蕭條時各國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歷程實在太相似，不能不讓人懷疑，經濟災難與生態災難之後降臨的，會是政治災難。

自由派政治人物及支持他們的主流媒體或許是這一波右傾風潮中最應該自責的陣營。他們

驚駭地發現了，對他們可笑的極右派對手的無情嘲笑，原來只是壯大了對手的的支持度，讓他們想為之代言的工人階級大眾，覺得被嘲笑的不僅僅是那些丑角，而是與這些丑角一樣品味不佳的工人階級大眾他們自己。自由派的政治身影越優雅，往下墜落中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狼狽模樣就越顯得不堪，「被代表」的賭爛感就越難受。

然而，進步派又何嘗沒犯錯誤？多年來，「我們」不斷用這種或那種方式指出全球資本主義發展會帶來的災禍，也不斷地批評各個議題上自由派所提出的妥協調和方案都不可能解決矛盾。但是，為什麼當災禍已經不僅是徵兆，對千千萬萬人已經成為現實困厄時，受災的人們選擇的是廉價地出一口氣（不管是出在誰身上），而不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但是，話又說回來了，如果有人選擇要拋掉資本主義的枷鎖，誰能有信心告訴他們，從此時此地到那個另類未來的道路往哪去找？主張另類道路的人們支支吾吾說不清楚的時候，台灣長久以來選舉政治中傳頌的一句諺語就會成真：「敢的人拿去吃！」說謊成性的川普們就是那種「敢」的人。

台灣長久以來的選舉政治還傳頌著許多智慧結晶，例如，只有最輸不起的人才會怪罪選民沒水準、配不上我這個太高級的候選人。娜歐蜜·克萊恩不想當那種輸不起的人——自怨自艾留給被川普打趴在地競選對手就好。認清現實的任務迫在眉睫，因此，她以極快的速度寫出了這本《不能光說NO》，試圖邀請「我們」趕快重新出發。在這種情況下，她的分析自然是充滿漏洞的。例如，用「震撼主義」來解釋許多原本說不通的情節，太容易陷入對於思考政治實

踐無益的陰謀論。本書的結尾也依舊是令人覺得太過輕易的樂觀主義，但是，她的懇切情詞與急迫感是不容忽視的。除非「我們」能夠在知識與行動上有效地回應她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否則，川普終將不斷出現，而我們的任何批判，也會僅僅是在集體走向毀滅途中的烏鴉嘴而已。

不能光說 NO

如何力抗災難資本主義，
贏取我們想要的世界

Resisting Trump's Shock Politics and
Winning the World We Need

"This is one attempt to uncover how we got to this surreal political moment. It is also an attempt to predict how, under cover of shocks and crises, it could get a lot worse. And it's a plan for how, if we keep our heads, we might just be able to flip the script and arrive at a radically better future."

—— From the Introduction

NO Is Not Enough

Naomi
Klein

娜歐蜜·克萊恩——著 朱崇旻——譯

給每日教導我在震撼中成長茁壯的母親。

——邦妮·薛爾·克萊恩 (Bonnie Sherr Klein)

我並不想推翻美國政府，
這個目標已由公司國達成。

——約翰·特魯戴爾 (John Trudell) ，

桑蒂達科他蘇族激進分子、藝術家與詩人（一九四六—二〇一五）

CONTENTS 目錄

推薦序
醒醒吧！

陳光興

3

美國夢早已結束

推薦序

學會說ZOO之後呢？

陳信行

11

《不能光說ZOO》的掙扎

前言

23

第一部

我們怎會落到今日

第一章

川普的致勝法門：成為終極品牌

38

這步田地：

第二章

第一家庭的品牌

61

超級品牌的崛起

第三章

馬阿拉歌的飢餓遊戲

74

第二部
我們目前的處境：
不平等的風氣

第四章

氣候敲響了午夜鐘聲

92

第五章

鹹豬手之王

114

第六章

政治痛恨真空

134

第七章

學著愛上經濟民粹主義

156

第三部

恐怖的可能性：
未來等著我們的震撼

第八章

災厄大師：躲避民主的迂迴戰術

166

第九章

劇毒的計畫表：當你預期危機將至，
該做什麼心理準備

197

第四部

改善的可能性

第十章

震撼主義反撲之時

226

第十一章

不能光說「不」

247

第十二章

立石蘇族部落之鑑：勇敢夢想

261

第十三章

躍進的時刻：不能再亦步亦趨

271

總結
伸手可及的關懷

附錄
躍進宣言

謝辭

300

311

317

NO IS NOT
ENOUGH

前言

震撼。

自從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之後，這兩個字便屢屢出現在人們口中——也許是形容逆轉民調的選舉結果，也許是形容許多人看著總統登上權勢的臺階時內心的情緒狀態，也許是形容他在政策革新方面的閃電戰略。「對固有系統的震撼」——正是總統顧問凱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本人用以形容這個新時代的詞句。

關於對社會上的大規模震撼，我的研究已持續近二十年——震撼是如何發生、如何受政客與企業利用，甚至是某些人為了欺騙迷惘的大眾，如何刻意加深震撼的程度。我也曾報導此一過程的相反面：社會若能理解危機，並基於共同的危機意識團結起來，就能改變世界，朝更好



的方向發展。

當我看著唐納·川普逐漸崛起，心中總有說不出的古怪感覺。這不只因為他將震撼政策施用在全球最強大且武力居冠的國家，不，不只如此。我曾以書籍、紀錄片與調查報導記錄一系列的趨勢：超級品牌日益崛起；私人財富對政治體系的影響逐漸擴大；新自由主義藉由種族歧視與對「外人」的恐懼，強行擴散至全球；企業自由貿易造成了若干破壞；還有政治光譜上的右翼人士，堅決否定氣候變遷。當我著手研究川普時，他在我眼中儼然成為科學怪人，彷彿是以上提及的趨勢與更多危險趨勢拼湊而成的產物。

十年前，我出版了《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一書，探討近四十年歷史中的種種震撼——從奧古斯圖·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流血政變過後的智利，到蘇聯瓦解後的俄羅斯，從經歷美國「震撼威懾」（Shock and Awe）空襲行動的巴格達，到經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摧殘的紐奧良。「震撼主義」，也稱「衝擊療法」，指的是系統性利用大眾在震撼過後的迷惘，推行激進的新規。這些震撼可能是戰爭、政變、恐怖攻擊、股市崩盤或自然災害，但最終都被人用以推動殘酷的震撼政策，圖利企業。

雖然在某些方面川普脫離了固有模式，他的震撼策略仍然離不開腳本，我們只須觀察在危機遮掩下快速強加新規的國家，便能摸清他的脈絡。唐納·川普在上任第一週簽署了一連串海嘯般的行政命令，人們只能頭暈目眩地試圖跟上他的腳步——當時我不禁想到人權倡議者哈琳

娜·寶娜嘉(Halina Borównska)說過的話。在共產主義逐漸崩解的年代，美國對她的祖國波蘭施行經濟衝擊療法，她表示當時國內變化的速度堪比「狗的歲數跳到人類的歲數」，並發現「人們開始出現半精神錯亂的反應。」她說，「你不能預期他們依利害關係行動，因為他們已經無法判斷——或根本不在乎——事情對自己究竟有利或有害了。」

目前的證據顯示，川普與他的親信顧問正希望人們出現寶娜嘉描述的反應，因此在國內實施震撼政策。他們的目標是對公共領域與公共利益全面開戰，防治污染的規章也好，救濟飢餓的計畫也好，將之通通擊敗。取而代之的，將會是各企業不受規範、毫無限度的自由與權勢。這個計畫不公到膽大包天、腐敗到顯而易見，唯有藉種族與性別歧視策略分化群眾，以及媒體源源不絕的驚人報導轉移眾人視線才有可能成功。當然，在那背後是突然增加的巨額國防支出，還有敘利亞到北韓各陣線戲劇性加劇的軍事衝突，以及我們這位總統關於「刑求很有用」的言論。

想看出川普政府潛藏的目的，只須觀察他滿是億萬富豪與千萬富翁的內閣。國務卿是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國防部首腦是通用動力(General Dynamics)與波音(Boeing)、剩下基本上就是高盛(Goldman Sachs)的天下。只有少數職業政客得以管理政府機構，而任用他們的標準似乎「完全不相信此機構的核心理念」或「根本不認為該機構應當存在」。史蒂夫·巴農(Steve Bannon)——明顯被排除在外的川普首席策士——在這方面十分直截了當。他在二〇一七年二月

對保守派聽眾演講時，表示川普政府的目的「解構行政國」（他所謂的「行政國」，指的是負責保護人民與其權益的政府規章與機構）。他說：「仔細看看這些內閣提名人。選擇他們是有原因的，而那個原因正是『解構』。」

巴農的天主教國族主義，與川普較正統的助手——尤其是女婿傑瑞德·庫許納（Jared Kushner）——的跨國主義起衝突，這件事傳得沸沸揚揚。不久後，巴農極有可能被徹底踢出這齣血腥實境秀（也許，當你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此事早已成真）。正因如此，有一件事情值得我們注意：在解構行政國、盡可能將業務外包給營利企業這方面，巴農與庫許納的觀點一致，完全沒有衝突。

事件展開的同時，我發覺華府上演的戲碼並非一般的政黨輪替——是赤裸裸的企業吞併，而且是鋪陳了數十年的吞併行動。顯然，長久以來收買兩大黨的經濟集團已對遊戲感到厭倦；顯然，多年來與獲選的官員應酬、多年來的勸誘與合法化賄賂，侮辱了他們「天賜的權利」。於是他們決定割除中間人——理應維護公共利益的貧苦政客——以勝者辦事的手段行事。換言之，自己動手。

這就是為什麼關於利益衝突與違反倫理的嚴肅問題往往得不到答覆。就如川普遲遲不肯揭露他的納稅申報單一樣，他也完全拒絕售出他的企業帝國，或停止從中獲益。然而川普集團須仰賴他國政府註冊其商標並賦予經商許可，川普與集團密不可分的關係，也許與美國憲法關於

總統收禮的規定相抵觸。指控川普收取外國政府贈禮與「酬金」的訴訟，已經上了法庭。

儘管如此，川普一家似乎毫不在乎。當今政府的特色，便是其近乎無懈可擊的泰然態度——彷彿不受尋常規範與法律限制。只要是威脅到他們免於懲處地位的人，就會立刻被解僱——問前任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士·柯米（James Comey）就知道了。在此之前的美國政壇上，「公司國」安置在白宮的代表人都戴了面具：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的演員笑臉、小布希（George W. Bush）虛偽的牛仔性格（背景是臭著一張臉的迪克·錢尼（Dick Cheney），即哈利柏頓公司（Haliburton））。現在，面具已然摘除，他們連裝都懶得再裝了。

情況沒有最骯髒，只有更骯髒。川普從未領導過傳統公司，他從發跡至今一直是自己商業帝國的首腦；這是個以川普個人品牌為根基建造的帝國。在融合美國總統頭銜之後，這個品牌與川普之女伊凡卡（Ivanka）的品牌一樣，得到了數不盡的好處。川普家族的經商模式並不是獨一無二的案例，許多主打品牌的跨國企業都發生了企業結構的變動，整體大大改變了文化與就業市場。我出版的第一本書——《NO LOGO：顛覆品牌統治的反抗運動聖經》（*No Logo: Ta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便提到這些趨勢。那麼，這個模式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當今的白宮之主完全無法理解川普品牌與川普總統並非密不可分，他也無法理解兩者為何應該有所區別；對他而言，總統一職正是川普品牌至高無上的延伸。

探索川普與商業品牌之間錯綜複雜的關聯時，我也深入思索這種關係對未來政治的影響。

過程中，我逐漸看出許多針對川普的攻擊為什麼無效——也找到對他進行有效反抗行動的竅門。

在眾目睽睽下，一個人竟能堂而皇之地利用公職牟取暴利，實在令人不安；川普剛上任這幾個月來，許多作為都使得人心惶惶。但是我們從歷史的脈絡便能看出，無論此時的情況有多麼不穩定，在震撼主義的作用下，情況只會變得更慘。

川普的政經計畫有幾條主軸：解構「規範的國家」；全面進攻「福利國家」與社會公益服務（使之合理化的手段，包含以危言聳聽的方式攻擊某些種族，以及抨擊行使自身權利的女性）；開啟國內開採化石燃料的狂潮（他們得先拋開氣候學不顧，並封住官僚體系中許多人的口）；最後，是展開對移民與「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文明戰爭（國內外的舞臺正不斷擴展）。

這整個計畫很顯然威脅到最弱勢的人們，不僅如此，還會製造出一波又一波的危機與震撼。在撤銷管制後泡沫經濟越發膨脹，最後在破裂時造成的經濟衝擊；反伊斯蘭政策與外國的怒火反撲時，造成對國家安全的衝擊；當氣候變得更加不穩定後，我們將受到天氣的衝擊；預防災害的安全性管制與環境管制被砍光之後，輸油管線洩漏、設備倒塌事件也極可能發生，導致產業衝擊。

這些都很危險，但更危險的是川普政府，他們利用這些震撼，推行對他們自己有利的極端政策。

一場大規模危機——無論是恐怖攻擊或金融危機——在他們的操作下，能轉變為宣布緊急狀態或例外狀態的藉口。一般的規則不再適用時，川普一夥人便能在其掩護下推動他們的陰謀，更進一步將民主的核心概念束之高閣——例如拒絕讓任何伊斯蘭教徒入境（不只是來自特定國家的人，而是所有伊斯蘭教徒），在推特上揚言要派聯邦政府工作人員壓制芝加哥的街頭暴力，或意圖限制新聞媒體。一場足夠重大的經濟危機，能成為廢除社會安全保險等計畫的藉口；川普雖然保證他會保護社會安全保險，但他身邊有許多人恨不得讓這個制度消失，他們巴望了數十年。

除此之外，川普也可能有其他動機，驅使他提升危機等級。阿根廷小說家西塞·埃拉（César Aira）於二〇〇一年寫道：「任何變化，都能改變話題。」川普轉變話題的功力令人暈頭轉向，這點無庸置疑。從瘋瘋癲癲的推特發文到戰斧巡弋飛彈，任何事件都能為他所用。上回怵目驚心的化學武器攻擊事件過後，川普空襲敘利亞的行動為他贏得了上任以來最多新聞媒體的讚美（在某些地區，這甚至引起眾人對他的尊崇）。無論是回應人們對他與俄羅斯關係的疑問，或回應複雜國際交易的醜聞，川普將持續轉變話題——而轉變話題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利用大規模震撼。

一件影響重大的壞事，不足以使我們進入震撼狀態；這件壞事不僅須影響重大，還必須是我們還未理解的事件。在事件發生最初，當事件與我們解釋事件的能力之間出現了溝壑之時，

就會引起人們的震撼反應。當我們進入這種狀態時，我們無法解釋現今的情況，只能像無頭蒼蠅般亂撞亂竄——許多人便會陷入權力人物的掌控，盲目地對彼此感到恐懼，乖巧地為成全「至善」而捨棄自身權益。

在今天，這個現象已不受限於美國，而是遍及全球。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巴黎在經過計畫性恐怖攻擊之後，法國政府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禁止超過五人的政治聚會——緊急狀態與限制公開示威的規定，持續了數月。而在英國，在脫歐選舉過後的震撼之中，不少人表示，他們彷彿在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家醒過來；在此前提下，英聯合王國的保守黨政府開始實施一系列逆行的「革新」。他們散布的其中一個觀念就是：英國恢復競爭力的唯一方法，是廢除對富人的稅賦與限制——直到英國成為全歐洲的逃稅天堂。德蕾莎·梅伊（Theresa May）便是在這個前提下，以提前大選的方式向民調支持率低的競爭對手出招，顯然希望在大眾有機會反抗與脫歐觀念迥異的緊急措施之前，先行確保自己連任首相。

先前，我每寫一本書就會花五、六年時間深入探究該題材，從多方檢視它，並且從最受影響那些人的角度報導事件。這種寫作方式的結果，就是一本本又厚又重的書，以及每本書最後又臭又長的註釋。與以往相比，這本書的寫作時間非常短，僅僅數月。我寫得很簡短又口語化，

因為這年頭沒有人有空閱讀字典般的厚書，而且其他作家也已動筆寫書，準備將這複雜故事中他們比我更瞭解的部分公諸於世。雖然這本書在短短數月間完成，但我發現過去的調查與研究並非無用，反倒能幫助我闡明川普主義的重點。我從他的經商模式與經濟政策追本溯源，對比歷史上動盪的時代，並從前人抵抗震撼策略的成功案例吸取教訓——然後想辦法解釋我們踏上這條危險路途的因果、我們該如何撐過未來的衝擊；還有更重要的是，如何快速轉移至較安全的境地，這就是抵禦震撼的路線圖。

希臘債務狂潮中的雅典、卡崔娜颶風襲擊過後的紐奧良、美軍占據時期的巴格達——我曾在數十個遭遇危難的地區報導當地情況，也因此學會一件事：抵禦震撼策略的方法確實存在。反擊的關鍵有兩個，首先，我們必須瞭解震撼政策及其受益者是誰，才有可能快速擺脫震撼狀態，開始反攻。再來是同樣重要的第二個關鍵：我們必須對世人公開一個與「震撼醫生」說辭不同的故事，而我們對世界的願景須令人信服，方能與震撼醫生的版本分庭抗禮。我們的價值觀與願景必須開啟嶄新的道路，遠離一波又一波的衝擊——我們必須團結不同種族、族群、宗教與性別的人們，而不是加深彼此之間的隔閡；我們必須治療我們的地球，而不是以戰爭與污染使之更不穩定。最重要的是，這個願景必須為受到傷害的人們——失去工作、失去健保、失去和平、失去希望的人們——找到真正的好生活。

這份願景的面貌，我現在還未知曉，只能和所有人一起尋找答案。我相信唯有所有人齊心

協力，並且在最受現今體系傷害的人們領導下，解答才能誕生在這個世界上。在這本書最末的幾個章節，我將探討幾個民間組織與思想家合作的案例，將他們設想的初步計畫與他們的希望分享給大家——這份希望，足以抗衡逐漸崛起的軍國主義、國家主義與統合主義。他們的計畫雖然仍在起步階段，我們卻能看見大眾一步步邁向革新，用大膽的計畫為所有人謀求我們所需、我們所樂見的和平友愛世界。

這些人的努力，建立在一個基礎之上：光是對壞主意與壞演員說「不」，無法解決問題；即使是最堅定的「不」，也得伴隨勇敢且具前瞻性的「要」——我們「要」一個令人信服、動人心弦的未來計畫，驅使眾多人民不顧撲面襲來的震撼與恐嚇戰術，為了實現它而奮鬥。說「不」——對川普說「不」，對法國的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說「不」，對全世界所有仇外、極端國家主義團體說「不」——或許這是促使百萬、千萬人走上街頭的因素，但是讓我們持續奮鬥的力量，來自我們的「要」。

在即將襲來的暴風雨之中，「要」是最為明亮的燈塔，引領我們走上正途。

簡而言之，本書的論點是：川普雖然極端，但他並不是離經叛道的始作俑者，而是邏輯推演的結論——是過去半世紀以來所有負面趨勢加總、混融的產物。川普的誕生，源自一個影響深遠的思想體系；這個體系將人類生命的價值以種族、信仰、性別、性傾向、外貌與體能劃分

等級，從最初的北美洲殖民時期、跨大西洋奴隸買賣到現在，系統性地利用「種族」這個武器施行殘酷的經濟政策。川普同時是人類與企業融合的化身——他一個人構築了超級品牌，妻兒則是旗下的子品牌，所有的病狀與利益衝突也伴隨此身分出現。他的存在，體現了「錢財與權勢允許一個人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在他人身上」的信念，無論是亂摸女性，或者在瀕臨暖化危機的時刻掠奪有限資源，都證實了這個想法。我們的商業文化盲目地崇拜「混亂製造者」，這些人明目張膽地無視法律與規範，並以此斂財——川普便是這種文化的造物。「自由市場」的思潮至今依然聲勢浩大，受中立派與保守派擁戴——在這種思維模式下，公有、共有的一切遭受攻擊，而企業執行長儼然是拯救全人類的超級英雄——川普更是這個思潮的化身。在二〇〇二年，小布希為設計攻打公共領域的軍師舉辦生日派對，在白宮慶祝激進派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九十歲生日。派對上，美國前任國防部長唐納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宣稱：「米爾頓體現了一個事實：所有的思想，都必須承擔後果。」他說的沒錯——那些思想直接導向了唐納·川普這個後果。

在這方面，川普的存在與崛起並不震撼。這些多年前早該消失的普遍性思想與趨勢，便是造就了川普的成因；這件事完全可以預測，甚至到狗血老套的地步。這就是為什麼，即使川普噩夢般的總統任期在明天結束，製造了美國與其他國家可怕現況的政治環境仍會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美國副總統麥克·彭斯（Mike Pence）與眾議院議長保羅·萊恩（Paul Ryan）對大權

虎視眈眈，就連民主黨的核心人物也都位在億萬富豪之列，我們即使更換白宮主人也無法贏得我們所需的世界。

關於「我們」這個用詞，當你閱讀本書時，也許會注意到我說的「我們」有時指的是美國，有時指的是加拿大。其中一個原因很簡單：我同時是美國與加拿大公民，無論在國境哪一側都存在與我關係密切的人事物。我父母是美國人，我的親戚也都住在美國，但我從小在加拿大長大，現在居住加拿大也是我自己的選擇。（總統大選那一晚，我父親傳了一條簡訊給我：「幸好我們都搬來加拿大了，妳說是不是？」）儘管如此，我在媒體界、政治界的事業都與美國密不可分；我在美國參與了無數場會議與辯論，與無數人討論該如何集結眾人力量，擔負當今世界需要我們擔負的責任。

我以「我們」這個詞談論美國事務的另一個原因，與護照、公民身分沒有關係，而是美國總統影響的不只美國人，是全世界所有人。這個國家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系、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亞軍，也是擁有全世界最強武力的國家，沒有人能脫離它的影響範圍。遭受川普的飛彈與炸彈攻擊的人，無疑承受了最重的負擔，但是川普的權力是如此之大、政策是如此之魯莽，只要是居住地球上的人，就居住在他的爆炸範圍、餘波範圍，當然還有暖化範圍內。

不可能用一個故事解釋我們到達這步田地的過程，也不可能用一個藍圖說明修復一切的方法——因為我們世界的關係太錯綜複雜。這本書不過是檢視現今離奇政壇的眾多說法之一。我

在書中探究了政治變得更糟的可能性，也思索了冷靜地翻轉棋局、到達美好未來的方法。

開始前，我們必須先理解我們說「不」的對象——因為封面上的「不」並不只針對一個人，也不只針對一群人（雖然確實針對了某些人）。我們否定的對象，包含允許這些人攀至高處的系統本身。接著，我們除了說「不」以外，也必須說「要」——我們「要」為世界的根本帶來改變，將今日的企業吞併行動轉變為歷史上簡短的一筆，以此警示我們的孩子。而唐納·川普等人將會在所有人眼前現出原形：他們不過是重症的病徵。我們所有人將齊心協力地治癒這場疾病。

註：部分文字曾出現在作者過去的文章、書籍與演講中，但是絕大部分的段落都是首次公諸於世。若希望深入瞭解本書提及的各項運動，並和更多組織與理論家取得連繫，歡迎造訪 noisnotenough.org。

書中所有引文與數據的來源已彙整成清單，歡迎至上述網站查閱更多資料。



我們必須盡快開始從「以物為主」的社會，轉變成「以人為主」的社會。當機械與電腦、謀利動機與財產權比人本身還重要時，我們便永遠無法戰勝種族歧視、唯物主義與軍國主義三巨頭。

——馬丁·路德·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Jr.)

《越南背後：打破沉默的時刻》(*Beyond Vietnam*)，1967

川普的致勝法門：成為終極品牌

唐納·川普於二〇一六年總統大選脫穎而出，成為第四十五任美國總統的那一晚，對我而言特別混亂——因為對我而言，「那一晚」根本就不是夜晚。當時我以講師的身分旅行至澳洲雪梨，由於時差的關係，我所在的當地是十一月九日星期三，接近中午時分。對我認識的幾乎所有人來說，當時是週二晚間，大家在大選開票派對上喝得醉醺醺，互相傳送簡訊。不過對澳洲人來說，那不過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工作天——因此，當我陸陸續續接獲選舉的結果時，暈眩的感覺才如此強烈。

當時我正和約十五位澳洲環境、勞工與社會正義組織的領袖開會，繞著一個關鍵事實熱烈討論。在此之前，反抗全球暖化、種族歧視、不平等待遇，以及迫害原住民、移民與女性權益



等等，各面向的革新戰爭都分開行動，互不干涉。我們提出了現今許多運動提出的問題：這些議題的交叉點在哪裡呢？究竟是什麼核心因素，導致了這些結果？我們該如何在同一時間協力解決這些問題？這樣的運動，是由什麼價值觀主導的呢？它又該如何轉化為政治力量呢？近來，我和一群同志致力在北美創造跨各運動的「人民政綱」，這項計畫稱為〈躍進宣言〉(Leap Manifesto)——我會在最後一章再次提到這個計畫。而在澳洲，不少團體也有興趣探索類似的做法。

會議開始後第一個小時，我們談論得非常愉快，未來的無限潛力令我們興奮不已。大家以十分輕鬆的態度看待美國選舉，我們就像許多革新主義者、自由派，甚至是傳統保守派一樣，深信川普會敗選。

接著，大家的手機開始一個接一個震動起來，大家變得越來越安靜，籠罩在明亮光線下的會議室，蒙上了恐慌的陰影。忽然間，我們聚集開會的原因——結合眾人的力量，在氣候問題、種族正義、就業市場等方面躍進的理想——顯得太過荒誕，所有人彷彿在一瞬間明白了不必開口也能理解的事實——我們即將被一陣強風吹得向後倒退，即使竭盡全力也只能停留在原處。而在眾人提出的各個議題上取得進步……此一可能性，似乎在我們眼前蒸發消散。

會議在無人宣布散會的情況下，安靜地結束了，大家幾乎連再見也沒說就離開了。CNN新聞宛如無可抗拒的自動導向裝置，我們默默地離開會議間，尋找更大的螢幕。

大多數的美國選民都沒有投給唐納·川普；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的支持率比川普多了將近二百九十萬票，即使到了現在，我們的總統依然對此事耿耿於懷。他之所以獲勝，是因為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一個當初為了保障奴隸主權力而設下的制度。而在全球各地，絕大多數的人們都表示，若他們有機會在這場事關緊要的選舉中投票，他們絕對會投給柯林頓。（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的調查顯示完全相反的結果，顯然川普在當地很受歡迎。）

在這陣容龐大的反川普陣營，我們所有人在那一晚或那一日有著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故事。對許多人而言，最明晰的情緒就是震撼——我們不敢相信美國會發生這種事情。而對其他許多人而言，最深刻的情緒是哀傷——種族歧視與厭女文化竟如此深植美國人民心中，以如此強烈的方式受到證實，令人難過不已。對一些人而言，心中感受到的是失望——看著美國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統候選人落選，失去成為孩子楷模的機會，心中是無限惆悵。還有一些人憤怒不已——川普的對手，竟是一位自身難保的候選人，令人感到憤慨。而對美國國內外的數百、數千萬人而言，對主要的情緒是恐懼——人們彷彿切身認知到，身為總統的川普將成為恐怖的催化劑，引出極端的種族歧視、暴力與迫害。當時許多人的情緒混雜了以上數種，還有更多難以言喻的情感。

與此同時，許多人也明白一件事：這次的選舉結果，並不只是一個國家、一個人的事。若感染了全球的是一種疾病，那川普不過是其中一個品系。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狂潮般的獨裁、

仇外、極右政治——從法國的瑪琳·勒朋，到印度的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到菲律賓的羅德里戈·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到英國的獨立黨（Independence Party），到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還有與他們相似的所有人（有些人甚至開門見山地告訴你，他們信奉新法西斯主義）——逐漸在世界各地掌權。

我和各位分享選舉當日（當晚）自己在雪梨的經驗，是因為我心裡總覺得其中含有某種重要的教訓——川普當選的消息，足以打斷我們的對話，輕而易舉地斬除我們前瞻性的計畫。我們在選舉當天感受到的情緒，是情有可原沒錯……但是，若我們接受一個前提，認為接下來所有戰鬥都將是防衛性鬥爭、是竭力抵抗川普式「退化」攻勢的鬥爭，那我們的處境將變得極端危險。為什麼？我們不能甘於維持現狀，因為川普當選前的「現狀」，就是創造出川普這個人的「現狀」。即使遭受最近一連串挫折之前，我們許多人也深切地明白，「現狀」是社會上、生態上的危機。

當然，我們必須力抗川普的攻擊，也必須力抗全球其他蠱惑民心的政客。但在接下來的四年，我們不能光採守勢；我們此時面對的危機一件比一件急迫，不能再耽擱下去了。關於氣候變遷，我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人類能採取行動的時間有限，在寶貴的時間流逝後，我們就再也無法守護穩定的氣候了。當你讀到第四章，就會明白一件事：這段黃金救援時間正迅速消失。

所以，我們需要攻守同時進行——不僅得抵禦現今的攻擊，還必須找到合適的空檔，建造

我們所需的未來。在說「不」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大聲說「要」。

然而，在我們開始說出取代川普、取代川普政府、取代川普主義的「要」之前，我們得先睜大眼睛，看清我們現在的處境、我們來到這步田地的過程，以及短期內事態惡化的可能性。關於最後一點，我只能告訴你：雖然我們似乎將迎來末日，但我們不能因此而自甘衰弱。在這個危險的地域，我們只能冒著重重艱難踏出去，因為這是唯一避免重蹈覆轍、唯一能找到長久解決方案的辦法。

不是政黨輪替，而是企業政變

唐納·川普的內閣滿是千萬富翁與億萬富豪，這顯現了一個淺顯易懂的事實：擁有地球大半資源的人們，尚未知足。這些人的資產逐年成長——根據樂施會(Oxfam)最新的數據，這世界上半的財富握在八個男人手裡——而有錢有權的人們打定主意撈取更多財富。

根據國家廣播公司(NBC)於二〇一六年十二月的新聞報導，川普選取的內閣閣員各個身價不斐，加總起來是令人震驚的一百四十五億美元（這還不包含身價超過一百五十億美元的「特別顧問」卡爾·伊坎(Carl Icahn)）。更可怕的是，川普內閣的主要成員不只是超級富豪，更是一群為了財富無所不用其極的人。他們靠著傷害世界上最無力自救的人們來斂財，甚至在危機

當中危害我們的星球本身。這似乎是川普挑選閣員的標準之一。

川普的財政部長史蒂芬·努勤(Steve Mnuchin)是個偽銀行家，一度為「止贖機器」OneWest公司的董事長與主要投資者，在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期間，將數萬人踢出了家園。川普的國務卿雷克斯·提勒森(Rex Tillerson)曾任全球最大私營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集團的CEO。數十年來，這家公司出資贊助並推廣偽氣候科學，並且暗中對有意義的國際氣候行動施壓，同時還不忘思索如何在暖化的地球上為埃克森美孚賺取更多財富。川普的國防部與國土安全部也盡是軍武與監視系統的承包商，以及收了錢的陳情者。

我們本勝券在握

我們也許忘了，在川普當選之前，許多義憤填膺的普通人為了抵制這些產業與政治勢力所代表的不公不義，毅然起身奮鬥，並且取得了不少佳績。同樣參選總統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雖然失敗了，但他強而有力的競選主張嚇得華爾街瑟瑟發抖，怕他們的津貼與補助被奪回。桑德斯甚至對民主黨的政綱造成了顯著改變。黑人生命平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與說出她的名字運動(Say Her Name)強迫全美討論系統性歧視黑人與警方暴力執法的現象，對逐步淘汰私營監獄、減少美國獄中人數等方面有所貢獻。到了二〇一六年，所有的大型體育或文化

活動——從奧斯卡頒獎典禮到美式足球超級盃——都看得見進步的影子；關於種族與國家暴力的改變，引起層出不窮的討論。女權運動使得性暴力屢屢登上頭版，也使得關於「強暴文化」的討論登上大雅之堂。比爾·寇司比（Bill Cosby）等名人被指控性犯罪時，眾人討論的聲音因女權運動而改變；而被控訴性騷擾超過二十名女性的羅傑·艾爾斯（Roger Ailes），也在女權崛起的現在，被驅離福斯新聞（Fox News）的高位（雖然本人全盤否認了性騷擾的指控）。

先前，關於氣候的運動也屢戰屢勝，對抗輸油管線、天然氣液體壓裂法，以及北極鑽油的戰況連連告捷，而領頭的往往是重新興起的原住民團體。不僅如此，二〇一五年的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通過將氣溫維持在特定範圍內的條例；為達到此目的，價值數兆的化石燃料必須留在地底，不得開採。對埃克森美孚這樣的公司來說，若實現這些目標，公司的存在本身便受到威脅。

我在雪梨參加的會議暗示我們，在美國國內外的人逐漸意識到，最要緊的任務是連結眾多社會運動，構築共同的計畫，並集結成以獲勝為目標的革新聯盟。這個聯盟的根基，將會是深刻的社會包容與對地球的關懷。

川普政府的故事，不只涉及一個危險又荒誕的人物，我們應該將它放在上述背景之中——隨著各項社會與政治運動交集，訴求更公正、更安全的世界時，反對方也毫不留情地還以顏色。這幫掠奪成性的放款人、動搖全球的污染者，與從戰爭與「安全」獲利的人們，決定集結起來

奪走政權。他們不願冒著世界進步的風險（進步意味著他們的損失），寧可支配政府，保護他們的不義之財。川普與他任用的一票人，已經在數十年間看著公共領域一點一點化為私人所有物，如今，他們自己出手控制了政府。奪權任務，完成。

實現企業的願望

身為政治素人的川普，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推銷說辭，雙管齊下。第一點：我已經有錢到無法被收買了。第二點：我一定能修復這個腐敗的系統，因為我瞭解它內部的運作——我也曾經以商人的身分操作系統、收買政客、逃避賦稅、外包生產，所以還有誰比我和我這群富豪朋友更有資格處理問題？

當然，上演的戲碼與他們先前的說法完全不同。川普與內閣那群前任經理以驚人的速度著手改造政府，圖利他們自己的企業、過去的企業與同樣富有的階級。剛上任的數小時內，川普下令大幅減稅，讓企業的賦稅從原先三二五%降至一五%，並宣告在未來減少七五%的稅收法規。他的賦稅計畫為富豪階級——例如他的內閣閣員（當然還有他自己）——留了許多機會與漏洞。川普直接任命女婿傑瑞德·庫許納領導一支企業經理組成的「特警隊」，負責尋找應被剷除的規章、能被私有化的計畫，以及讓美國政府「經營得像一家偉大的美國公司」的辦法。「根據

公共公民組織(Public Citizen)的分析，川普上任不到三個月便見了至少一百九十位企業經理——然後，他宣布不再公開訪客資訊。」新政府被質問在這幾個月有了哪些實質成就時，預算局局長麥克·馬瓦尼(Mick Mulvany)舉出川普狂風暴雨般的一連串行政命令，特別強調：「這些大部分都是去除其他法律的法律，還有去除其他規章的規章。」

說的沒錯！川普和他的團隊準備消滅那些保護孩童不受環境有毒物質傷害的計畫，他們允許汽油公司不將他們釋放的溫室氣體量全部上報，並致力推動數十、數百件類似的計畫。簡而言之，這是毀滅性的改革。這就是為什麼當人們針對利益衝突而發出微弱的抗議時，川普等人卻哈哈大笑——因為這整件事正是利益衝突。這就是事情的本質。

而對唐納·川普，一個完完全全融合了個人與企業品牌——甚至無法辨清兩者界線——的男人而言，利益衝突代表了一切。川普上任到目前為止，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棕櫚灘的私人度假勝地——馬阿拉歌俱樂部(Mar-a-Lago)，以及它的新用途：類似嘉年華會的會員制、營利制「冬季白宮」(國務院的網站上，甚至有一小段時間這樣為它打廣告)。一位俱樂部會員對《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表示，去馬阿拉歌感覺像「去迪士尼樂園，而且你知道米老鼠會整天在那裡陪你玩。」……但是，在這個全面向的品牌創建行動中，「迪士尼樂園」不是迪士尼樂園，而是美國樂園，而「米老鼠」則是美國總統本人。

終極品牌霸凌

當我看到關於馬阿拉歌的這句引文時，我發現嘗試理解這位總統的過程中，我不得不做一件我多年來不斷抗拒的事情——再度回到我第一本書《NO LOGO》以及那個企業行銷與打造品牌的世界。

這本書著重於商業歷史上一個關鍵時刻——當耐吉(Nike)與蘋果(Apple)這等企業巨獸改變對自身的認知，從製造實體商品的公司轉型為品牌創造者的時刻。他們相信自己的未來存在於打造品牌——並在其中創造出集團意識。工廠都無所謂了，維持龐大的勞工陣容也無所謂了——一旦這些公司發現他們最主要的盈利來自他們所創建的品牌形象，這些「有名無實的品牌」(hollow brand)便會得到一個結論。他們的產品由誰製造並不重要，而製造產品的勞工薪資多麼低廉也不重要，這些不過是承包商的管轄範圍。這樣的發展，對國內外勞工產生衝擊性的影響，也為新的反企業運動增添動力。

撰寫《NO LOGO》的四年，是全身心浸泡在品牌文化中的四年——我花了四年一次又一次觀看美式足球超級盃的廣告、疾速翻閱《廣告時代》(Advertising Age)雜誌以尋找企業合作最近的創新、閱讀泯滅天良的商業書籍以學會觸及個人品牌價值的方法、遠征NikeTown商店、造訪亞洲的血汗工廠、前往巨型購物中心、參觀品牌小鎮，還有在夜間帶著廣告剋星(ad-buster)與

文化反堵者 (culture jammer) 突襲廣告看板。

有一部分確實很好玩——我對優秀的行銷策略沒什麼抵抗力——但是到了最後，我彷彿超過了我所能承受的閾值，患了近似品牌過敏的病症。假若星巴克 (Starbucks) 新創了某種將他們咖啡廳「去品牌化」的方法，假若維多利亞的祕密 (Victoria's Secret) 將原住民族的頭飾用在時裝秀上，我不想寫任何與之相關的文字——我已經遠離那個貪婪的世界了。問題是，倘若你想瞭解川普，你就不得不瞭解造就了他的世界——而那很大一部分就是品牌化的世界。我在《ZOO LOGO》提及的各種糟糕趨勢，都能在川普身上看到：從不負擔照顧那些為你製造商品勞工的責任、無視承包商網路對勞工的壓榨、到類似殖民政策的無盡慾望，非得在日所能及的地方通通標上自己的名字。這就是為什麼我決定重返那個光鮮亮麗的世界，看看它如何解釋唐納·川普的崛起、他如何掌握世界最有權勢的要職，說不定還能釐清那個世界對現今政治整體的解釋。

超越物質世界

超級品牌的崛起並非無中生有，它源自於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由管理學理論家發展出的想法——一個乍看下人畜無害的想法：一家成功的公司，生產的主要商品並非產品，而是品牌。川普以他自身無禮的角色為根基，打造了他自己的超級品牌，也是依循這個想法。

在這個理論成形之前，商業界雖然明白透過廣告推廣自家品牌的重要性，每一位實力派製造業者仍然以製造商品為主。一九三八年，《財星》(Fortune)雜誌一篇社論報導寫道：「工業經濟體系最根本、最無可改變的功能，便是製造物品……消費能力源自工廠、土地與地底。」

但是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汰漬(Tide)、Levi's、萬寶路(Marlboro)等著名品牌的商品銷售量逐漸下滑。問題的根源在於，市場上滿是近乎無異的商品，而在經濟衰退期，消費者選購的標準從品牌轉變為價格。舊時的招數——廣告看板、電視廣告——似乎都失靈了，消費者彷彿對促銷手段產生了抗性。「創意行銷總監大衛·魯巴斯(David Lubars)令人印象深刻的說法是，消費者「就像蟑螂一樣——你拿殺蟲劑一次又一次地噴他們，過一陣子他們就免疫了」。」

而在這時，一種新型企業開始逐漸壯大，市場占有率足以與全美國的製造業者抗衡；這些就是像耐吉、蘋果，以及後來的湯米席爾菲格(Tommy Hilfigers)、星巴克等公司。他們的營運理念與以往迥異：以公司為中心，創建一個超越商品本身的理想或品牌，利用它向擁有相同價值觀的消費者伸手，然後將商品標上昂貴的價格——因為他們賣的並不只商品本身，而是深深銘刻在人類心中，想要歸屬於某個團體的渴望。

所以當年輕人大半夜去排隊買一雙二百五十美元的耐吉球鞋時，他們買的並不是球鞋本身，而是「Just Do It」這個概念，以及麥可·喬丹(Michael Jordan)這個超級品牌所代表的夢想——「超級品牌」這個詞彙，最初便是用以形容這位運動員不斷成長茁壯的事業帝國。當年輕人的父

母購買蘋果電腦時，他們買回家的是「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這個口號中，極為樂觀的未來願景。(甘地、馬丁·路德·金恩、畢卡索、曼德拉、達賴喇嘛，已故或在世的革命、藝術名人面孔伴隨廣告出現，可信度也隨之上升。)當通勤族手中的咖啡價格忽然翻了四倍，是因為星巴克賣的並非普通的咖啡，而是他們執行長所說的「第三生活空間」，一個不是家也不是辦公室的的生活空間。(所謂的「第三生活空間」曾指人們能不依靠企業的助力，自由聚集的社區空間，但這種空間在當時已逐漸消失。)

在那個時代，還有另一個關鍵的思維轉變：既然真正的商品是品牌而非物品，那這個品牌就能投射到任何與原商品無關的物品之上。雷夫·羅倫馬球(Ralph Lauren)賣起了繪畫顏料，維珍集團(Virgin)賣起了婚紗禮服與汽水，星巴克推出一系列爵士樂CD。無限的可能性等著他們去開發。

許多高度品牌化的公司，發表了(在當時)十分大膽的主張：製造商品不過是他們業務附帶的一環，而由於近來貿易自由化、勞工法改革的緣故，他們也能將製造的工作透過承包商與分包商轉給薪資低廉的製造業勞工，以及海外的廉價勞工。實質勞力由誰付出並不重要，因為真正的價值並不在製造，而是在設計、創新，當然還有行銷。

業界的管理階層很快地達到共識：不使用這種經營模式的企業都太過膨脹了，他們擁有的東西太多、聘僱的員工太多，被太多事物拖垮。舊時的製造業——自己經營工廠、對數萬名全

職的長期勞工負責——在人們眼中越來越不像通往成功的道路，反倒成了笨重的累贅。企業的新目標就是成為有名無實的品牌——雖然擁有的實物不多，卻必須為一切事物打上品牌的標誌。接著，跨國企業紛紛開啟了擺脫負擔的賽跑。只要擁有最少實物、聘請最少員工，並且創造出最強烈鮮明的形象而非產品，你就能成為贏家。

沒有空間，缺少工作

這種經營模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興起，直接造成了兩種影響。隨著各品牌向外尋找、拓展出新天地，以及推廣宏大理念、觸及目標客群的「品牌延伸」，我們的文化逐漸充滿各色行銷策略。另一方面，工作市場與勞工的價值大打折扣，變成用畢即可丟棄的存在。

耐吉與愛迪達（Adidas）這類品牌在營銷圈激烈競爭，他們部分的产品卻在同樣幾家工廠生產，縫製鞋子的也是同一批工人。有何不可呢？物品的製造不再被視為「核心競爭力」，公司總部（現在越來越多人稱之為「園區」）想盡量脫離這些凡俗事務，將精力集中在他們心目中真正的業務上：創造一個無比強大的企業神話，強大到一個品牌標章就能賦與任何物品特殊意義。

在新聞報導中，這種現象就是「X公司或Y公司決定將工廠轉移至工資較低廉的區域」。但是，當我造訪印尼與菲律賓專門製造蓋璞（Gap）衣飾或IBM電腦等名牌商品的血汗工廠

時，我發現新聞媒體的報導與事實仍有一段差距。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公司並不是將原本位於北美或歐洲的工廠遷移至亞洲，而是關閉工廠後再也不重開。這段期間內，異常複雜的供應鏈急速增加，我們越來越難得知一樣物品究竟是在何處製造、由誰製造的。同時，一波醜聞的浪潮也猛然襲來：勇敢無畏的調查記者與勞工團體一次次揭發企業界醜聞，例如標上麥可·喬登品牌的耐吉球鞋或掛了迪士尼(Disney)品牌保證的T恤，實際上卻是在海地或印尼令人咋舌的血汗工廠中生產製造。然而，當記者或消費者試圖讓公司為此負責，公司給的回應幾乎毫無例外：「我們和各位同樣震驚，我們將停止與這個承包商合作。」

這種經營模式成功的原因，並不是什麼祕密。如果你做得夠好——如果你的廣告夠漂亮，如果你投資了夠多成本進行設計，如果你經由無數的贊助支持與交叉促銷計畫使品牌具現化——人們就願意為你的商品付出天價。這也是為什麼，所謂「生活品牌」獲取成功後，一股狂潮也隨之興起。各家品牌開始相互競爭，比誰擁有範圍最廣的品牌延伸，比誰能創造出最讓消費者身歷其境的3D體驗——讓顧客得以爬進品牌之中，與他們最愛的品牌合為一體。

那麼，這些一九九〇年代的歷史，與唐納·川普又有什麼關係呢？關係可大了，川普的商業帝國便是逐字逐句依循這個公式建造起來的。他的公司像許多公司一樣，很久以前便捨棄了本土高投入的製造業，留下了一個個充滿憤怒與絕望之情的勞工社區。成為總統候選人之後，川普想辦法利用人民心中的忿懣，一步步走向白宮。了不起的騙局。

川普秀

在一九八〇年代，川普剛開始成為全國性人物之時，他仍然是個傳統房地產開發商。他內心存在一種將自己名字印在一切事物之上的慾望——他將名字揮灑在紐約與大西洋城許多建築物上頭；他持續不斷地操作新聞媒體；他將自己與妻子、情婦的關係變成活生生的八點檔連續劇。結果是，川普的曝光率超越了他原先所能及的高度：他的臉頻頻出現在雜誌封面，從《時代》(Time)到《瀟灑》(GQ)都看得見他的身影，並且在好萊塢電影與電視節目上客串演出。早在當初，他便對打造品牌有了本質上的理解——他曾對《花花公子》(Playboy)雜誌表示：「這場秀正在各地上演，門票全賣光了——這場秀，就是川普秀。」儘管如此，他的經營核心依然符合傳統：無論是飯店、豪宅公寓或賭場，都是買進房地產之後如常經營。

到了一九九〇年代，這一切開始改變了。改變的契機，是川普在大西洋城的賭場經營失敗，即使在他踏上宣告破產的道路之前，他的產業便逐漸落入銀行家掌控。然而，他並沒有完全失去對資產的控制；投資家似乎深信他們需要「川普」這個名號——他的個人品牌——否則紙牌屋便會崩解。這就是現實世界中，一個耳熟能詳的名號附帶的價值。

在這時，川普雖然主要經營營造業，卻也親眼見證了耐吉等公司利用有名無實的品牌賺進大把大把鈔票。於是，他決定逐步跟進。一開始，他為經濟結構中從未有過品牌的一部分打造

了品牌——為高檔房地產標上品牌，那就是川普的創新。想當然耳，過去也曾存在過全球性飯店品牌與連鎖度假村品牌，但川普開闢了全新的概念，告訴你一個人工作的場所（辦公大樓）、居住的場所（豪華公寓）、娛樂的場所（高爾夫球俱樂部或度假勝地），都能夠成為一個全球性奢侈品品牌旗下的子企業。就像迪士尼自家的品牌小鎮——佛羅里達州塞拉布雷遜鎮（Celebration）——一樣，川普銷售的是一個機會，一個一週七天、全天二十四小時居住在他品牌之內的機會。

不過真正的突破性進展來自馬克·柏奈特（Mark Burnett），這位實境電視節目帝國之主對川普提出了《誰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的構想。在此之前，川普忙著解決破產的問題，以及設法與失去耐性的銀行家交涉；現在他忽然獲得寶貴的機會，得以一舉躍上超級品牌的同溫層。這些精緻的公司不必自己製造產品，只須建立品牌形象並四處投射，便能賺取巨額利潤。川普若能位居超級品牌之列，便能擺脫自己建造建築物的負擔。

他立即明白了這個節目的潛力。這個電視節目將聚焦在他金碧輝煌的生活，拍攝他宮殿般的住宅與豪華噴射機，替他達成數十年來的任務——將「川普」這個名號與物質上的成功連結在一起。在節目第一集上映前，他早已做好準備，將以川普的名義推出一款男士衣飾。他對電視臺的公關人員表示，即使《誰是接班人》的「收視率不高，對我的品牌還是有很多好處。」

但節目的收視率很高——高到令人欽佩。那之後不久，川普便推出了形形色色的子品

牌——從川普古龍水到川普礦泉水到川普眼鏡到川普彈簧床到川普大學。在美國現任總統眼中，世界上不存在不能插上川普旗幟的產品。

最重要的是，川普並不像其他品牌那樣，花錢請著名電視節目替他的品牌打廣告。《誰是接班人》給了他一個平臺，他不僅能從中獲利，還能靠節目免費推廣自己的品牌。不僅如此，他的節目也替其他品牌打廣告，以此賺入數百萬美金。例如在二〇一一年四月，《名人接班人》（*The Celebrity Apprentice*）收錢宣傳的產品比其他電視節目都來得多，足足一百二十樣產品。這就是一個真正的超級品牌：川普創立了一個包含眾多品牌的品牌。（他甚至將子女帶上這個節目，開始培育新品牌。）

那麼，當你達成了這樣的成就，你的下一個目標又是什麼呢？答案是，連結你的品牌與至高權勢的象徵——白宮。

時髦寡頭政治

然而在那之前，川普還須要做到最後一件事，方能完成蛻變。他徹底改變了自己企業的核心：房地產。以往他自己建造建築、自己擁有建築，但川普發現他不必那麼辛苦賺錢。他只須將自己的名號賣給世界各地的開發商，讓他們利用「川普」品牌的名聲吸引買家與顧客到他們

建造的辦公大樓、豪華公寓與飯店。那些開發商會承擔建造與相關責任，即使計畫失敗（這種事情時常發生），川普仍然能收取授權費。他的授權費可不容小覷，根據《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關於巴拿馬一棟酒店豪華公寓的報導，「川普幾乎沒有投資任何錢財，卻賺了至少五千萬美元」。

他仍然擁有幾棟旗艦資產，包括紐約的川普大廈（Trump Tower）以及佛羅里達的馬阿拉歌俱樂部。但是，若你仔細觀察川普品牌名下的眾多房地產——從杜拜的川普國際高爾夫俱樂部（Trump International Golf Club）到位於印度、加拿大、巴西、南韓與紐約市的許多川普建築——你就會發現，川普實際上並不是這些資產的所有人，或者他擁有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的收益，主要來自品牌名稱的授權。

川普之所以在國際上功成名就，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便是時機。在他踏入全球高檔房地產界的時刻，逃過稅賦的巨額私人資產正滯留在富豪手中，尋找安全的去處——至今依舊如此。根據英國發跡的租稅正義聯盟組織（Tax Justice Network）資深顧問詹姆斯·亨利（James S. Henry）的說法，二〇一五年藏匿於全球各地避稅天堂的私人財富，估計在二十四兆至三十六兆美元之間。金碧輝煌的豪華公寓，再加上豔俗的審美觀，完美地迎合了全球各地——從莫斯科到哥倫比亞——新興寡頭政客的胃口。

但川普的目標客群不只是富豪，他藉由《接班人》系列節目創建的品牌帝國，讓他能同時

吸引富裕與中薪階級的消費者。如果你是收入可觀又喜歡豔俗風格的人，就能加入他的海灘或高爾夫俱樂部，或購置川普品牌大廈的房產，以及川普品牌的室內配置。如果你是預算有限的普通百姓，也能買下小片小片的川普夢——絲滑的鮮紅川普領帶、一份川普牛排，或一本川普書。

你們都被開除了！

川普在邁向白宮的競選過程中，不斷高喊著製造業工作機會都消失了——而這些正是他——有機會便外包給別人的工作。他作為商人完完全全地利用了外包經濟，他女兒伊凡卡的公司亦是如此。當一篇篇血汗工廠的醜聞報出來時，我們一點也不訝異——例如位於中國嵯州市，負責製造川普領帶的工廠，其工作條件令人驚駭不已，而製造伊凡卡品牌鞋履的中國工廠更是怵目驚心。二〇一七年四月，公平勞動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一九九〇年代，在一樁又一樁血汗勞工醜聞之中誕生的監察機構——發布報導，將中國血汗工廠的實情公諸於世。伊凡卡旗下洋裝與女式襯衫的主要供應商之一在中國設廠，工廠的員工一週工作近六十小時，時薪卻幾乎只有一美元（遠遠低於中國市區製造業勞工的平均薪資）。大多數員工也沒有任何健康保險或生產津貼——對提倡女性勞工權益的伊凡卡而言，不是什麼光彩的事蹟。

在美國與國外，建造許多川普品牌飯店與大廈的過程中，也同樣爭議頻傳。例如《Vice》雜誌的調查報導顯示，即使在勞工被當作奴隸對待的杜拜，建造川普品牌高爾夫球場的移工所受的待遇卻更令人咋舌。撰寫那篇報導的班·安德森（Ben Anderson）表示，那些勞工的宿舍環境極其糟糕，「一間房住二十一個人，老鼠滿地跑」，而浴室設備更「不像是給人用的」。

川普集團（Trump Organization）發表了聲明，表示「不接受『川普』名下計畫項目中，任何非法勞工待遇」。當然，用膝蓋想也知道，杜拜的這項計畫是由其他公司包辦，川普只不過是授權使用品牌名稱罷了。

換成是其他品牌，也許會被類似的報導擊潰，但川普集團卻不當一回事。背後的原委，與唐納·川普建造商業帝國的品牌理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對醜聞免疫

川普在公開場合提到他的品牌時，總是以品質優良與奢華高級等詞彙形容它，但這不過是他的花招罷了。川普旗下的飯店與度假村，壓根不在世界前十豪華住宿品牌之列；倒是四季酒店（Four Seasons）與奧布羅伊（Oberoi）等品牌每次都穩坐前十（相較之下，馬阿拉歌俱樂部反而在二〇一七年一月登上榜單——不過，是食安事件的榜單）。事實不如廣告令人嚮往，川普品

牌代表的即是「財富」本身——以更粗俗的用詞來說，就是錢。這就是為什麼川普品牌的美學設計一律是「《朝代》(Dynasty)混融路易十四」風格；這就是為什麼川普與黃金的关系，是超人與氦石關係的相反——超人只要接近氦石便會體力不支，而川普只要遠離閃亮亮的東西就會頹然倒地。

唐納·川普的個人品牌稍微不同，但也有著同樣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品牌就是「終極老闆」，他就是有錢到可以在任何時間對任何人為所欲為的男人（這也包含對他喜歡的任何女人上下其手）。

川普為何如此執著於財富的符號，我們能由此看出一些端倪。金色簾幔與私人噴射機，川普時時刻刻利用這些影像提醒眾人，川普品牌就是資本主義成功者的終極體現——權勢與財富。這也是為什麼競選總統時，他將他個人的資產（在一番誇飾後）當作宣傳主軸。

這也是他不受血汗醜聞影響的原因。在他創造的世界裡，他的所作所為不過是「贏家」的所作所為；一個被人踐踏的人，當然就是個魯蛇了。這路思想不只適用於血汗勞工的醜聞——幾乎所有傳統常見的政治醜聞，都無法動搖川普。川普不光是以政治素人的身分踏入政壇，不依循既有遊戲規則出招，他是帶著自己的一套規則踏入政壇——打造品牌的規則。

根據他的規則，一個人不必成為客觀上的好人，只須持續不斷地忠於你自己創建的品牌。品牌經理之所以如此執著於「紀律」與「重複」，也是因為這條規則：一旦你找到了你的核心品

牌，你唯一的任務就是賦與它形體、投射你的品牌，並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背誦品牌理念。只要你全神貫注、專心致志，就幾乎沒有人動得了你。

這條規則應用於現任美國總統身上時，問題就大了。多年來，唐納·川普以令人驚訝的一致性，創建了一個從內到外都無關道德的品牌。競選時，他若無其事地接下了幾乎所有的「嘿！逮到你了」招數。逃避聯邦稅賦？那叫「聰明才智」。拒絕公開納稅申報單？你打算押著他拿出文件嗎？川普曾在競選時一場演說中，半開玩笑地表示：「就算我站在第五大道路中間對一個人開槍，我的選民也不會離棄我。」在川普的世界裡，成功的終極表徵並不是堆積成山的黃金，而是「免於懲處」的特權。

綜上所述，防止當今政府進行明目張膽的盜竊統治，是一條漫長而艱險的道路。但是我們將在下章看到，川普的品牌防護泡並非無懈可擊，只要懂得如何下針，我們還是能找到擊敗他的方法。

第一家庭的品牌

也許唐納·川普從未想過自己有機會坐上總統大位，畢竟在選舉結果出爐前，認為他能獲勝的人非常少。然而，當他在共和黨的黨內初選獲勝時，他無疑發現打造品牌的終極工具——美國總統之位——伸手可及。身為美國總統的每一分每一秒，川普的品牌價值與企業價值便會持續上漲，光是占據美國最高公職，他便能直接且顯著地獲利——而這也正是利益衝突的規則應該防止的情形。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了未經探索的地域，因為人形超級品牌是相對較晚出現的現象。我們沒有預期會發生這種事情，既有的規則也無法對應到現況。人們不斷地發問——他會放棄他的事業嗎？他會賣了他的公司嗎？伊凡卡會嗎？然而，這些問題本身的意義不明確，因為川普一



家的主要事業，就是他們的名號。你無法分離川普這個人與川普這個品牌，因為兩者在很久以前早已合而為一。他每次踏進他的房地產——高爾夫俱樂部、飯店、海灘俱樂部——白宮記者團便如影隨形，而他的品牌價值也跟著水漲船高。如此一來，他的集團能售出更多俱樂部會員、租出更多房產，並提高它們的價位。

川普家族看待品牌塑造與政治職務的關係，有他們自己的一套邏輯——我們能透過梅蘭妮亞·川普（Melania Trump）成為第一夫人前不久發起的訴訟，看清他們的邏輯。《每日郵報》（*Daily Mail*）在網站上的一篇報導，暗示她曾經做過伴遊女郎，梅蘭妮亞因此向經營網站的公司索賠一·五億美元。她當然有權索賠，但幾乎沒有經營任何事業的她，有什麼理由指稱自己損失了足足一·五億美元呢？她這場官司的癥結點在於，梅蘭妮亞身為第一夫人「將會在數年任期內成為世界上曝光率最高的女性之一」，本可創建「銷售各類產品」的賺錢品牌，「於數年內建立價值數千萬美元的商務關係」。（最後《每日郵報》與之和解，在道歉後支付了數目未公開的一筆賠償金。）

第一夫人利用政治角色創立生活品牌的案例，並非前所未見。前任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之妻莎曼珊（Samantha）在丈夫離開首相一職短短五個月後，宣布推出她自己的「職業女性」系列服裝。但梅蘭妮亞的訴訟案件之所以驚人，是因為她試圖跳過打造品牌的階段，直接索取錢財。此外從訴訟的原始文書不難看出，川普一家對總統一職的態度是：利用公

職這項短期投資，在長期使自己的商業品牌價值大幅增長。

我們也能在伊凡卡身上看出這種思維。拿人民稅金辦事的公職人員竟叫賣她的商品——包括她父親在推特上的言論，以及總統顧問凱莉安·康威在全國性電視節目上「打廣告」，呼籲觀眾「去買伊凡卡的東西！」自我諷刺的是，在二〇一七年四月六日，《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報導指出：「中國政府暫時批准伊凡卡·川普公司的三個新商標，公司得以在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獨家販售伊凡卡品牌的珠寶首飾、包包與溫泉療法服務。」當天發生的事不只如此。「當晚總統之女和丈夫傑瑞德·庫許納，與中國領導人夫妻在馬阿拉歌俱樂部共進晚餐，享用牛排與比目魚大餐。」這正是傑瑞德·庫許納本人安排的政治高峰會。當人們問起之中的利益衝突時，伊凡卡向來強調：她父親將川普集團業務交付給他的兒子代理（但他仍然收取利潤），因此已經遠離了商業事務，她自己也將公司業務託付給「獨立的管理人」——丈夫的弟弟與妹妹（但她仍然收取利潤），因此也已遠離了商業事務。這已經不是任人唯親的範疇了，而是將美國政府視為家族營利事業。

我們知道川普當上總統之後，這個由品牌構築而成的家族變得更有價值了——凱莉安·康威上電視打廣告之後，伊凡卡的公司業績創了新紀錄。馬阿拉歌俱樂部的會員費用也從一年十萬美元漲到二十萬——有何不可呢？多付了一倍會費的你，有機會在晚餐會上見證關於國防問題的高風險會談，有機會與來訪的異國領導者親近親近，甚至有機會看到川普宣布對他國進行

空襲。當然，你還有機會遇到總統本人，還能獲得默默影響他的機會。（進出俱樂部的個人資料並不公開，所以內部發生了什麼事，又有誰知道呢？）數十年來，川普賣的是接近財富與權力的誘惑——這就是川普品牌的意義。但現在，他能將真正接近財富與權力的機會，呈給付費的顧客。

川普於馬阿拉歌俱樂部的所有權本身，便告訴我們許多事。他在一九八五年購置了馬阿拉歌，而在那十年前，莊園的主人——社交名流瑪裘麗·波斯特（Marjorie Merriweather Post）——將之贈與美國政府，希望馬阿拉歌能成為總統休養的場所，或成為「冬季白宮」。儘管如此，沒有一位總統用過它，最終美國政府歸還了莊園的所有權。早在二〇一六年總統大選前許久，川普便經常大肆宣揚此事，聲稱他居住在總統等級的豪宅裡。現在回想起來，他扮總統的遊戲似乎已進行了三十年，而經過二〇一六年大選後，他的幻想成了真——還是說，真實世界已然被川普的幻想吞噬殆盡？這和關於川普的其他事一樣，難以判辨。川普也許將這幢位於棕櫚灘的宅第稱作「冬季白宮」或「南方白宮」，但從各方面而言，它與白宮一詞相差甚遠。白宮是公有單位，而馬阿拉歌至今仍是間私人、營利、會員制俱樂部，營收直接流入川普一家人的口袋。

只要你是總統，拒絕售出自家公司便會導致利益衝突的爭議，因為美國政府的一舉一動都可能影響股市，甚至是油價（我們在之後的章節將再提及此事）。然而，川普這類型的品牌公司

卻又是另一回事了。此間利益衝突並不限於特定的法規或政治行動，而是存在於各個角落、永遠不會消失的矛盾——矛盾的根源，在於川普任職總統這件事本身。生活品牌的價值時常大幅變動，變動的根據，是品牌在文化中占據的位置，所以任何提升唐納·川普曝光率、在人們心中植下他「無所不能」之印象的事物，都能直接提升川普品牌的價值，也提升了顧客願意付出的金額。大則在豪華公寓開發案印上川普的名字，小則在他的高爾夫球場打球，或者購買他的領帶。

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出川普有任何退讓的跡象，他仍舊將自己總統的身分利用得淋漓盡致。根據二〇一七年四月一篇《紐約時報》報導，「川普先生的事業現在由他成年的兩位兒子管理，目前在三十六個國家總共有一百五十七項商標申請案待審核。」

川普家的兒子，究竟在賣什麼呢？

二〇一七年一月，唐納·川普的兒子艾瑞克(Eric)出差至烏拉圭，造訪一名為新建大廈買下川普名號的開發商。當時這件事引起一波怨聲，人們不敢相信大把大把美國稅金竟用於特勤局派遣的隨扈，以及其他陪同艾瑞克出國的政府官員。光是住宿的費用就高達十萬美元，等同於大眾直接「補助」川普的私人交易。但這僅僅是醜聞的表面，核心問題是，他們在烏拉圭宣

傳的是川普品牌——由於老闆即將成為美國總統，品牌的價值也跟著扶搖直上。

我們還沒提到貪污的可能性呢。因為川普的兒子——艾瑞克與小唐納（Donald Jr.）——賣的是無形且價值浮動的商品（「川普」這個名字），買家可能花六百萬美元買下其使用權，也可能花六千萬美元才買得到，又有誰能衡量它公平的市場售價呢？更令人擔憂的是，當一間私營公司花數百萬美元獲得授權時，又有誰知道他們買下的是什麼服務呢？私營公司真的認為「川普」兩個字對他們的豪華公寓這麼重要嗎？還是他們認為，只要多付出五百萬美元就能拉近自家公司與白宮的關係，在處理未來其他生意時能夠接受特別待遇？這些複雜的商業往來非常難釐清。一個品牌的價值，就是買家願意付出的數目，這便是此類經營模式對企業的誘因——一個沒有實質形體的名字，能夠換取真實世界中的錢財。

川普集團已發表聲明，表示他們為了避嫌，將不再進行新的外國房地產交易。但川普的事業並不只是國際問題；假若美國境內某個市政府或州政府減輕川普開發案的稅賦或規範，他們是真的認為這項計畫對當地有所助益，還是希望從白宮得到好處？同理可證，當國內外任何一個政府機構或企業決定在川普的資產舉辦活動，或讓員工住在川普的飯店裡，他們是真的認為這是最佳選擇，還是想巴結現任總統？

最有趣的是，這些道德問題與柯林頓基金會（Clinton Foundation）競選時面對的醜聞極其相似，而相關醜聞也間接導致希拉蕊最終的失敗。當私營公司或外國政府捐贈大筆錢財給柯林頓

基金會時，他們究竟想得到什麼？他們這樣的舉動，究竟是不是純粹的慈善，是不是真心想救助受傳染病與兒童肥胖所擾的人呢？還是這些人希望以捐款的方式投資希拉蕊·柯林頓，因為她是國務卿，因為她很有可能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

相關的問題層出不窮，也是有憑有據的疑問，川普競選時也不忘提起競爭對手的爭議。但是川普兩位兒子靠授權他人使用父親名號所賺取的錢財，以及他們用以談判的各種恩惠，卻是完全不同檔次的可能性——販賣影響力的可能性。現在，錢直接流入現任總統（而非總統候選人）家族的口袋，他們甚至不像柯林頓基金會，擁有「慈善」的偽裝。我無意免除柯林頓一家的罪過——差得遠了——比爾（Bill）與希拉蕊·柯林頓花了數十年時間模糊柯林頓基金會的道德界線，他們為川普架設了全盤推翻界線的舞臺（第六章會有更詳盡的說明）。

雷根的預言實現了

新政府上任後數月，《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封面的插圖，畫了川普將高爾夫球擊向白宮，打破一扇又一扇窗戶。這幅插圖十分引人注目，因為人們逐漸意識到，被川普打破的並不是馬阿拉歌或川普大廈的窗戶，而是川普一家堅持不肯入住的公有建築——白宮。

難以接受的事實也逐漸浮出水面。隨著川普每一次疑似違反道德倫理的行為，隨著每一句

厚顏無恥的謊言，隨著他每一則瘋狂的推特發文，我們的公共領域也變得越來越殘破。即使川普最終因貪污（或叛國）被逐出白宮，他留下的也只會是滿目瘡痍——這將證實川普政治計畫最根本的前提：政府不僅是沼澤，它更是個累贅。這只能證明，不存在值得守護的東西，私人比公家好。倘若以上皆為真，那何不在離職前摧毀這個政府呢——象徵性地摧毀它，或者照字面意思，將它夷為平地。

這件事提醒我們，若不是數十年來「公共領域」的概念逐漸瓦解，川普的政治生涯也不可能成真。若非隆納·雷根出名的這個想法：「政府並不是問題的解答，而是問題本身」，川普也不可能成為總統。若非雷根說出這句話之後數十年來管制不斷被撤銷，賄賂幾乎成為合法行徑，巨額款項自企業界流入政治界，川普也不可能成為總統。

現在的系統腐敗無疑，它確實是沼澤，人們也深明此理。他們知道，改寫既定規範以偏袒企業界一小群人與頂層1%的人，是兩大黨都支持的行為——當初撤銷銀行管制的便是比爾·柯林頓，也是他構築了導向二〇〇八年經濟崩潰的道路。而選擇不對銀行家起訴的便是歐巴馬（Obama），相信與川普競爭總統大位的民主黨候選人也不會例外。

我們當然知道，一個自稱億萬富翁的人高座金色王座，以勞工階層的救世主自居，是一件荒謬可笑的事。但美國大眾很顯著的一部分人，卻信了他無理的說辭：「相信我，因為我也曾在這場遊戲中出過老千。」為什麼呢？因為早在在川普出現前，華府的「日常作業」在大眾眼中

就成了赤裸裸的貪污腐化。

這也是為什麼眾人將選舉政治當作獵奇娛樂。一旦政治貶值至此，我們何必苦苦守護它，不讓川普這等粗鄙莽夫接近它？反正怎麼走都沒有救，不如坐著看好戲吧。我身為多倫多市民，便經歷過同樣的病狀。我們前一任市長——羅柏·福特（Rob Ford）——於二〇一六年去世，那之前，他可說是本地演出的川普劇。福特自導自演地創造了誰也無法羞辱的形象——因為他的個人品牌，就是「無恥」。即使他吸食古柯鹼的模樣被錄下來，也終結不了古怪的羅柏·福特秀，而他的支持者宛如微帶挖苦意味的忠實觀眾，像觀看《週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似地追蹤他一舉一動。然而福特就和川普一樣，以誇張的戲碼與個人醜聞轉移眾人注意力，隱藏起真正的邪惡計畫——他的偽民粹主義專門給企業好處、給警方無限權力，而最需救助的人們只能接受半吊子福利。

二十年前，當我開始寫這方面的書籍時，我並未預見「品牌文化」能有今天的聲勢；但今天的我並不感到驚訝。當時我將打造品牌視為類似殖民的程序：它不斷地吸收更多空間與房地產，建立自己的結界。唐納·川普成為總統之後，最特別的一點便是他對我們的影響——無論我們願意與否，我們所有人現在都居住於川普品牌的世界裡。他的營利真人實境節目不斷膨脹擴張，已然吞噬了全球最強政府，我們也都成了節目中的臨時演員。

有辦法逃出去嗎？川普品牌本質上的不道德形成了特殊障礙，令我們難以要求政府為事情

負責。儘管如此，我們仍有希望。驅使川普生存下去的動力——金錢——也許將在這位總統身上開出前人所未見的破綻。

堵死川普品牌

當初出版《NO LOGO》時，我們將此事稱為「文化反堵」。文化反堵有一個不變的竅門：找出一家公司販售的宏大理念，然後揭發閃亮外表下的骯髒事實。消費者與行動派分子能影響商業品牌，我們曾多次見證類似的事件，最近一次是比爾·歐萊利（Bill O'Reilly）與上級花一千三百萬美元和解性騷擾指控（而且並未承認罪責）之事曝光後，逼迫他離開福斯新聞主播職位的運動。

當人們發現將恥辱加諸歐萊利品牌不可行時，非裔人權組織「改變的色彩」（Color of Change）與其他女權團體決定採取後門攻勢：他們直接找上福斯新聞的廣告商，並告訴他們，他們現在被視為長期花錢壓抑女權的幫凶。數千名顧客在網路上與現實世界重複這段話，當廣告商得知此事，他們一窩蜂地逃離歐萊利的節目。歐萊利的和解醜聞在《紐約時報》曝光後不到三週，儘管他的節目在美國電視新聞中收視率最高，歐萊利也不得不離開主播席位（雖然他離開時，據說收了高達二千五百萬美元。）

反歐萊利的運動告訴我們，任何品牌都能被人民反堵，即使是如川普品牌這般脫離道德範疇的品牌也不例外——我們只須理解它的弱點。

既然川普的個人品牌是為所欲為的「大老闆」形象，破壞它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讓川普顯得像提線木偶。幕後的操縱者是誰並不重要，只要讓人看見他頭上的線繩，川普精心雕塑的形象便會迅速崩解。這個策略顯然有效；川普被關於「巴農總統」(#PresidentBannon)的笑話逼得火冒三丈，甚至得在推特發文聲明自己是最高決策者，而曾經位高權重的首席策士，發現自己的地位一落千丈。

既然川普品牌就是擁有堆積如山的錢財，那麼我們還能用另一種方式反堵它——讓川普變窮。這和反歐萊利的運動有異曲同工之妙，最佳解答便是讓他的品牌帝國遭遇危機。「抓住你的錢包」(#GrabYourWallet)是抵制川普品牌網路的信息流通中心；自川普當選之後，他們持續推動反川普運動，成功對數家連鎖公司施壓停售川普品牌商品。

這些都是對川普品牌一小波、一小波的攻擊。川普集團主要的收入，來自出售或出租辦公室與豪華公寓，以及將「川普」名號授權給世界各地的房地產公司。想當然耳，川普認為他能利用總統的身分哄抬價碼——但如果，有人證實此想法大錯特錯呢？若是商業租客感受到與川普品牌打交道的壓力（許多類似的抵制行動已在進行中），開始一一離去呢？倘若建商受到來自大眾的壓力，發現在大樓放上川普的名字，反而害他們收入減少呢？在紐約市，川普社區

(Trump Place)的居民已經出聲抗議，要求大樓管理員移除川普的名字。一位居民表示，她已厭倦了每次踏入自家公寓時，心中湧升的「厭惡感」。管理員最後依照居民的意思，移除了川普的名字。

當川普的兩個兒子前往溫哥華，歡慶川普最新的「殿堂」開張，卻遇到當地政客的抗議與抵制。如果這種抗議行動能擴散至四方，就會有更多開發商決定與川普斷絕關係；一旦他黃金打造的名號從溫哥華到馬尼拉各幢高樓大廈消失，川普和他的兒子想必不會安然接受。根據新聞報導，兩個兒子已經擔心史蒂夫·巴農這些資深顧問對家族名聲的負面影響。

在二〇一七年一月，白宮關閉了供民眾撥打投訴電話的服務，於是 whitehouseinc.org 這個團體想出了方向相似的策略。他們建議選民致電川普品牌的飯店與度假村，對電話另一頭的人訴說他們對取消健保或任何政策的不滿。這個計謀十分有用，據說數萬人撥了投訴電話給川普飯店與度假村，一個月後白宮再次開啟了投訴電話服務。

如果你認為這其中有任何不公平的地方，那請別忘了：我們之所以期待政客放棄他們的金融控股，或者將之交付與真正的盲目信託，是因為政治人物任公職期間若有活動商業控股，便會在利益衝突下衍生出許多暗中利用自身影響力的機會。川普選擇不放棄他的公司，而他身為總統助理的女兒也拒絕放棄事業，因此我們利用他們的選擇將他們打擊得落花流水，也是再正當不過的行為。

倘若對他的品牌帝國造成夠多損失，並好好打擊他的「大老闆」形象，也許川普會決定更正他較具爭議性的政策。至少當我們反堵他對選民的推銷說辭——「相信我，我是個成功的億萬富翁」——他在二〇二〇年總統大選的勝算便會大大降低。

然在此之前，「川普秀」將持續在我們眼前上演。

馬阿拉歌的飢餓遊戲



曾經有人問隆納·雷根，在當完演員之後當美國總統是什麼感覺。根據當時的報導，他回答：「總統怎麼能不當演員呢？」我們不難想像，川普對真人實境節目的明星也許有類似想法。

川普精通真人實境電視節目，這是他建立品牌帝國的關鍵，也是他成功當上總統的必備條件。

現在，川普利用他在《誰是接班人》節目學到的技能改變白宮，不僅改變白宮，還改變了全球許多地區。他相信事實能在剪接與後製處理過後，套入他事先預想好的自我吹捧計畫。

真人涓滴之王

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真人實境節目以誰也沒預想到的迅疾速度占領了電視廣播網。在極短暫的時間內，北美洲居民冷落了每季、每集由相同角色與固定腳本演出的連續劇，愛上了貌似不受編劇限制的真人實境節目，以觀看節目參與者彼此競爭、剷除異己為樂。數千萬觀眾緊緊盯著電視螢幕，看著《倖存者》(Survivor)的參賽者被踢出小島，看著《鑽石求千金》(The Bachelor)的參賽者被踢出豪宅——然後，看著唐納·川普開除《誰是接班人》的參賽者。

他的時機恰到好處；《倖存者》第一季於二〇〇〇年出爐，在大紅大紫之後掀起了模仿風潮。這之前二十年，「自由市場革命」在隆納·雷根與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炒作下起飛，社會開始推崇貪婪、利己主義與競爭。現在商人得以錄製人們為錢撕破臉的節目，將之以「大眾娛樂」的名義賣出去。

真人實境秀本就是諷刺的滑稽戲劇，從參賽者結盟、互相陷害，到最後獨自一人勝利，都屬資本主義的範疇。但在《誰是接班人》之前，此類型節目至少存在光鮮亮麗的包裝，也許是野外求生，也許是捕獲夫婿，也許是當個好室友。當唐納·川普登場時，這層包裝消失了；《誰是接班人》的節目宗旨顯而易見，是在殘酷的近代資本主義「叢林」中掙扎求活。

節目第一集一開始，是一位街友在路邊打盹的畫面——換句話說，就是「魯蛇」的象徵。

接著，畫面切到乘坐豪華汽車的川普——他過的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生活，因此他是終極「贏家」。《誰是接班人》傳遞的訊息再清楚不過：你可以選擇當街友，也可以選擇當川普。這就是整齣節目最殘酷的精神——若你能打出一手好牌，你也許有幸成為唯一的贏家，否則你只能難堪地接受老闆的苛責，然後被直接開除。這是節目在文化方面的創舉；在人們經歷數十年來集體解僱、生活水準下滑，以及普遍不穩定的工作之後，馬克·柏奈特與唐納·川普使出了致命的一擊，將「開除員工」製作成大眾娛樂。

人生就是受罪

《誰是接班人》每週為數百萬觀眾呈現自由市場理論的中心思想，它告訴觀眾：展現出最自私、最殘忍的一面，你就能成為英雄，你就能創造就業機會、幫助經濟成長。別當老好人了，拿出自己凶殘的本性吧，這才是幫助經濟的方法——更重要的是，這才是幫助你自己的絕佳法門。

在之後某一季，節目潛藏的殘酷本性更是表露無遺。當週獲勝的一組住在奢華豪宅裡——躺在泳池充氣躺椅上啜飲香檳酒，乘坐高級轎車去見當代名人。而失敗的一組被趕去後院，住在戲稱為「川普拖車屋停駐場」的帳篷裡。

川普愉快地稱這些失敗者為「無產窮人」，他們不僅得住在帳篷裡，甚至無法用電、只能用紙餐盤吃飯，睡覺時還被犬吠聲吵得難以安眠。這些人只能從樹籬的縫隙偷窺贏家，偷窺那近在咫尺卻遙不可及的奢侈生活。換言之，川普與柏奈特刻意創造出現實世界的縮影，將真實生活中日益劇增的不平等搬上電視螢幕。現實中的不平等，在許多川普選民心中點燃了怒火——但川普與柏奈特竟將之大肆誇飾之後，轉變成能夠吸引眾人目光的競賽。《誰是接班人》節目隱隱透出《飢餓遊戲》(Hunger Games)的味道，不過電視頻道限制了節目中的暴力。」在某一集，川普對住帳篷的參賽者說：「人生就是受罪。」他們得盡全力踩在輸家的身上，成為像他一樣的贏家。

二〇〇七年播出的這場階級鬥爭之所以有趣，是因為先前用以說服上一個世代的託辭——資本主義將創造最好的世界——已消失無蹤。這個系統造就了少數大贏家與無數輸家，你得好好確保自己待在贏家的團隊。

這顯示一個事實：十多年來，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意識與思維能力碰上了嚴重危機。在二〇一六年，瑞士信貸集團(Credit Suisse)估計全球總共有二百五十六兆美元的財富——但財富的分配卻極不平均。「較貧窮的五〇%人口擁有少於一%，而最富有的一〇%擁有全球八九%資產。」這就是為什麼現在願意板著臉說「給富人更多錢是幫助窮人的最佳解」的人不多了。川普的推銷說辭向來與眾不同，他從一開始就說：我會把你變成贏家——然後，我們一起擊潰魯蛇。

在現實世界的噩夢中，夢想也是商品

值得一提的，川普並非靠房地產生意攀上全國名人的殿堂，而是靠一本關於房地產生意的書。一九八七年是雷根時代的頂峰，川普的書也在這一年出版；《生意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被當作取得金錢財富的祕術大肆宣傳，隨後又是一本接著一本越來越粗俗的書，本本圍繞著相同的主题——《億萬富翁都是這樣想》（*Think Like a Billionaire*）、《大膽想出狠招》（*Think Big and Kick Ass*）、《成功術101》（*Trump 101*）與《川普致富術》（*How to Get Rich*）。

川普聲稱自己握有加入頂層1%富豪榜的門票，並銷售此概念的最初，正是允許階層流動的階梯瓦解之刻。免費的高品質國民教育開始消失，社會的防護網逐漸被撕毀。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人們更急著想獲得天上掉下來的財富，縱身躍上那個安穩的經濟階級。

川普出生在富裕的家庭裡，他以高明的手腕利用眾人近乎絕望的心境，在多個平臺獲利，最惡名昭彰的便是川普大學。川普曾為這所醜聞頻傳、現已廢止的「大學」打廣告，宣稱：「我可以把任何人變成成功的房地產投資家，你也不例外。」（實際上，這所「大學」是飯店會議室裡舉行的一系列可疑講座）。

再來是川普的賭場；這些賭場占他在美國持有的房地產很大一部分。賭場經濟的核心夢想，與川普大學、《川普致富術》兜售的夢想極為相似：也許你今天瀕臨破產，但倘若你能（真

的)打出一手好牌，就能在明早開啟富裕的新生活。

川普創建品牌、聚斂財富，便是仰賴這個觀念。他選擇在較貧窮的九九%遭遇困境時，售出「你也能成為唐納·川普」的保證，接著以一模一樣的說辭說服選民——他能讓美國再度成為贏家之國。他利用了人們內心深處關於金錢問題的焦慮，並將多年來製作超高收視率節目學到的模擬現實技巧，獲得選民支持。唐納·川普數十年來銷售致富守則的經驗告訴他，即使不實現自己的承諾也無所謂——只要人們足夠恐慌，重新協調一筆生意的諾言、復興製造業的保證不能被兌現都不重要。

沉迷虛假事物，一路走向白宮

早在川普崛起前許久，選舉已失去原先的意義，成為電視上搶收視率的娛樂新聞。川普不過大幅增加娛樂了的元素，同時也獲取更高的收視率。在真人實境節目打滾多年的他明白一件事：一旦選舉成為這樣的餘興節目，那最強的參賽者（他可不見得是最佳候選人）就能獲勝。也許這樣的參賽者贏不了最後大選，但他至少將贏得媒體沸沸揚揚的報導，而這在品牌塑造的角度而言，也是一種勝利。二〇〇二年，當川普考慮參選總統時（他最後決定旁觀），他曾說：「我很有可能成為第一個參加總統大選還能賺錢的候選人。」

選舉過後，我們聽到新聞媒體界幾位經理懺悔，坦承自己給了川普那麼多播報版面，某方面而言間接幫助了他勝選。沒錯，他們確實大大幫了川普一把，但他們該反省的不只這件事。他們雖然送給川普上新聞的機會，但這不是他們贈與川普的終極大禮——媒體界播報選舉的「娛樂新聞」模式，才是幫助川普登上總統寶座的最大助力。這類娛樂新聞捨棄了傳統新聞的工本，他們不深入探討候選人的政見，也不說明各候選人關於健保等議題的立場將如何影響選民生活，反而大肆炒作候選人之間的人際關係。

廷德爾報告(Tyndall Report)顯示，在總統選舉期間，最主流的三個夜間新聞節目花了共三十二分鐘「報導議題」——比二〇〇八年少得可憐的二百二十分鐘還要少。餘下時間，都是誰說了誰的好話壞話、誰在什麼地方的民調支持率最高，類似真人實境節目的報導。對數百萬名觀眾而言，這是娛樂價值非常高的新聞。(法國媒體也許從美國的選舉學到教訓，在他們拚得你死我活的二〇一七年選舉期間，也選擇以相似的手法播報新聞。)

我們必須強調：川普並沒有製造問題，他不過將之利用得淋漓盡致罷了。正因為他比誰都瞭解虛假的「真人實境」，川普將這個遊戲玩到了完全不同的檔次。

假爭鬥，真賭局

川普引入選舉政治的，不只有真人實境節目的概念，他還混入了另一種極受歡迎的娛樂節目，這種節目同樣結合了近似卡通的演出——它就是職業摔角。川普對摔角有著濃濃興趣，他曾於世界摔角娛樂公司（World Wrestling Entertainment，簡稱WWE）的節目上以自己「超有錢大老闆」的形象演出，前後至少八次，甚至贏得了WWE名人堂的席位。他曾在《億萬富翁之戰》（*Battle of the Billionaires*）中，假裝狂揍摔角界大人物文斯·麥馬漢（Vince McMahon），隨後為了慶祝勝利，在不停喝采的觀眾面前幫麥馬漢剃光頭。他也曾將數千美元現金丟入觀眾席，給那些大聲尖叫的粉絲。現在，他任用WWE前任執行長琳達·麥馬漢（Linda McMahon，文斯之妻）為小型企業管理署（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署長，但這則新聞悄悄隱沒在了每日的狂風暴雨之中。

川普在職業摔角界的副業使廣大觀眾群愛上了他，無論是摔角競技場、電視上或網路上，他都受許多摔角愛好者喜愛，與《誰是接班人》的效果類似。也許在多數自由派選民眼裡，職業摔角是幾乎看不見的文化力量，但我們也不能小覷它；WWE每年的收入將近十億美元，是一筆可觀的數目。川普在摔角界得到的不只是選票——他還學到了許多技巧。

知名記者麥特·泰比（Matt Taibbi）曾在《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發表言論，他認為川普

的競選過程與WWE摔角競賽有許多共通點。川普與其他候選人之間刻意經營的仇恨，像極了職業摔角的戲碼，尤其是他替對手取侮辱性綽號的習慣（例如「小馬可」、「撒謊的克魯茲」。最像職業摔角節目的還不是這個，而是川普在造勢活動表演指導者兼主播角色，他還不忘帶領觀眾高喊誇張的侮辱性口號（「把她關起來！」、「殺掉希拉蕊」），並引導觀眾將怒火轉向這個競技場指定的惡人：媒體記者與示威民眾。參加川普造勢活動的圈外人會感到震撼，對適才發生的事充滿疑問。那適才發生了什麼事呢？這是一場職業摔角比賽與白人至上主義所混合而成的荒誕造勢活動。

真人實境節目與職業摔角的共通點是，它們皆是美國文化中較新興的大眾娛樂，也與現實世界建立了微妙的關係——一個同時虛偽又真實的關係。

觀眾都知道，每一場WWE摔角比賽都是選手事前演練過的戲劇，勝負早在開打前就決定好了。儘管如此，觀眾依然看得不亦樂乎，所有人都知道這個祕密，觀眾的叫好聲與噓聲也是節目的一部分，加強了比賽的娛樂色彩。其中的虛偽並不是缺點——反而是節目的重點。

摔角與真人實境節目都建立在極端情緒、爭端與痛苦之上，兩者都有尖叫著拉扯對手頭髮的人，而且在摔角節目中，選手還會爆打對手一頓。但是在觀影同時，你也知道這不是真的，所以你不必在乎這些人的感受，能夠在不需同理心的情況下充分享受戲劇。摔角選手被痛扁、受辱時，不會有人為他們哭泣；《誰是接班人》參賽者被川普開除或侮辱時，我們也不會為他們

哭泣。觀眾得以坐在安全的地方，幸災樂禍地看戲。這，就是虛偽之王唐納·川普登上的舞臺，他帶著虛假的身體部位、虛假的摔角、虛假的真人實境節目、虛假的新聞，與整個虛假的經營模式登基。

現在，川普將這種虛偽卻真實的關係引入了政治。他指控歐巴馬竊聽的說辭，與摔角選手聲稱要將對手打到灰飛煙滅一樣，事實已經不是重點了。這是讓觀眾興奮的手法，是他演出川普秀的手法。《誰是接班人》也許下檔了，川普的WWE生涯也許結束了，但川普秀仍在熱映中——它將永不停息。

先前一直大力支持川普的紐特·金瑞契(Newt Gingrich)，在川普就職前不久接受訪問，發表了他對候任總統繼續擔任《名人接班人》執行製作人此一決定的看法。金瑞契的說法為我們說明了許多事情；他認為川普做了錯誤的選擇，因為他「即將成為『美國政府』這東西的執行製作人，必須推出一個驚天動地的電視節目——『領導全世界』。」

金瑞契的預言成真了。現在，總統辦公室每日直播川普秀，而發生在馬阿拉歌俱樂部的種種更像是電視節目了，俱樂部富有的會員們甚至成了內建的現場直播觀眾。顯然，川普也是以這種眼光看待他的總統職位——他當自己是一個國家的執行製作人，隨時留意節目的收視率。當人們揣測他是否打算開除連連失言的新聞秘書時，據說川普表示：「我才不會開除西恩·史派瑟(Sean Spicer)，那傢伙最會提升收視率了，有他在，大家都會關注我們。」

現在，川普以輕率無禮的演技操作——或者說，失敗地操作——他當初立下的承諾，也就是重現過去工廠與藍領工作機會遍地皆是、中產階級收入優渥的盛景，以及制定「購買美國貨，僱用美國人」的政策。（他貌似不在意自己靠外包工作與血汗勞力建造企業帝國的事實。）

川普態度的真實性，與過去在WWE競技場中毆打摔角選手同樣「真實」，與選擇《名人接班人》優勝選手的態度同樣「真實」。川普比誰都清楚，重現美國一九七〇年代製造業盛況不過是個殘忍的笑話——他比誰都清楚，因為從他自己經營的公司就能看出，美國絕大多數的企業已不再是製造商。這些公司現在不過是虛有其表的外殼，他們販售的商品也是從廉價的承包商取得。川普也許能帶回幾間工廠，或聲稱自己辦到了這件事，但與人民的需求相比，那僅是微乎其微的數量。（創造許多待遇良好的工作並非不可能，但與川普的方法差了十萬八千里。我們必須前瞻未來，而不是拘泥過去——我們將在最後一章詳述此事。）

川普的計畫已經開始實施，他打算以他面對所有事情的態度，面對失業與未充分就業的難題——將之視為公開演出的一場秀。他將聲稱自己創造了（相對非常少，而且本就會出現的）工作機會，然後全力推廣這些所謂的成功故事。新增的工作數量究竟符合他的說辭，一點也不重要；川普會將事實剪接拼湊成符合他說辭的模樣，這是他製作《誰是接班人》學會的手法。他上任的第一天便以此小試身手，宣稱參加總統就職典禮的人潮幾乎創新紀錄。

這就是川普的作風，也是他一直以來的作風。在一九九二年，當一系列錯誤的投資導致企

業帝國瀕臨破產時，川普的處理方式並不是釐清財政問題，而是在大西洋城的川普泰姬陵賭場 (Trump Taj Mahal) 舉辦豪華「重整旗鼓派對」，邀請投資客與金融家赴宴。派對上，穿著緞布拳擊短褲與大紅拳套的川普，在《洛基》(Rocky) 的電影配樂伴奏下，打穿了紙做的牆壁。這個男人認為所有問題都能用精心準備的演出解決，過去發生的種種也經常證實他這套理論，所以川普認為以浮誇演出躲避破產的法門，也適用於我們國家的經濟問題。

假新聞、別樣事實與最大的謊言

我們知道，在唐納·川普的世界裡，事實並不重要。與川普相關的事物與其說是「最大的謊言」，不如說是「永無止盡的謊言」。沒錯，他確實說過誇張的謊話，例如暗示泰德·克魯茲 (Ted Cruz) 父親涉嫌暗殺約翰·甘迺迪 (John F. Kennedy)，以及他多年來關於歐巴馬出生地的誑語。但是真正令人頭暈目眩的，是川流般永不停息的一系列謊言，這些謊言以「別樣事實」的姿態呈現在我們面前。根據《Politico》政治新聞媒體的調查報導，這是蓄意說謊。「白宮職員說謊時，多半是為了娛樂，而非為了更深遠的計謀。」這些職員甚至為此開啟賽局，比誰能「讓媒體報導最誇張的妄語」。雖然這些主張源自匿名信息來源，其中也包含不少謊話，故事本身卻符合我們對川普的認知。如果不能恣意改變事實，抵達權力頂峰又有什麼用？在川普的世界

裡，根據他的品牌理念，說謊而不必承擔後果正是他大老闆形象的一部分。唯有魯蛇才會受固定、無趣的事實束縛。

目前為止，他的策略似乎有效，至少在川普自家支持者陣營有效。一些自由派人士指稱支持川普的勞工階級「太好騙」，竟然接受了川普的「別樣事實」。但值得一提的是，支持巴拉克·歐巴馬的選民也有類似表現，他們欣喜地接納歐巴馬政府精心創造的各種標誌——慶祝同性婚姻合法化時，打上彩虹燈光的白宮；政府文明且博學的聲音；受眾人喜愛，並在八年任期間沒爆出大醜聞的第一家庭。這些都是好事沒錯，但這些支持歐巴馬的人，卻也選擇忽略無人機轟炸行動殺死無數無辜民眾、約二百五十萬名沒有公文的移民被驅逐出境，與歐巴馬沒能兌現的承諾——關閉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海軍基地，或停用小布希的大規模監控建築學。歐巴馬雖以氣候英雄身分自居，卻曾誇耀自己的政府「建了足以繞地球一圈有餘的輸油管線與天然氣管線」。

在加拿大，同樣有許多自由派人士表現出選擇性盲目。眾人被首相英俊的外貌與積極革新的口號唬得一愣一愣，因而允許他沿用前任首相糟糕的政策，包括無限期拘留為數眾多的移民，到開挖油砂輸送管線（後續將再提到此事）。政治上，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與唐納·川普判若雲泥，但他的行為在猶如狂熱粉絲的死忠支持者眼中，卻被名人光芒掩蓋了。近來的「杜魯道狂熱」告訴我們，混淆國家歸屬感與品牌忠誠的不只有保守派人士。

川普競選時成功售出他編織的夢想——美國恢復從前生產大國的面貌——使勞工階級的白人投給他神聖的一票，但這個夢想總有一天會全盤粉碎。最令人擔憂的是，當川普無法再粉飾太平，當人們發現煤礦相關工作不可能再次出現，當人們發現能支付中產階級薪資的工廠不能回歸時，川普會採取何種行動。他十之八九會退而使用他所剩的唯一道具：他將卯足全力引發白人勞工與移民勞工之間的紛爭，想盡辦法引起人們對黑人犯罪的恐懼，集中精力炒作跨性別人士與跨性別廁所的爭議，並針對媒體權限進行更加猛烈的攻擊。

當然，用盡一切方法時，他永遠有最後一個選項：戰爭。

世界末日秀

即使我們知道川普將總統職責視為真人實境節目，也無法減少這件事對我們造成的危害——事實恰恰相反。這場節目已經死了人——葉門、阿富汗、敘利亞與美國——在節目下檔前還會出現更多傷亡。一個英國監測團體的紀錄顯示，光是在二〇一七年三月便有一千五百名平民因美國在伊拉克與敘利亞的空襲行動喪命，歐巴馬任期間的死亡人數從未到達這個數目。

儘管如此，節目還是節目，血腥競技節目是科幻界的老眼。你看看《飢餓遊戲》中的真人實境節目，只有一個人能活著回來。還有《魔鬼阿諾》(The Running Man)這部電影，劇中也存

在攸關參與者生死的電視節目。「川普的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 (Wilbur Ross) 據說將空襲敘利亞的行動稱為馬阿拉歌的「餐後娛樂」。」

最令人膽寒的是，在我寫這本書的同時，川普的「馬阿拉歌飢餓遊戲」才剛拉開序幕，手邊的道具包含美國全套軍武——而鼓勵他繼續下注的大有人在。當川普用戰斧巡弋飛彈攻擊敘利亞時，MSNBC新聞臺主播布萊恩·威廉士 (Brian Williams) 稱之為「美麗」的一幕。短短一週後，川普下令用美國所擁有最強力的非原子炸彈轟炸阿富汗的洞穴群——如此不分敵我、不成比例的暴行，令分析家絞盡腦汁臆測川普的軍事策略。策略根本不存在——炸彈本身就是訊息。他使用炸彈進行批量溝通。

既然川普下令使用未曾用於實戰的強力軍武，既然他剛上任十二週便在沒有明確威脅的情況下出招，我們也不能期望他克制自己執導終極節目的慾望——將全面戰爭、暴力的世界末日電視化，絕對能得到突破天際的收視率。早在川普出現前，我們就打過類似娛樂節目的戰爭。一九九〇年的波斯灣戰爭被戲稱為第一場電玩戰爭，CNN頻道甚至為它設計了專屬的標誌與主題曲。不過這和二〇〇三年入侵伊拉克的「震撼威懾」節目相比，壓根是小巫見大巫；當時的攻擊行動經特意設計，不僅提供談資給電視新聞觀眾，更是演給伊拉克人看的一場秀，目標是最大化他們心中的無助，並「給他們一個教訓」。現在美國軍方恐怖的科技落入了史上第一位真人實境節目製片者——川普總統——手裡，我們必須做充足的準備，我將在第九章重提此事。

空虛之人

若說總統川普的虛偽慶典中有任何一絲真實，那就是最核心的飢渴。貪得無厭。川普常說他不需要更多錢，他的財富已經夠多了；即使如此，他仍一有機會就開始銷售商品，千方百計地行銷。彷彿得了某種罕見疾病——我們姑且稱之為「品牌人格障礙」——幾乎無法控制自己推銷品牌的行為。在演說中，他會突然說起川普品牌飯店的大理石多美麗、多昂貴；受訪談論轟炸敘利亞的行動時，他會忽然附贈一句，馬阿拉歌的巧克力蛋糕是「我見過最美的蛋糕」。

這種無法滿足的飢餓、潛藏在內心的空虛，確實有它的根據——它源自造就了唐納·川普的文化，源自此文化內部深深的虛無。這份虛無與生活品牌的崛起有著密切關聯，而生活品牌崛起正是贈與川普廣闊舞臺的文化變遷。「有名無實的品牌」在數十年間興起，它們什麼都賣，實際上卻什麼都不擁有。在那數十年，曾經給予人們歸屬感與認同感的各個單位急速沒落——人們互相照顧的溫暖社區消失了，保證一輩子給你工作的大型公司消失了，人們自己創作藝術而非消費藝術的時間與空間消失了，有組織的宗教團體消失了，奠基於面對面人際關係的政治運動與工會消失了，以公共利益為目的、竭力拉近國際關係的媒體也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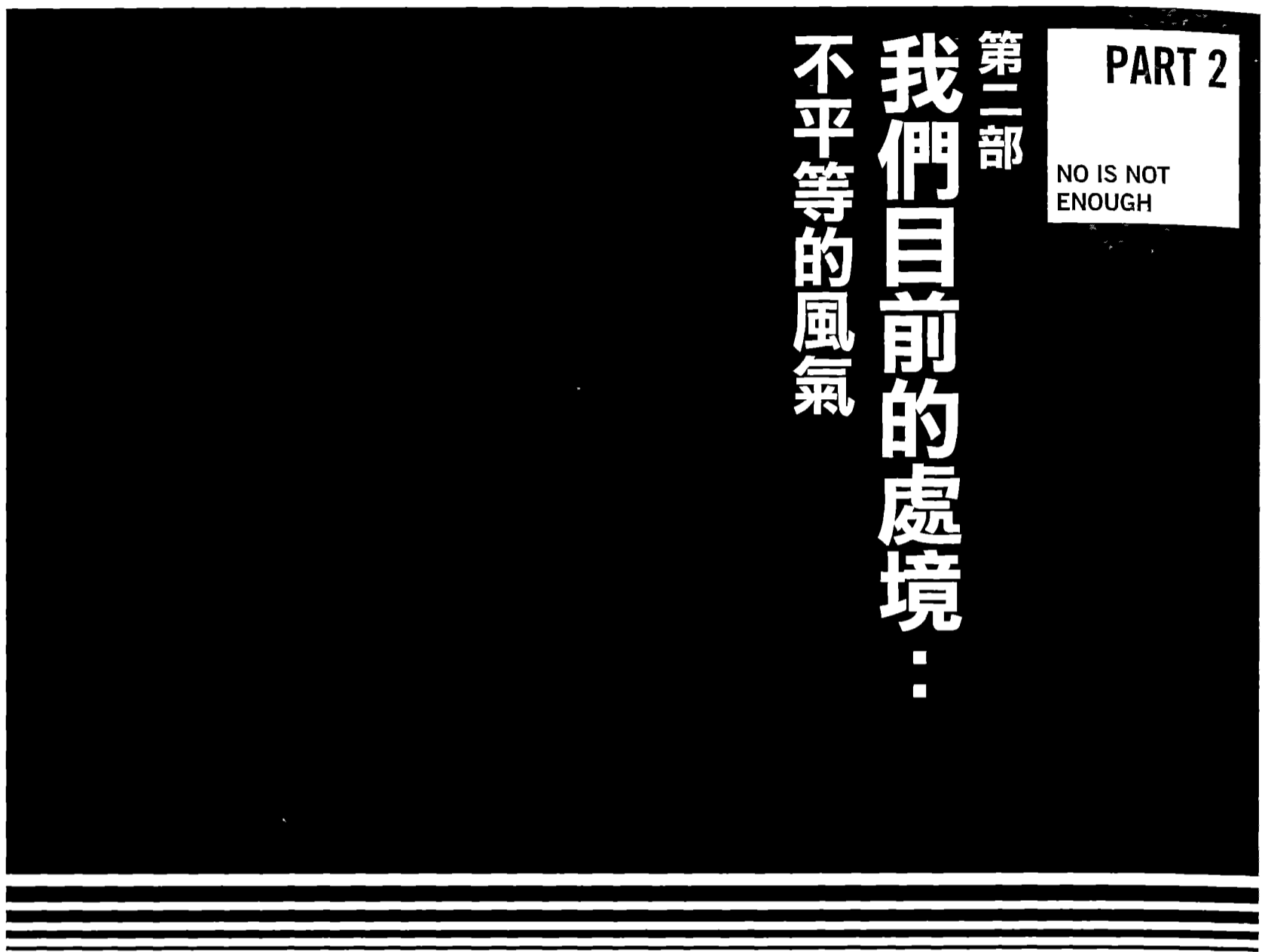
過去的這些單位與習俗並不完美，有時與「完美」二字相差甚遠，不僅將許多人擋在門外，還強迫內部成員順從團體的意志。儘管如此，這些團體提供了我們人類精神所需的東西，也是

我們永不停止追求的東西：團體的歸屬感、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以及遠大於我們當下所求事物的使命感。多年來，兩種趨勢——公共團體的沒落與品牌企業的興起——存在反向關聯，隨著賦予我們歸屬感的團體失去影響力，品牌企業的力量也步步高升。

兩者之間的拉鋸向來令我感到安慰，因為這代表，即使我們充斥著品牌的世界能利用我們渴望歸屬感的心理，它仍然無法永久填補我們的心靈。當你買下它們的商品時，你能暫時成為一個團體、一個理想、一個跨時代革命的一部分，在當下感到快樂。但是這種滿足感轉瞬即逝，你剛拆開新球鞋、最新款 iPhone 或其他「替代品」的包裝，先前的喜悅早已消失無蹤，你又得想辦法填滿內心的深淵了。這樣的公式很完美，消費者必須持續不斷地消費，並長期透過社群媒體自我商品化。對我們的地球而言，這是一場災難；地球無法支撐如此高量的消費。

但請別忘了，此循環的中心存在著無比強大的力量——人類渴望歸屬感與人際關係、恆常不變的心理。因此，我們還有希望。如果我們重建我們的社會，開始在團體中建立更有意義的目標、更溫馨的感覺，許多人將能夠稍稍遠離無腦的消費主義。（與此同時，我們也許能減少在社群媒體上創造並編輯個人品牌的時間）。

我們將在第四部看到，已經有許多社會運動與理論家朝這個方向努力，想改變我們的文化與價值觀。不過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回溯幾條重要的道路，以便理解我們到達今天這步田地的原因。



我想，人們頑固地緊抓著仇恨不放，是因為他們知道一旦仇恨消失，他們將不得不面對痛苦。

——詹姆斯·鮑德溫 (James Baldwin)
《土生子札記》(Notes of a Native Son)，1955

氣候敲響了午夜鐘聲

我們稍微倒帶，回到川普剛當選那一週。當時我感到暈頭轉向，因為我見證了不只一場災厄，而是兩場。我認為除非我們同時面對這兩場災厄，我們不可能真正明白川普帶來的危害。

我先前說過，當時我出差去澳洲，我知道這種長距離旅行的排碳量非常可怕，之後可能過很久才會重回澳洲。於是我決定首次造訪昆士蘭州外的大堡礁，這是聯合國認定的世界遺產，也是世界上由生物所建造的最大自然物體。它同時是我此生見過最美麗與最可怕的景象。

小時候，我時常游泳。六七歲時父親教我浮潛，我最快樂的回憶之一就是在水下游玩。和海洋生物互動時，有種神奇的親切感——一開始游向珊瑚礁的時候，魚群多會逃逸四散，不過靜待數分鐘後，牠們開始將你視為海景的一部分，而非入侵者。小魚會游到你的浮潛蛙鏡前，



或輕輕啃咬你的手臂——對兒時經常感到焦慮的我而言，這是最夢幻、最平靜的體驗。

隨著澳洲之旅的日期漸漸挨近，我發覺自己期盼看到大堡礁的心情，與我身為四歲男孩——托馬(Toma)——母親的身分密不可分。我們為人父母，有時會太早讓孩子接觸自然所面對的威脅與危險。很多孩子閱讀的第一本自然相關書籍，是蘇斯博士(Dr. Seuss)的《羅雷斯》(The Lorax)，書中充滿了關於污染的描繪，美景化為垃圾山、動物一隻隻死去或消失或窒息，非常恐怖。托馬兩歲時我曾唸《羅雷斯》給他聽，眼睜睜看著他小臉蒙上恐懼的陰影。我心想：「不行，這完全錯了。」現在，我和托馬一起讀的書，都是與花言巧語的松鼠、自然之美與奧妙有關的書。雖然我知道書中的物種瀕臨絕種，但我也知道，托馬現在還不必為此事擔憂。我認為我的工作就是盡量讓他對大自然留下正面印象，讓他愛上自然世界。在你奮力守護一樣事物之前，你必須先愛上它。

此外，我也希望以記者的身分造訪大堡礁。過去兩年來，發生了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事情——破紀錄的高溫重創了大堡礁，超過九〇%的珊瑚礁發生了大規模白化事件。珊瑚礁白化究竟是多麼災難性的事件，我實在很難說清。當白化事件發生時，原本豔麗的小生物變得白如枯骨。假如水溫又快速下降至正常範圍，白化的珊瑚礁還有復甦機會，但這回水溫並沒有下降，大堡礁——一個與亞馬遜雨林同樣豐富多變的生物圈——死了將近四分之一。

值得強調的是，如此激烈的變化，竟發自相對不大的氣溫變化。海洋水溫只上升了攝氏一

度，只比珊瑚蟲演化後適應的水溫高了攝氏一度，便足以導致這種奇異生物大量死亡。這次事件雖與氣候變遷相關，卻不似暴風雨或森林大火充滿戲劇性——而是海中無數生物，默默地消亡。

當我們抵達大堡礁時，空氣中瀰漫著不可思議的氣氛。來自道格拉斯港（Port Douglas）的船隻依舊滿載觀光客，海面湛藍而綺麗，還有一片片令人嘆為觀止的藍綠色水域。儘管表象光鮮亮麗，大海深處卻藏著人類最恐怖的祕密。二〇一〇年，英國石油公司（BP）使用深水地平線鑽油平臺時，引發了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報導此事件時我第一次認知到海洋隱藏祕密的力量。當漂浮於海面的油開始下沉時，漏油事件也迅速離開新聞頭條，然而海面下的災難卻不會停止。

我們與一隊熱愛大海的海洋生物學者（他們記錄眼前景象的同時，所有人都只覺心如刀割）以及《衛報》（*The Guardian*）攝影師一起接近大堡礁，開始拍攝仍然存活的部分珊瑚礁。我們設法讓托馬戴上浮潛設備；老實說，我不確定他有沒有辦法體驗珊瑚礁之美，因為他才剛學會游泳，身上還套著浮圈。在場的科學家對他非常有耐心，托馬得以充分享受五分鐘的夢幻海景——他「看到了尼莫（Nemo）」、看到了海參，說不定還看到了海龜。大堡礁尚未白化或死亡的區域只是小小一部分，但依舊美不勝收——色彩鮮亮的珊瑚與魚類、悠游而過的海龜與鯊魚，演繹生命的狂舞。

我們前往死珊瑚礁與白化珊瑚礁的區域錄影時，就沒有帶托馬同行。那裡是片墓園，彷彿

佛宇宙某個開關切換後，世界上最美的景象之一瞬間變得奇醜無比。珊瑚遺骸覆滿生物腐爛時留下的黏糊物——棕色的黏糊物。我們的潛水裝沾染了死亡的氣味，我們恨不得立即遠離那個地方。

我們之所以選擇錄下殘破的大堡礁，是因為氣候變遷在許多人心中仍是遠在天邊的危難，似乎在認真處理問題前還能稍作休息。我們想告訴大家，人們心目中總是生機盎然的地區正在劇烈變化，我們的地球正在改變——不是在遙遠的未來，而是此時此刻。全球仰賴珊瑚礁魚類維生的人約有十億，這些變化對人類也有深遠的影響。

我也希望能透過托馬的視角將這場災難呈現給所有人，因為當我們擾亂地球的氣候，也將帶來許多不公平。今天我們大人的行為將嚴重影響未來數代人的生活，也會影響現在太過年輕而無力影響政策的孩子們——像托馬這麼大的孩子，以及全球各地的同齡孩童。這些孩子沒有犯任何錯，將來卻必須面對最極端的氣候——暴風雨、乾旱、野火、海平面上升——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與經濟壓力。這些孩子在生物大規模滅亡的時代長大，沒能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以及與生物相伴成長的溫暖。

這是一種偷竊，一種暴力——是理論家兼作者羅布·尼克森（Rob Nixon）所說的「慢性暴力」。所有物種生來有權活在乾淨、蓊鬱的地球上，這也是大堡礁被列為世界遺產的原因，因為它屬於這個世界——卻在我們手裡逐漸凋亡。我發現，我想闡述的是一個關於跨世代盜竊與

跨世代正義的故事。於是我首次決定讓世人看見托馬；雖然我不願讓他出現在影片裡，我卻找不到將他從故事中移除的方法。

那天的行程結束後，我們所有人都累癱了。我們看見了這麼多原本美麗的事物死亡、消失……但我兒子也獲得了珍貴的經驗。當晚我們住在道格拉斯港一間汽車旅館裡，我一面為托馬掖被窩一面說：「托馬，你今天發現海底存在一個祕密世界了。」他樂不可支地抬眼望著我，說：「我看到了。」我當下痛哭失聲，在歡欣的同時心也碎了——因為我知道，就在托馬意識到世界之美的時候，這些魔法般的美景也逐漸消逝。

我承認，當時我也感受到憤怒。那一整天，我不停想著埃克森美孚——根據記載，這家公司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就知道氣候變遷將至。一篇普立茲獎提名的〈氣候內幕新聞〉(InsideClimate News)報導指出，埃克森自行發起了觀察過去趨勢的尖端研究，利用油輪排放的二氧化碳樣本建構最先進的氣候模型，預測了海平面上升等氣候變化。包括詹姆士·布拉克(James Black)在內，埃克森內部的資深科學家也對公司發出了警告。布拉克在呈給僱主的報告中斷言：「科學界普遍認為，人類影響全球氣候的主要形式，是經由燃燒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他還寫道：「人類只剩下五到十年改變能源策略的時間，接下來或許就沒有轉圜餘地了。」那是他一九七八年寫的。

等到雷克斯·提勒森接下美國埃克森中央生產部門經理之位，上述事實已是公司內部人士

知悉的祕密——他們也知道最令人不安的事實：時間不多了。即使如此，至今為止埃克森美孚花了超過三千萬美元請智囊團出手，系統性地在新聞界散播關於氣候科學真實性的謠言。美孚與埃克森合併之前，甚至買下了《紐約時報》一整面的廣告，發表對科學數據的疑慮。目前紐約州、加利福尼亞州與麻薩諸塞州檢察總長皆在調查埃克森美孚欺瞞大眾的案件。由於埃克森美孚所提供的錯誤信息，及整個化石燃料圈的錯誤宣傳，人類失去了轉移至綠能經濟的關鍵數十年——而在這數十年間，埃克森美孚與其他化石燃料公司開啟了石油與天然氣的新天地。倘若當時我們有所作為，今天也許還能見到健康美麗的大堡礁。

但是此次大堡礁之行並沒有使我被無助的情緒淹沒，因為世界各地都存在頑強的團體與社會運動，這些人一心一意想警醒自己的政府，呼籲政府不要再開挖新的天然氣或油田，呼籲政府不要再開挖新的煤礦坑。我們瘋狂地在四天內剪接完影片，趕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將之公諸於世，希望能鼓勵人們投票並施壓讓希拉蕊·柯林頓推行更多氣候相關政策。我們趕上了——我們在十一月七日將影片放上網。

隔天，川普贏了，然後埃克森美孚的執行長成了美國國務卿。

現實

二〇一六年總統大選的戰況激烈，原因有很多：數百萬人即將失去健保，許多人在川普火上澆油地撩起白人國族主義後面臨種族攻擊，許多家庭將被殘忍的移民法規硬生生撕裂，女人可能失去選擇是否成為母親的自由，性犯罪極可能被國家最高元首一般化、平凡化。無數人的生活將深受選舉結果影響，沒有人有閒暇將議題依緊急程度排序，大聲嚷嚷「我的危機比你的危機重要」也不會有任何人得到好處。如果這些事情發生在你身上，如果你的家庭被硬生生分隔兩地，如果警察針對你找碴，如果你祖母付不起醫療費，無法接受保命治療，如果你的飲用水含鉛——這一切都是最緊急、最危險的議題。

氣候變遷並不比這些議題重要，但它與時間的關係不同；當氣候相關的政策出錯（現在這些政策錯得離譜）我們下一次嘗試，就會是四年後的事了。這四年期間我們排放的氣體將徹底改變地球，無可避免的災難也將越來越難挽回。

這也許顯得危言聳聽，但我確實採訪過全球專攻此領域的科學專家，他們的研究顯示，我的文字不過是中立陳述現實罷了。我們減少排碳量、避免災難性暖化的窗口正逐漸縮小。許多社會運動喜歡用薩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名言作為較輕鬆的口號：「屢試屢敗，但即使失敗，敗得更精采。」我向來喜歡這種態度；我們不可能變得完美，也不可能屢戰屢勝，但我

們無論如何都該以進步為目標。問題是，貝克特的格言並不適用氣候問題——到了我們現在的局面，已經來不及了。如果我們降低排碳量的行動持續失敗，如果我們積極從化石燃料經濟轉型到再生能源經濟的行動持續失敗，如果我們持續逃避浪費性消費的問題，持續追求更多更大的事物……那麼我們就沒有「敗得更精采」的機會了。

幾乎所有變化都比氣候變遷的模擬更迅速，包括北極海冰層融化、冰層崩裂、海洋暖化、海平面上升，以及珊瑚礁白化。等到世界各地的選民下回投票時，更多冰層將會融化，更多濱海地域將被淹沒，更多物種將永遠消失。我們必須阻止全球暖化，否則吐瓦魯、馬爾地夫這些島國將被海水吞噬，但我們的機會已經越來越少了。發生在地球上的這些變化無可逆轉——我們無法讓一個消失在海面下的國家重頭來過。

經同儕審查的最新科學研究指出，我們若是想在孩子這一代在世時保護沿海城市——包括紐約市、孟買這些都會區——那我們就得以非人的速度停用化石燃料。牛津大學在大選期間發出一篇論文，出版於《Applied Energy》期刊，文中下了定論：唯有二〇一八年開始每一所新建的發電廠都完全不排除碳，人類才有可能達到二〇一五年底巴黎氣候協議的目標氣溫。二〇一八年是什麼時候呢？是川普任職總統的第二年。

對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而言，這些訊息實在難以接受，因為我們已經習慣聽人告訴我們「進步是必然的」。馬丁·路德·金恩曾說：「道德宇宙的弧線雖漫長，但終歸正義。」這是個鼓

舞人心的理想，可惜它不適用於氣候危機。世界各地有錢的政府瞎晃了太久，使得問題不斷惡化，現在這條「弧線」必須彎得非常、非常快，否則將與正義擦身而過。氣候的警鐘，已將近午夜。

不一般的選舉輪迴——無敵糟糕的時機

民主黨黨內初選時，某件事深深撼動了我的心。一位年輕女性在一次競選活動問希拉蕊·柯林頓：由於全球暖化的程度越來越嚴重，她是否能發誓再也不收化石燃料利益集團的錢？在此之前，柯林頓競選團收了化石燃料公司員工與陳情者的大筆捐款——綠色和平組織的資料顯示，這個數目約為一百七十萬美元。當時，柯林頓一臉噁心地斥責這位年輕人，表示她「受夠了」這個不斷被提起的議題。數日後，柯林頓受訪時表示：年輕人應該「自己查資料」。提問的女性名為伊娃·芮斯尼克戴伊（Eva Resnick-Day），是綠色和平組織的一員。她確實自己查了資料，並堅持道：「這就是我們為未來擔憂的原因……接下來四或八年的動向，能決定我們地球與人類的未來。」

我認為她說到了重點；這並不是普通的選舉輪迴。她讓我們知道，對希拉蕊抱有政商勾結疑慮不僅合理，更是我們不得不提出的問題。芮斯尼克戴伊的評論，更點出了川普任職總統為

何如此悲慘：掌握世界最高權力的男人，竟宣稱全球暖化是中國人編造的謠言，他忙著廢除美國對化石燃料的限制（這些限制本已不夠用了），更鼓勵他國政府跟進。這一切，都發生在人類史上最不恰當的時間點。

目前為止，我們使地球暖化了攝氏一度。僅僅一度的變化，就引發了戲劇性的結果：大片大片的珊瑚死亡，北極氣溫上升導致冰層嚴重融化，南極冰層四分五裂。我們若沿著目前的污染拋物線行進，將使地球氣溫整體提升攝氏四到六度。氣候學家兼排放物專家凱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表示，允許地球暖化四度「不是任何有組織、公平且文明的全球社會該有的表現」。於是各國政府前往巴黎簽訂協議，盡其所能地遠離這條危險的道路，試圖將暖化限制在「遠低於二度」的範圍，盡量維持在一·五度以下。目標溫度的上限已是目前暖化程度的兩倍，即使達成了目標，我們也尚未脫離危險。

所以我們必須朝目標範圍內的低溫邁進。這並不簡單；根據華府智庫國際石油變化（Oil Change International）於二〇一六年九月發表的研究，各國政府若希望確保上升溫度低於攝氏二度，就必須讓尚未開挖的儲備化石燃料留在地底。問題是，即使在川普出現之前，也沒有任何經濟大國採取這些必要措施。他們想兼得魚與熊掌——在推出嚴格的綠能政策同時，批准了化石燃料擴大開採與新建輸油管線。這就等同於一個想減肥的人吃一堆沙拉，同時卻吃一堆垃圾食物。

在美國，歐巴馬推出了潔淨電力法案（Clean Power Plan），目標是加速國內老舊煤廠的汰換速率，並要求新建的發電廠過濾他們排放的氣體，盡量不讓二氧化碳進入大氣層。但同樣在歐巴馬任期內，巴肯頁岩油區利用液體壓裂法開採的天然氣與石油產量卻連連上升。而在加拿大，政府推出了全國碳定價與脫煤政策，卻也允許油砂開採區不斷擴增，還批准了全新的超大型液化天然氣輸出管道——基本上，加拿大是不可能達成巴黎協議的目標了。

即使如此，這麼多國家在媒體沸沸揚揚的報導下簽署了巴黎協議，也至少花費唇舌工夫宣傳它們的溫度目標；這些行動給了環保氣候運動足夠的影響力，讓它們有辦法對政府施壓，要求政府通過真正能達成目標的法案。我們試圖要求政府實現巴黎的諾言，也確實有所進展。

然而現在，川普卻說：什麼，把錢都留在地底？你瘋了嗎？！

油膩膩的政府

競選期間，川普一踏上講臺就會開始他的標準演說，句句說入觀眾的心坎：建高牆、找回工作機會、法律與秩序、壞蛋希拉蕊。他通常不會提起「氣候變遷是謠言」的理論（但有人提問時，川普也會口若懸河地說起這件事）。然而這個競選期間顯得毫不起眼的議題，在川普開始任命內閣閣員時忽然浮出水面。總統就職典禮後，剷除所有氣候環保規範儼然成為川普政府的

特色。川普與他的團隊彷彿與時間賽跑，系統性地滿足了化石燃料產業一個又一個願望。他任用的高層行政首長、他決定砍預算並剷除環保規章的計畫、他一次次否定氣候變遷的行為，甚至是他與俄羅斯之間複雜的糾葛——全都指向同一個方向：一股深植心中、恆久不變的堅持，一股推動無限制化石燃料狂熱的堅持。華府的密謀與詭計非常多，最惡名昭彰的，是川普團隊與俄羅斯合作影響二〇一六大選結果的說法——此案正在調查中，這也是理所當然。但別被誤導了，真正隱藏在亮處的，是川普與化石燃料公司勾結的陰謀。

剛上任數日，川普直接中斷了環保審議，並在立石蘇族部落（Standing Rock Sioux）聲勢浩大的反對下，強硬地推行了達科他輸油管（Dakota Access Pipeline）計畫。他已經做好通過鑰石XL輸油管線計畫（Keystone XL pipeline）的準備，從加拿大亞伯達省接至美國境內；當初歐巴馬駁回這項計畫，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輸油管線對氣候環境的影響。但現在川普下達行政命令，翻轉歐巴馬中止煤礦業租用聯邦土地的決策，並宣稱要擴大墨西哥灣沿岸地區的石油與天然氣開採行動。除此之外，川普也竭力抹殺歐巴馬的潔淨電力法案。在政府通過一項項新化學燃料計畫的同時，他們也排除了各種環保規範，使埃克森美孚等公司能在挖取並處理碳燃料的過程中獲得更多利潤。結果這些本就對氣候有害的計畫，變得更可能導致深水地平線漏油事件等工業意外——這就是規範消失的後果。

在我寫這本書時，美國是否將正式退出巴黎協議，仍是未知數；川普政府內部似乎有不同

的聲音。但無論美國的去留，我們不得不同意，川普政府正一步步剝除美國曾在巴黎協議立下的允諾。

除了雷克斯·提勒森之外，川普的其他政府官員也與化石燃料工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化石燃料公司的主管、政治人物都一樣。其中有幾人在管理政府機構的同時，對這些機構的命令持反對意見，或者是漠不關心。史考特·普魯特（Scott Pruitt）是川普的國家環境保護局長，但當初他作為俄克拉荷馬州檢察總長曾多次提告環境保護局，而收取化石燃料公司數萬美元不知是不是巧合。川普挑選的能源部長瑞克·裴利（Rick Perry）與石油產業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達科他輸油管計畫背後有兩家公司，董事會名單上都曾出現裴利的名字。在二〇一一年，裴利參加共和黨提名人選舉時，甚至提議完全廢除能源部。

別問，也別說

這群人齊聚一堂，在各方面為石油、天然氣與煤礦公司爭取利益。例如，一項計畫要求石油與天然氣公司報告他們排放或洩漏的甲烷總量（甲烷是一種效果顯著的溫室氣體），原本在歐巴馬擔任總統的最後數週通過，部分原因是為推翻「天然氣能解決氣候變遷」的說法。工業界恨這項計畫入骨；它已經被川普扼殺了。川普將這份大禮送給了工業界，以自身行動表達：別

說，我們不想知道。從今以後，全球其他國將只能揣測美國脫離氣候環保規範的程度，因為最關鍵的數據將不存在。

化石燃料產業面臨的最重大威脅，就是世界各地出聲要求政府採取真正能改善氣候的行動，以及人們心中逐漸抬頭的觀念：所謂認真看待氣候危機，就等於中止新的化石燃料計畫。化石燃料公司主管以及石油大國（例如俄羅斯）政府懼怕此觀念，因為這代表富含化石燃料、價值數兆美元且股票高漲不跌的保留地，可能在一夕之間變得一文不值。此一現象有時被稱為「碳泡沫化」（carbon bubble），到了二〇一六年，這個泡泡已經開始洩氣了。你可以想像川普拿著腳踏車充氣筒，狂奔過來救援，告訴化石燃料產業他將用幾年份的有毒氣體填充泡泡。他打算怎麼做呢？答案還不簡單？自然是讓氣候變遷直接消失。

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事態發展，一切清晰到了荒謬的地步。第一天，白宮網站上許多關於氣候變遷的資訊都消失得一乾二淨。美國太空總署（NASA）用衛星收集地球變化資料的計畫也面臨中止危機，冰河融化、海平面上升的資料將不再更新。預算局局長麥克·馬瓦尼對此直言不諱：「關於氣候變遷的問題，我認為總統先生說得相當直截了當——我們將不會撥預算給這方面的計畫。我們認為拿各位的錢做這些事，是一種浪費。」

他們抹消氣候變遷的意志是如此強烈，他們甚至打算抹消那些幫助人們面對氣候影響的計畫。川普提議中止一項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ssociation）幫助人

民保護海岸的計畫。他還想大幅削減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簡稱FEMA）的經費，這是負責處理大規模自然災害的機構；川普還打算完全中止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幫助人民預防災害的主要計畫。他打算砍掉國家環境保護局超過三〇%的經費；此舉將致使數千人失業，並消滅整個環保正義計畫——這是幫助非裔美國人、拉丁美洲裔與美國原住民等低收入社區的計畫，協助他們面對後院堆滿工業毒物的種種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川普的許多措施——包括砍預算、中止管線鉛污染相關的計畫——將以不成比例的程度，傷害邊緣族群的孩子。國會一項預算政策已延遲了最嚴重的部分，砍環境保護局大筆經費的行動將延至二〇一八年。

由此可見，川普拯救化石燃料產業的計畫是多管齊下：先是阻止科學研究、封住各機構的出口，以此埋藏氣候變遷的證據；接著，消除那些負責處理氣候災害的計畫；接著，排除所有障礙，通過更多鑽油、開採天然氣的計畫，通過更多採礦與燃煤的計畫，任由導致氣候變遷的行為變本加厲。

政策不斷倒退，不過加利福尼亞與紐約等大州勇敢的行動能多少與之抗衡。這些州承諾道，無論川普如何推動化石燃料政策，它們將迅速地推出更多再生能源計畫。但是，成日為埃克森美孚牟利的川普政府，究竟能否引發無可挽回的災厄，還有一個必須考量的關鍵因素。

價格就是一切

化石燃料公司並不會立即開啟大型開採計畫，其中存在一個最大的限制——而這個限制不是歐巴馬推行後被川普取消的法規。阻止他們擴大開採的因素，是油價與天然氣價格。今年是二〇一七年，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油價相對歐巴馬上任時低廉許多，因為供過於求——市場上供給的石油與天然氣，超過消費者所需的量。

對公司而言，價格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開採容易且成本低廉的化石燃料正不停地消耗，此情形在美國尤為嚴重。那麼，剩下的資源呢？都是開採困難且成本高昂。在北極或深海鑽油可一點都不便宜，從加拿大的亞伯達省開採半固態油砂後精緻處理也需要大筆資金。二〇一四年油價高漲，化石燃料公司投資數十億美元開採昂貴的燃料資源；當時油價約一百美元一桶，即使開採成本高，他們依然能賺取高額利潤。石油化學工業的發展確實推動了經濟成長，確實創造了不少就業機會，但地球環境付出的代價太高了。墨西哥灣的深水地平線漏油事件，與化石燃料公司為了採油越鑽越深的事實密切相關。亞伯達省的油砂開採計畫之所以極具爭議，是因為採原油的過程排放大量的碳，且對土地而言是侵入性開採，原住民保留區的土地與水資源已遭嚴重污染。

當時，雷克斯·提勒森的埃克森美孚瘋狂地購置高價重油保留地，最後公司足足三分之一

的油礦保留地都位於亞伯達省油砂。油價崩盤對埃克森美孚而言是極大震撼。二〇一四年，油價開始下跌，僅僅六個月內，布蘭特原油（Brent Crude）——國際原油評價觀測體系——從一桶一百美元跌到五十美元，此後油價停滯在一桶五十五美元附近。此事導致許多公司取消較極端的能源計畫，美國境內以液體壓裂法採石油與天然氣的狂潮逐漸冷卻，造成災難性的人資問題：在二〇一四年油價下滑之後，約十七萬名石油與天然氣相關勞工失去工作。隔年，投資亞伯達省油砂的金額下降了約三七%，並持續下滑。殼牌石油公司（Shell）中止北極鑽油計畫，並售出公司持有的大部分油砂保留地。法國石油公司道達爾（Total）同樣收回了伸向油砂的手。就連埃克森美孚也被迫放棄近三百五十萬桶油砂石油，因為在目前的價格下，石油市場不認為這些保留地值得開採。深海鑽油行動也停滯不前。

對大型石油公司而言——尤其是打賭油價居高不下的公司——這一切都是場災難，其中損失最慘重的便是埃克森美孚。油價高漲時，提勒森帶領公司打破了美國企業營收記錄，在二〇一二年賺了四百五十億美元。而在二〇一六年，埃克森的營收遠遠不及八十億美元，公司利潤在短短四年內掉了八〇%。

這些究竟代表什麼呢？這代表埃克森美孚等大型石油公司，以及承保了這些巨額賭注的銀行，恨不得讓油價再次上漲。他們想回到過去超高利潤的日子，再度開啟化石燃料狂熱。所以我們不得不回答一個重要的問題：川普政府——也就是埃克森美孚聯盟——將如何達成此目

標？

我們已經看到一些為抬高油價而存在的政策。川普計畫推翻歐巴馬時代關於汽車節油的規定，此舉將一併提升消費者對汽油的需求。而川普編列的預算，以完全不支援新大眾運輸計畫、剝除長程火車服務的經費為目標。

儘管如此，目前市場並未大幅受其影響。川普當選後，油價稍微上揚，但之後又維持穩定。從氣候的觀點而論，這是好消息：低廉的油價也許會促進短期消費，但也阻撓了導向災害的長期投資。我們擔心的是——我們發自內心感到擔憂——川普等人的花招還不只這些，他們也許能用其他方式炒高油價、達成重現化石燃料狂熱的目標。

我們必須時時刻刻盯著石油市場的變動，因為哄抬油價最好的方法就是戰爭，以及對全球市場的大規模震撼——我們將在第九章深入探討此議題。

自由派一概不知，保守派卻深深明瞭的暖化祕密

過去許多年，我一直不懂為何某些人堅持否定全球暖化。乍看下，此現象令人不解；一個人為什麼拚了命否定九七%氣候學家認同的科學事實呢？這些事實所造成的影響明明就在我們身邊，我們每天收看的新聞都驗證了這些事實。這個問題引導我踏上尋求解答的旅程，也為我

寫的《天翻地覆——資本主義 vs. 氣候危機》(*This Changes Everything*) 奠定基礎。我想，我寫《天翻地覆》時發現的事實，能幫助我們理解氣候破壞對川普政府的重要性。

我發現，當最冥頑不靈的保守派否定氣候變遷時，他們不只保護受氣候環保行動威脅的數兆美元財富，也在保護對他們更加珍貴的事物：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理念是，市場永遠正確，規範永遠錯誤，私人永遠好，公家永遠壞，而支撐大眾福利的稅賦更是罪大惡極。

對許多人而言，「新自由主義」是個模糊的概念，新自由主義派的身分也不清不楚。這是情有可原的困惑；讓我來為各位說明。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極端資本主義，於隆納·雷根與柴契爾夫人當政的一九八〇年代逐漸興起，一九九〇年代過後，它成為世界菁英不分黨派的主流思想。儘管如此，最忠實、最虔誠的新自由主義派，仍然是最初發起運動的那群人：美國右派人士。

新自由主義可說是一項經濟計畫，它使公共領域妖魔化，並攻擊任何市場運作或消費者決策之外的事物。最簡潔明瞭的概述，是雷根的名言：「英文最恐怖的七個字是：政府派我來幫你。」在新自由主義的世界觀裡，政府之所以存在，是為了替私人企業創造利潤、財富最大化的環境，因為隨之而來的企業利益與經濟成長將從上層向下涓滴，（總有一天會）造福所有人。倘若此法無效，社會上的不平等依舊頑強地存在，甚至惡化（這是千篇一律的結果），那麼在新自由主義的世界觀中，想必是受苦的人們自己出了問題。他們想必生活在「犯罪文化」中或缺乏「職業道德」，或許是長年不在家的父親所致，總之新自由主義會提出一個個帶種族歧視意味

的藉口，堅持政府政策與公共經費不該用以消除不平等、提高生活品質，或解決社會結構問題。

推行新自由主義計畫的工具，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詞彙：公共領域私有化、企業界去規範化、減少公共福利以求更低的稅賦，這一切包裹在企業友善的貿易協議中。無論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空環境下、在什麼歷史背景下，無論當地人民懷揣何種希望與夢想……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公式。一九九一年，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的勞倫斯·薩默斯(Larry Summers)為此社會特性下定結論：「推廣事實——經濟學就如工程學，一套法則通用於世界各地。」（這也是我有時稱新自由主義為「麥當勞政府」的原因。）

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被視為新自由主義推廣至全球的信號。隨著社會主義逐漸沒落，似乎已沒必要掩藏資本主義的鋒芒。對於此事，柴契爾夫人的名言是：「別無選擇。」（換個角度想，新自由主義就是沒有競爭對手的資本主義，也可說是資本主義穿著襯衣癱在沙發上，嚷著：「你還能怎樣？丟下我不顧嗎？」）

新自由主義是賺錢潛力很高的一系列想法集結而成，所以我不太喜歡以「意識形態」或「思想體系」稱之。貪婪的邏輯依據——這就是它的核心觀念。數年前，美國億萬富豪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上了新聞頭版，原因正是因為他對CNN新聞說了這段話：「二十年來，階級鬥爭不停地進行。我的階級贏了……我們富豪階級。」巴菲特想表達的正是此事：貪婪的邏輯依據。雖然他當下說的是富人在這段期間享受的巨額減稅，但他的概念適用於新自由主義所

有政策。

那麼，這和右派人士廣泛拒絕相信氣候變遷、川普政府對氣候變遷深深地否定，有什麼關係呢？關係可大了。因為到了現今的地步，我們唯有全民一起行動、限制埃克森美孚、高盛銀行等公司的行為，才有可能改善全球氣候。我們必須投資公共領域——投資新的能源網、大眾運輸與輕軌，以及優化能源效率——我們必須投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大的精力，經營公共領域。前提是富人與企業的稅賦必須加重……但這些正是川普慷慨地允許減稅、鑽漏洞並逃避規章的對象。針對氣候變遷採取行動，也代表川普必須給予地方社區以當地綠色產業為優先的自由——但此一過程時常與新自由主義的企業自由貿易法規正面衝突，也排斥「愛用國貨」這些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川普競選時宣稱反對那方面的自由貿易法規，但我們將在第六章看到他無意廢止這些規定。）

簡而言之，氣候變遷炸毀了當代保守主義的思想架構。當你承認氣候變遷為實，你也不得不承認新自由主義計畫將迎來終章。這就是為什麼右翼人士對物質世界發起了叛變，竭力反抗科學（這驅使世界各地數十萬名科學家參與二〇一七年四月的「為科學遊行」(March for Science)，共同守護不應該需要人們守護的原則：我們應該盡量認識我們的世界，這是好事)。但是，科學成為我們今日所見的戰場，也是其來有自——因為科學不斷地揭露事實，告訴我們新自由主義計畫將導致威脅地球物種的災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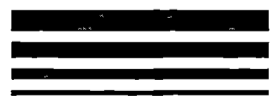
相較之下，數十年來主流自由派人士主張：我們只須稍微更動現有的系統，一切就會安然無恙。我們可以生活在高盛銀行資本主義與太陽能板並存的世界……然而，我們面對的挑戰，是更加基本的觀念。為了迎接挑戰，我們必須拋開新自由主義的守則，去面對現今不斷膨脹的消費主義，以及我們衡量經濟成長的標準。在這方面，川普的閣員——那些迫切否定全球暖化、貶抑其重要性的閣員——理解了一件本質上無誤的事實：我們若希望避免氣候災厄，就必須挑戰自一九八〇年代開始宰治世界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此意識形態的既得利益者，這些人自然感到十分不快，這是理所當然的反應。全球暖化逼迫我們激進革新，若氣候變遷為真——此事顯而易見——那麼寡頭政治領袖階級就不能再一手遮天。人類整體的存亡，與阻止這些寡頭政治領袖密切相關。

如果我們失敗了，我在大堡礁所見的死亡將蔓延至全世界，以我們難以想像的方式侵占我們家園。

鹹豬手之王

川普上任後，許多人呼籲大眾停止「爭議二〇一六年的選舉」——別再回頭，是時候向前看了。

老實說，我也厭倦了反覆回頭的行為，因為我幾乎承受不了大選期間——尤其是民主黨黨內初選期間——的緊張感。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幾乎無法上社群媒體，因為每次打開網站都會看見好友為了「伯尼好兄弟」(Bernie Bros)與「希拉蕊機器人」(Hillary Bots)爭論不休，我為此失了好幾個朋友，許多人也經歷了相同的苦難。有些人責怪我這種公眾人物不公開支持希拉蕊，或者在初選期間過分抨擊她與企業藕斷絲連的關係，害她最終敗選。而我也無法原諒自由派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等人，明明寫了那麼多強調經濟不平等與銀行詐欺之重要



性的書籍，卻利用自己在《紐約時報》的影響力頻頻攻擊伯尼·桑德斯——唯一認真想力戰收入不平等並約束各銀行的候選人。人們不希望重提當時的戰事，因為當時的情況慘不忍睹。

我們所有人處理恐懼與不確定的方式都不同，面對持續改變且變得不穩定的世界，許多保守派人士選擇努力挽回時間。若說挽回逝去的時光是右派專長，那麼左派的專長便是內部鬥爭，以及永遠循環輪迴地互相指責。

儘管如此，呼籲大眾看向明天的聲音出現得太快，我不由地感到懷疑。因為我們確實必須盡可能聯手抵抗川普與類似的勢力——但同時，我們也必須避免重蹈覆轍，犯下當初允許川普主義與類似觀念崛起的錯誤；我們不能再重現當時的大環境。可惜，部分證據指出，許多當權民主黨員只學到了一個教訓：別讓俄羅斯人駭入你的電子信箱。

所以我認為我們都應該深呼吸，稍微回頭——這並不是要揭開過去的瘡疤，而是從過去的經驗學習。我們如果不願誠實面對導向現況的因素，就不可能離開我們所在的位置。

惡劣的情緒油然而生

如果從全球各地油然而生的惡劣情緒抽取一個教訓，它也許就是：我們永遠、永遠不該低估仇恨的力量。永遠別低估掌控「外人」生殺大權的慾望，這些「外人」或許是移民、伊斯蘭教

徒、黑人、墨西哥人、女性，任何的「外人」都有可能激起人們心中的掌控慾。尤其在經濟蕭條的時期，眾人害怕支撐他們生活的工作永遠消失，更容易排斥「外人」。

川普直接針對經濟恐慌出聲，也同時對美國很大一部分的白人喊話，激起他們對國家變化的怨憤，提醒他們國內權勢與優待落入外貌不同的人手裡，引發更多的怨恨。除了種族仇恨之外，沒有其他理由能解釋川普及其死忠支持者對歐巴馬強烈且無理的憤懣，他們花了好幾年試圖「證明」歐巴馬是肯亞人，以此剝除他的「美國人」特質，將他視為「外人」。這就是大選那一晚，CNN新聞評論員范·瓊斯(Van Jones)提及的「白人種族主義反撲」現象。對川普很大一部分的選民而言，這是一股凶暴而殘忍的力量，這點無庸置疑。

競選期間，針對希拉蕊·柯林頓的憤怒也來自同樣野蠻、原始的人性。這位候選人不僅是女性，她甚至支持女權運動，是女權運動的產物，而且沒有用「可愛」或「靦腆」包裝她尋求權勢的企圖心。從「把她關起來！」的瘋狂喊聲能看出，對美國非常多人而言，他們就是無法接受柯林頓。

我個人不支持柯林頓的某些政見，但人們沸騰的仇恨並非針對她的政見，而是來自更深層的所在。在我看來，競選期間最先浮出水面的爭議具顯著意義：當福斯新聞主播梅根·凱利(Megyn Kelly)斗膽向川普提出艱難問題，請他針對先前性別歧視的發言表示意見時，川普說她顯然「某個地方在流血」。這是最卑鄙的侮辱，建立在「月經使得女人不適合公眾生活」這個古

老觀念之上；它是最先敲響的警鐘，它提醒我們，對於女性跨出男性授與她們的活動範圍，部分人民心中燃起了盲目的無名火，而這將成為競選期間一股巨大的推進力。唐納·川普是個驕傲的花花公子，麥克·彭斯是個對「性」感到不屑的男人（他聲稱自己從不與女性同事單獨用餐），上述觀念暗示了連結這兩人的共通點：他們相信女性的身體是為了服務男性而存在，無論是為了滿足男性的性慾或製造嬰兒。這種白人男性將成為政府各部門幹部，決定女性身體健康與生育自由的未來。

人類生命的等級

在二〇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時，我們聽見某些男性自信地大吼，只有他們才有執政的權利——他們公開放話，也在緊閉的門後竊竊私語。川普身邊的男性、在新聞媒體上公開支持他的男性之中，不少人曾有毆打、騷擾或性侵女性的紀錄。史蒂芬·巴農的前妻告訴警方，巴農曾對她施以肢體與言語暴力——檢察官無法請巴農前妻作為證人出庭，此案便不了了之。川普原本指名的勞工部長安德魯·帕茲德（Andrew Puzder）的前妻在法庭文件中聲稱，帕茲德「沒來由地暴擊她的臉、胸、背、肩與頸部」，造成了永久性傷害——但後來她撤回了這份文件。當然，川普在媒體界最強力的支持者比爾·歐萊利也在這些人當中。再來還有原先在福斯新聞工作的

羅傑·艾爾斯；在二十幾名女性（好幾位還是他的同事）指控他性騷擾之後，艾爾斯與歐萊利同樣否認了被害人的指控，他離開福斯新聞並成為川普競選總部的顧問之一。當然，我們不能遺漏川普本人——許多女性指控甚至是控告川普性侵害與性騷擾（他否定了一切），據說他第一任妻子伊凡娜（Ivana）某次宣誓作證時，表示丈夫曾於一九八九年強暴她，但後來與安德魯·帕茲德前妻一樣撤回了這份文書。

自由派自然也有不少性犯罪者，然而圍繞在川普陣營核心人物周遭的指控、批評與封口費，已經到了前所未見的地步。這些人無論受到何種指控都以拒絕承認的高牆堵回去，有錢有勢的男性為其他有錢有勢的男性打包票，他們告訴全世界，女性不值得信任。考慮到川普的品牌特色，我們也許不該為此事驚訝——因為他就是為所欲為的大老闆，他愛摸誰就摸誰、愛摸哪裡就摸哪裡，他愛嘲諷、侮辱或羞辱誰也沒人管得了他。這就是「鹹豬手之王」販售的商品……顯然，這個產品的市場需求非常大。

「工作選民」的難題

許多選民投給川普，主要動力並不是「白人種族主義反撲」或「男性主義反撲」。不少人表示，他們投給川普是因為喜歡川普關於貿易與工作的言論，或因為他們想衝擊華府菁英的「沼

澤」。

但這些說辭有問題。當一個候選人公開挑起種族、性別與肢體障礙的仇恨時，除非你認為這些議題不重要，否則你不該投票給這位候選人。當這位候選人的言論（以及衍生推行的政策）實質威脅某些人的生活，投給這位候選人就代表你認為自己的生活比他們重要、與你外貌相似之人的生活也比他們重要。除非你願意犧牲其他「類別」的人，換取你（希望能得到）的利益，否則不該投給他。容我直言不諱：雖然一個人投票給川普不代表他仇視其他族群，但他至少以此舉表明了滿不在乎的可怕態度。

大力支持川普崛起的種族與性別仇恨有著悠久歷史，在歷史的脈絡中隨著壓力與各種契機興衰。然而川普在當今世界使用如此古老的策略，並得到民眾熱烈的響應，其中存在深深埋藏於現今結構中的原因。有些是白人男性地位變化所引發的仇恨，但這只是冰山的一角。川普之所以勝選，是因為失去社會地位的民眾，同時也失去了基本的經濟保障。投票支持川普的白人，並不是受到新自由主義政策嚴重打擊的族群——還差得遠呢。社會福利減少、銀行去管制化等政策，對黑人與拉丁裔美國人家庭的影響大得多，這些有色人種居住的區域，正是社會福利減少程度最大的區域。

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政策將部分民眾排除在正式經濟之外，且不僅如此，它還導致以控制與遏制為目的的國家機關暴增：武警隊、守備森嚴的國界、受羈押的移民，以及大規模監禁行

動。自新自由主義革命開始已經過了四十年，美國監獄裡的囚徒人數增加了約五〇〇%——雖然白人也感受到此系統的影響，但受影響的黑人與深色皮膚人種卻多到不成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的支持者多半不貧窮，而是屬於中薪階級的一群人，年薪座落在五到二十萬美元之間（多數人集中在此區間偏低的薪資）。既然川普的選民多半不到貧困的程度，有些人認為他們投給川普並非基於經濟壓力。

但此說法遺漏了一項重要的因素。CNN新聞分析了大選的出口民調，發現在認為自己經濟狀況較四年前糟的選民之中，七七%都支持川普。換句話說，這些人雖然收入高於全國平均，卻失去了曾有的優渥生活——而這個趨勢，早在多年前就開始了。

各方面都沒有保障

過去三十年來，除了頂層1%的富豪之外，所有人的就業保障與曾經存在的薄弱安全網都逐漸消失了，這個情況在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時期只有加速，沒有減緩。這代表一個人失去工作之後，支付健保或房貸的能力也大受影響；打擊許多選民的同時，此現象也打擊了支持川普的勞工階級白人男性。另一方面，由於川普的藍領選民在此之前都過著不錯的生活——擁有待遇佳、工會保障的生產工作，足以支撐中產階級的生活品質——當這些人經濟能力下滑時，受

到的衝擊相對也較嚴重。

我們從死亡率也能看出這些變化；沒有大學學歷的中年白種美國人死亡率在近年明顯上升，主因為自殺、濫用處方藥物，以及酒精相關疾病。死亡率提升的只有白人，處境相似的黑人與西語裔美國人，死亡率反而下降了。安·凱斯（Anne Case）與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他們發現這個自一九九九年開始的趨勢，並以「絕望死亡」為題材撰寫了標誌性論文。他們認為此趨勢的不一致性，來自各族群過去不同的經歷以及對未來的期望，換言之便是「對實際發生的未來感到失望」。我們還能以另一種方式思考：當一幢大廈倒塌時，原先位居上層的住戶會摔得更慘——這不過是淺顯易懂的物理法則。

除了這份失望之外，人們居住在一個不斷變化、種族組成日益多元化、女性掌握越來越多權力的國家，不穩定與不確定的因素也給與人們不少壓力。這是邁向平等社會的必經之路，是許多人奮力爭取而來的成果，但這也代表白人男性逐漸失去他們的經濟保障（這是所有人都應得的），也失去他們高人一等的優越感（他們本就不該有此想法）。當我們急匆匆地斥責後者時，我們必須謹記重要的一件事：並非所有「天生權利」都是錯誤。所有人天生擁有尊嚴與生命的權利。在富裕的國家，當一個認真工作數十年的人認為他理應得到基本的工作保障、退休後的老年照護、生病時的醫療補助、孩子學習並脫穎而出的工具，這並不是貪婪的表現或奢求。在一個像樣的社會裡，人們本就該爭取這些權利，這些是人類的基本權利。然而四十年來，這些

需求受到右派猛烈攻擊，甚至到了「天生權利」這個詞——代表退休金與健保的詞彙——在華府染上污穢意義的地步。

正是上述因素混合而成的複雜情勢，允許川普站在所有人面前說：我會擁護那些受眾人圍攻的勞工。我會幫你們找回製造業的工作。我會幫你們廢除這些自由貿易協議；我會把你的權利交還給你。我會讓你再次成為男子漢，想摸哪個女人就摸哪個女人，不用面對一堆無聊問題；還有川普對支持者最有說服力的承諾：我會把棕色皮膚的人全部驅逐出境或禁止他們工作，黑人要是敢爭取權利，我就把他們全部關起來，幫你們移除競爭對手。換言之，川普承諾再次使白人男性回歸他們安全的高位。

這個諾言的影響力是如此強大，以致川普當選總統的消息如同蝙蝠俠標誌，號召國內各種煽動仇恨者群起出擊。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報告指出，光是在二〇一六年，反伊斯蘭教仇恨團體的數量就增加至將近三倍。川普當選後一個月內，發生了超過一千起針對有色人種的仇恨行動。來自印度的三十二歲移民工程師斯林尼瓦·庫奇賀拉（Srinivas Kuchibhotla）遭槍殺，此案發生在堪薩斯州奧拉西市；根據報導，射殺庫奇賀拉的白人男子當時大喊：「滾出我的國家！」之後開槍。二〇一七年才剛開始兩個月，就有七位跨性別人士遭謀殺，呼籲聯邦政府調查這一連串仇恨犯罪的聲音也隨之響起。

這個國家的社會狀況越來越恐怖。我們的膚色與性向決定了誰能被國家照顧，不會受肢體

傷害，它決定了誰可能被激進分子施加暴力，它決定了誰能在不被世人抨擊的情況下表達內心所想，它決定了誰能從容自適地跨過國界，也決定了誰能安心信仰自己的宗教。

指責身分的遊戲

因此，當人們呼籲自由派與革新派捨棄「身分政治」，轉而聚焦於經濟與階級時，我們必須知道這是短視且危險的想法。這些因素是不可能分開看待的。

斥責所謂「身分政治」與「政治正確」，是福斯新聞與布賴特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的標準作業，但它們並非唯一，而且選舉後，批評者的聲音只有越來越大。許多自由派民主黨員從希拉蕊·柯林頓敗選的經驗學到了「教訓」，認為她競選時直接對女性與少數群體喊話，勞工階級的白人男性感覺被排擠，只能紛紛湧向川普陣營。大選過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拉（Mark Lilla）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他責備柯林頓道：「每一次演講都明白地向非裔美國人、拉丁美洲裔、LGBT與女性選民喊話，這是她的策略失誤。」他認為柯林頓集中精力拉攏傳統上被邊緣化的群體，並專注於「關乎種族、性別與性向的道德恐慌」，導致「自由主義所傳達的訊息扭曲了，無法成為有能力掌權的統合力量」。顯然在里拉看來，「統合」的前提是所有吵鬧不休的弱勢群體（其實加總起來是不容小覷的多數群體）閉上嘴，讓民主黨能夠放下各群體

零碎的問題，回到一九九二年比爾·柯林頓當選總統時的競選口號：「笨蛋，問題是經濟。」

然而，若我們非從二〇一六年大選抽絲剝繭地記取「教訓」，這絕對是錯誤的結論。希拉蕊·柯林頓敗選與她傳達訊息的方式無關，這是前科紀錄的問題。更確切來說，正是她、她丈夫與民主黨掌權者信奉的（笨）新自由主義經濟，使得她無法提出可信的政見說服白人勞工支持她——這些人兩度選擇歐巴馬，這回卻決定投給川普。川普的計畫確實不可靠，但至少令人耳目一新。

同樣地，若柯林頓專注於性別、性向與種族身分的態度存在問題，那問題就是她主張的身分政治並沒有挑戰創造了種種不平等的系統，只想將系統變得更「有包容力」。所以她支持婚姻平等、墮胎與跨性別廁所，但至於居住權利、支撐家庭生活的薪資（柯林頓抗拒將最低薪資提升至十五美元的呼聲）、免費健保，或任何須要嚴格重新分配財富、挑戰新自由主義守則的政策，她的態度是：想都別想。競選時，柯林頓諷刺川普的「川普瞎掰式涓滴經濟」，然而她自己的理念卻近似「涓滴式身分政治」——稍微更動系統，稍微改變最上層的性別、種族與性向組成，接著靜待正義與平等涓滴至下層。結果呢？涓滴式做法在身分政治的成效，與經濟方面同樣淒慘。

我們為什麼能如此斷言？因為已經有人試過了。近年來，爭取多元化的戰役取得了數次具歷史意義的勝利——非裔美國人組成的第一家庭、兩位黑人檢察總長、好萊塢開始認同黑人導

演與演員、出櫃的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者擔任新聞主播與財星五百大企業的領導人、熱映電視節目以跨性別人士為主角、主管位階的女性數量增加等等。這些多元文化與包容的勝利非常重要，它們改變許多人的生活，並為社會帶來新的聲音。一代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看著歐巴馬擔任全世界最高權力的角色，這也非常重要。儘管如此，如果光是仰賴改變自上而下發生，而不制定自下而上的政策，改善學校教育與居住問題等系統性議題，那我們不可能迎來真正的平等。差太遠了。

在美國，上層變得更加包容、更加多元化的同時，也是移民被大規模驅逐出境、美國黑人與白人貧富差距擴大的時期。根據智庫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的數據，在二〇〇七年與二〇一〇年間，白人家庭的平均財富下降一一%（非常多），但黑人家庭的財富卻下降了足足三一%。換言之，在這個突破歷史限制、不斷進步的年代，黑人與白人卻變得更不平等了。其中一個原因，是銀行經常給黑人家庭次級貸款，受這種待遇的黑人家庭多得不成比例。所以在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這些黑人家庭也遭受最重的打擊。

與此同時，被警察槍殺的年輕黑人男性人數依舊居高不下（據《衛報》報導，相比同齡白人男性，這個數字高了五倍）。他們被殺害的影片時常暴露在大眾面前，深深烙印在成長中的孩子心裡。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黑人生命平權運動成了這一個世代的人權運動。《從黑人命平權運動到黑人自由》（*From #BlackLivesMatter to Black Liberation*）的作者基安格雅瑪塔·泰勒

(Kecanga-Yamahata Taylor)寫道：「由巴拉克·歐巴馬總統率領的黑人執政者，一次又一次證明了他們連最基本的任務也沒能完成——這個任務，就是保護黑人孩子的性命。年輕人只能自己保護自己。」同樣地，即使現在掌握權勢的女性人數眾多——還不夠，但至少較上一個世代多出不少——美國低收入女性的工時卻不斷加長，為了付清每個月的帳單，她們也許得兼好幾份沒有保障的工作。（美國領最低薪資的勞工之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女性。）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全球性別經濟落差排行榜上，美國從二〇一五年的第二十八名，一路跌至二〇一六年的第四十五名。

面對周遭的不確定性，支持川普的白人選擇對世界怒吼，而許多傳統自由派人士選擇不聞不問。希拉蕊·柯林頓在每一場造勢活動對弱勢群體喊話，宣稱她將為他們「出頭」，但如此微溫的誘因吸引不到她所需的支持率。當川普陣營因白人身分政治而士氣大振，柯林頓陣營的涓滴式身分政治卻無人響應。在愛荷華州、俄亥俄州、威斯康辛州等關鍵地區，柯林頓得到的民主黨支持者票數較二〇一二年巴拉克·歐巴馬少了一五%到二〇%。革新派興致缺缺、鬱鬱寡歡的態度，也是川普最終贏得總統大位（雖然他的總得票數低於柯林頓，在選舉人制度下他仍然勝出）的重大原因之一。

也許這也是我們該從二〇一六年學到的教訓。對「外人」的恐懼或許能成為極右派選民的動力，但在本就不公正的系統中，「包容」外人不足以擊敗排斥的勢力。「包容」不夠激勵人心，

無法在二〇一六年刺激士氣低靡的民主黨，無法擊敗英國的脫歐運動，我們也沒理由認為這種狀態能改變。

我們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並不是將所有問題排出高下——身分、經濟、種族、性別——也不是在「迫害的籠鬥」中由其中一個議題擊潰其餘議題。我們應該用心理解這些不平等之間的關聯性，它們是如何交錯、如何互相支撐、如何堆疊成穩固的架構，允許盜竊成性的混混成為全世界權力最大的男人——就像在脫衣舞俱樂部撫弄小姐一樣輕鬆。

「種族資本主義」

讓我們花一點時間回憶過去；要知道，利用種族與性別製造虛假的優劣排序，並以此維持殘酷的階級制度需要漫長的光陰。我們現代的資本主義經濟依靠兩次大規模剝削行為誕生：竊取原住民土地，以及竊取非洲人。進行上述兩種行為時，人們必須創建新思想理論，將人命與勞力的相對價值排出優劣順序，最頂層自然是白人男性。由教會與國家認可的白人（與基督教）至上理論，允許歐洲探險家積極地「無視」原住民文明——歐洲人雖然看見了這些人的存在，卻不承認原住民有土地所有權——將一整個原住民族遍布的大陸在法律上歸類為無人區，並在「拾金而昧」、「先搶先贏」的制度下恣意劃分土地。

在相同的人類優劣系統下，對其他人類的大規模綁架、囚禁與虐待行徑也有了正當性，抓奴隸來耕耘白人掠奪而來的土地。因上述因素，已故政治理論家西追·羅賓森（Cedric Robinson）並不用「資本主義」描述當初誕下美國的市場經濟，而是「種族資本主義」。非奴生產的棉花與糖推動了工業革命，唯有將有色人種及其國家視為低人一等，人們才能為竊取土地與勞力貼上「正當」的標籤。若少了最初的種族至上主義，這個道德破產的系統便無法鍍上法律正當性的金箔。換句話說，經濟從一開始就與「身分政治」密不可分，尤其在美國這種殖民國家——那麼，我們今天又為何分割這兩者呢？

人權律師蜜雪兒·亞歷山大（Michelle Alexander）在她的新書《新吉姆·克勞法》（*The New Jim Crow*）中表示，種族等級制度向來是市場體系的共犯，數百年來一同演化。她寫道：美國菁英從以前就一直利用「種族」離間窮人，「防止不同種族的窮人形成聯盟」——例如白人勞工支持的黑奴叛變事件，接著是利用吉姆·克勞法分割種族，以及後來所謂的毒品戰爭時期。每當這些跨種族聯盟壯大到足以威脅企業威權，就有人說服白人勞工，告訴他們真正的敵人是搶走「他們的」工作或威脅他們社區的有色人種。想說服白人選民支持縮減學校、公車與福利經費，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給他們錯誤資訊：這些社會福利的受惠者多半是有色人種，他們許多人都是「非法」之徒，專門利用福利機制騙錢。在歐洲，某些人靠散布「移民搶走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社會福利資源，還侵蝕了我們的社會」等說辭製造恐慌，達到類似的效果。

在過去的美國，隆納·雷根散布謠言，說食物券都被一個個身穿皮衣、駕駛凱迪拉克車的「福利女王」領走並用於支持犯罪文化，將種族隔閡最大化。川普也在這場瘋狂的行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九八九年，五名黑人與拉丁美洲裔青少年被指控在紐約中央公園強暴白人女性，當時川普買下紐約幾家日報的全頁廣告，高呼紐約應恢復死刑制度。後來DNA證據證實五名青少年無罪，他們的刑罰也取消了，但川普拒絕道歉或收回前言。這麼說來，難怪川普現在的司法部在部長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的帶領下，主張紐約與芝加哥等城市的社會福利與基礎建設「在非法移民與暴力犯罪下崩解」。他們恰到好處的轉移話題，引導我們遺忘多年來新自由主義沒能嚴格制裁犯罪的事實，並千方百計地禁止這些城市成為移民的「庇護城市」。

分而治之

事實上，幫助企業創建現今反烏托邦情勢的，便是系統性、持續不斷的對立：白人勞工與黑人，公民與移民，男性與女性。白人至上、仇女、恐同與跨性別恐懼症——這些都是高層菁英防治真實民主制度的最佳武器。他們的政治與經濟陰謀只能讓少部分人獲利，唯一實行這種策略的方式，就是利用分而治之的手段，並以創意十足的規章阻撓弱勢群體投票。

我們從歷史經驗得知，即使白人至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運動一直默默燜燒，在經濟困難

與國家走下坡的時期，這些運動極有可能化為熊熊烈焰。德國的威瑪共和仍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創傷復原，他們時時刻刻蒙受戰敗後經濟制裁的羞辱，最終成為納粹主義孳生的溫床。這本該是永傳後世的警世寓言。

猶太人大屠殺事件（Holocaust）後，全世界試圖聯手創造種族屠殺思想永遠不可能再興起的環境。當時的條件，再加上下層對上層的施壓，形成了全歐洲社會福利盛行的背景。市場經濟必須給與人民一定程度的尊嚴與保障，以免幻想破滅的人民利用替罪羔羊或極端思想發洩情緒——西方國家接受了這點。

然而這一切都被拋到了九霄雲外，我們竟允許一九三〇年代的歐洲在今日重演。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過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聯盟委員會與歐洲中央銀行（三者合稱「三巨頭」）強迫一個又一個國家接受「衝擊療法」，以衝擊性改革換取各國迫切需要的救濟融資。對希臘、義大利、葡萄牙，甚至是法國等國家，三巨頭說：「好啊，我們可以借錢給你們，但首先你們得顏面掃地。你們得放棄你們國家經濟事務的控制權，你們得將所有關鍵決策交到我們手上，你們得將國內經濟許多部分私有化，包括礦產等被視為國家根本的部分。你們必須減薪、減退退休金，再減健保。」這件事十分諷刺，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創立，其宗旨非常明確：預防類似一戰後德國所受的經濟制裁再次發生，避免人民心中萌生仇恨。儘管如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積極參與另外兩巨頭的行動，在希臘、比利時、法國、匈牙利、斯洛

伐克等國家創造出有利於新法西斯政黨的條件。我們現今的金融體系在世界各處散布恥辱——一個世紀前，經濟學家與外交官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警告世人，若世界對德國施行處罰性經濟制裁，「我預測，當復仇找上門之時，絕不會是跛著腳來訪。」

人們將川普勝選歸咎於一兩項主因，這種心態我能理解。人們說，這是美國最醜惡勢力的體現，它們一直隱身在社會上，直到蠱惑人心的政客撕下它們的面具，讓它們躍至前臺。人們說，這是種族問題，白人失去至高無上的地位後無理地發火。人們說，這全是厭女主義作祟；希拉蕊·柯林頓竟然敗給川普這麼噁心、這麼無知的人物，仍然是許多女性心中尚未癒合的創口。

但是，將當今危機濃縮成一兩個因素的結果並排除此外所有因素，並不能幫助我們理解擊敗這些勢力的方法，或幫助我們在下一次取得勝利。倘若我們無法提起好奇心，探索各種元素——種族、性別、階級、經濟、歷史、文化——如何互相交疊導致現今危機，那即使最好的狀況發生，我們也只是回到川普獲選前的膠著狀態。那個位置並不安全。

因為早在川普現身前，我們的文化就將地球與部分人類視為垃圾。我們的系統從勞工身上榨取一輩子的苦力，用畢便丟棄這些不受到保護的人。我們的系統將缺乏經濟機運的數百萬人當作廢物，監禁他們。我們的系統將政府視為挖掘私人財富的資源，最後只留下吃剩的殘骸。我們的系統視維繫生命的土地、水資源與空氣為無底餽水坑。

無愛政策

身為作家與知識分子的柯尼爾·衛斯特(Cornel West)曾說：「正義就是大眾化的愛。」我時常認為，新自由主義就是「無愛政策」。它是多為有色人種的好幾代孩子，在漠不關心的環境中成長；它是底特律老鼠四竄的學校；它是佛林特市的鉛水危機，毒害當地的年輕人；它是為倒塌而建造的房屋，以及取消贖回權的房屋抵押；它是資源匱乏、感覺更像監獄的醫院，以及滿是囚徒、像極人間煉獄的監牢；它是人們認為地球之美一文不值，任意破壞它的行徑；它就像川普那樣，是貪婪與漠視的代表。

雖然我們的全球經濟系統辜負了地球上大多數人，所有人被辜負的程度卻不相等。川普等人誘導人民將仇恨導向最不受保護的群體，這與川普代表超級富豪進行經濟掠奪、企業政變的行動息息相關，前者是因，後者為果。川普關於種族與性別的醜惡言論，是為了達成一組特定的目標——有巨利可圖的目標。基於身分的仇恨向來有此目標。

幸好現代成長速度最快的民間政治團體——從終結對女性施暴的社會運動，到黑人生命運動；從勞工爭取足以支撐生活的薪資，到原住民權益與氣候正義運動——不從單一議題出發。他們接納了女權與人權倡議者金柏莉·威廉斯·坎秀(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提出的「交集」觀念，找出不同議題——種族、性別、收入、性向、肢體能力、移民狀態、語言——在一個人

的生命中，以及權力體系中交集的形式。

嚴格執法、攻擊女性生育自由、提升外國衝突、將移民當作替罪羔羊、開啟化石燃料狂熱、取消經濟管制以圖利超級富豪——川普政府並不是從中選擇一個方針，而是同時進行上述（與更多）行動。他們知道，這些都是「讓美國再度偉大」的組成零件。

因此，任何認真想擊垮川普或世界各地極右勢力的反對派，必須以全新的方式陳述「我們如何來到這步田地」的歷史。這份歷史必須有說服力，並清楚呈現分而治之策略所扮演的角色。種族隔閡。階級隔閡。性別隔閡。公民身分隔閡。

以及人類與大自然之間，虛假的隔閡。

到那時，我們才能真正團結起來，贏得我們所需的世界。

政治痛恨真空

川普上任沒多久就發生了許多不光彩的事件，從馬阿拉歌俱樂部的燭光彈道飛彈高峰會，到怒罵百貨公司、未經過濾的推特貼文。但從反對派的視角看來，川普任職總統的第一個完整工作天依舊保持最不光彩的紀錄。就職典禮過後的星期一，一群笑盈盈的美國工會領袖從容地走出白宮，他們走向等候多時的一部攝影機，宣告效忠唐納·川普。

北美建築業工會(North America's Building Trades Unions)領袖席恩·麥格維(Sean McGarvey)表示，川普親自帶著這個來自數個工會的代表團參觀總統辦公室，表現出「令人不敢置信」的尊重。木匠兄弟會(United Brotherhood of Carpenters)領袖道格·麥卡倫(Doug McCarron)讚美川普的就職演說，以「對勞工男女而言偉大的一刻」形容多數人認為是「好戰的口頭推特文」。



我們看在眼裡，非常不好受。川普已經向經濟體系中最不受保障的勞工宣戰，據說還想砍去數筆可觀的經費，而這極可能導致公車司機等公共領域的勞工大規模失業。那麼，這些工會領袖代表約四分之一已加入工會的美國勞工，為何打破所有勞工團結一致這個工會運動最神聖的教條呢？當時參觀白宮的工會領袖中，大多數人各自的工會在數十年來對民主黨忠心耿耿，為何選擇在許多人受苦受難的此刻，讚揚唐納·川普呢？

根據工會領袖的解釋，川普的能源政策與這場魔鬼交易息息相關——一項又一項的輸油管線計畫。川普承諾將經費用於基礎建設，也構成一部分動機（雖然他們沒有明言，但也許花費二百一十億美元建造美墨高牆的說辭，也打動了他們的心）。工會領袖們明確表示，重點是，終於有一位總統在自由貿易議題上的想法與他們一致。

在這方面，川普確實毫不廢話。接見工會代表團的同一天稍早，他簽署了一紙行政命令，帶領美國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這是十一國貿易往來的合作協議，川普競選時就口口聲聲稱之為「對我們國家的強暴」，堅決反對它。美國在川普的簽署儀式上正式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川普大聲宣布：「這對美國勞工來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事後，有些人寫信問我，這會不會是川普任職總統的小確幸？數十年來飽受革新派抨擊的貿易協議已斬首示眾，或者如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

NAFTA)將重新協商、重新簽約，只為「帶回我們的工作」……這難道不是好事嗎？我能理解這些人的心情，畢竟在天天烏煙瘴氣的白宮新聞中尋找小確幸，心情也會比較好。但是，川普的貿易計畫並不是小確幸。

這整件事令我回想起小布希侵略伊拉克的行動；當時許多自由派主戰分子支持布希的軍事行動，因為戰爭符合他們從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手中救出伊拉克人的希望——這是「人道介入」派的辯辭。然而從布希與錢尼的過去紀錄與世界觀，卻看不出他們侵略並占領伊拉克的行動有任何民主或人道精神——結果不出所料，美軍與軍火商攻占伊拉克過後，軍事行動迅速轉變為屠戮與酷刑，以及失控地利用戰事牟取暴利。那麼，從川普過去的紀錄——他對待員工的方式、任人用人的選擇、目前已推行對企業有利的政策——怎麼看不出他重新協商貿易協議、「帶回我們的工作」的做法，是為了我們的勞工或環境呢？

期望川普變成伯尼·桑德斯，在貿易協議這方面為非親非故的人牟求福利，本就沒有意義。我們應該面對殘酷的事實，發問：為什麼一幫公然鄙視民主常規的財閥代表，能劫持企業自由貿易等議題呢？

力爭下游

川普將貿易協議當作招牌議題，有兩個原因。一者，我們從當日白宮的情形可以看出，這是奪取民主黨支持者的好策略。厭惡工會的右翼權威查爾斯·柯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福斯新聞宣稱川普與工會代表的高峰會是「一樁政治竊盜事件」。

二者，川普說過，他能談成比過去幾位總統更好的協議（我們知道他相信自己是協商、公關界霸主）。但問題是，他所謂的「更好」並不是對工會裡的勞工更好，也絕不是對環境更好。他所謂的「更好」，就和他平時的「更好」一樣——對他與他的企業帝國更好，對他內閣的銀行家與石油工業主管更好。換言之，倘若川普一意孤行，對一般人而言貿易規則將變得「更糟」——他不只影響到美國人，全世界的平民百姓都將受其影響。

看看川普上任後的所作所為，後續發展也將一目瞭然。川普親自帶工會代表團參觀白宮，給他們戴上大高帽的同一日，他還接見了數名商業領袖，並宣布廢除七五%規章、替企業減去一五%稅賦的計畫。這些政策的代價將由勞工支付。少了規範，勞工的工作會變得更不安全，職業傷害的發生率也將提升；而富人減稅也代表勞工享受的福利減少。川普曾經承諾用美國鋼鐵建造鑰石XL輸油管線，但他已然食言——從此事件，我們能看出他對當初承諾的「購買美國貨，僱用美國人」多麼缺乏責任感。

接下來我們不得不懷疑，政府將製造業工作帶回美國的計畫，是否代表政府將撤回工會上個世紀努力爭取的福利與保護——包括集體談判並達成協議的權利。川普身邊許多人大力推動各式政策，目的是讓工會更難組織、集結，尤其在所謂工作權法方面。現在，眾議院與參議院都成了共和黨的大本營，這項計畫將一直是國會的首要目標之一。

川普政府贈與美國各企業一件件大禮，由此可知，川普復甦製造業、「讓美國再度偉大」的計畫，仰賴「讓美國製造業再度廉價」之策略。煩人的規章消失了，企業應繳的稅額減少了，川普也火力全開地攻擊環保規範……這麼一來，僱用美國勞工的成本降低，美國勞工確實能與墨西哥等低薪國家競爭了。

我們能從川普第一個指名的勞工部長，看出川普對勞工的態度。他選擇安德魯·帕茲德作為理應保護美國勞工的閣員，雖然最後提名失敗，川普驚人的選擇卻值得回顧，我們也能以此分析川普的意圖。帕茲德是連鎖餐廳帝國的執行長，旗下連鎖店包括哈帝漢堡（Harder's）與卡樂星（Carl's Jr.），是眾所周知，美國最暴虐無道的僱主之一。他的公司與子公司在數十起訴訟案中，被指控不支付加班費與員工額外工作的費用，公司也因此付出共數百萬美元的和解金。此舉的正確名稱是「薪資偷竊」。帕茲德還曾對《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網站若有所思地討論用機器人取代勞工的優點：「它們永遠不用放假、永遠不會遲到、永遠不會展開工作意外的訴訟，也不會出現年紀、性別或種族不平等待遇的爭議。」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查爾斯·舒默

(Charles Schumer)稱身價約四千五百萬美元的帕茲德為史上「最反勞工」的勞工部長提名人。而川普對帕茲德的欣賞顯示一件事：他將製造業引誘回本土的真正計畫，是壓抑勞工權益、薪資與保障，直到在工廠工作與在安德魯·帕茲德旗下的哈帝漢堡工作同樣辛苦。換言之，這又是一項劫貧濟富的荒謬計畫。

我們今天見證的絕不是小確幸，而是在企業貿易協議反對者最怕的「力爭下游」比賽中，奮力游向終點。

你沒聽錯，貿易協議沒有最糟，只有更糟

川普不打算從貿易協議中移除對勞工最不利的條款——例如禁止制定政策偏袒本土製造業的條款。國家政府立法（包括製造就業機會、保護勞工的法條）時，若企業認為法律不公平地使它們利益縮減，它們能控告國家政府——這也是川普不打算移除的條款之一。

川普競選時承諾處罰那些將製造工作外包到國外的公司，然而真實計畫似乎是加緊保護這些將製造工作移至海外的公司。我並非無憑無據地臆測；新總統上任剛滿兩個月，一封政府寄給國會的信件草稿曝光——那是政府意圖重新協商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的聲明書。智庫公共公民全球貿易觀察(Public Citizen's Global Trade Watch)的分析結果顯示，政府計畫將跨太平洋戰略經

濟夥伴關係協議中最糟糕的部分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或者補強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中相同的負面條款。至於禁止美國施用「購買美國貨」政策的條款，川普政府顯然無意廢除它。全球貿易觀察的主席洛瑞·瓦拉赫(Lori Wallach)表示：「相信川普會實現他讓北美自由貿易協議『變得更好』的諾言、造福勞工的人，都被狠狠打臉了。」

許多貿易協議最陰險的部分，就是其強硬保護專利與商標的態度；當救命的藥物與重要的科技受專利與商標保護時，窮人往往無法得到他們所需的幫助。川普一家所建立的全球性帝國，仰賴的便是獲得商標權與特許權，並由他人極力守護這些商標與特許。因此，我們只能坐看協議中關乎智慧財產權的部分變得更加有害。

支持此理論的最有力證據，是川普指名進行貿易協商的人選。他的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曾經是銀行家，他是位身價數十億的創業投資家，靠收購並重組破產企業賺取巨額利潤——而他賺錢的手法無異是解僱勞工，並將製造部分移至更廉價的地區。例如在二〇〇四年，羅斯收購了美國紡織公司 Cone Mills，在不到十年的重組、企業合併與業務外包之後，這間位於北卡羅來納州的工廠中，美國勞工人數從逾千人降至三百人，而製造產品的工作被羅斯外包給中國與墨西哥了。

任用羅斯這樣的執行長管理貿易，不過是企業政變的一個小環節。川普摘下了政府的中立調解人面具，直接讓企業負責摧毀公共領域與公眾利益的最後步驟。

作家狄更斯 (Dickens) 筆下的夢魘。

但反對的聲浪逐漸壯大，安德魯·帕茲德被迫放棄勞工部長提名，部分原因是全國各地餐廳員工的組織性反對運動。當川普受邀在兩千名北美建築業工會（當初在白宮大力吹捧他的團體）會員面前致辭，一群勞工受夠了工會向「億萬富翁之王」獻媚的決策。川普對工會會員演講時，這些勞工突然起身背對他，在被保安人員帶走前高舉「反抗」(#RESIST) 的牌示。

並非所有工會都落入了川普的貿易圈套，大多數工會領袖，尤其是代表多種族勞工的工會——全美護理師聯合工會 (National Nurses United)、代表大眾運輸工作人員的工會，以及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明白川普的存在威脅到他們，於是組織反抗的運動。即使如此，先前的疑問依舊存在：川普作為勞工擁護者的態度是如此地荒誕，怎麼可能在美國勞工群體吸引為數不少的聽眾呢？

答案很大一部分，與右翼自由派人士放棄了這塊政治戰場有關。

回憶一場強而有力的全球運動

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我就加入了一場全球性社會運動，試圖警告所有人：企業自由貿易協議及其加速的全球貿易，導向環境破壞及眾多人類被剝奪權益與財產，情況正迅速失控。那

是場多世代、多國家、多領域共同參與的運動，非營利組織、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原住民群體、教會、工會等等，不同團體連成一氣。那場運動很混亂、理念仍在草創階段，也不完美——但它規模龐大，有一段時間強大到取得了幾次重大勝利。

在某些重要的層面上，這場運動幾乎成為我們現在抵抗偽民粹主義右派所需的多面向聯盟。因此，我們應好好參考過去這場運動的興起——以及最後的衰亡。之所以說「衰亡」，是因為那場運動若能將人民的聲音轉變為更多政策上的勝仗，川普及其企業內閣怎麼可能汲取人民對不平等全球貿易規定的憤怒，以「公平貿易」的斗篷為自己黃袍加身呢？

在一九九〇年代晚期至二〇〇〇年代初期，從倫敦到熱那亞、孟買、布宜諾斯艾利斯、魁北克與邁阿密，只要新自由主義派發起大規模集會，推進他們的經濟計畫，就絕對少不了反對者的示威遊行。一場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高峰會在西雅圖舉行時，整座城市因抗議者的示威而停止運轉，高峰會因此脫軌。數月後，類似的事件發生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在華府的年度會議，以及推動美洲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的高峰會——這份協議若談成，美洲從阿拉斯加至火地群島都會成為自由貿易範圍。這場社會運動陣容龐大，到了二〇〇一年七月，一場八大工業國組織（G8）會議舉行期間，熱那亞街頭抗議的人潮約有三十萬人。

今天的超國族主義右翼運動批判全球主義，但我們過去的運動不同，我們擁有傲人的國際

組成與國際主義思想，利用當時新興的網路輕易組織跨國運動，進行網路上與面對面的互動。在貿易協議加劇不平等情形、掠奪我們所有國家的公共領域這方面，我們取得了共識；我們要求各國政府開放人民的國際往來，要求各國政府撤除藥物、種子與重要科技的專利限制，並要求各國政府加強對企業的控制。

運動的核心理念是從當地至全球的深度民主，而與之對立的是我們過去稱為「企業統治」的勢力——在今天的世界裡，深度民主的體制極其重要。當然，我們抗議的並非貿易；從古至今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易未曾停息，未來也將持續進行下去。我們反對的是國際機構利用貿易協議，將有利於企業的政策推廣至全球——這些政策只對少部分玩家有利，卻不斷吞噬種子、水資源、全民健保等公共資源。

此爭議的典型是稍早一場戰役，玻利維亞的科恰班巴市與美國貝泰公司(Behret)之間的拉扯。貝泰公司將科恰班巴的市民福利私營化之行動中，貝泰獲准經營當地的用水系統；結果此民生必需品的價格水漲船高，未經特殊許可的情況下收集雨水甚至被列為違法行為。科恰班巴市民發起了「水資源戰爭」，將貝泰公司逐出國境……然而貝泰也不甘示弱，向玻利維亞提告並索取五千萬美元，以賠償公司的損失。由此可見，即使人民從企業手中奪回民主權利，也逃不過國際貿易法庭的殘酷判決。因此我們得到結論：貿易政策是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之間的核心鬥爭。

任何人只須觀察川普上任數月來的行徑，或看清他周遭人物的嘴臉，就會明白一件事：川普不會扭轉這些趨勢，反而會使之加速。

駕駛與烏龜——終於在一起了！

我們擔心的其中一件事，是這些貿易協議導致嚴重失業，在底特律、布宜諾斯艾利斯等城市留下「鐵鏽地帶」，而同時福特汽車（Ford）與豐田汽車（Toyota）還繼續尋找更便宜的汽車製造地。我們的主要目標並非川普式保護主義；世界的新秩序已對各國勞工與環境都造成了負面影響，我們希望在這場已經開始的「力爭下游」比賽中，逆流而上。我們爭取的貿易模式必將「保護地球人」視為最高指令，這是當時進步的關鍵——到了現在，這已是燃眉之急。

當時，這場運動甚至踏上了勝利的道路。我們擊敗了仍在計畫階段的北美自由貿易區，我們暫停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商談判，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無法再公開討論「結構調整」——將新自由主義強加於貧困國家。

此時回想起來，我們過去成功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不再執著於彼此的差異，我們跨過領域與國界，為了共同的目標奮鬥。當然，在策略方面我們發生了不少衝突，環境主義者與工會的想法依然分歧；但儘管如此，卡車司機工會與環保人士仍然一同走上西雅圖的街頭，高舉「駕

駛與烏龜：終於在一起了！」的布條。

反觀白宮門前讚美川普的工會領袖，簡直判若雲泥。

被震撼推到一邊

那麼，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簡而言之，答案是：震撼。九一一恐怖攻擊與反恐戰爭，幾乎將我們的社會運動從北美與歐洲抹得一乾二淨。那次經歷開啟了我的探索旅程，帶領我深入追查危機在政治上的用途（與不當利用）。

當然我們的運動並沒有完全消失，許多團體、許多好人依舊在新的不平等貿易協議出現時努力敲響警鐘。在玻利維亞與厄瓜多等拉丁美洲國家，反對派勢力掌握了政權，開始建立他們自己的「自由貿易」網；不過在北半球，我們迅速失去了力量，不再是影響數十個國家、改變眾人討論聲音、不容小覷的大規模運動。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過後，我們忽然成為政客與媒體評論者的攻擊對象，他們將喧鬧的反企業街頭示威（當時的確與警方發生數次衝突，路旁的店家也受到波及，櫥窗被打破）與攻擊世貿大樓的瘋狂勢力畫上等號。這是毫無根據的指控，是令人作嘔的比較……但這都不重要。

我們的運動向來是涵蓋許多議題的大帳篷——我們稱之為「一切運動的運動」(movement of movements)，這個詞彙近來又回到眾人的生活中。然而九一一攻擊之後，聯盟中許多部分被布希「如果你不支持我們，你就是支持恐怖分子」的言論嚇唬；仰賴大型基金會資助的非營利組織害怕失去經費來源，退出了運動，某些關鍵的工會也接著退出。一夕之間，所有人回到他們各自的隔間，為自己的議題孤軍奮戰，而我們不完美卻又意義非凡的跨界聯盟幾乎消失殆盡。少了將各方勢力齊聚於民主保護傘下的聯盟，川普與歐洲的極右政黨得以趁虛而入。人們失去對無責任跨國機構的控制時，心中燃起了情有可原的怒火；川普等人掌控了人們的怒火，轉而將其導向移民、伊斯蘭教徒，以及任何能輕易畫上標靶的對象。川普等人藉機推動企業治國計畫，邁向全新、未知的領域。

這段期間，許多社會運動人士依舊活躍，他們加入其他大範圍合作的運動——「擊敗布希」、「停止戰爭」——但相比之下這些聯盟太薄弱、太戰略性。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我們都必須面對相同的全球性經濟勢力——但是深入分析這些勢力的運動，多半消失了。

真空與川普的邂逅

我們應牢記過去的失敗，因為我們今天極有可能重蹈覆轍——聯合爭取「彈劾川普」、「投

給民主黨」等最小公分母，過程中卻忘了注意最初允許川普崛起的條件與政治因素，忘了這些因素正是今天助長極右派勢力的元凶。我們從布希時代學到了教訓：光說「不」還不夠。

我永遠不會忘記，九一一攻擊過後幾天，加拿大的右派報社《國家郵報》(National Post)發表了一篇新聞，標題為：反全球化是昨日的流行。他們等不及埋葬我們的社會運動，但他們錯了——我們發起的警告並不是「昨日」的事物。世界上的痛苦與混亂，並不會因為新聞媒體決定二十四小時播報恐怖主義新聞而消失。

現實恰恰相反，數百萬人因危機加劇而被迫離開家園，尋找更好的生活。政經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於二〇一七年的研究顯示，自一九九四年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實施以來，墨西哥的貧困人口逐年上升，現今的人數較當初多了約二千萬人——這是墨西哥人移民至美國的強大推力。與此同時，北美與歐洲白人勞工的聲音無人聽聞，他們的怒火也燒得越來越猛烈。這為川普等擅長煽動民心的政客開啟了大門，允許他們將勞工的憤怒自財閥與富豪轉向墨西哥移民。川普等富豪因貿易協議開啟的外包機會而賺進大筆錢財，墨西哥移民不過是貿易政策犧牲的平民百姓，當社會被糟糕至極的貿易協議掏空時不得不遷居美國。

英國脫歐運動也趁機喊著「取回控制權！」的口號出面奪權。法國的極右派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代表瑪琳·勒朋也對這份憤怒喊話，告訴大眾全球化是「將奴隸製造的商品賣給失業的人」。極右勢力在世界各地興起，他們掌握人心對過去國族主義的憧憬，以及對遙遠經濟官

僚政治的憤怒——無論是華府、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世界貿易組織或歐盟。極右派將這些情緒與種族歧視、仇外心理混合，然後透過迫害移民、將伊斯蘭教妖魔化，以及貶抑女性的方式，創造「控制」的假象。

這是劇毒的組合，也是原本能避免的結果。對抗世界富豪為自身利益設計的殘酷系統，是左派的領域，但我們必須面對冰冷的現實——九一一攻擊之後，許多偏向革新派的政治人物嚇壞了。也因此，剩下經濟民粹主義出現空隙，由趁虛而入的人們恣意濫用。政治痛恨真空；若不以希望填滿空間，就會有人以恐懼填補空隙。

好消息是，革新派的反自由貿易聯盟終於在過去數年開始復興。近年來，在歐洲——尤其是德國、法國、比利時——工會與環保團體開始聯手，組織大規模反抗歐洲與美國、加拿大的企業貿易協議。與此同時，伯尼·桑德斯站出來大力反對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將其視為「全球力爭下游運動的一部分」。桑德斯表示：「它外包工作；它削減勞工權益；它拆解勞工、環保、健康、食安與金融法條；它允許企業在國際法庭挑戰我們的法律，而不是在我們自己的司法系統內解決問題——只為圖利大型企業與華爾街。」

倘若二〇一六年大選時桑德斯帶著這份訊息與川普競爭，也許能將最終選擇川普的白人與拉丁美洲裔勞工拉回民主黨。可惜川普的對手並不是桑德斯，而是希拉蕊·柯林頓。柯林頓在

過去一向支持這些貿易協議，甚至親自參與談判，當她在競選時批評這些協議只會顯得沒有說服力。每當她提起貿易協議，就是露出破綻讓對手抹黑她，將她描繪成再平常不過的狡詐政客。

放棄民粹陣地的危險

一些人受夠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選擇放棄中立派候選人，投票支持川普等自稱「局外人」與「超義者」的候選人。而在世界各地，更多人選擇直接放棄——他們在選舉日待在家中，不再參與選舉政治，因為他們深信政治體系被人暗中操弄，永遠不可能改善他們的生活。此現象在美國二〇一六年總統大選尤為明顯；儘管相關報導多到令人目不暇給，儘管一位浮誇、危險又愛煽動民心的政客加入選戰，儘管有機會投給美國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全美卻有約九千萬名成年人聳聳肩，決定待在家裡。所有合格選民之中，投給希拉蕊·柯林頓的人數約占二五%，投給唐納·川普的人數也相差不遠，反倒是選擇不投票的人數比例遠遠超出兩位候選人的支持率——約四〇%。以民主國家而言，美國自願脫離政治與選舉的人數多得不可思議。

於是，話題又回到造訪白宮的工會代表團。沒錯，他們與魔鬼立下盟約——但工會領袖願意與川普倒行逆施的政府聯手，顯示了數十年來民主黨與共和黨對勞工的忽視與鄙棄。

不，歐普拉和祖克柏不會救我們

為川普的白宮之路奠定基礎的，是兩位深受美國自由派人士喜愛的男人——比爾·柯林頓以及比爾·蓋茲（Bill Gates）。你也許認為這句話違背直覺，容我細細道來。

唐納·川普站到了全世界面前，高聲道出他成為總統的資格：我很有錢。更確切地說，他的說法是：「我的其中一個優點是我非常有錢。」在川普口中，他的財富是他「非常聰明」的證據，證明他確實在各方面高人一等。他聚斂了如此多錢（我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的事實彷彿存在某種魔力，想必能彌補他毫無政治經驗、缺乏對政府與歷史的基本認知等弱點。上任後，川普利用這條邏輯脈絡提拔超級富豪，進入內閣任公職的人們似乎只需一項資格：一筆巨大（而經常是繼承而來）的財富。

最重要的是，川普將財富魔力公式延伸至他自己的帝王世家。他賜予女婿傑瑞德·庫許納（生來便是百萬富翁的房地產開發商）的業務盡是重責大任，很快地成為媒體的笑料。《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法蘭克·布魯尼（Frank Bruni）曾一一清點庫許納目前的責任——進行中東和談、規畫馬阿拉歌的中美高峰會、監控美軍在伊拉克的行動、命令無人機轟炸葉門、使政府運行得更像一家公司——布魯尼表示：「我們何不縫一件紅披風、給他穿上彈性纖維緊身衣、在他胸口繡上華麗的『S』標誌算了？超級傑瑞德起飛囉。」

若我們能將「億萬富翁等於救世主」情結歸咎於川普被推特弄糊塗的腦袋，或歸咎於他在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顧問——以及他們如艾茵·蘭德（Ayn Rand）般信奉「自由企業」與大廈建商的心態——我們內心或許會好受一些。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川普與庫許納雖幻想他們的財富能轉變為漫威漫畫中的超能力，但他們並不是開創此想法的人，他們的美夢也不是第一個受他人鼓勵的痴想。

二十年來，我們曾以集體行動與受政府資助的強大企業所解決的問題，在自由派菁英眼中成了億萬富豪階級該幫忙解決的問題——我們有時將此現象稱為「慈善資本主義」。比爾·蓋茲、理察·布蘭森（Richard Branson）、麥克·彭博（Michael Bloomberg）、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歐普拉（Oprah），以及不知為何總是一起被提及的波諾（Bono）——這些身價億萬的執行長與名人在我們眼裡，漸漸從各領域菁英、擅長賺錢的普通人，轉變為近似半神人的存在。二〇一一年，《商業內幕》網站刊登了一篇清單文章，標題是〈比爾·蓋茲拯救世界的十種行動〉——它完美地濃縮了這個趨勢。這一小群富豪與他們各自的慈善基金會，得到了巨大的權力與責任，人們也將權力與責任的印象投射在他們身上。

單是比爾與美琳達·蓋茲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就價值四百億美元，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慈善組織。在非洲農業、傳染病與美國教育體系等關鍵面向，此基金會的勢力堪比聯合國與美國政府的重要機構。儘管比爾與美琳達·蓋茲基金會握有前所未見的影響力，其內部運作卻

出了名地神祕，由比爾、妻子美琳達（Melinda）、父親威廉·蓋茲（William Gates）與另一位億萬富豪華倫·巴菲特做關鍵決策，任人唯親的作風與川普一家不相上下。值得一提的是，蓋茲的救世主形象並非從一開始就建立好，在一九九〇年代，大眾普遍將其視為企業梟雄，他剝削員工、獨霸軟體業的行徑惡名昭彰。接著，蓋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將自己重塑為全球英雄——一個能獨立修復棘手社會危機的超級英雄。誰在乎蓋茲是否有各方面的專業，誰在乎比爾與美琳達·蓋茲基金會的好幾個速效解決方案已經起了反效果？

蓋茲與其他億萬富翁救世主後來被稱為「達佛斯階級」（the Davos class），命名由來是瑞士每年在達佛斯鎮一座山頂舉行的世界經濟高峰會。這是極為緊密的網路，連繫了銀行家、科技巨富和這些人關係匪淺的政務官，以及使整件事顯得光鮮亮麗的好萊塢影星。例如在二〇一七年的達佛斯高峰會，歌手夏奇拉（Shakira）分享她在哥倫比亞的教育慈善工作，名廚傑米·奧利佛（Jamie Oliver）談到他減少糖尿病與肥胖症的計畫，蓋茲的演說一如往常地備受矚目，他與幾位合作夥伴宣布要花四·六億美元防治傳染病。

達佛斯階級的權力在一九九〇年代飛躍性成長，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與英國首相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便是此階層的創始人。布萊爾與柯林頓卸任後，繼續維持他們與達佛斯階級的關係——柯林頓基金會創了一年一度的柯林頓全球論壇（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類似「哈德遜河畔的達佛斯」，與會的寡頭政治家各個向大眾分享他們由衷想修復世界的宏願……卻不願

依公平的比例納稅。

對許多人而言，柯林頓基金會是民主黨——勞工與工會組成的傳統政黨——與全球富豪合併的化身。它的宗旨簡而言之就是：現在世界上的私有財富多到用不完，因此大大小小任何問題只需說服超級富豪花點「小錢」便能解決。當然，說服富人做這些好事的是柯林頓家，他們在頂尖明星的幫助下談成各項交易。

圈內人想必認為此事再公正不過，然而在世界各地的大眾眼裡，達佛斯階級卻象徵「成功人士的派對」……而只有少數富豪收到派對邀請函。人們深知富豪不斷成長的財富與權勢，與老百姓高築的債臺、無力感以及孩子越來越不穩固的未來相關。口口聲聲答應會保護勞工階級權益的政客，卻與達佛斯階級掛勾，這點只加深了民眾的怒意。在此背景下，我們方能明白當初巴拉克·歐巴馬收取四十萬美元出場費到華爾街演說的爭議。

川普與達佛斯階級毫無瓜葛（反倒是利用了民眾對他們的憤恨），而這個偏向自由派的迷人群體中，不少人因川普接任總統而驚恐不已。然而這些站在山頂行善的富人設下了先例，他們是川普得以參加總統大選的原因之一，也是數百萬名美國人選擇將政府託付給川普——除了「有錢」之外沒有其他資格的候選人——的原因之一。參與其中的並不只是投給川普的選民，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我們許多人雖然不可能投給川普，卻對達佛斯階級麻木了——「一個人擁有巨額存款（或分散在不同銀行、不同國家的數筆巨額存款）代表他同時擁有深不見底的專業

知識」，此概念在我們腦中已根深蒂固。無論是何種類型的政府，都越來越習慣將公共政策的挑戰交付給一小群高身價富豪。

川普聲稱自己很有錢，因此知道讓美國再度偉大的方法；這不過是以粗俗的方式，重複多年來不斷迴響在我們耳畔的危險思想：比爾·蓋茲能拯救非洲；理察·布蘭森與麥克·彭博能解決氣候變遷。

引爆點：保釋銀行

自一九八〇年代開始，達佛斯階級與一般大眾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不過對許多人而言，真正的引爆點是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

數十年來，人民被迫過艱苦的生活，然而在金融危機爆發後，各國財政司長、財政部長與財政大臣忽然拿出數兆美元解救銀行，人們親眼見證自己的政府印出大把鈔票。這些平民百姓付出了多少犧牲——退休金、薪資、優良的教育——結果事實卻與柴契爾夫人的說辭截然相反，他們並非別無選擇。大家猛然發現政府能透過各種手段干預市場，只要你夠有錢，政府就能以貌似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幫助你。在那一刻，世界上所有人都發現自己受騙了。

面具揭開後的弦外之音仍在迴蕩。無論左派、右派，選民心中的憤怒開始沸騰，他們憤怒

並不只因為失去了太多，而是因為他們遭受不公正的對待。大家終於明白，在我們這個年代失去了種種事物的，只有平民百姓；大家終於發現，達佛斯山頂的富豪從一開始就沒打算救濟山腳下的大眾。

這表示，擊敗偽民粹主義右派不能只靠選舉策略，也不能光尋找正確的候選人。我們必須投入一場選舉時期——以及更重要的選舉間——持續進行的理念鬥爭，向腐敗、深受兩黨支持、崇拜財富的世界觀宣戰，向這個最初引發大眾激烈反應的世界觀宣戰。

現今社會不平等到了畸形的地步，人們會憤怒也是理所當然；除非革新派學會觸及這股怒火，右派將會屢戰屢勝。沒有一位超人富翁會飛過來打敗掌權的壞蛋，拯救我們。歐普拉不會，祖克柏不會，伊隆·馬斯克（Elon Musk）也不會。

我們只能以前所未見的規模團結起來，自己救助自己——而在二〇一六年，我們瞥見了大眾的潛力。

學著愛上經濟民粹主義

從過去到現在的所有美國總統候選人中，我唯一公開支持的就是伯尼·桑德斯。我向來不喜歡為候選人背書，之所以在二〇一六年破例，是因為我有投票權以來，桑德斯是首位在民主黨黨內初選期間直接提及新自由主義、經濟不平等與氣候變遷三大危機的候選人。他的競選運動與眾不同，因為他在這樣的背景下紅了起來，沒有人能責怪他拆臺或分散選票（雖然不少人試圖抹黑他）。伯尼·桑德斯不是抗議型候選人；一旦他在競選初期翻轉局勢，贏得新罕布夏州的選票，桑德斯的遊戲就此開始。眾人出乎意料地發現，桑德斯並不如（包含我在內的）有人所想像的那樣聲勢微弱，他確實有機會勝過希拉蕊·柯林頓，成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到了最後，他獲得超過二十州的支持，總共一千二百萬票。對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而言，



這是政治地圖上的一大變動。

許多全國性民調顯示，桑德斯擊敗川普的機會高過柯林頓（當然，若他當初贏了黨內初選就得面對右派火力全開的攻勢，或許支持率不會較柯林頓高）。伯尼·桑德斯非常適合在大眾感到憤慨、抗拒既有政治模式的時期站出來；他關於政治腐敗合法化的言論觸及了義憤填膺的人心，但他是從革新派的角度出發，言語中並無人身攻擊，而是帶著發自內心的溫暖，這十分罕見。他支持那些限制銀行、讓人民負擔得起教育的政策，並斥責「銀行家從來不須負責」的不公。一生在政治圈打滾的桑德斯，不受任何貪污的醜聞污染，這更加難能可貴。正因為桑德斯與名人實境秀那外表光鮮的世界相隔十萬八千里，沒有人比他更適合破除川普與馬阿拉歌富麗堂皇的節目。

競選初期，一張迅速紅遍全國的照片，是桑德斯頂著亂亂的白髮，擠在飛機經濟艙中間的座位上。這樣的候選人與搭乘私人噴射機（機身還漆了大大的金字）的男人較量，必定是本世紀最精采的總統選舉。人們顯然還對兩人之間的對比念念不忘，即使在川普上任兩個月後，福斯新聞的民調結果仍顯示，桑德斯在全國政治人物中總喜好度最高。

我們之所以討論此事，是因為當這樣一位候選人站出來時，當這位候選人證實（在得到足夠支援與支持的情況下）他有可能獲選時，我們應該花時間理解他失敗的原因，記取教訓。因為，在二〇一六年，總統候選人名單上差一點出現了有能力改變一切的選項，而下一回，我們

也許有機會看到這樣的候選人登上候選人名單。

恐懼難以掌控的群眾（以及難以駕馭的頭髮？）

我並不想爭論當初該投給希拉蕊或川普，而是想討論當初是否可能出現更有機會擊敗川普、更有能力改變造就了川普之背後勢力的候選人。在我看來，川普所代表的悲劇，並不只是「一個代表美國文化最壞的一切，集其精華於一身的男人成為美國最高領袖」這麼簡單。最悲慘的是，這個國家原本能在氣候敲響午夜警鐘之際，選擇我此生見過最好、最有希望的候選人（雖然桑德斯並非完人）。

那麼，他為什麼無法觸及夠多選民的心，代表民主黨參選？

民主黨內的死忠新自由主義派不希望桑德斯當選，這我能理解。他威脅整個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他所支持的經濟民粹主義也令許多位居高處的人物感到不安。所以我不會浪費時間重申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如何陷害伯尼·桑德斯，如何與柯林頓陣營交換情報與策略，以達到此目的。我想讓你知道，當初革新派重重抨擊桑德斯，有些人看著這位承諾改善全國勞工物質生活、集數代人力處理氣候變遷問題的候選人……然後選擇支持自己都站不住腳的柯林頓。

眾多有權有勢的美國自由派人士敵視伯尼·桑德斯，他們堅持在桑德斯連連告捷時阻撓他，這點在令人煩憂的同時，也揭示了許多祕密。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說法：雖然這些自由派人士個人支持以大膽的政策打擊不平等現況，但這些政策不值得他們公開擁護，因為美國大眾太過保守、太贊成資本主義，永遠不可能支持這些政策。於是，自由派人士以實用主義為由，轉而支持握有權位、較正統的候選人——他們選擇最有機會贏過共和黨的候選人。

然而伯尼在競選期間證明了一件事：過去被認為太激進、唯有極左派支持的政見——例如全民健保、拆解銀行、免除學生負債、免費大學教育、將化石燃料留在地下、轉型到一〇〇%再生能源——在全球最資本主義的國家竟廣受支持，支持者多達數百萬人。他為我們證明：改變現況不是空想。另一方面，人們口中的「安全」選項——希拉蕊·柯林頓——結果卻是異常危險的選項。

誰的革命？

我們必須盡快找出桑德斯失敗的原因，理解他為何沒能鼓舞足夠多的激進派知識分子與重要社會運動；這些人對柯林頓與當權的民主黨員頗有微詞，為何不全力支持桑德斯呢？有些人不甚投入地支持他，或選擇誰也不支持，因為他們不認為候選人有資格得到他們的選票，也不

認為伯尼的「政治革命」包含他們。

儘管我當初公開支持伯尼，我知道許多有色人種與女性因上述原因做出不同的選擇，而那些也是正當的理由。柯林頓以為她對身分政治的認可可能替代貨真價實的經濟革新，而伯尼似乎以為經濟議題能掩蓋黑人、女性與其他傳統上邊緣團體的特殊需求及歷史。沒錯，在這方面他遭到不公平的抹黑，但更重要的教訓是，倘若伯尼沒有種族與性別議題上的弱點，那無論民主黨當權者如何努力阻礙他，他仍有可能獲勝。若他當初能說服更多中年與老年婦女，讓她們知道他理解生育自由的重要性與不確定性，讓她們知道他明白對女性的暴力是多麼急迫的問題，伯尼就有可能獲勝。在賓夕法尼亞州與紐約州等關鍵地區，他只需半數黑人的支持便能獲勝……但為達此目的，他當初必須以清晰並具信服力的言論，連結美國最深層的經濟不平等、過去無可抹滅的蓄奴歷史、吉姆·克勞法，以及居住與金融方面的不公平待遇。

塔奈希西·科茨 (Ta-Nehisi Coates) 曾在一篇《大西洋》(Atlantic) 雜誌報導中指出，桑德斯面對美國的種族問題時，他先前挑戰華爾街的大膽、激進態度忽然消失了。有人問他是否支持以某種方式彌補過去奴隸制的傷痕時，他以此舉在政治上不可行且「引起不必要的分歧」為由，否定了這個想法，並表示投資大量資源給有色人種的社群會引發相同結果。但科茨正確地指出，桑德斯競選的主題不正是挑戰政治上「可行」的極限嗎？那麼，為何說到種族平等時，他無畏的態度卻消失無蹤？「一位社會主義候選人視彌補奴隸制為『引起分歧』(美國政壇上，很少出

現比社會主義更能引起分歧的標籤），實在匪夷所思，唯有桑德斯擺出實用主義者態度這件事，能與之爭鋒。」科茨寫道。（儘管他強烈批評桑德斯，科茨公開表示他會在初選投給桑德斯，因為他是「我們這次選舉中最好的選項」。）

《新吉姆·克勞法》作者蜜雪兒·亞歷山大在初選時大力反對柯林頓，她認為柯林頓過去在刑事司法系統與社會福利的紀錄不佳，沒資格獲得黑人的支持。但亞歷山大也決定不公開支持桑德斯，她告訴我，二〇一六年大選最急切的教訓就是：「如果革新派認為他們能在不與黑人有效互動、不認真看待種族歷史的情況下長期贏得勝利，他們最好對伊隆·馬斯克按下快轉鍵，然後開始計畫在火星建立新家，因為這顆星球很快就撐不下去了。」

我們必須盡快記取這個教訓，因為若左派民粹主義候選人持續失敗，若民主黨持續以傳統的候選人取而代之，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越來越好鬥的右派持續獲勝。

全球的劇毒混合物

川普大吼：一切都很糟！柯林頓回道：一切都很好——我們只須做一些小小的調整，讓系統變得更包容。柯林頓最後的口號是「愛勝過恨」，但愛無法獨自取勝，它需要更強大的力量幫忙——它需要正義。

希拉蕊·柯林頓作為總統候選人，沒資格對憤怒不已的現今社會大眾喊話。她曾代表美國協商許多人視為威脅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等貿易協議；第一位柯林頓總統當政時取消了諸多銀行與衍生性金融市場的規範，為金融危機設下基礎（希拉蕊·柯林頓未曾公開反對此舉，她本人也從銀行收取了不少演講出場費）。於是她試圖粉飾太平……結果為何我們都心知肚明。

當候選人名單缺少革新派選項時，川普得以和半信半疑的選民形成連結。他告訴這些選民：我懂你們的痛苦，你們的確被整慘了。競選時，川普引導人民將憤怒轉向過去推動這些政策的企業——但現在幾乎無人記得此事。他將怒火用於召喚種族歧視的幻象：要來強暴你們的移民、要來炸死你們的伊斯蘭教徒、不尊重警方的黑人激進分子，還有毀了一切的黑人總統。

英國脫歐運動的宣傳也針對相同的劇毒混合物——人民切身體會的經濟痛苦、被侵蝕的殘缺民主，再加上基於身分的天生權利。希拉蕊·柯林頓沒能以令人信服的說辭回應川普虛假的經濟民粹主義；當奈傑·法拉吉（Nigel Farage）與英國獨立黨（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簡稱UKIP）聲稱人民的生活失控、公共福利預算不足，留歐派一樣無法提出令人心服口服的回應（但法拉吉與獨立黨提出的解決方案極可能使情勢惡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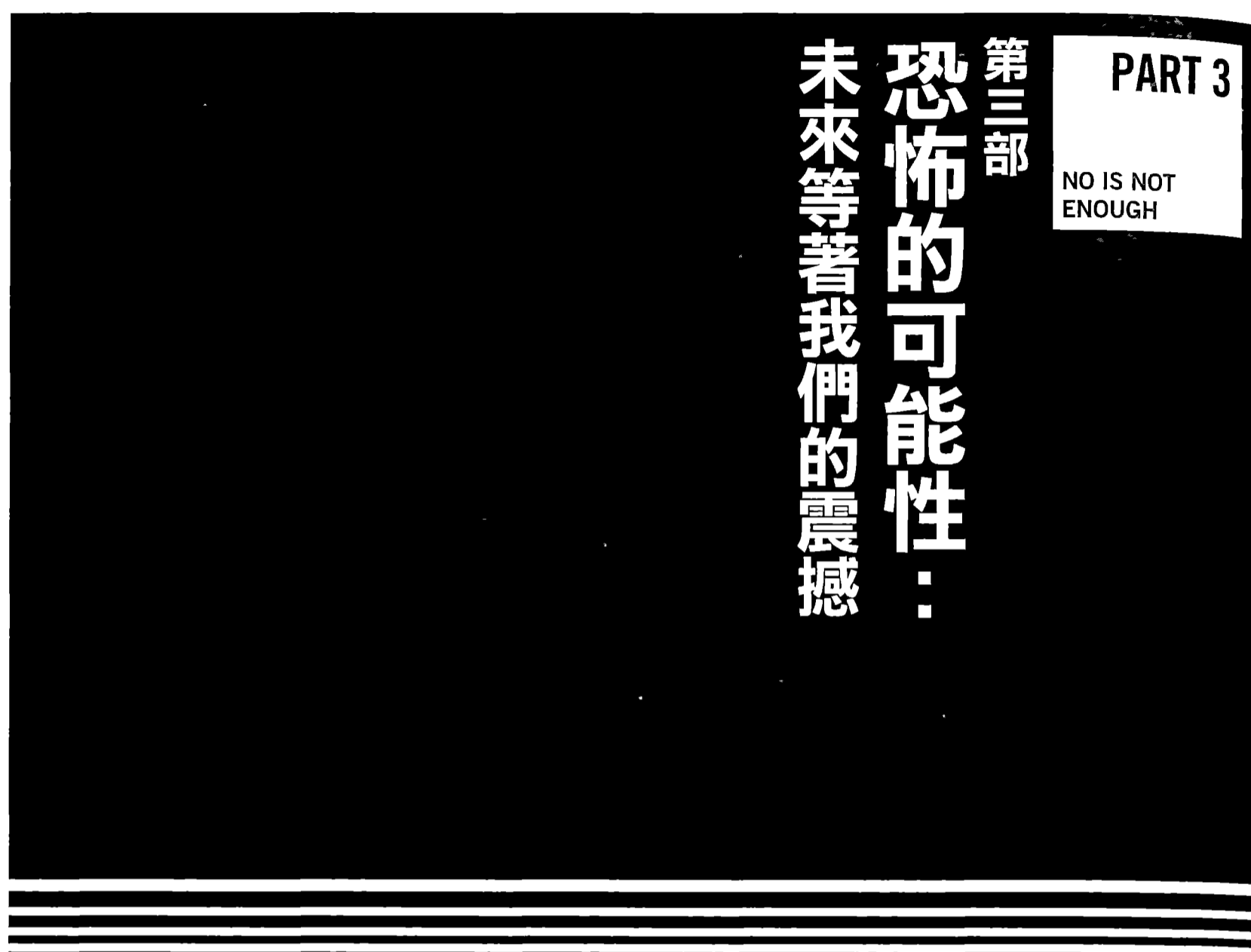
從英國脫歐運動與川普當選總統，我們可以學到一個關鍵的教訓：若人民認為一個領袖代表失敗的新自由主義現況，他就不可能是擅長煽動人心者或新法西斯主義政客的對手。唯有大

膽無畏、真心想重新分配資源的革新計畫，才有可能真正解決民主政治中的不平等與其他危機，並將人民的憤怒導向它所屬的地方：那些拍賣公共財斂聚大筆財富的人，那些污染了土地、空氣與水資源的人，以及那些撤銷了金融管制的人。

下一回，當我們在選舉中思索該支持哪個政黨或哪位候選人時，我們必須謹記這點。在這個不穩定的時代，固守現狀的政客通常無法解決問題；另一方面，一開始顯得太過激進，甚至有些冒險的候選人，也許正是我們變化無常的時代所需之人。

而對我們不斷暖化的地球來說，激進的政治與經濟變化，是我們避免物質世界劇烈變化的唯一希望。

無論如何，接下來幾年都將動盪不安。因此，在我們試圖贏得我們想要並所需的世界之前，我們必須未雨綢繆，準備面對川普白宮帶來的下一波危機，以及下一波撼動全球的震撼。



歷史很重要。如果你不懂歷史，你就和昨天才出生的嬰兒沒兩樣。如果你和昨天剛出生的嬰兒沒兩樣，那任何一個握有權勢的人告訴你的任何一句話，你都無法確認或證實。

——霍華德·津恩 (Howard Zinn) 《在行進中的火車上，你不可能保持中立》
(*You Can't Be Neutral on a Moving Train*)，二〇〇四年紀錄片

災厄大師：躲避民主的迂迴戰術

很多時候當我在災區報導當地災情時，我會有種不安的感覺，彷彿我眼前的並不只是此時的此刻的危機，而是我們所有人的未來——我彷彿預見了我們這條路途的終點，得知我們唯有抓住方向盤、用力轉彎才能避免走向那個未來。當我聽川普演說，看著他唯恐天下不亂的態度時，我時常想：這我見過了，我曾經在瞥見所有人的未來時，見過這一幕。

其中一次窺知未來，是在卡崔娜颶風蹂躪過後的紐奧良。當時我看著私人軍事服務公司一窩蜂地湧入這座氾濫的城市，從災難中尋找商機。而數千名紐奧良市民被政府遺棄，努力生存的他們被視為危險罪犯。

在二〇〇三年的巴格達，我又一次看見絕望世界開啟的預見未來的窗扉。當時美軍入侵不



久，占據巴格達的美軍將城市一分為二：市中心的綠區（Green Zone）躲在重重水泥牆與炸彈探測器之後，是將美國複製後在伊拉克重現的區域，區內有販售烈酒的酒吧、速食連鎖店、健身房以及日夜笙歌的游泳池。圍牆之外的巴格達則被炸成破瓦頹垣，醫院通常沒有電力，而伊拉克軍與美軍之間的暴力衝突越發失控，這就是紅區（Red Zone）。

當時，綠區是保羅·布雷默（Paul Bremer）的采邑；布雷默曾任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助理，是季辛吉管理顧問公司的經理，受小布希任命為美國派至伊拉克的最高代表，因伊拉克當時缺乏具有執行力的全國政府，布雷默可說是伊拉克的最高領導人。布雷默的帝國完全是私人帝國，他身穿軍靴與筆挺西裝走動時，總是由一批黑衣傭兵保護著（僱用傭兵的美國黑水公司（Blackwater）現已無生意）。而經營綠區的則是哈利柏頓公司——全球最大的油田公司之一，當時的副總統迪克·錢尼曾擔任公司主管——與其他私人承包企業形成的網路。

當美國官員踏出綠區（許多記者又稱之為「翡翠城」[Emerald City]），身邊總是跟了一團全副武裝的士兵與傭兵，他們的機關槍瞄向四面八方，工作理念是「先斬後奏」。美國軍火「解放」的伊拉克平民毫無自保能力，只能對宗教民兵盡忠以換取保護。美國護衛隊清楚地讓所有人知道：有些人命就是比較有價值。

布雷默在他的綠區「城堡」深處制定一條又一條法令，意圖將伊拉克重塑為標準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現在想來，這與唐納·川普的白宮非常類似，而他們發布的命令也相去無幾。例如，

布雷默規定伊拉克應施行一五%單一平頭稅制（與川普的政見雷同），伊拉克的國有資產應盡速拍賣出去（川普也在考慮此事），政府應大幅裁減員工（又是川普的政見）。改變的速度狂亂而匆促，緊盯著伊拉克與其他國家油田不放的布雷默，急著在伊拉克人民對他們「解放」的未來提出異議前，完成他的全國改造計畫。

甚至有一段令人無法置信的時期，布雷默與國務院從俄羅斯請來顧問；這些顧問當初帶領俄羅斯進行災難性「經濟衝擊療法」實驗，以腐敗不堪的私有化、去規範，創造出俄羅斯惡名昭彰的寡頭政治階級。在巴格達的綠區內，訪客們——包括俄羅斯「震撼醫生」葉戈爾·蓋達爾（Yegor Gaidar）——教導美國指派的伊拉克政客，強調在伊拉克人民從戰爭中回神之前，毫不猶豫地從根本重建經濟之重要性。若伊拉克人民有權發聲，他們絕不可能接受這些政策（後來，他們確實廢止了多項政策）；是當時極端的危機，使布雷默的計畫顯得可行。

布雷默在危機時期的掩護下拍賣伊拉克國有資產的目的眾所周知，證實了許多人的猜測：入侵伊拉克的主要目的並非解放暴政下的人民，而是將伊拉克的財富解放給外國企業。伊拉克陷入暴力之中，美軍及其私人軍事承包商則以更多暴力、更多震撼回應。數不盡的金錢消失在承包經濟的黑洞中——這些錢後來被稱為「伊拉克離奇失蹤的數十億美元」。

科幻小說與好萊塢電影常見的反烏托邦未來世界，不只源自企業權勢與戰爭；我瞥見的絕望未來，也源自「危機時期強勢施行平時不可能通過的政策」此一機制。《震撼主義》的主題，

就是我在伊拉克得到的感想。我在此書中原本只打算集中討論布希的戰爭，但我發現世界各地的災區都出現了相同的策略（以及相同的商家：哈利柏頓、黑水、貝泰……）。首先是一場危機——自然災害也好，恐怖攻擊也罷——接下來便是閃電般一連串對企業有利的政策。多數時候，利用災難達成自身目標的人會直接公然談論此事——我們甚至不需想像他們的陰謀。

在我深入研究的同時，我發現超過四十年來，上述策略一直是強行推動新自由主義的沉默共犯。「震撼策略」有一套明確的模式：等待危機降臨（或者如智利、俄羅斯那樣，自行挑起紛爭），宣布全國進入人稱「極端政治時期」，暫停部分或所有民主規則——然後盡快完成企業許願清單上每一項目標。我的研究顯示，幾乎任何騷動在政治領袖的情緒化炒作下，都能達到這種「軟化」效果。它可能是軍事政變般極端的事件，但市場或經費危機等經濟衝擊也能造成相同的效果。例如極度通貨膨脹或銀行瓦解的時候，國內掌權的菁英往往能說服慌亂的大眾接受某些「必要」的措施，例如攻擊社會保障、花大筆錢財援助私人企業——因為根據這些人的說法，另一個選項就是經濟崩潰。

震撼醫生的守則

震撼策略首次為服務新自由主義而發動，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拉丁美洲。到了今日，

這些手段仍被用以違背民意、為「自由市場」讓步。

川普出現之前，我們也見過這種策略。在底特律、弗林特等美國城市，「地方政府瀕臨破產」成了當地民主體制瓦解、任用「緊急經理」的藉口。在波多黎各，國債危機被用以創建無責任的「金融監督與管理委員會」(Financial Oversight and Management Board)，這是強行實施嚴苛縮減開支制度的機制，不僅縮減退休金，還一波波關閉學校。類似的事情發生在巴西，在二〇一六年可疑的迪爾瑪·羅賽芙總統(Dilma Rousseff)彈劾事件過後，一系列未經投票認可、圖利企業的極端新制凍結了巴西接下來二十年的公共事業支出、強加了嚴苛的縮減開支規定，並開始售出機場、發電廠與其他公共資產，開啟私有化狂潮。

而唐納·川普任職美國總統的現在，同樣的情形公然發生在美國境內。競選時，他並沒有對擁戴他的群眾說出削減送餐服務經費、奪走長者與行動不便者餐飲的計畫，也沒有坦承他將試圖從數百萬名美國人身上奪走健保。在此，與許多其他方面，川普當選後的行動與競選時的說辭背道而馳。

上任後，他依然不讓混亂、危急的氣氛消散，一樁又一樁惡行接踵襲來，無數人因此暈頭轉向也是情有可原。人們經歷川普海嘯般的一系列動作——上任十一個完整工作天內，頒布七條行政命令，外加十一則總統備忘錄——感覺像是站在網球投擲機前，雖然川普的對手偶爾會回擊一兩顆球，我們仍然被一顆又一顆的網球砸臉。就連眾人相信（抑或祈願？）川普撐不

完四年，也使大眾更感到頭昏腦脹：現在的局勢一點也不穩定、一點也不靜態，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下非常難制定策略或組織行動。

民主，在另行通知前停擺

過去半個世紀的種種，顯示政府如何刻意——且有效——地利用震撼主義克服民主制度，推行十分有害的政策。這些政府確實需要躲避民主的計策，因為許多新自由主義政策都極不受歡迎，人民不僅在民調中表示反對，甚至為此上街頭抗議。他們抗議也是其來有自：從全球少數寡頭政治家積聚、藏匿的巨額財富，我們能看出這些極端社會改組政策只對極少數人有利，而絕大多數人（即使在經濟飛速成長的時期）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生活品質原地踱步或下滑。因此對決意推行這些政策的人而言，多數決與自由民主不是盟友，而是阻礙、是威脅。

當然，並非每一件新自由主義政策都不得人心。人們都喜歡減稅（即使不喜歡超級富豪減稅，中產階級與清寒勞工減稅也很好），也喜歡減少「繁文縟節」的概念（至少，理論上是如此）。但同時，人們也喜歡這些稅金被用於國家支付的健保、乾淨的水資源、優良的公立學校、安全的工作場所、退休金，與照顧老年人與殘疾人士的計畫。計畫減少這些必要的保障與福利或將之私有化的政客，當然不能正大光明地將這些當作選舉主題。最常見的仍是新自由主義政客承

諾減稅、減少政府經費的浪費，同時確保必要的福利不受影響……然後在某種（虛構或真實的）危機掩蓋下，不情願且抱歉地表示：對不起，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砍健保預算了。

一鼓作氣

說到底，堅信自由市場之人——又稱「自由意志主義者」（此為科赫（Koch）兄弟給自己的稱號）——受大動亂吸引，是因為他們反民主的野心在非動亂時期難以存活。

整件事的關鍵就是速度，因為震撼本就是短暫的狀態。沉醉於震撼中的領袖與資助者，作風通常與布雷默相近，他們一般會遵守馬基維利（Machiavelli）在《君王論》（*The Prince*）一書中給的建議：「傷害應當一口氣完成，嚐此滋味的時間越短，造成的不快就越少。」他的邏輯再直白不過：環境發生循序漸進的變化時，人們能對此做出回應，但若數十種改變同時從四面八方襲來，大眾將很快地彈性疲乏、不知所措，最後不情願地接受這些變化。（請回想關於波蘭衝擊療法的描述：如「狗的歲數跳到人類的歲數」。）

《震撼主義》在二〇〇七年出版時，引起一波爭議。我挑戰了我們許多人從小認知的美好歷史——我們所學的歷史告訴我們，在二十世紀後半，撤銷市場管制與民主進步一直相輔相成。然而事實醜陋得多；改造現代世界的極端資本主義——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約瑟夫·史迪

格里茲 (Joseph Stiglitz) 稱其為「市場基本主義」——通常只能在民主機能停滯、人民自由受限的情況下進步。在某些情況下，為了控制叛亂的民眾，甚至得用酷刑等暴力手段。

已故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最出名的著作是《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他在書中將人類自由與市場自由比喻成同一枚硬幣的正反面。但是第一個全程依傅利曼思想操作的國家並不是民主國家，而是智利——當時，一場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政變推翻了智利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薩爾瓦多·阿葉德 (Salvador Allende)，取而代之的是極右派獨裁者奧古斯圖·皮諾契特將軍。

這不是巧合——傅利曼的想法實在太不受歡迎，沒有專制暴君的國家不可能實際施行。阿葉德在一九七〇年智利大選中獲勝時，理查·尼克森 (Richard Nixon) 不悅地道出他的名言：「讓經濟厲聲尖叫！」阿葉德在血腥政變中身亡，傅利曼遂建議皮諾契特毫不猶豫地進行經濟改革，並開出他稱為「震撼治療」的處方。在著名經濟學家及其學生 (拉丁美洲所謂的「芝加哥男孩」 (the Chicago Boys)) 的指導下，智利以保證書與特許學校取代了公立學校，將健保改成現購現付制，並將幼稚園與墓園私有化 (及美國共和黨注目數十年的諸多目標)。別忘了，這個國家的人民對這些政策抱有極深的敵意——他們甚至在政變前的民主選舉中，選擇了社會主義政策。

在此期間，類似的情形在拉丁美洲許多國家上演。害得數百萬人窮困潦倒的經濟震撼治療，及殘害了智利、阿根廷、烏拉圭與巴西數十萬深信社會應更公平之人的酷刑——當地首屈

一指的知識分子看出了兩者明確的關聯性。已故烏拉圭歷史學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曾提問：「若非使用一次又一次的電擊，怎能維持這樣的不平等？」

拉丁美洲正好遭受這兩股強勁的衝擊。大部分「自由市場」改造計畫沒這麼血腥，蘇聯瓦解、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終結等極端政治轉變也能令人民頭暈目眩，掩蓋新自由主義經濟革新的行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最常見的產婆是大規模經濟危機，有心人一次次利用它推動激進的私有化、撤銷管制與廢除安全網行動。但實際上，任何震撼都能達到此效果，就連自然災害也一樣——只要災害過後需要大規模重建，就有機會將土地與資源從弱勢者手中轉移給掌權者。

正派的相反

許多人對這樣利用危機的行徑驚駭不已，而這也理所當然。正派人士在能自主的情況下，面對大規模創傷時往往選擇幫忙，而震撼主義則相反。二〇一〇年海地大地震過後，人們以私人名義捐贈了三十億美元；二〇一五年尼泊爾地震及二〇〇四年南亞海嘯也分別收到數百萬美元捐款。這些災難激發了全球各地的善心人士捐贈錢財與資源，數以千計的平民百姓捐錢資助災民，並當義工幫助他們。

美國歷史學家兼作家雷貝嘉·索爾尼（Rebecca Solnit）曾傳神達意地表示，災難能喚醒人心

中最好的一面；在危急時刻，我們時常看見令人動容的互助與團結。在二〇〇四年海嘯肆虐後的斯里蘭卡，人們拋開數十年的跨種族內戰——伊斯蘭教徒幫助他們的印度教鄰居，印度教鄰居幫助他們的佛教鄰居。在卡崔娜颶風蹂躪後氾濫成災的紐奧良，人們甘冒生命危險救援鄰居。超級颶風珊迪（Superstorm Sandy）摧殘紐約之後，陣容龐大的志工網分散至全市各處，他們在「占領珊迪」（Occupy Sandy）的旗幟下集結——這是源自「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的運動——分發數十萬頓餐飲、清掃超過一千間房屋，並為數千名災民提供衣服、毛毯與醫療照護。

震撼主義的主軸是無視深植人心的助人之念，反而剝削無力自救的人們，最大化少數人的財富與利益。

這世上，少有比之更奸邪的事物。

盜竊的藝術

震撼主義的邏輯完全符合川普的世界觀。川普毫不害臊地將人生視為支配他人的鬥爭——甚至痴迷地記錄誰是當前的贏家。在他多次自我吹捧的談判中，總是提出相同的問句：我能從這次談判獲得的最大利益是什麼？我要怎麼最有效地利用對手的弱點？

在二〇一一年《福克斯與朋友們》(Fox & Friends)電視節目中，川普直言不諱地描述他與利比亞前領導人穆安瑪爾·格達費(Muammar Qaddafi)談成的協議：「我租了一塊土地給他，他租一個晚上付的錢比那塊土地租出去一整年的費用還高，可能和兩年的費用一樣多也說不定。然後呢，我不讓他用那塊土地。這就是我們該做的事情；我不想用『搞』這個字，但我就是狠狠搞了那傢伙。這才是我們該做的事。」

若川普只選擇讓受人厭惡的獨裁者吃虧，也不會有人難過。然而，川普在任何談判場合都是這個態度；他在如何變得像川普的《大膽想出狠招》一書中，如此描述他的談判哲理：「你能常聽人說，一場好的談判就是雙方都贏。我告訴你，那全是屁。一場好的談判就是你贏——不是對方贏。你要狠狠打爆對手，然後成為更好的自己。」

這股利用他人弱點的冷血熱忱，是川普作為房地產開發商的中心理念，也是他與內閣許多閣員的共通點。此事之所以令人擔憂，是因為它不僅表現出川普團隊刻意營造的混亂氛圍，更使我們駭然意識到，他們極可能如此利用將來的大規模危機。

目前為止，瀰漫在川普周遭的危機氣氛，主要由他危言聳聽的言論維持。他聲稱某些城市是「充滿犯罪」的「屠殺」現場，而實際上全國的暴力犯罪率已在數十年間持續下降。他以三寸不爛之舌捏造移民犯罪潮的故事，並堅稱歐巴馬毀了美國整體。然而再過不久，川普也許將得到真正能利用的危機——因為無論是哪方面，他的政策理應殊途同歸，來到「危機」的終點。

有此概念後，我們應仔細觀察川普團隊過去利用危機達成經濟與政治目標的方法。當我們理解他們的前科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不會令我們震驚到無法思考，最終幫助我們抵抗這些陳腐的花招。

震撼構築而成的事業

在美國，新自由主義革命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的紐約市搶先開始。在此之前，這座城市一直是完美但大膽的一場社會民主主義實驗；從圖書館到大眾運輸到醫院，它擁有全美最優良的公共福利。但到了一九七五年，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刪減預算，再加上全國經濟衰退，致使紐約面臨完完全全的破產。此次危機，正是大幅重塑紐約市的機會。在危機的掩護下，一波嚴苛的擲節措施、優待富人的規則與私有化襲捲全市——最終導致我們所愛的紐約市轉變成今天投機性融資、奢侈消費與無止盡貴族化的殿堂。

在敘說這段鮮為人知的美國歷史之《恐懼之城》(Fear City)一書中，歷史學家金·菲力普費因(Kim Phillips-Fein)記錄了一九七〇年代的紐約市改造過程，並詳盡描述它為全球改造浪潮拉開序幕的經過。這波浪潮在世界頂層的一%與其餘人之間留下鴻溝，此情況在唐納·川普的故鄉——紐約市——尤為嚴重。在這個故事中，川普扮演了極其重要但形象不佳的角色。

在一九七五年，前總統傑拉德·福特（Gerald Ford）似乎無意救助紐約市，美國最大、最傳奇的城市極可能步上破產之路——《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頭條寫著大大的：「福特對紐約說：去死」。當時，川普才二十九歲，仍在他富有的父親庇蔭下工作。他父親在紐約外圍區域建造不搶眼的中產階級房屋，並以此致富——而他同時也是惡名昭彰的房東，系統性地歧視非裔美國人。

川普從以前一直夢想在曼哈頓留下自己的足跡，他在這場負債危機中看見了不可錯失的良機。機會在一九七六年降臨，當時歷史悠久、頗負盛名的海軍准將酒店（*Commodore Hotel*）宣布因賠本的緣故可能得停止營業。市中心著名的地標將閒置，散布都市衰敗的形象，並減少市政府的稅收……市政府得知此事後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他們必須盡速找到買家，情緒近乎絕望；依當地電視臺的說法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輪到川普粉墨登場，這位初號災難資本主義者與凱悅酒店集團（*Hyatt Corporation*）聯手，計畫以「全新的（反光玻璃）外皮」取代海軍准將酒店的經典磚牆，然後以君悅酒店（*Grand Hyatt Hotel*）的名號重新開張（在這短暫的時期，未來將成為美國總統的他還未堅持在所有開發案標上自己的名字）。他與受債務危機所困的紐約市談成不可思議的合約；菲力普費因解釋道：

川普用九百五十萬美元從鐵路公司購買此物件，然後以極低價轉售給都市開發公司（*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最後，都市開發公司再將此物件以九十九年租期租給川普與凱悅酒店集團；此舉允許開發商享近一世紀的超低稅率——價值數億美元的意外之財。（到二〇一六年為止，川普逃漏稅造成了紐約市三·六億美元的損失。）

沒錯，川普投資九百五十萬美元，省下了價值三·六億美元（且持續上漲）的稅金。新開幕的飯店宛如詛咒——一位建築評論家以「鄉下人對城市生活的想像」描述之。換句話說，它是川普品牌早期的產品；而未來某位俄羅斯寡頭政治家透過私藏錄影帶中一九八〇年代的《朝代》與《朱門恩怨》(Dallas)肥皂劇認識美國，川普便會將此人眼中的美國販售給全世界。根據菲力普費因的說法：

唐納·川普與其他趁市政府手足無措時建造高樓大廈的開發商，對餘下的紐約興致缺缺。數百萬美元被用於資助營造案，而非恢復社會福利或促進市內窮困或勞工階級社區復元，但他們絲毫不覺良心不安。

這個故事引人深思的是，它不只是川普年輕時利用紐約的經濟危機擴增自己的資產，並狠狠敲了危機當前的市政府一筆。不僅如此；這筆交易不是普通的交易——這筆交易幫助川普走

出父親的庇蔭，使他在這場遊戲中成為自立自強的玩家。川普的事業打從一開始就由震撼建構而成，在危機給予的商機中成形。從脫離父親陰影的那一刻開始，川普對公共領域的態度便已定型——公共領域存在是為了讓他去掠奪、讓他去致富。

自此之後，他的態度從未變過。值得一提的是，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當天，雙子星大廈被撞毀後不久，川普接受廣播電臺採訪時忍不住評論道，在雙子星大廈倒塌後，他成了曼哈頓鬧區最高建築的主人。街上滿是遇難者的屍體，曼哈頓鬧區形同戰場，而在電臺主持人一點點鼓勵下，川普就想到了自己品牌的利益。

當我採訪菲力普費因，問她從川普在紐約債務危機時期的行為學到什麼教訓時，她的回答是「恐懼」。她表示，當時瀰漫著「對於破產、對於未來深深的恐懼；在這樣的氣氛下，當時刪減預算的措施才有可能施行，市民才認為紐約市需要一位救世主。」二〇一六年大選過後，她時常思索此事。「恐懼能讓我們原先顯得不可行的政治措施，一夕之間變成唯一的選項。因此，我認為這是我們此時須力抗的事物之一；我們必須想辦法抵抗令人喘不過氣的恐懼與混亂，找到能與之抗衡的團結。」

這是很好的建議……尤其是現在，川普集結了一批危機投機者，我們更須找到抵抗他們的方式。

災難資本主義內閣

川普團隊的資深隊員，曾於近年主導極其過分的震撼策略。接下來，我將簡短敘述他們的事蹟（從川普身邊的高盛銀行主管數量可知，下列種種不過是冰山的一角）。

從氣候變遷與戰爭獲利

美國國務卿雷克斯·提勒森的事業，很大一部分建構在從戰亂中獲利的手段之上。二〇〇三年美國攻打伊拉克，油價跟著上漲，所有大型石油公司中，埃克森美孚在這段時期賺取最多利潤。不僅如此，埃克森美孚直接利用了伊拉克戰爭；它違背國務院的忠告，談成探索伊拉克屬庫德斯坦的協議。此舉越過了伊拉克的中央政府，在當時很可能引發全面內戰——此舉確實「貢獻」了部分內部衝突。

提勒森作為埃克森美孚執行長，也在其他方面從災難中獲利。我們已經知道，提勒森是這間巨型石油公司的經營者，這表示他經營了一家無視自家氣候科學研究，決定出資散播不實情報與捏造氣候科學的公司。而且根據《洛杉磯時報》(LA Times)一篇調查報導，埃克森美孚（在兩家企業合併前與合併後）費盡心思研究如何利用它竭力掩蓋的危機賺取更多利益，並保

護自身不受其影響。埃克森美孚開始探索北極鑽油的可能性（由於氣候變遷，北極冰層正在融化），它重新設計北海的天然氣管線，以承受海平面上升、超級風暴等氣候災害，並重新設計加拿大新斯科細亞省外海的鑽井架。

在二〇一二年一場公開活動，提勒森承認氣候變遷正在發生——但他接下來的言論，卻令人恍然大悟：人類「這個物種」一向能適應環境，「所以我們會適應這些變化。氣候模式改變會導致農作物生產區改變——我們會適應的。」

他說的沒錯，土地不再生產糧食時，人類確實能適應。人類適應的方式就是遷徙——他們離開家鄉找尋新的落腳處，找尋能養活他們與他們家人的土地。但是提勒森心知肚明，我們所生活的時代，並不是各國敞開大門歡迎飢餓、絕望的難民入境的時代。提勒森現在的上司，是一位將敘利亞難民抹黑成恐怖分子、特洛伊木馬的總統（在敘利亞，最終引發內戰的壓力來源之一，便是乾旱）。若非司法機構擋下了他的命令，這位總統制定的旅遊禁令將阻止敘利亞移民進入美國。關於尋求庇護的敘利亞孩童，這位總統表示：「我可以看著他們的臉，告訴他們：『你不能來。』」這位總統聲稱因恐怖的化武攻擊害死了孩童與「美麗的嬰兒」，他下令以飛彈轟炸敘利亞……而無論化武攻擊令他多麼感傷、無論飛彈轟炸有何影響，他禁止移民的立場卻毫無改變，依然拒絕讓孩童與「美麗的嬰兒」及其父母進入美國國境。這位總統宣布了計畫，希望以追蹤、監視、監禁與驅逐移民作為他當政的特色。

而川普團隊中不乏暗中等待良機、深諳從災厄中獲利之道的佼佼者。

從監獄獲利

選舉日到川普上任滿一個月，美國兩家最大的私營監獄公司——美國矯正公司（CoreCivic，原名 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與地緣集團（GEO Group）——股價翻了一倍，分別漲了一四〇%與九八%。

有何不可呢？就如埃克森從氣候變遷尋得商機，這些私營監獄、私人保全與私人監視產業的公司，也視戰爭與移民（兩者時常與氣候壓力脫不了關係）為拓展市場的良機。在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Agency，簡稱 ICE）每日監禁的移民人數可高達三·四萬人，這些被懷疑非法居留的移民有七三%監禁於私營監獄中。川普獲選後，這些公司的股價飆漲也是理所當然。不久後，監獄公司又接獲一份大禮：川普的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就職後第一件事，就是撤回歐巴馬政府將一般監獄人口抽離營利監獄的決策。

從戰爭與監視獲利

川普挑選的國防部副部長派崔克·夏納翰(Patrick Shanahan)是波音公司高層，曾販售昂貴軍武給美國軍方，包括阿帕契直升機與契努克直升機。他也負責監督波音的彈道飛彈防禦計畫——若國際情勢在川普的操弄下持續惡化，波音將坐收大筆利潤。

而這不過是大趨勢中的一小部分；二〇一七年三月，李·方(Lee Fang)於《攔截》(Intercept)新聞網寫道：「唐納·川普總統指派國防承包商與陳情者擔任各部門關鍵官員，將旋轉門般的政府部門武器化，並以迅速增加軍方經費、擴展國土安全計畫為目標……目前為止，被提名或任命的重要官員中，至少十五人與國防承包商有財務關係。」

當然，我們都很熟悉旋轉門的概念；退休的軍方高官一般會轉至軍火公司工作或與之合作。令我們詫異的是，川普任命這些與軍武承包商掛勾的將軍為各部門要員，給予他們分配經費的權力——包括他在一年內為軍方、國防部與國土安全全部提高超過八百億美元經費的計畫。

另一項變化，是國土安全與監視產業的規模。九一一攻擊後，布希政府宣告將投入永無止境的「反恐戰爭」，所有能外包工作的都會外包——監視與國土安全相關產業也跟著蓬勃發展。窗戶貼了反光紙的事務所，像毒蘑菇似地在華府外的維吉尼亞州郊區冒出，而原先就存在的公司——例如博思艾倫漢密爾頓控股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更是發展到全新的境界。二

〇〇五年，丹尼爾·格羅斯（Daniel Gross）在《石板》（Slate）雜誌如此描述人們所謂的「安全氣泡」：「國土安全產業到達了一九九七年網路投資的階段；當時你只須在公司名稱加上『e』字，股票初次公開發行的價碼就會飆上九重天。現在，你能用『堡壘』兩個字達到相同的效果。」

這表示，川普內閣許多官員的前一份工作，是提供不久前不可能外包的服務。比方說他的國家安全會議執行祕書——退役的基思·凱洛格中將（Keith Kellogg）——在進入業界後曾與Cubic Defense等保全承包商合作；根據Cubic Defense公司的說法，凱洛格負責「我們的陸戰訓練業務，並擴展本公司的全球顧客群。」沒錯，「陸戰訓練」曾經是軍隊自己完成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任用的承包商之中，有許多公司在九一一事件之前根本就不存在：專門做人體辨識技術的LI Identity Solutions公司、由布希的國土安全部長麥可·謝爾托夫（Michael Chertoff）創立的謝爾托夫集團（Chertoff Group）、由PayPal億萬富翁與川普支持者彼得·泰爾（Peter Thiel）創立的監視及大數據公司帕蘭泰爾技術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等等。保全公司經常從政府的軍事部門與情報部門挖角人才，現在川普任職總統，又有許多來自保全公司的陳情者與職員遷移回政府部門。當川普總統狩獵所謂的「壞炸彈客」時，他們很有可能積極爭取賺錢的機會。

這是危險的組合。這群人直接從戰爭獲利，現在他們位居政府要職，又有誰會倡議和平？戰爭終有一天會決定性地平息——此觀念似乎已是布希時代視為「九一一前思想」的舊時遺跡。

從經濟危機獲利

美國政府與企業界的連結從一七七六年就沒有斷過（開國元勳之中有幾位是出自富裕的農莊地主家族）。自此，無論坐鎮白宮的是民主黨或共和黨，旋轉門的運行一直沒有停歇。川普的不同，是在於他的音量，以及他的無恥。

在我寫這本書的同時，唐納·川普指派了五位現任或前任高盛銀行主管擔任政府高官，其中包括財政部長史蒂芬·努勤、副財政部長詹姆斯·杜諾文（James Donovan，前高盛銀行董事總經理）、白宮國家經濟會議主席蓋瑞·寇恩（Gary Cohn，前高盛銀行營運長），及白宮經濟舉措資深顧問狄娜·鮑威爾（Dina Powell，前高盛銀行慈善投資負責人）。就連史蒂夫·巴農也曾於高盛銀行旗下工作。而這還沒算上川普派任證券交易委員會會長的傑·克萊頓（Jay Clayton），他曾擔任高盛的顧問律師，收取數十億美元酬金，而他的妻子也是高盛的理財經理。

川普任命一批高盛高層為內閣閣員，是十分厚顏無恥的一步棋，因為高盛正是他攻擊對手的花招之一。有一回，川普一如往常地對共和黨內的競爭對手泰德·克魯茲發動猛烈攻擊，聲稱高盛銀行「完完全全掌控了他，就像他們完全掌控希拉蕊·柯林頓一樣」。

除此之外，川普政府當權期間發生的經濟震撼，可能成為他們用於自肥的機會，這點令人非常擔憂。在二〇〇八年次貸危機中心的華爾街投資銀行中，高盛表現得最具侵略性。高盛不

僅是利用複雜金融手段使地產貸款泡沫化的元凶之一，它更是在危機中忽然態度急轉彎，據說它將賭注抽離貸款市場並賺了數十億美元。為此，及其他不法行為，美國司法部在二〇一六年命高盛銀行支付五十億美元的和解金——高盛從過去到現在金額最龐大的和解金。在二〇一〇年，高盛因它在金融危機中扮演的角色，付出了五·五億美元罰款；在當時，這是證券交易委員會創立七十六年來，華爾街所有公司所付出的罰款中最昂貴的一筆。

民主黨參議員卡爾·列文(Carl Levin)曾於二〇一〇年領導參議會小組，在金融危機過後調查高盛。列文對其非法行為簡述如下：

證據顯示，高盛再三將公司利益擺在客戶與社會之前……高盛做的不只是賺錢；客戶合理地預期公司希望旗下商品成功，合理地相信公司與它承諾服務的客戶之間沒有經濟利益衝突，而高盛卻利用了此心理。其所作所為顯示，它經常將客戶視為圖利自身的物品，而非寶貴的顧客。這很重要，因為它並不是在客戶得利時得利，而是在客戶損失時獲利。

即使在高盛「校友」群中，史蒂芬·努勤樂意將利潤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態度，也令他鶴立雞群般顯眼。二〇〇八年華爾街金融衰敗之後，努勤在止贖危機當中買下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家銀行。這家重新命名為OneWest的銀行替努勤贏得了「止贖之王」的稱謂，據說它從政府

單位收取十二億美元補償取消贖回房屋的損失，並在二〇〇九至二〇一四年間將數萬人逐出家園。OneWest甚至因二十七分錢的欠款，試圖取消一位九十歲婦女的房屋贖回權。

上述掠奪性經營手段，在努勤的財政部長聽證會上引來各方砲火，卻沒能使共和黨員轉而反對他。奧勒岡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榮恩·魏登（Ron Wyden）在聽證會上表示：「努勤先生擔任執行長的期間，這家銀行展現出了迅速將無力自救者趕到街上的能力。」並指控：「OneWest製造止贖案的效率，就和中國工廠生產川普西裝與領帶一樣。」

從自然災害獲利

再來是副總統麥克·彭斯。在許多人眼中，他在眾人皆醉的川普亂世中獨醒，然而前印第安那州長彭斯在冷血地利用他人痛苦圖利自身這方面，卻持有最令人膽寒的紀錄。

當麥克·彭斯宣布成為唐納·川普的競選搭檔時，我心想：「這個名字很眼熟，我在哪裡看過。」然後，我想起來了。我報導過最駭人聽聞的事件之一，就是以他為主軸：卡崔娜颶風、紐奧良氾濫的災難中，彭斯便是災難資本主義大混戰的核心人物之一。麥克·彭斯從他人的痛苦中獲利之事令人驚駭不已，這些事隱含許多資訊，讓我們能更準確地預期川普政府在緊急危難時刻的動向；因此，這些事件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卡崔娜藍圖

在深入探討彭斯的角色之前，我們必須謹記一件事：卡崔娜颶風雖經常被描述成「自然災害」，它對紐奧良造成的影響卻一點也不自然。當卡崔娜於二〇〇五年八月登陸密西西比州，它從五級颶風降為依然極具破壞性的三級颶風，然而在抵達紐奧良時，卡崔娜的強度又減弱變成「熱帶性低氣壓」。

這很重要，因為熱帶性低氣壓理論上不可能擊垮紐奧良的防洪設施——但卡崔娜確實擊破了防洪設施，保護這座城市的防洪堤被沖垮了。為什麼？現在我們知道，美國陸軍工兵部隊無視多次關於防洪風險的警告，放任防洪堤破損、失修。導向此結果的主因有二：

其一，是對貧困黑人身家性命的漠視；這些人居住在紐奧良下九區（Lower Ninth Ward），最受防洪堤損壞的威脅。這也是全美忽視基礎公共建設的結果之一，更是新自由主義政策數十年來直接造成的影響。因為當你系統性地攻擊公共領域與公共利益之概念時，社會的公共骨架——道路、橋梁、防洪堤、水利工程——自然會陷入年久失修的狀態，經不起災害的考驗。當你大幅減稅，除了軍警預算之外沒有多餘的經費，發生這樣的事件也不奇怪。

對不起這座城市——尤其是最窮苦的市民（紐奧良與美國許多城市一樣，最貧困的居民多半是非裔美國人）——的並不只是實體基礎建設。第二道大裂痕是人為因素，災害應變處理系

統也對不起紐奧良。負責處理此類全國危機的政府單位是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而州政府與地方政府也在避難規畫與應變等項目中扮演關鍵角色。無論是哪一階層的政府，全都失敗了。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花了五天時間，才將食物與飲用水送到在超級巨蛋緊急避難的災民手裡。當時最悲慘的照片，是受困在住家與醫院屋頂的災民高舉「救我」牌示，眼睜睜看著直升機從上空飛過。那時候，人們盡可能互相幫助；他們划小船與獨木舟拯救彼此，他們彼此分享糧食，他們展現出了人類在面對災厄時的團結。然而在公家方面，情況完全相反。我永遠忘不了紐奧良人權運動組織者柯蒂斯·穆罕默德（Curtis Muhammad）說的話，他表示，這次經歷「讓我深深意識到，沒有人會照護我們。」

紐奧良市民經種族與階級的分割後，被不平等地遺棄了。當時很多人有能力自己離開城市，他們自行開車到沒有淹水的飯店，打電話給他們的保險經紀人；而部分的人留下，是因為他們相信防洪設施能撐過這場颶風。但是，有眾人留下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他們也許沒有車，也許太衰弱而無力開車，也許完全不知所措。這些人才是真正需要避難系統與救助的人……可惜，他們沒有得到他們所需的幫助。巴格達的災難彷彿在紐奧良重演，有些人在自己的綠區避難，更多人卻擱淺在紅區——而最糟糕的事即將降臨在他們身上。

災民被遺棄在紐奧良，他們沒有糧食、沒有水源，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只能盡其所能地生存，取用當地店家的存貨。福斯新聞等媒體抓住這點，將紐奧良的黑人描繪成危險的「搶劫犯」，

並對大眾宣稱這些人即將入侵未氾濫的白人居住區，以及城市周遭的郊區與小鎮。「搶劫犯會被槍擊」的字句被人用噴漆塗在建築外牆上，市內各檢察站將災民困在災區，警察在丹濟格橋（Danziger Bridge）上一一話不說便朝黑人市民開槍（五名員警最後認罪，在此案及卡崔娜災後另外兩起相似的案件，市政府與受害者家人以一千三百三十萬美元和解）。與此同時，持有武器的白人「正義使者」在街上四處遊走，根據一名市民日後對調查記者亞當·克萊·湯普森（A.C. Thompson）的說法，他們在尋找「狩獵黑人的機會」。紅區儼然成了無法無天的世界。

當時我也在紐奧良，我親眼看見警方與軍方蓄勢待發的模樣——更別提剛從伊拉克回國的黑水公司等私人保全人員。紐奧良像極了戰場，貧民與黑人被困在砲火區——但這些人唯一的罪孽，就是竭盡全力活下去。等到國民警衛隊（National Guard）到場組織全市疏散行動時，他們凶暴、無情的表現也令人不解。市民在沒有獲得任何情報的情況下，被持槍瞄準他們的軍人強迫坐上巴士，孩童與父母被迫分開的情形也屢見不鮮。

我在那次洪災中看見了令我震驚的事物，但在卡崔娜颶風離開後看到的種種卻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紐奧良市震顫不已，市民分散到全國各地，在無法保護自身利益的情況下，高層開始全速完成有利企業的一系列措施。那年九十三歲的米爾頓·傅利曼為《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寫了一篇文章，表示：「紐奧良大部分的學校已成斷垣殘壁，學生的家園也殘破不堪，孩子們四散全國各地。這是場悲劇，但同時也是激進革新教育體系的良機。」

當時為路易斯安那州共和黨眾議員的理查德·貝克(Richard Baker)，也發表類似的言論：「我們終於清空紐奧良的公共住宅了。這件事我們原本做不到，但上帝為我們完成了。」貝克發表此言論時，我人在巴頓魯治(Baton Rouge)附近的避難所，接受我採訪的人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想像你被迫離開自己的家，每天只能睡在巨大集會館的行軍床上，結果你的民意代表卻說這是出自神之手——上帝顯然很喜歡豪華公寓建案。

貝克說的對，公共住宅確實「清空」了。颶風過境後數月，紐奧良居民與他們麻煩的意見、豐富的文化、深深的依戀，全都「清空」了；數千個公共住宅單位被拆除，其中很多間位於地勢高的區域，颶風過境時遭受到的破壞根本非常少。取而代之的是豪華公寓與連棟住宅，價格遠遠超出居民能負擔的範圍。

麥克·彭斯就是在這時登場。紐奧良遭卡崔娜颶風襲擊時，彭斯擔任共和黨研究委員會的主席，領導這個有影響力、有理想的保守派立法小組。在二〇〇五年九月十三日——防洪堤被沖垮後僅僅十四天，紐奧良市仍有部分積水未排乾——共和黨研究委員會在華府的美國傳統基金會辦公室開會。在彭斯的帶領下，小組列出了「對應卡崔娜颶風與油價高漲之促進自由市場計畫」清單——共三十一條虛偽的救濟政策，條條出自災難資本主義攻略手冊。

引人注目的，是他們對勞工標準待遇與公共領域宣戰的決心——這十分諷刺，因為基礎公共建設的不足，正是卡崔娜颶風變成人為災厄的首要原因。值得注意的另一點，是他們抓住任

何機會圖利石油與天然氣產業的堅持。他們的清單包含「於災區自動停用戴維斯—培根法案的最低工資法」（此法要求聯邦承包商支付基本生活工資給員工），「將整塊災區改成單一稅、自由企業區」，以及「廢除或不強制執行阻礙重建的環保限制」等建議。

布希總統於一週內施用了其中許多項建議，不過後來在多方壓力下，他不得不恢復勞工工作標準。另一項建議是發保證書給學童的父母，讓學生去私立學校或特許學校（稅金補助的營利學校）就學；此舉與川普選的教育部長貝琪·戴弗斯（Betsy DeVos）目標一致。一年內，紐奧良的教育體系成為全美最私有化的教育系統。

不僅如此。氣候學家已直接連結海水溫度上升與強力颶風的產生，然而彭斯的小組卻沒有因此打消在國會上廢除墨西哥灣沿岸地區環保規範的念頭，他們堅持想廢除環保限制，允許石油公司在美國建造新的煉油廠，並批准「在北極野生動物保護區鑽油」。這些舉措太過瘋狂；共和黨研究委員會提出的措施絕對會提高溫室氣體排放量，提高人類對氣候變遷的主要「貢獻」，最終導向更強烈的風暴。儘管如此，彭斯立刻全力支持這些提案，後來布希也在處理風災的偽裝下，聽取他們的建議。

在此我們可以稍微暫停，釐清這一切的含意。卡崔娜颶風之所以重創紐奧良，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與氣候變遷相關的極端天氣，另一個原因是破敗且無人處理的基礎公共建設。彭斯小組提出的所謂「解決方案」，是終將加劇氣候變遷、使基礎公共建設變得更脆弱的措施。他與他

的「自由市場」夥伴似乎堅決執行這些方案——這些在未來會造成更多卡崔娜災難的方案。

而現在，麥克·彭斯占據高位，能以全美國為舞臺發展他的願景。

盜竊統治大亂鬥

因卡崔娜颶風獲利的不只是石油產業。颶風過後，巴格達一整批承包商——貝泰、福陸（Fluor）、哈利伯頓、黑水、西圖（CH2M Hill），以及在伊拉克草率施工的Parsons公司——立刻降臨紐奧良。這些公司目的一致：證明他們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提供的私有化服務，在本國也有市場，並在過程中簽定價值二十四億美元的無競標合約。

之中的爭議數不勝數，無法在此一一列舉。相關經歷似乎與合約的分配無關；例如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花五百二十萬美元請來的承包商「燈塔災難救濟會」（Lighthouse Disaster Relief），理應在紐奧良郊區的聖貝爾納郡（St. Bernard）為緊急工作人員建造大本營，然而此關鍵工程的完工日卻遙遙無期，最後沒有完成。調查顯示，燈塔災難救濟會根本是宗教團體。「我做過最相關的事，是在教會辦青少年營隊。」救濟會會長蓋瑞·黑爾德牧師（Gary Heldreth）坦承。

在層層承包商與分包商瓜分完畢後，經費已不足以支付實際工作的人員。作者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的紀錄顯示，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請Shaw公司替破損的房屋屋頂裝藍色防水布，

支付的酬金是每平方英尺一百七十五美元……但防水布本身卻由政府提供。當所有分包商將酬金瓜分完，將防水布釘上屋頂的工作人員拿到的酬勞卻少之又少，最低為每平方英尺二美元。「承包商食物鏈中，除了最底層勞工之外，所有層級都大腹便便。」戴維斯寫道。「然而最底層勞工才是真正工作的一群人。」那些所謂的「承包商」其實就像川普集團——不過是有名無實的品牌，它們將利益抽乾後，在自己名字貼在薪資低廉或根本虛構的服務上。

為補償因各項合約與寬減稅額流入私營企業的數百億美元，當時由共和黨主導的國會於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宣布扣除聯邦政府四百億美元經費，而經費遭刪減的計畫包含：就學貸款、醫療補助計畫與食物券。如此說來，美國最貧困的人們兩度「資助」了各家承包商：第一次，是當救助卡崔娜災民的行動轉化為毫無限制地將經費贈予企業時，不僅沒能提供好工作，更沒能提供可用的公共福利；而第二次，是當真正能直接幫助全國失業人口與貧窮勞工的計畫，為支付過於龐大的酬金而遭刪減時。

* * *

紐奧良是災難資本主義的藍圖——由現任副總統與美國傳統基金會設計的藍圖……而美國傳統基金會正是川普外包政府多項編預算業務的智庫。最終，因卡崔娜颶風的後續處理問題，小布希的支持率一落千丈，導致共和黨在二〇〇八年失去了總統之位。九年後的今天，共和黨

再次掌控國會與白宮，我們不難想像紐奧良成為全國災難應對程序私有化的藍圖。

過去，極度軍事化的警方與持有武器的傭兵出現在紐奧良，令許多人大吃一驚。自此之後，類似的現象飛速擴散，全國的地方警力皆備有軍方等級之配備，包括坦克與無人機，而私營保全公司則時常為警方提供訓練與協助。由川普政府中占據高位的傭兵與保全承包商人數可見，此現象將隨一波波震撼擴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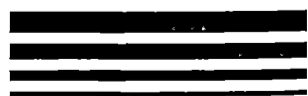
對川普承諾花數兆美元進行基礎建設仍抱持希望的人，請看看卡崔娜過境後的結果，那是再明確不過的警告。數兆美元經費會拿去整修一些道路與橋梁，也會創造一些就業機會（但我們將在第十章看到，從化石燃料轉而使用綠色基礎建設的投資，能創造遠超過這些的工作機會）。最關鍵的一點，川普表示他打算盡量不通過公營企業進行基礎建設，反而透過公家與私人的合作完成各項建設——然而從過去經驗可知，這類型的合作計畫是貪腐的溫床，結果勞工收到的薪資可能遠低於真正公家設計畫的薪資。我們能從川普的商業紀錄以及彭斯在政府扮演的角色看出，他的大規模基礎設計畫極可能演變成近似卡崔娜的盜竊統治。這是由竊賊構成的政府，而馬阿拉歌的小組忙著將大筆大筆稅金收入口袋。

當下一波震撼來襲時，我們能預見紐奧良的悲劇重演。可悲的是，紐奧良的警世寓言不過是冰山一角；在危機的掩護下，川普政府可能推出的政策遠遠不止這些。為了抵抗未來的衝擊，我們也必須為此做充足的準備。

劇毒的計畫表：當你預期 危機將至，該做什麼心理準備

現在在川普身邊任職的關鍵角色中，某些人在卡崔娜颶風肆虐後的紐奧良展現了他們野心勃勃的一面；他們為了摧毀公共領域，並圖利房地產開發商、私人承包商與石油公司，簡直不擇手段。而今天，這些人坐上了政府高層的位子，有能力將卡崔娜災後的種種擴大至全國。

這批災難資本主義者之所以令人極度憂心，是因為川普雖然在剛上任數月造成了不少傷害，但他也一次次受司法系統與國會阻撓。而川普政府的願望清單中，許多較激進的項目還未嘗試過。例如他的教育部長貝琪·戴弗斯畢生精力都用於私有化教育系統，就像卡崔娜過境後的紐奧良。川普周圍很多人都殷切希望能廢除社會安全保險，許多人也同樣希望自由的媒體、



工會與政治上的抗議行動能消失。川普曾發表關於派聯邦政府工作人員處理芝加哥等城市犯罪問題的言論，並且在競選時保證將禁止所有伊斯蘭教徒進入美國——不只是他多份清單上列舉的國家，而是「所有」的伊斯蘭教徒。他的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向來對警方關於「雙方同意的判決」之規定頗有微詞。這是一項重要的規定，若司法部與聯邦法院認為州或地方警員有虐待之嫌——例如多次向未持有武器的黑人開槍——聯邦司法體系能介入此事。塞申斯聲稱這些負責任的機制「可能降低員警的士氣」，致使他們無法打擊犯罪（但此說法毫無根據）。

川普競選時最富有的金主，也是整體極右派的金主——擁有億萬家財的科赫兄弟與默瑟（Mercer）家族——也有自己的計畫。他們希望消除政治上對於金錢所剩無幾的限制，並廢除規定私人錢財用途透明化的法條。在對抗虛構的「選民舞弊」行動掩蓋下，這些富豪同時資助了某些團體，而這些團體提倡的措施會使得低收入戶與弱勢群體更難投票，例如選民必須持有相片的身分證明才能投票（川普當選時，至少三十二州已經以某種形式實施這些行動）。若他們的兩大目標完全實現，共和黨候選人的經費將勝過革新派挑戰者，而革新派光是讓支持者參與投票過程便會遇上重重難關……川普代表的企業政變很可能成為美國永久的狀態。

在目前的情勢下，他們無法完全實現反民主目標。唯有危急時刻，他們才能排除法院的阻撓，才能無視民主黨掌控的幾個州政府，而國會也不會再妨礙川普實現更殘酷的梦想——例如恢復酷刑制度。

即使如此，這些人的計畫依然存在，依然靜待良機。因此，作家與記者彼得·馬斯（Peter Maass）於《攔截》新聞網寫道：川普的白宮是「上了膛的手槍，一觸即發」，只待危機時刻到來。很久以前，米爾頓·傅利曼寫道：「只有危機——無論是真實或意識中的危機——能造成改變。當危機發生時，人們進行的動作取決於當時存在的思想。我相信，這就是我們最基本的功能：發展出與現行政策不同的方案，並維持它們的生命力，直到政治上的不可能轉變為政治上的必然。」就如生存主義者未雨綢繆地儲備罐頭與飲用水，這些人事先儲備的是誇張的反民主思想。所以，這些是我們必須注意的問題：什麼樣的災難，或者一連串的災難，能允許他們實行計畫？在劇毒的計畫表上，有哪些任務會在機會來臨時首先出擊？

是時候準備迎接災難了。

緊急狀態，例外狀態

川普競選時，有些人認為他較誇張的種族歧視性言論只是激怒選民的手段，而不是他認真打算完成的行動。川普上任第一週，當他針對七個伊斯蘭教為主的國家頒布旅遊禁令時，那些人的幻想瞬間煙消雲散，眾人立即開始反抗行動。全美的大城市中，數以千計的人們走出家門、湧入機場，要求廢止禁令並釋放被拘留的旅人。紐約計程車司機拒絕載客離開或前往約翰·甘

迺迪國際機場，各地政客與律師忙著幫助遭拘留的人們，一位聯邦法院的法官終於插手，廢止了禁令。當川普稍微修改行政命令內容，重新頒布禁令時，又有一位法官出手干預。

整件事讓我們看見了反抗的力量與司法的無畏精神，是令人欣慰的事件。但我們不能忘記，只消一次對美國的恐怖攻擊，政府就會有藉口推翻這種反抗。他們極可能快速壓抑反抗行動，宣稱這些阻塞道路與機場的抗議及罷工行為威脅到「國家安全」，而後利用此偽裝抨擊抗議的組織——可能是監視，可能是逮捕，可能是監禁。我們許多人依稀記得九一一事件後，「如果你不支持我們，你就是支持恐怖分子」的氣氛瀰漫在社會上——但若想看清這些手段，我們其實不必追溯到九一一攻擊那麼久遠的事件。

二〇一七年三月，倫敦西敏橋發生恐怖攻擊案，一人駕駛汽車蓄意撞入行走的人群，殺死四名路人並造成數十人輕重傷。此事件發生後，英國的保守派政府立刻宣布，任何要求數位通訊保密的人威脅到國家安全。內政大臣琥珀·路德（Amber Rudd）上了英國廣播公司新聞（BBC），宣稱「完全不能允許」WhatsApp等軟體提供的端點到端點加密服務。她表示，政府官員將與大型科技公司見面，「請求他們幫助我們」利用後門進入通訊平臺。

在二〇一五年的法國，致使一百二十人死亡的一系列恐怖攻擊之後，法蘭索瓦·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政府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禁止政治抗議活動。恐怖事件過後一週，我在法國發現了一件事：遭恐怖攻擊的場合包括演唱會、美式足球場、餐廳與其他巴黎日常生活

活的象徵，而被禁止的只有戶外政治活動。大型演唱會、聖誕節市集、體育競賽——可能遭受恐怖攻擊的活動——卻能自由舉行。

接下來數月，緊急狀態一次又一次延長，直到此狀態維持超過一年。目前，法國的緊急狀態理論上將持續至二〇一七年七月——這是他們全新的日常。而這一切，發生在一個偏左派政權當政的國家，一個歷史上罷工與抗議行動屢見不鮮的國家。倘若你認為唐納·川普與麥克·彭斯不會立即利用對美國的恐怖攻擊，進行相似但規模遠大於法國的動作，那你就太天真了。我們應該做好充足的準備，我們應該瞭解：國家安全上的震撼將被當作藉口，川普政府會趁機集中並監禁他們所針對的族群，例如拉丁美洲移民、伊斯蘭教徒、黑人生命平權運動領袖、氣候激進分子等。這些都有可能發生。然後，塞申斯將以給予執法人員更多空間為由，處理掉聯邦政府機構對各州與地方警力的監督權。

不幸的是，若真的發生恐怖攻擊，沒有人能保證會有法官像川普新上任時一樣，站出來反抗川普。法院雖為中立仲裁者，卻沒有對大眾的恐慌免疫。可想而知，現任總統將把握國內恐怖攻擊事件給他的機會，將過錯推給法院。當他的旅遊禁令被推翻後，川普在推特上發文表示：「我不敢相信，一個法官竟然會害我們的國家變得這麼危險。如果發生什麼事就怪他跟司法系統。」

黑暗王子回歸

川普從未隱藏過他對酷刑的興趣。「刑求很有用。」他在競選時曾說。「只有笨蛋才會說它沒用。」他也承諾將更多人關入關塔那摩灣海軍基地，承諾抓更多「壞蛋——相信我，我們會把監獄塞滿壞蛋。」

從法律的角度而言，這並非易事。自從小布希政府鑽漏洞、踏上施虐的路線，美國司法系統便採取措施，使未來的政府更難重蹈覆轍。參議院也在二〇一五年通過一條修正案，清楚地聲明所有審訊手段皆須遵守美國陸軍戰場手冊（Army Field Manual）。

然而，若美國面臨足夠嚴重的安全危機，我們很難期望共和黨掌控的參議院與眾議院拒絕讓白宮行使它要求的權力。川普的中央情報局局長麥克·蓬佩奧（Mike Pompeo）表現出了令人擔憂的「倒退」傾向；在聽證會上，蓬佩奧毫不含糊地表示絕不會允許刑求策略回歸，接著追加了一句：「如果專家相信現行法律妨礙他們收集關鍵情報、保護國家，我會希望理解這些阻礙，並聽取任何修改法律的適當建議。」此外，他還要求撤除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披露情報後，國家在電子監控方面少許的限制。

不幸的是，即使不受國會或中央情報局支持，堅持違反法令的政府仍然能找到違反法令的方法。川普最有可能選擇的途徑，是將這些骯髒活外包給私營承包商；幕後輔導川普的，正是

黑水公司的創立者艾瑞克·普林斯（Erik Prince，教育部長貝琪·戴弗斯之弟）。調查記者傑瑞米·斯卡希爾（Jeremy Scahill）曾撰寫關於黑水公司的得獎書籍，他記述道，普林斯不僅捐贈十萬美元給支持川普的政治行動委員會，還積極給與總統過渡團隊「關於情報與國防的意見，並提出關於國防部與國務院官員之人選的意見。」而在四月，《華盛頓郵報》發表一篇報導，揭露：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於一月安排了黑水公司創立者艾瑞克·普林斯與俄羅斯總統佛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的親信會面，根據美國、歐洲與阿拉伯官員，此舉顯然是為建立莫斯科與唐納·川普總統之間的後門連繫。官員表示，此次會面發生在印度洋的賽席爾群島，時間是一月十一日——川普就職前九天。

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普林斯「以川普的非正式使者自居」。普林斯透過發言人聲明，這「完全是杜撰出來的故事，我們會面與川普總統沒有任何關係」。

除了川普團隊與俄羅斯的又一次曖昧關係之外，普林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登場的時機也令人擔憂。在一連串官司與調查之後（四名黑水公司員工涉嫌在巴格達的納蘇爾廣場（Nisour Square）屠殺無辜民眾，導致十七人死亡，美國一組聯邦陪審團判定四人有罪），普林斯試圖更換黑水公司的名字，最後直接將公司售出。現在他開了一間新公司：先豐服務集團

(Frontier Services Group)，投入掃蕩全球的反移民熱潮，聲稱他的公司是阻止移民入境的最佳選擇。在歐洲，他表示各國若付錢請他的公司在利比亞辦事，便能「保衛國土疆界，預防移民前往地中海。」在二〇一七年初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上，普林斯寫道，若實施他的計畫，「移民走私者將無處可躲，我們能利用空中與陸地上的行動偵查、拘留並處理這些移民」——一個全私有、全營利的計畫。

普林斯此時重新出場，提醒我們即使是法律規範也有後門可走。而川普與他國領導者，能利用普林斯等人的公司進行監視、審訊作業並大幅提高邊境管控。

不，他們不需要計畫

有些人警告大眾，川普對事實毫不在意的態度，以及恐慌氣氛帶給他的好處，很可能驅使他的政府自行製造能加以利用的危機。我們當然不能低估這批狠角色，但事實上，這些假想的陰謀根本就不必要——因為川普能力不足卻不顧一切的統治方式，就是最有效的災難創造機。

例如川普政府關於伊斯蘭教與「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等煽動群眾的言論與政策；所謂反恐戰爭已持續十多年，我們在此能不受爭議地陳述事實：這些舉措與言論，只會招來暴力的回應。近來，最大力宣導此舉之危險性的人，並不是反種族歧視或反戰爭激進份子，而是軍方、

情報組織與外交機關有頭有臉的人物。他們認為，只要美國與全伊斯蘭教或全體伊斯蘭教徒開戰，就是送一份大禮給極端分子，讓他們有藉口將針對美國軍人與平民的血腥攻擊合理化。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資深會員丹尼爾·L·拜南（Daniel L. Bynan）曾任參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中九一一聯合調查小組的一員，他表示：「川普的言行，為伊斯蘭聖戰戰士關於文化戰爭的說辭增添可信度。」

伊斯蘭國（ISIS）已稱川普第一次反伊斯蘭教徒的旅遊禁令為「幸運的禁令」，幫助他們招募戰士。伊朗的外交部長發出警告，表示此禁令是「送給極端分子的禮物」。就連川普自己的國家安全顧問 H·R·麥馬斯特中將（H. R. McMaster），也認為川普重複使用「激進伊斯蘭恐怖主義」一詞並無助益，因為恐怖分子「不遵從伊斯蘭教義」。然而這些都沒帶來任何改變，川普似乎堅持想加強「聖戰」的啟示。

「川普不知自己在挑釁」的想法太過荒誕，與他聲稱不知自己的種族歧視言論創造了仇恨犯罪氛圍，同樣不可置信。

戰爭的震撼

政府對恐怖攻擊最致命的過激反應，就是利用恐懼的氣氛發動全面對外戰爭，而敵方究竟

與恐怖攻擊有沒有關係，並不重要。伊拉克不該為九一一事件負責，但它依然被侵略了。

川普最有可能針對的目標是中東，包括（但絕不限於）下列國家：敘利亞、葉門（川普已增加無人機攻擊的次數）、伊拉克（造成許多平民死傷的強力攻擊也不斷增加），以及最危險的伊朗。當然，還有北韓。造訪南北韓之間的非軍事區之後，國務卿提勒森主張：「所有的選項都明擺著了。」關於北韓政權試射飛彈之舉，他刻意拒絕從回應的選項中刪除主動軍事攻擊這一項。接著，川普示威性地宣布立即在朝鮮半島部署美國海軍突擊隊，其中包括兩艘驅逐艦、一艘導彈巡洋艦，與一艘核能航空母艦（令川普政府尷尬的是，有人在數千英里外拍到航空母艦往反方向行駛，準備與澳洲海軍進行聯合演習）。川普還在推特發出敵意滿滿的貼文，表示中國若不介入，「我們就自己解決問題！U.S.A.」與此同時，北韓中央媒體發表了令人汗毛直豎的宣言，表示他們對「美國本土」的核攻擊已有所準備。

川普公開號召人們開啟新的核子「軍備競賽」——從一九八〇年代至今，川普是首次重提軍備競賽的總統。據說他多次問外交政策顧問群，為什麼美國不能直接使用核武，似乎不理解「反擊」這個概念。最支持川普的金主之一——謝爾登·阿德爾森（Sheldon Adelson）——曾表示，美國應該「在沙漠中釋放核彈」威脅伊朗，並表示：「這樣誰也不會受傷……可能就幾條響尾蛇……然後你就說：『看好了！下一顆就會丟在德黑蘭市中心，我們是認真的。』」阿德爾森捐了五百萬美元給川普的就職典禮，是此類捐款中金額最龐大的一筆。

我並不是說核戰很可能發生，但川普才上任不久，軍事情勢惡化到一種令人膽寒又隨意得不可思議的地步。川普早早使用美軍最強非核武器——大型空爆炸彈（Massive Ordnance Air Blast）——之舉顯示，他沉浸於讓世界知道他是老大的快感。因此，曾任蘇聯領袖的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在《時代》雜誌寫道：「核戰威脅再次顯得真實。數年來世界強權的關係惡化，提倡發展軍武的人與軍事工業集團開始摩拳擦掌。」（而且，這還是川普向北韓挑釁前的事。）

川普身邊的人——尤其是直接來自保全、國防產業的眾多官員——認為應製造更激烈的軍事衝突，其中有許多因素。我們從二〇一七年四月，川普對敘利亞發動的飛彈攻擊（他未經國會許可便下令發射飛彈，在部分專家眼裡是非法行為）可以看出，此舉帶給他上任以來最正面的媒體報導，不僅福斯新聞的超級粉絲積極討好川普，就連自由派的主戰人士也好評如潮。同時川普的親信立刻以此次飛彈攻擊為由，斷言白宮與俄羅斯毫無瓜葛。「如果說敘利亞有什麼作用的話，那就是證實我們和俄羅斯沒有關係。」川普三十三歲的兒子艾瑞克接受《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採訪時表示（也許他無意間透露了，他們戲劇化地攻擊敘利亞，動機不僅僅是對「美麗的嬰兒」的同情心）。

埃克森的戰爭

川普政府可能急著利用國家安全危機開啟新戰爭或使現有衝突惡化，還有另一個原因：沒有比戰爭更快、更有效抬高油價的方法，尤其當之中的暴力影響到石油資源，減少世界市場上的石油量。

這方面令人尤為擔憂的是國務卿雷克斯·提勒森與埃克森美孚的關係——只要油價飆漲，埃克森美孚等石油產業霸主就能直接獲利。是的，提勒森已同意脫離公司，並宣布在一年內不參與明確和埃克森美孚有關的決策，但他與這家公司的連結依舊難以抹滅。提勒森不僅一 lifetime 血投注在埃克森，為公司工作了整整四十一年，埃克森美孚還同意支付足足一·八億美元的全套退休金，這筆巨額退休金（考慮到公司在他的帶領下，虧了那麼多錢）很可能在現任國務卿心底埋下感激的種子。（如果一家公司給你一·八億美元退休金，你會怎麼想？）根據能源經濟暨金融分析研究院（Institute of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財務總監湯姆·桑茲洛（Tom Sanzillo）的說法：「你能把這傢伙抽離埃克森，但你不能把埃克森抽離這傢伙的心。」

此外，提勒森雖不參與埃克森美孚表達過明確興趣的基礎建設決策（例如鑰石XL輸油管線的許可），但面對影響油價，可能為公司帶來數十億美元利益的外交政策決策，他卻無法置身事外。畢竟提勒森若不參與相關討論，就必須完全不顧產油區的軍事衝突，或拒絕與石油國

家領導者直接交涉。從他目前為止的行為可看出，提勒森並沒有對此不聞不問的打算。

戰爭與油價的關聯不只是理論；當油價下跌時，委內瑞拉、俄羅斯等極度仰賴石油的國家就會變得不穩定，反之，當奈及利亞或科威特等產油國家內部發生衝突時，市場預期石油供給量下降，價格也會相對應地飆高。（就連川普在四月對敘利亞進行飛彈攻擊，也導致石油價格稍稍上漲。）「油價與鬥爭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關聯性。」漢普郡學院（Hampshire College）研究和平與國際安全的教授麥克·克萊爾（Michael Klare）解釋道。此現象其中一個案例是二〇〇三年美軍侵略伊拉克，致使油價從一開始的每桶三十美元升到二〇〇八年每桶超過一百美元，導致石油公司投資油砂、搶著去北極鑽油。此事也可能在未來重演；一場戰爭若使國有大型油田停產，或顯著削弱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簡稱OPEC）的勢力，大型石油公司便能從中得到高額利潤。埃克森美孚擁有大片油砂保留地，並且在俄羅斯極地有蓄勢待發的鑽油計畫，想必能海撈一筆。

當國際情勢變得如此不穩定時，或許只有佛拉迪米爾·普丁獲得的利益高於石油公司。俄羅斯是個幅員遼闊的石油國，外銷的天然氣量為世界之冠，石油外銷量則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然而油價下跌後，普丁的俄羅斯便陷入經濟困境。過去油價高漲時，俄羅斯大量產出化石燃料自然再好不過——二〇一四年以前，俄羅斯整整五〇%的收入來自石油與天然氣。但油價下跌後，普丁政府忽然少了數千億美元，此經濟災變也對國民造成巨大的衝擊。根據世界銀

行的統計，俄羅斯的實質工資在二〇一五年下滑將近一〇%；俄羅斯的貨幣盧布（ruble）貶值近四〇%；定義為貧困人口的人數從三百萬增加到超過一千九百萬人。普丁雖扮演獨裁強人的角色，但此經濟危機使他在國內的地位搖搖欲墜。

因此許多人推測，俄羅斯不顧風險地參與敘利亞軍事衝突，部分動機是再次提升油價。亞歷山大·特默科（Alexander Temerko）是最大力推廣這個理論的人，他是在烏克蘭出生的右派英國企業家，在石油產業工作。二〇一五年，特默科在《衛報》寫道：

如果中東戰事持續不止，就正中普丁下懷。衝突越嚴重、範圍越廣，石油與天然氣的價格就越可能上漲，幫助普丁重振國內經濟，並使經濟制裁無效化。

普丁的統治體系是利用人民的愛國心與公共精神，因此提升國內生活品質是他的終極目標。他計畫恢復俄羅斯關鍵的石油與天然氣收入，以此收買全國一·四億人口的忠誠心。

（這是過於簡化的說法。普丁投入敘利亞戰事還有其他原因，他希望能進出敘利亞的港口，以及敘利亞的油田、天然氣田。此外，若一國領導者希望能轉移人民的注意力，讓他們不再專注於國內的苦難，戰爭是非常實用的手段。）

另外，我們經常聽說埃克森美孚與俄羅斯國有的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談成了一大筆

交易，準備在北極鑽油——普丁誇耀地表示，此交易替俄羅斯賺了五千億美元。歐巴馬政府針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阻撓了這項交易，但儘管美俄雙方在敘利亞劍拔弩張的氣勢，川普仍有可能解除經濟制裁，允許埃克森美孚進行交易，並為近來狀況不佳的埃克森美孚增加收益。（川普上任後數月，這家公司要求不參與美國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但被拒絕。）

然而，即使川普解除經濟制裁，仍有一個要素阻撓這項計畫：低廉的油價。提勒森是在二〇一一年與俄羅斯石油公司進行交易，當時油價高漲，一桶約一百一十美元。他們第一項任務是到西伯利亞以北的海域探勘，在冰寒環境中尋找難以開採的石油資源。自從油價下跌，包括殼牌與法國道達爾等其他石油公司都退出北極鑽油計畫，其中一個原因是在苦寒環境中鑽油的成本實在太高。（極地鑽油的回本售價是每桶一百美元以上。）所以即使川普解除經濟制裁，若油價遲遲不漲，埃克森美孚與俄羅斯石油公司繼續進行鑽油計畫也沒有意義。換言之，雙方都有充足且多層面的動機，希望石油價格能回升。

所以我們必須清楚地瞭解一件事：川普政府內外的核心人物並不懼怕不穩定、不確定的情勢，很多人反而會歡迎混亂的事態。川普身邊的人從提勒森到梅努欽，各個是混亂好手，而從過去到現在，混亂一直是哄抬油價的一大助力。一旦石油回到一桶八十美元以上的價錢，石油公司又會爭先恐後地開採並燃燒最髒、最不環保的化石燃料，包括融化冰層下的石油資源。油價回升將導致全球石油公司恢復對北極與油砂的興趣，開啟開採高風險、高碳數化石燃料的風

潮。若我們允許此事發生，我們將失去最後一次避免災難性氣候變遷的機會。

所以從這個觀點看來，預防戰爭與預防氣候亂象是一體兩面的抗爭。

經濟震撼

就如川普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反伊斯蘭言行提高了恐怖攻擊發生的機率，我懷疑川普政府中許多人都明白，他們取消金融管制的一系列行動也提升了其他衝擊與災難發生的機率。川普已宣布廢止陶德—佛朗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Dodd-Frank）——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後，最實在的一條金融法規。雖然陶德—佛朗克法不夠嚴格，但少了它，華爾街的泡沫經濟將不受控制，當泡沫消失時，新的經濟衝擊也接踵而來。

川普的團隊知道這個道理，他們只是漠不關心罷了——泡沫市場帶來的利潤實在太過誘人。況且他們知道銀行勢力龐大，即使經濟再度崩潰，銀行也不會完全失能，只會與二〇〇八年一樣被保釋出來。（川普甚至頒布行政命令，要求重新審查陶德—佛朗克法，特別是法案中防止納稅人受這筆「保釋金」所困的規定——當制定行政政策的人盡是前高盛銀行高層時，這是十分不祥的徵兆。）

川普政府想必也有一些人注意到，市場在經過一兩次撼動人心的衝擊後，他們渴望得到的

政策就有機會實施。競選期間，川普為討好選民，承諾絕不動社會安全保險與聯邦醫療保險；但眼見川普的減稅政策即將施行，他多半無法遵守當初的諾言。經濟危機正是川普違背諾言的好藉口。而在他們對大眾稱為「經濟末日」的時期，貝琪·戴弗斯甚至有機會實現她的夢想，以保證書與特許學校完全取代公立學校。

川普一夥人的政策代辦清單無法在一般時期實施。例如新政府剛上臺不久，麥克·彭斯與威斯康辛州長斯考特·沃克（Scott Walker）會面，打聽州長如何於二〇一一年剝奪工會集體交涉的權利。（提示：他以威斯康辛州的財政困境作為掩護；此舉被《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看在眼里，驅使他宣告：「震撼主義正在威斯康辛州全面上映。」）

全局越來越清晰了。在川普政府的第一年，我們不太可能看見他們計畫中的所有經濟暴行，那會在未來不可避免的預算危機與市場震撼之後，才浮出水面。接著，白宮會以拯救政府，也許是拯救全國經濟為由，開始一一實現企業願望清單上的項目。

天氣震撼

我們知道川普的國防與經濟政策必定會製造並加重危機；我們知道川普政府提高化石燃料產量、廢除美國許多環保法規、脫離巴黎協議等動作，將導致更多大規模工業意外——更別提

氣候災害。從二氧化碳被釋放到大氣層，到因其所致的全球暖化，中間有大約十年的遲滯期，所以等到川普政府下臺後我們才會感受到政策對氣候造成的嚴重影響。

話雖如此，我們目前的暖化情形已經相當嚴重，總統不可能安度沒有大型氣候災害的四年任期。川普上任不到兩個月，就必須面對北美大平原的野火——當地牛隻死傷慘重，一名牧場工人甚至稱此事件為「我們的卡崔娜颶風」。

川普似乎對大火沒有興趣，關於此事連一則推特發文也沒有。但是，等超級風暴襲向美國海岸時，我們就能看到這位總統激烈的反應了——因為他知道濱海房地產的價值，因為他只想為頂層1%人口建造建築物。當然，我們擔心的是類似卡崔娜颶風時的詐欺、伊拉克「離奇失蹤的數十億美元」，因為倉促間外包的工程是貪污的良機，而付出代價的往往是災民與勞工。

奢華的災害應對

川普時代最主要的經濟成長，多半會是以富人為對象的災害處理服務——《紐約客》雜誌一則頭條新聞稱之為「超級富豪的末日對策」。在我寫《震撼主義》時，這還是個新興產業，初期幾家公司都沒能撐下去。例如我在書中提到的救援噴射機航空公司（Help Jet），這家曇花一現的航空公司總公司為川普最愛的西棕櫚灘，在未倒閉時，為繳交會員費的富人提供五花八門的

「鍍金」救援服務。

當颶風壓境時，救援噴射機航空公司會派豪華轎車接會員，選擇安全的地點替會員預訂五星級高爾夫度假村或溫泉療養地，然後用私人噴射機載客戶前往度假勝地。「不必排隊、不必人擠人，頂級服務讓您的困擾變成愉快度假。」公司的宣傳資料寫道。「享受不被一般颶風避難過程所擾的感覺。」現在看來，救援噴射機航空公司並沒有誤判市場需求，它不過是領先了時代一步。這年頭，紐約的奢華房地產開始向買家推銷獨家災難服務設施——從緊急照明到自用抽水機到發電機到足足十三英尺的防洪閘門，應有盡有。曼哈頓一幢豪華公寓甚至備有氣密洗衣儲物間，能「潛水艇式」密閉，以防下一場超級颶風珊迪來襲。川普的高爾夫球俱樂部也搭上了這條船，愛爾蘭川普國際高爾夫林克斯球場與酒店（Ireland Trump International Golf Links and Hotel）申請建設一道長二英里、高十三英尺的牆，保護海邊的資產不受上升的海平面與越來越危險的暴風雨襲擊。

最近，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在《紐約客》雜誌刊登一篇報導，指出矽谷與華爾街較認真的高端生存主義者已準備面對氣候災害與社會崩解，他們在堪薩斯州的客製地下避難所購買屬於自己的空間（這些避難所由全副武裝的傭兵保護），並在紐西蘭地勢較高的位置興建避難屋。當然，人們只有乘坐私人噴射機才能到達避難所——這就是終極綠區。

此趨勢最極端的例子，是PayPal億萬富翁、川普的金主兼總統過渡團隊的彼得·泰爾。在

二〇〇八年，泰爾包銷了帕特里·傅利曼（Patri Friedman，米爾頓之孫）合夥成立的海洋家園研究所（Seasteading Institute）。海上家園計畫的目的是讓富人在未來退出國家，進入漂浮於海面、全然獨立的邦國——他們不必擔心海平面上升，也完全可以自給自足。任何不想再納稅、不想再被限制的人，只須——根據此運動的宣言——「用你的船投票」。泰爾近來似乎對此計畫失去了興趣，他表示建造漂浮海面的邦國「不太可行」，但計畫依舊持續進行。

高端生存主義運動令人擔憂的一點是（除了很怪之外），當富人建立自己的逃生機制時，無論富貴貧賤地幫助所有人的災難處理機制就變得較不重要，維持這些救難系統的動力也將越來越少——這正是卡崔娜颶風襲捲紐奧良時造成無謂苦難的原因。（生存主義者戲謔地指稱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愚蠢地期待有意義的救助」——但只有能花錢救助自己的人才笑得出來。）

這種不公平的災難應對結構正以令人驚愕的速度向前奔馳。在加利福尼亞、科羅拉多州等容易發生火警的地區，保險公司經常為少數客戶提供「到府服務」，當野火威脅到這些富人的別墅時，保險公司會派遣私人消防員用阻燃劑噴灑別墅。而在這時，公共領域只有繼續腐蝕下去。

加利福尼亞州的狀況，就是我們未來的縮影。當地的消防主力是多達四千五百人的囚犯，他們冒生命危險與野火搏鬥、進行消防作業時，工資是一小時一美元，待命時則是一天二美元。有些人估算加利福尼亞州利用此機制每年省下十億美元——當你將擲節政策、大規模監禁與氣候變遷混為一體，得到的就是這個結果。

我不熱啊——你會熱嗎？

高端災難預防機制興起，也代表我們經濟上的贏家更沒動機接受政策革新，沒理由防止地球暖化與未來的氣候災害。這也能解釋川普政府竭盡全力加速氣候變遷危機的堅持。

目前為止，圍繞著川普環境退步計畫的爭論，多聚焦於川普身邊兩派人馬的分歧，包括國家環境保護局長史考特·普魯特與川普的一派人積極否定氣候科學，而雷克斯·提勒森、伊凡卡·川普等人則承認人類確實為全球暖化出了一份力。但這不是重點；川普身邊所有人的共通點是，他們深信他們、他們的孩子，甚至是他們整個階級都不會有事，深信他們的財富與人脈能保護他們不受未來的衝擊影響。這些人也許會失去一些海濱資產，但別墅這種東西在山裡蓋一幢新的就行了。

重點不是這些人關於氣候科學的言論，重點是，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對此表示憂慮。氣候變遷初期的災害多發生在貧困區域，居住在地球這些角落的人們不是白人。當富裕的西方國家遭遇災害時，富人花錢買相對安全的門路也越來越多。川普成為總統後不久，共和黨眾議員史提夫·金(Steve King)發表了引起爭議的推特貼文：「我們不能用別人的嬰兒修復自己的文明。」許多方面而言，他的貼文發人深省；共和黨不將氣候變遷當一回事，因為有權有勢的人們顯然認為肩負風險的會是「別人的嬰兒」，而這些嬰兒的價值比不上他們自己的嬰兒。雖然部分共和

黨員不否定氣候變遷，但他們幾乎所有人都不在乎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災難。

共和黨毫不在乎的態度，體現了令人十分不安的趨勢。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今天，我們的上層菁英中一大部分人不僅物理上與眾人隔離，甚至精神上遠離了其餘人類的命運。菁英們（在心靈層面）抽離人類這個物種，因此不但能將迫在眉睫的氣候行動置之不理，還能策畫更具掠奪性的方法，從現今與未來的災難與不穩定之局勢獲利。

我們正全速墜向多年前我在紐奧良與巴格達瞥見的未來，那是一個綠區與紅區壁壘分明的世界，還有專門放置不配合者的黑區。而未來的經濟將朝黑水公司路線發展，私營企業將建造高牆、監視大眾，從私人保全與私有化檢查站獲利。

綠區與紅區的世界

我們的世界正以驚人的速度分割，歐洲、澳洲與北美洲建造了越來越複雜（也越來越私有化）的國境堡壘，將僅求生存難民區隔在外。而難民之所以逃亡，通常是因上述各大陸國家的行為——也許是掠奪性貿易協議、戰爭或因氣候變遷而加劇的生態危機。

人們為「移民危機」憂心忡忡——卻少有人為驅使人民遷移的危機感到憂慮。自二〇一四年至今，約一·三萬人試圖從地中海游到歐洲卻中途溺斃。而抵達歐洲海岸的難民也不保證獲

得安全生活；法國加萊的大型難民營被戲稱「叢林」，在此，我們能看見類似卡崔娜災區的情形，遭遺棄的人們被歸類為「野獸」。二〇一六年底，在川普當選前夕，加萊難民營被剷平了。

但將人心中的絕望視作傳染病的，是澳洲政府。自二〇一二年開始連續五年，搭船接近澳洲海岸的移民皆系統性地在海上被攔截，難民被移送至諾魯（Nauru）與馬努斯（Manus）等偏遠海島的集中營。多方報導指出，集中營的環境無異於酷刑虐待……然而政府只聳聳肩，畢竟負責經營集中營的不是政府，而是私營承包商（不出所料）。

諾魯的集中營環境糟到了極點，在二〇一六年某一週，兩名難民為了讓世人看見他們的痛苦而點火自焚。沒有用。澳洲總理麥肯·滕博爾（Malcolm Turnbull）仍拒絕眾多澳洲人的要求，不歡迎難民進入他們幅員遼闊的國家。「我們不能因為這件事感傷。」他說。滕博爾認為澳洲人民「必須明確地堅持我們的國家意志」。

附帶一提，諾魯是受海平面上升威脅的太平洋小島之一；見家園成為索馬利亞、阿富汗等戰亂國家難民的囚牢，島上的居民很可能也被迫遷徙。我們又瞥見了將至的未來：明日的氣候變遷難民，受僱為今日的獄卒。

噴射機、無人機與船隻

最諷刺的是，今日推動移民的多種衝突已因氣候變遷而惡化。例如在內戰開始之前，敘利亞經歷了歷史紀錄中最嚴重的乾旱——國內遷徙的人口多達一百五十萬。許多被迫搬家的農人遷至邊境的德拉市（Daraa），也就是二〇一一年敘利亞暴動的原點。乾旱並不是造成情勢緊繃的唯一因素，但包括前國務卿約翰·凱瑞（John Kerry）在內的眾多分析師認為，乾旱確實是關鍵因素。

倘若我們在地圖上標記現在衝突最嚴重的區域——從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血腥戰場，到利比亞、葉門、索馬利亞與伊拉克——我們就能清楚看見，這些紛爭不斷的區域，同時也是地球上最炎熱、最乾燥的地區。以色列建築師埃爾·魏茲曼（Eyal Weizman）曾記錄西方國家無人機轟炸的地點，發現了「令人驚愕的巧合」；這些轟擊行動高度集中於年均雨量二百毫米的地區——原本就少得可憐的降雨量，一旦經氣候變遷的干擾，就會引發旱災。換言之，我們轟炸的是地球上最乾燥的地區，也是地球上最不穩定的地區。

十年前，美國軍方透過海軍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發表了直截了當的解釋：「中東地區向來與兩樣自然資源密切相關，一是石油（因為石油資源充沛），二是水（因為水資源匱乏）。」說到中東的石油、水資源與戰爭，我們能從多年來的紀錄看出事態發展之端倪。首

先，西方國家的戰鬥機為當地充沛的石油資源而來，引發暴力與不穩定的局面。接踵而至的是西方國家的無人機，在乾旱與衝突混融時，它們仔細地追蹤當地水資源匱乏的情形。而就如炸彈追隨石油而來，無人機追隨旱災而至——二者身後緊追不放的，就是船隻。這些船上滿載難民，帶他們逃離戰火焚盡的家園，以及地球上最乾燥區域的旱災。

漠視「外人」人性的心理，先前被用以合理化炸彈與無人機攻擊所造成的平民死傷，而這種漠視現在被導向船上的難民（及搭乘巴士、徒步前來的難民）。他們對安全的需求成了「威脅」，他們別無選擇的逃難成了某種侵略。

右翼國族主義、反黑人種族歧視、伊斯蘭恐懼症，以及毫不掩飾的白人至上主義，在過去十年戲劇性地抬頭，而此趨勢與現在的混亂情勢——從噴射機到無人機到船隻到高牆的程序——不可分割。若想將如此誇張的不平等合理化，就必須大力推廣種族階級制度，並編撰故事，告訴眾人那些被鎖在全球綠區之外的人罪有應得。例如川普將墨西哥人抹黑成強暴犯與「壞炸彈客」，將敘利亞難民說成潛伏的恐怖分子，或者加拿大知名的保守派政客凱莉·里奇（Kellie Leitch）提議以「加拿大價值觀」為標準篩選移民，抑或接連數任澳洲總理將恐怖的小島集中營美化為不讓難民葬身大海的「人道」選擇。

在未曾補救過去罪惡的社會——堅持主張蓄奴與盜竊原住民土地不過是光榮歷史上一點小差池的國家——這就是「全球不穩定」的樣貌。畢竟奴隸莊園經濟正是綠區與紅區的體現：奴

隸主在屋裡舉辦舞會，僅僅數步之遙的農園裡卻上演著虐待黑奴的戲碼……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原屬於原住民，之後被暴力奪來的土地，也是北美洲財富的根源。

在過去的工業時代，人們以種族優劣理論將暴力掠奪正當化；而在現今財富與安逸的體系逐漸多方面瓦解之時，這些理論又重新浮出水面。

川普不過是系統瓦解初期的凶惡體現；他並不是唯一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想像之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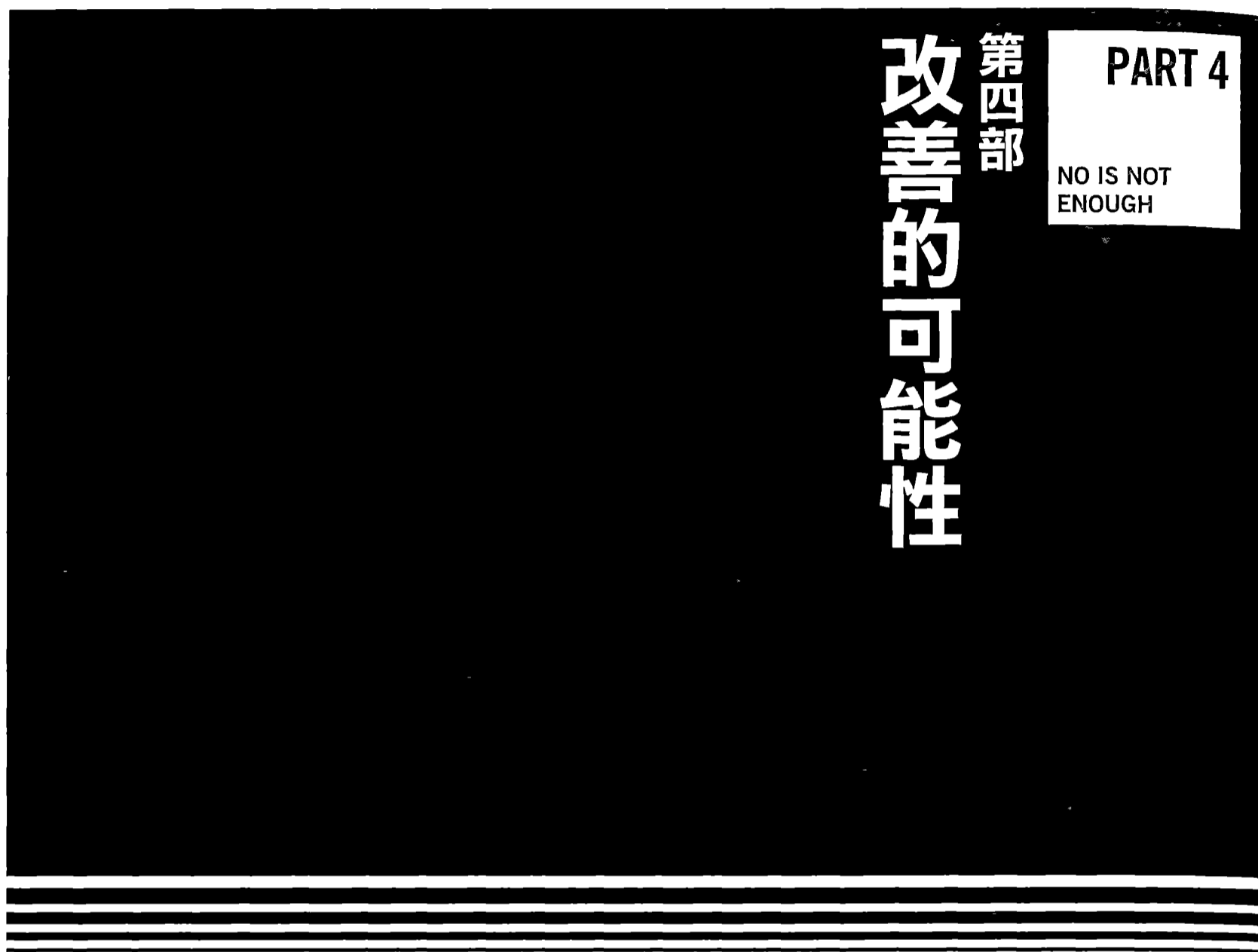
當記者試圖描述伊拉克綠區與紅區，以及居民的特權與安全之巨大差異時，經常使用「科幻」這個詞。那的確是有如科幻故事的差異，少數富人居住在高牆內的城市，享受榮華富貴，而牆外的民眾為生存而互相廝殺——幾乎所有反烏托邦科幻電影都存在類似的情節，從《飢餓遊戲》中奢華的都城與絕望的行政區，到《極樂世界》(Elysium)中近似溫泉療養區的太空站與人口稠密、難以生存的貧民區。這樣的情節深深埋在西方主流宗教中，例如大洪水洗淨世界，唯有被選中的少數人得以從頭來過的宏大故事；例如熊熊大火焚盡異教徒，將正義之人帶到天上一座柵門封鎖的城市。作為人類，我們一起想像了極端的贏家與輸家結局，想了無數次；現在我們最急迫的任務之一，就是學會想像人類故事其他的結局。我們必須學會想像在危急時刻

團結而非分裂，想像拆除分界而非建立更多的壁壘。

為什麼？因為現在這條道路會通向什麼終點，相信我們都心知肚明。它將通往滿是卡崔娜災難的世界，證實我們最恐怖的噩夢。雖然烏托邦科幻的次文化確實存在，主流反烏托邦書籍與電影卻一次又一次想像綠區、紅區分明的未來世界。但是，反烏托邦藝術的目的並非作為時間性導航系統，將我們導向無可避免的絕望未來。這些故事的目的只是警告我們、點醒我們——絕望故事讓我們看見這條危險道路的終點，給我們另覓他徑的機會。

「我們有能力重新開始這個世界。」美國開國元勳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曾在多年前說過這句話，簡潔地總結了逃離過去的梦想——這正是殖民計畫與美國夢的核心理念。可惜事與願違，我們並沒有重新開始的神奇力量，現在沒有，過去也沒有。我們必須生活在我們自己造成的混亂與錯誤之中，並在這顆行星能維持的限制中存活。

但是我們確實有能力改變自己；我們有能力試圖改正過去的錯誤，有能力修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修復我們與我們這顆行星的關係。這方面的努力，就是抵抗震撼的基礎。



她就在天際……我向前兩步，她就向前兩步。

我向前走十步，天際就向前跑十步。

無論我走多遠，我永遠不可能到達她身邊。

烏托邦有什麼用？只有走路的功用。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Eduardo Galeano)

《行走的文字》(Walking Words)，一九九五年

震撼主義反撲之時

在我十七歲時，母親在接連幾次中風後嚴重殘廢，後來發現主因是腦中的腫瘤。第一次中風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她當時比現在的我還年輕，平時有在運動，職業生涯也豐富多姿。原本在騎腳踏車的母親，下一秒就躺在神經科加護病房裡無法行動，甚至連呼吸都需要輔助。

在母親中風之前，我是個叛逆的青少年——在父母面前我沉默孤僻，在朋友面前我行徑瘋狂，對當時的我而言，說謊是家常便飯。我唯一的優點是學業成績優異，但家中生活的氣氛不是緊繃就是更緊繃。

母親的人生永久改變的瞬間，我也永久地改變了。我發現，我知道該如何當一個樂於幫忙的人，甚至是關愛他人的人。我在一夕之間成長了。開顱手術後，母親緩緩地恢復部分行動能



力；我看著她適應殘疾人士的生活，親眼見證了人類發掘自身潛力的過程。

確實，在危急時刻，人們可能會退步，這樣的情況我也親眼見過。在備受震撼時，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被狠狠地撼動了，這時許多人會變得像孩子一樣，被動且太輕易相信那些樂於濫用他人信任的人。然而，從我的家庭處理衝擊事件的過程，我學到人們完全相反的反應。我們可以在危機中進步、成長，並迅速拋開各種垃圾事。

抵抗、記憶，與「不」的極限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社會。當我們面對共同的創傷或共同的威脅，社會能團結一致，抱持著理智與成熟的心理，大膽作為。這樣的事情在過去發生過，目前為止的徵象也告訴我們，相同的事情可能再次發生。

川普政府一次重擊了眾多群體：縮減經費影響到的數千萬人、人權倡議者、藝術家、原住民、移民、氣候科學家……而川普政府在軍事方面的好鬥行為，以及對環境的攻擊，影響範圍遠遠超出美國國界，挑戰了全球穩定性與可居性。川普一夥人顯然與過去許多「震撼醫生」一樣，認為多管齊下的策略能將對手沖得頭暈目眩，使對手四處逃竄，最後令他們過度疲勞、心力交瘁之下選擇放棄。

同樣的閃電戰術在過去屢試不爽，但事實上風險極高。在多方面開啟戰役的策略很危險，若對手沒有放棄，反而會齊心協力對付你。

川普簽署鑰石XL輸油管線的許可證那日，龐卡族（Ponca Nation）的梅卡西·坎普·霍林耐克（Mekasi Camp Horinek）對記者艾琳·布朗（Alleen Brown）說出相似的理論：

我想對總統說聲謝謝，謝謝他做出這麼多糟糕的決定——謝謝他任用糟糕的閣員，謝謝他喚醒沉睡的巨人。未曾替自己出聲的人，未曾被大眾聽見的人、未曾冒險站出來的人，現在都義憤填膺。我想感謝川普總統，謝謝他的偏執、他的性別歧視，謝謝他讓我們全國人民站起來，一起奮鬥。

阿根廷說「不」之時

震撼策略的前提是大眾受迅速發展的勢態影響而思緒紊亂，因此當人們清楚記得過去的恐慌與創傷，記得掌權者利用這些情緒破壞民主規則，震撼策略便會猛然反撲。人們的記憶就如同緩衝器，提供共同的參照標準，並允許大眾看清眼下的局勢後全力反抗。

這是我在十五年前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學到的教訓，也是我當時瞥見的另一種未來。在

二〇〇一年末至二〇〇二年初，阿根廷陷入極其嚴重的經濟危機，其嚴重程度震驚了全世界。

在一九九〇年代，阿根廷開始迅速且徹底的企業全球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視其為模範生。國際銀行、連鎖飯店與美國速食連鎖店等人盡皆知的商標，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天際線閃閃發光，而市內新開張的購物中心之時尚與奢華程度堪比巴黎。《時代》雜誌在封面上，以「奇蹟」一詞讚美阿根廷的經濟。

然而，這一切都崩解了。阿根廷政府因債務危機，試圖訂定全新的摺節經濟政策，國內閃閃發亮的國際銀行不得不封閉門窗，避免客戶衝進去提取他們一生的積蓄。抗議行動擴散至全國；在郊區，歐洲連鎖超市被人打劫。在如此混亂的情勢下，當時的阿根廷總統費爾南多·德拉魯阿（Fernando de la Rúa）上了電視，滿頭大汗地宣布國家被「秩序的敵人，想散播混亂與暴力的人」攻擊。他下令全國進入為期三十天的戒嚴狀態——他能藉機暫時忤逆憲法，停用新聞自由等權利——並命令所有人待在家中。

對許多阿根廷人而言，總統的話語隱含軍事政變的意味——而這就是總統致命的錯誤。無論是老是少，阿根廷人都知道一九七六年殘酷的軍事政變，也知道過去的藉口就是恢復秩序、制伏內部敵人。獨裁軍政府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失去執政權，執政期間奪走了約三萬條人命。

德拉魯阿在電視上禁止國民出門的同時，決意不再讓軍政府奪權的數萬人湧入布宜諾斯艾利斯著名的五月廣場（Plaza de Mayo），許多人用湯匙與叉子敲響鍋碗瓢盆，以無言卻又震耳欲

聾的聲響違抗總統命令。阿根廷人不會為所謂的秩序放棄基本自由；他們再也不會捨棄自己的自由。

然後集結的人們找到了聲音，一聲反叛的呼聲響徹由老婆婆與高中生、機車快遞與失業工廠作業員組成的人群。他們向每一個政客、每一個銀行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每一個自稱能為阿根廷帶來繁榮與穩定生活的「專家」發出吶喊：「¡Que se vayan todos!」——所有人都得走！與警方發生衝突後，全國喪命的示威者超過二十人，但民眾堅持在街頭抗議。總統被迫在騷亂中解除戒嚴狀態，並搭乘直升機逃離總統府。新總統上任時，人們抱持深深的厭惡一次又一次否決他們，在三週內換了三個總統。

與此同時，在阿根廷民主的殘骸中，一件怪異卻又奇妙的事情逐漸發生：人們將頭探出他們的公寓與住宅，在缺乏政治領袖或穩定政府的情況下，鄰居開始互相溝通。人們開始一起思考。一個月後，光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區便出現了約二百五十個「asambleas barriales」（大大小小的社區集會）。這是無處不在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人們在街道、公園與廣場上集會，他們計畫、他們爭執、他們表明事情，直到深夜。人們為大小議題投票，從阿根廷是否該償還國外的債務，到下一場抗議行動的時間，到如何支持一群將工廠變為民主合作社的勞工。

最初，許多集會不僅是政治會議，更是小組治療。參與者分享他們的經歷，說出自己在一座一千三百萬人口的城市中感受到的孤獨。學者與店主為先前沒照顧彼此而道歉，公關經理承

認自己過去鄙視失業的工廠員工，他們曾認為失業者活該，卻未曾想過同樣的危機會觸及都會中產階級的銀行帳戶。當人們為當時的過錯道歉時，早在獨裁政府時期的事件也在人們聲淚俱下的告解中浮現。我親眼看見一名家庭主婦當眾起立，坦承在三十年前，當她聽到別人的父兄被軍政府綁架時，她學會對他人的苦痛封閉心靈，並告訴自己：「Por algo será」——一定是有什麼原因。人們聚在一起，試圖理解他們過去為何失去了那麼多，也建立新的人際關係，避免重蹈覆轍。

他們自下而上改變了阿根廷。

當然，阿根廷人民起義所致的政治改變，並沒有創造出烏托邦。最終恢復民主制度的政府先是由內斯托爾·基西納(Néstor Kirchner)為首，接著由其妻克里斯蒂娜(Cristina)領導；他們善於體察民意，執政時恰到好處地體現了人民的精神、實現了人民部分的要求，因此(雖醜聞不斷)得以掌權超過十年。時至今日，人們依然為過去獨一無二的政治時機爭論不休，倘若人民運動預先準備好自己的奪權策略，他們是否能以不同的方式統治阿根廷，是否能做到更多？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在反抗德拉魯阿的摶節計畫、違反他禁止人民出門的意旨之過程中，阿根廷人民避免了數年的經濟危難，拯救了自己。

西班牙說「不」之時

在數年後的西班牙，我們再次見證歷史與記憶扮演緩衝器的角色。在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一日，十顆炸彈炸爛了馬德里的通勤火車與車站，死亡人數近兩百。由於攻擊事件發生在馬德里人人使用的大眾運輸系統，「任何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的恐慌迅速在全市蔓延，十年後巴黎遭一連串恐怖攻擊的情形相似。

正式的調查結果顯示，犯下恐怖攻擊的團體從蓋達組織（al Qaeda）獲得靈感，據說動機是報復西班牙參與美國主導的伊拉克戰事。然而當時的西班牙首相何塞·瑪麗亞·阿茲納（Jose María Aznar）卻立即上電視煽動西班牙人民，將過錯推給巴斯克民族（Basque）的獨立派人士，並前言不對後語地呼籲民眾支持他（不受歡迎）的決策——加入伊拉克戰爭的決策。「這些殺手一次次在西班牙散播死亡，我們不可能和他們談判，也不希望和他們談判。唯有毫不動搖的態度才能結束這些攻擊。」阿茲納表示。

在經歷九一一攻擊後的美國，包括媒體在內，許多人將小布希與迪克·錢尼「如果你不支持我們，你就是支持恐怖分子」的言論視為強而有力的領導手段；人們賦予政府巨大的新權力，開啟永不停息的「反恐戰爭」。「在二〇一六年一場失敗的政變過後，土耳其的獨裁總統雷傑普·塔伊普·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動作更加了得，他在公民投票中獲得勢不可擋的新

權。」但是，當阿茲納試圖在哀悼中的西班牙施行類似的策略，人們卻沒有將之視為強大的領導能力，反而認為這是法西斯主義復甦的恐怖徵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聲音仍迴蕩在我們耳邊。」著名馬德里報社編輯何塞·安東尼歐·馬堤耐茲·索萊爾（José Antonio Martínez Soler）表示。過去，西班牙在佛朗哥的獨裁統治下度過了二十六年，索萊爾是當時受迫害的人之一。「阿茲納的一舉一動、一字一句都告訴人民，他是對的，他是真相的主人，任何人只要與他意見不同，就是他的敵人。」

西班牙人民回想起了恐怖統治的時代，於是在接下來的兩天，大量民眾湧上街頭，對恐懼與恐怖主義說「不」——也對政府的謊言與伊拉克戰爭說「不」。這一切發生在全國選舉前夕，選民趁機打敗阿茲納，投給承諾退出伊拉克戰事的政黨。西班牙人記憶中的震撼，給了他們抗拒新衝擊的力量。

九一一事件，與官方健忘的危險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當兩架飛機墜毀在紐約世貿大樓，一架撞上五角大廈時，這個國家缺乏西班牙與阿根廷的創傷經歷。當然，美國歷史上也存在多次創傷；美國就是在國內的國家恐怖主義（state terror）下誕生，從屠殺原住民到蓄奴經濟到私刑與大規模監禁，創傷從古至

今都存在。此外，震撼與危機經常伴隨濫用權力者出現。在南北戰爭結束後，政府違反了賠償重獲自由的黑奴、重新分配土地的承諾。接下來，一八七三年的金融危機——又稱「大恐慌」(Great Panic)——更「確立」了經濟太過破敗、國家太過分裂等藉口，南方被解放的黑奴不僅沒有得到經濟補償，反而遭受當局的恐怖統治。在一九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Great Depression)時期，多達二百萬名墨西哥人與墨西哥裔美國人遭驅逐出境。珍珠港事變後，約十二萬名日裔美國人(其中三分之二都是美國出生的公民)被囚禁在拘留營，而加拿大幾乎所有日裔公民都被集中監禁。

所以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問題不是美國沒經歷過類似事件，不記得震撼被用以攻擊民主與人權的教訓；問題是，只有深受影響的群體明確理解過去的創傷，其餘人民對這些事件的理解有限。過去的傷痛並不是所有美國人共同的經驗，美國人民無法藉此區別「合理安全規定」與「領導者利用恐懼心理趁虛而入」。

這是布希政府得以毫不留情地利用九一一創傷與震撼，攻擊國內的民權，並發動海外戰爭的原因；我們現在知道，這些行動都經偽造的情報正當化。這也是卡崔娜颶風過境後政府的疏忽與暴力，在紐奧良非裔美國人眼中並不稀奇——卻令眾多白人震驚不已的原因。

同樣地，川普勝選時驚愕的人與毫不意外的群體，也存在相似的種族分布。

抵抗震撼的美國

但川普上任後，我們逐漸看清一件事：對於九一一事件後執政者操弄恐懼的手法，人們記憶猶新。川普及其支持者雖竭盡全力利用人們的恐懼——對伊斯蘭教徒、對墨西哥人、對暴力「貧民窟」的恐懼——控制並分裂人民，此一手法卻不斷造成反效果。川普當選後，無數人首次參與了政治行動與集會，積極與川普所謂的「外人」團結一致。

一切在新政府上任的第一天就開始了。川普的就職典禮舉行時，代表各運動的小團體——從氣候正義到黑人生命平權運動——紛紛聚集在街口，阻擋前往會場的道路。隔天則是女性大遊行，約六百座城市共襄盛舉，四百二十萬人上街頭遊行，可說是美國史上規模最大的聯合抗議行動。雖然幫忙組織與運籌的是大型女權組織與知名女權倡議者，最原始的觀念卻是夏威夷一名退休律師與祖母發想出來的；當時她對臉書上數十位朋友說：「我覺得我們應該上街遊行。」

我也與家人朋友一同上華府的街頭遊行，令我驚訝的是，街上人潮雖主要是女性，參與這項行動的男性卻也有數萬人，他們為了伴侶、母親、姊妹、女兒與朋友的權利站了出來。有些人一開始可能認為他們是為女性的身體自主權與平等工作待遇抗議，但他們很快地發現，在我們的新時代裡，女權不只這些。女權還包含黑人女性不受警察暴力迫害的權利，包含移民女性

不害怕被驅逐出境的權利，包含跨性別女性不被厭惡與騷擾的權利。此次遊行的宗旨：「這場遊行是統整我們的社會、建立新的關係，並自下而上地改變社會的第一步。」

當政府或政府煽動的仇恨犯罪針對特定族群時，我們也能看見同樣的團結精神。川普第一次頒布伊斯蘭教徒旅遊禁令後，人民全新的激進態度表露無遺，無論信仰的數萬人湧上街頭與機場，大聲說「我們都是伊斯蘭教徒」、「放他們進來」。

其中一個受旅遊禁令限制的國家是葉門。在紐約，葉門裔美国家庭——經營紐約市許多家雜貨店（當地稱「酒倉」(bodega)）的家庭——迅速組織了行動。這個族群平時並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也沒有大型集團或工會，但他們在數日內開始了紐約市首次的「酒倉罷工」。超過一千家雜貨店暫停營業，一些店主在戶外進行伊斯蘭教的禱告儀式，數千名親友與顧客也前來支持他們。

對抗分而治之手段時，宗教團體特別積極。當聖路易與費城的猶太墓園遭人蓄意破壞時，伊斯蘭團體為幫忙重修墓園，募捐了超過十六萬美元——目標金額的八倍。二〇一七年一月，當一名白人國族主義者在魁北克一座清真寺槍擊伊斯蘭教徒，導致六死十九傷，全省、全加拿大掀起了強烈的反應。從溫哥華到多倫多到伊魁特，人們舉辦了數十場追悼會與守夜活動，許多場活動辦在清真寺外。

在恐懼與分歧的氣氛中，我們也能以小小的行動展現所有人共有的人性。川普的支持者展

開了惡毒的網路戰事，他們攻擊巴勒斯坦裔美國人與華府女性大遊行籌畫者之一琳達·沙索爾（Linda Sarsour），將她抹黑成恐怖主義支持者與反猶太主義者。類似的謊言攻擊在九一一事件後毀了許多人的生活與事業，但這回，卻不起效用。「我支持琳達」(#IStandWithLinda)的反抗活動幾乎立即反擊，支持琳達的聲勢之浩大，抹黑她的言論幾乎被完全消滅。當移民署逮捕了二十四歲的丹尼爾·拉米雷斯·梅迪納（Daniel Ramirez Medina）——他幼時與父母從墨西哥移民至美國——行動派人士發起了運動，在梅迪納被拘押超過六週後，他被放出華盛頓州的拘留所。

在更大範圍的層面上，數百座城市、郡縣（以及學校、大學、教會與餐廳）紛紛站出來支持川普政府想驅逐的移民，成為移民的「庇護所」。庇護運動早在二〇一六年大選前就開始了，最初的理念是，當人們連成一氣時，就能防止移民被驅逐出境。但也有許多人指出，這樣的行動通常無法阻止警方與邊境執法人員突襲檢查、拆散移民家庭。所以在大選後三個月內透過網路募資近八千萬美元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組織了倡議行動，對各州政府與市政府施壓，推行九條基本政策以保護移民不受川普政府的傷害。不到一個月，超過一千個社區也開始對當地執法機關施壓推行這些措施。（不得不提的是，有些人批評這些要求還不夠完善。）

當仇外思想日益壯大，許多強調公民與移民相互依賴關係的行動也開始出現。在二〇一七年二月，不同城市、不同產業的勞工參加了「全美無移民日」(Day Without Immigrants)活動，顯

現出美國經濟多麼依賴川普亟欲踹出國的移民。當日活動的籌辦人之一對記者表示：「我們想確保大家明白，如果我們不建造、不烹飪、不清潔，這座城市就會停轉。」（俄克拉荷馬州十二名餐廳員工因參與此活動而失去工作，附近至少家間餐廳立即表示願意給他們工作。）

現實的報復

川普時代的另一特點，就是對事實的戰爭。他們不僅將媒體醜化為全民公敵，甚至移除政府官方網站上的科學資訊，政府官員也不再透過正式的通訊管道談論氣候變遷之議題。作為回應，許多創意的倡議行動為守護客觀事實而萌生。川普就職後數日，惡地國家公園（Badlands National Park）的推特帳號首先違逆政府反科學的舉措，在推特發表海洋酸化與二氧化碳濃度等事實。貼文在發出後不久便被撤下，卻已引發了推特帳號違抗上命的趨勢。

關鍵的科學資訊自政府網站離奇失蹤，國際社會不約而同地試圖拯救這些資訊。川普當選後不久，舊金山的數位圖書館「網際網路檔案館」（Internet Archive）宣布了在加拿大找備用伺服器，保存美國資料的計畫（這個非營利組織過去二十年來致力於保存網路上的資訊，供大眾使用，並已保存數十億個網頁）。川普就職前數日，「數據救援」活動在數座城市中舉行，研究人員與關心此事的義工碰面，協力儲存環境保護局與其他政府網站的資料。而在二〇一七年二月，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舉辦的「黑客松」(hackathon)吸引了二百名數據守護者，前來保存能源部與太空總署等公共機關的地球科學資料。

平時，科學家甚少參加政治行動，因為提倡自己研究領域的議題，可能被視為科學研究中的成見。他們謹慎的心態不難理解，但面對川普政府公然抨擊科學事實，以及政府壓抑不合意之科學研究的赤裸意圖，許多科學家得到了「不得不站出來」的結論。著名靈長類動物學家珍·古德(Jane Goodall)稱攻擊科學的行動為警醒科學界的「號角聲」。

因此，在二〇一七年世界地球日，數萬名科學家參與了華府「為科學遊行」的活動，而芝加哥與洛杉磯的科學遊行參與人數多達四萬人——這些還只是美國與其他六十八國共超過六百場遊行中規模較大的幾場。「如果我們不能公開討論事實，」一位史丹佛大學生物學家對《衛報》表示，「那基於公開討論、基於對社會真相之信任的民主，又該如何存活？所以，我們要遊行。」（這些科學家喊道：「我們要什麼？有證據的研究。我們什麼時候要它？同儕審查之後。」）僅僅一週後，一個炎熱的日子，我們數十萬人聚集在華府的街頭（這次同樣有數百場遊行在其他城市進行），一同走在「氣候、工作與正義」的旗幟下。這回，我們的要求不僅是政府尊重科學，我們要科學成為改變的基礎，帶動大膽且急迫的經濟與社會轉型。

在這波初期反抗行動中，值得注意的是，區別一個人是不是「激進分子」、是不是「組織者」的界線完全消失，從未組織政治活動的人們開始籌畫大型活動。眾人發現，無論他們的專長在何處，無論他們是律師或餐廳員工，在逐漸集結的反抗勢力中，每個人都有每個人關鍵的角色、關鍵的用武之地。無論他們住在哪裡、做什麼工作，無論他們在工廠或酒倉或律師事務所或家裡工作，每個人都有能力加入群體，反抗這個危險的系統。

與此同時，我們之中許多人發覺，我們若希望響應此時此刻的重大危機，就需要我們現在缺乏的技術與知識——也許是歷史，也許是如何改變政治體系，甚至是如何改變自己的知識。所以，除了高可見度的運動與示威之外，民眾教育也忽然興起。對許多人而言，第一步就是重新學會「民主」的運作方式。當哈佛研究生宣布開授線上、人對人的「反抗學校」(Resistance School)，希望將「我們在聯邦、州與地方層面反擊行動所需的工具」授予組織活動的新手時，美國五十州共超過五萬人報名。

川普當選後的時日，幾位前民主黨國會職員編寫了一份二十四頁Google文件，將過去茶黨(Tea Party)一區一區挑戰歐巴馬計畫時他們學到的教訓，濃縮後寫下來。他們稱之為「不可分割指南」(Indivisible Guide)。川普當政的前一百日，超過七千個「不可分割」分會陸續誕生——

成員多半不是身經百戰的激進分子，而是學校老師與退休人員，他們氣不過自己選的民意代表幫助川普執行計畫，於是加入反抗勢力。「不可分割指南」不只是直截了當地說明如何自下而上地行民主制，根據維吉尼亞州一名「不可分割」成員兼組織者新手的說法，它與隨之出現的激進行動提供的，「不僅是政治群體，而是關心你、照顧你的群體，人們對這個脫軌的系統抱持相同的公民責任感，因此聚集在一起」。

除此之外，白人越來越積極挑戰我們內心、我們社會上、我們家庭中的種族偏見。「為種族平等發聲」(Showing Up for Racial Justice)等團體發現，人們對團體提供的訓練與工作坊越來越感興趣。紐約阿拉伯裔美國人協會(Arab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ew York)與其他相似的團體舉辦的訓練課程人滿為患，人們積極參與課程，學習有效介入仇恨犯罪與種族歧視之騷擾的方法。

在政府準備縮減婦女庇護所、計畫生育、對婦女暴力行為等計畫的同時，基層民眾以募款回應。根據美國計畫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的紀錄，選舉後一個月內出現了驚人的二十六萬名捐贈者，其中將近四分之一的捐款都在麥克·彭斯的名義下(競選期間，副總統曾表示希望將贊成墮胎的里程碑——最高法院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送入歷史的灰燼堆」)。

這些團結的表現反映了人們在數十年的政治「分離」後，逐漸意識到我們唯有互相配合才可能擊敗川普——沒有任何社會運動能獨自取勝。訣竅是團結一致，展現出過去未曾有過的

配合。因此超過五十個提倡不同議題的革新團體，在川普的內閣聽證會開始時宣言「聯合反抗」——他們公開承諾「以行動支持彼此，為彼此負責，並在街頭、在權力的廳堂上、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團結一致。當別人攻擊我們其中一員，就是對我們所有人的攻擊。」

我們也沒有將願景限縮於任一領域的餘地；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在華府女性大遊行中演講時，她以此收尾：「接下來一四五九天，會是川普政府執政的一四五九天，也會是反抗的一四五九天。我們會在基礎層面反抗，在課堂上反抗，在工作場合反抗，在我們的藝術、我們的音樂中反抗。這不過是一個開端；最獨特的艾拉·貝克（Ella Baker）曾說：『我們信仰自由的人，在自由來臨前不能停歇。』」

拒絕被川普霸凌的運動擴散至美國以外的區域，散布到北美洲各個角落。當川普推出伊斯蘭教徒旅遊禁令時，由伊斯蘭教徒與移民權益團體領導的數千名加拿大人立即展開行動，要求加拿大政府提供安全的避風港，收留美國拒於門外的移民與難民。自美國徒步逃往加拿大的移民越來越多，他們在天寒地凍的環境中逃難（手指與腳趾凍傷、壞死的可怕故事頻頻傳出），加拿大人也發起了歡迎這些移民的運動。

加拿大的難民法目前將美國視為「安全」國家，因此不認為難民逃離美國，尋求加拿大的庇護之舉存在正當性。但現在，許多人透過連署與示威行動對加拿大政府施壓，試圖改變既定

規則。一封法律系教授聯名信指出，川普的行為「反映了國際難民制度應對抗的固執、排外心理與利用本土主義製造恐慌之舉」。

與此同時，在墨西哥，十數座城市中共數萬人抗議川普的移民政策，以及他抹黑墨西哥民族的言論。即使在北美洲以外的地區，人們也開始對政府施壓。在英國，將近二百萬人簽了正式連署，要求政府拒絕讓川普以總統身分參訪英國（據說川普要求乘坐金色的皇家馬車）。因美國違反巴黎氣候協定中減少排放量的承諾，呼籲各國政府對美國實施貿易制裁的國際運動也逐漸起飛。抵制川普品牌的運動也逐漸成長，全球人民開始抵制向川普各大樓租用空間的公司，並對各地開發商施壓，要求它們從各國城市的天際線移除川普的名字。

……以及全球各地

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它自己必須面對的白人國族主義或新法西斯主義運動，我們能從各種徵象看出反抗勢力正在崛起。為回應歐洲激烈的反移民聲浪，歐洲各地舉行了規模壯大的示威活動——從柏林到赫爾辛基——堅持歡迎移民前來歐洲。在巴塞隆納，超過十萬人響應了新市長（原為居住權利倡議者）的號召，高舉「我們歡迎他們」(volem acollir)的旗幟走上街頭。

許多基層組織如雨後春筍地誕生，提供政府沒能給予移民的直接救助。在二〇一五年，當

人數眾多的移民潮進入希臘時，他們遇見的國民已「承受了五年的摶節衝擊療法；希臘人已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生活崩解，眼睜睜看著社會、政治與勞工權益一一消失。」社會學家希歐多洛斯·卡里奧提斯（Theodoros Karayotis）寫道。然而，希臘人並沒有神經兮兮地守著僅剩的事物，反而以「滿溢的團結之心」接納移民。數千名希臘人將難民迎進家門，數百萬頓家中準備的餐食被送至難民營，社區診所提供了免費的醫療服務，一間勞工經營的工廠將倉庫開放給大眾使用，募集衣物、嬰兒食品等生活物資。

而在德國，將移民安置在奇怪地點的提案滿天飛，這些地點包括學校體育館、空辦公大樓、空倉庫、兵營，甚至是納粹過去使用的勞動營。人們組織了「難民版Airbnb」，讓無家可歸的難民家庭暫居當地人家中的空房；同樣的行動已擴散至十三個國家。我的國家也展開了令人驚嘆的難民救助運動，數千名加拿大人資助敘利亞難民家庭，在加拿大的新居民來此第一年期間，以金錢與人際關係為他們負責，幫助難民適應全新的語言、文化與氣候。《紐約時報》將之形容為「全世界最親民的安置計畫」。

更令人雀躍的是，原先人們認為川普的崛起會引發連鎖反應，導致更多極右派人士在各國選舉中獲選，沒想到在一些國家卻起了反效果。各地選民看見了川普政府醜陋的面貌，看見了他們掌權後的所作所為，決定力挽狂瀾。在荷蘭二〇一七年三月選舉前，許多人預期反伊斯蘭又排外的自由黨（Freedom Party），以及自由黨的候選人海爾特·懷爾德斯（Geert Wilders）當選，

結果懷爾德斯的支持率忽然狂跌，原本的執政黨保留了最多席次。此次荷蘭大選中，最大的贏家是綠色左派（GreenLeft party），從之前的四席增至十四席。綠色左派的領袖傑西·克拉韋爾（Jesse Klaver）是摩洛哥裔與印尼裔荷蘭人，競選時主打強烈的反種族歧視主題；在選舉日當天，他給了歐洲面對右翼民粹主義與種族歧視的政治家一點建議：「別想騙過社會大眾。說出自己的主張，不要拐彎抹角。支持難民，支持歐洲……你們可以阻止民粹主義。」

* * *

數月後，許多法國人聽從了他的建議，但最終仍然不夠。為避免極右派的瑪琳·勒朋取勝，許多人以美國柯林頓與川普對決的情況為借鑑，他們不再支持中立派候選人，轉而支持左派民粹主義候選人讓·呂克·梅蘭雄（Jean-Luc Mélenchon）。梅蘭雄提出的政見包括反自由貿易、支持和平，與激進的經濟重新分配計畫，吸引的聽眾多達七萬人，比其他任一候選人還要多。最初只有九%支持率的梅蘭雄，在第一次投票時獲得一九·六%的選票，只差二%就能進入決戰。在最終選戰中，新自由主義的前銀行家埃瑪紐耶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徹底擊潰了瑪琳·勒朋，不過勒朋的極端政黨得票數依然破了紀錄。還有約三分之一的選民為表達對勒朋與馬克宏的不滿，選擇不投票或投廢票。與此同時的西班牙，有社會運動背景的候選人贏得了巴塞隆納與馬德里的市長之位，開始施行歡迎難民、處理街友無家可歸之問題，以及對抗污

染等政策。

「團結」能撐過大規模衝擊嗎？

與九一一事件後分而治之的情況相比，人們現在的反應進步太多了。目前為止，川普的震撼策略沒能使反抗者失去重心，反而喚醒了美國與世界各地的人們。但是我們知道，美國國內新成立的反抗聯盟尚未經大規模安全危機或緊急狀態的考驗。真正的考驗是，當人們被告知他們有生命危險，而且他們聯盟內某個團體可能包庇了上週引爆炸彈的人……這時，勇氣與團結的力量還能維持下去嗎？

現階段建立的許多聯盟有密切連繫，相信這份團結足以對抗緊急狀態下無可避免的恐慌。若川普試圖利用危急事件推行嚴苛的政策，我們逐漸成形的反抗勢力隨時準備站出來，以自己的身軀阻擋他，大聲說：「不——這次不會讓你得逞。」

不能光說「不」

問題來了。面對震撼策略時，說「不」通常還不夠——至少，我們需要更多的行動。這是在《震撼主義》出版後一年，看著華爾街經歷一九二九年華爾街股災後最嚴重的危機時，我學到的教訓。

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顯然是金融界貪得無厭所致，我們都看見了世界各地的政權利用此次危機，也看見了南歐各國政府利用金融危機壓榨平民，逼人民對嚴苛的震撼主義妥協。歐洲人態度頑強且勇敢地反抗這些冷酷的計策（比川普統治下的美國好上許多），他們占據了城市中的廣場並堅持數月，他們組織了全體罷工行動，使城市運轉停滯，有些人甚至為將混蛋踢下臺而舉辦選舉。在歐洲以外的區域也一樣，突尼西亞忽然間高漲的食物價格，催化了一系列的暴動，



這些行動後來被稱為阿拉伯之春。

在當時，一句街頭抗議口號從義大利傳至希臘與西班牙：「我們不會為你的危機買單！」數百萬人都心知肚明，政府就是要求他們買單，他們不得不替銀行家收拾善後，不得不以高漲的物價與低廉的薪資，替銀行家贖罪。眾人明確、大聲地說了：「不。」

然而，在大多數實例中，這並不够——他們沒能阻擋經濟上的懲罰。在某些時候，太過分的擲節政策有可能被街頭抗議擊退；在二〇一二年，魁北克的學生擊退了上漲的學費，在二〇一一年，智利的學生為全面修改殘破不堪的教育系統而奮鬥。儘管如此，他們依然無法完全擊潰擲節的計畫。

更重要的是，這一波抗議與占據廣場的行動，並沒有從根本改變經濟模式，並沒有幫助我們離開這條通往綠區、紅區世界的道路。當我們現今的經濟模式已破綻百出，暴露出自經濟大恐慌以來最大的弱點時，我們沒有全體把握時機，沒有抓緊歷史的方向盤，沒有急轉彎。

這是所有人的責任，我們不能將走在這條路上的罪怪在一個人或一個政黨頭上。儘管如此，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後，由於諸多因素導向的是變形式而非遞增式變化，美國情況最為淒慘。因此，當時的危機值得我們深入探討；這不是為了指責誰，是為了真正瞭解「錯過罕見的政治窗口」是什麼模樣。當我們明白之前失去的事物後，方能在下次經濟衝擊來襲時，避免重蹈覆轍。

讓我們回到二〇〇九年初。巴拉克·歐巴馬作為第一位非裔美國人總統踏入白宮，這是人們在布希八年的統治後，憤懣的回應。歐巴馬輕而易舉地贏得多數選票，接下來兩年，國會也一直在民主黨的掌控下。

歐巴馬的民主派政見也很明確，他將不只稍微更動破敗不堪的經濟。在他上任前的最後三個月，美國人失去了近二百萬份工作，步入二〇〇九年時全國氣氛低迷。攻擊華爾街的思想異常受歡迎（現在仍然如此），因為重創了全球經濟的正是那些大型金融機構，而這些機構也正是害許多人失去家、失去工作、失去一生積蓄的元凶。無人出面為銀行辯駁，銀行經理彷彿避不出戶。競選時，歐巴馬言詞激烈地強調，他會為「大街上辛苦工作、犧牲的人」重建經濟，對抗「華爾街貪婪、不負責任的人」。

除此之外，新政府也承諾對抗氣候變遷。在小布希的八年否定與阻撓後，歐巴馬立誓嚴格規範排碳量，並大力投資再生能源與混合動力汽車，創造五百萬份綠能相關工作。當歐巴馬在民主黨初選中脫穎而出時，他對歡聲雷動的群眾說，這將是海平面上升開始減緩、「地球開始復原」的一刻。好吧，他政見中缺少細節，但這不是普通的選舉，而且我們不能否認，他確實抱持著民主與勇氣。

當銀行下跪

現在回想起來，在民主黨失去國會掌控權之前那短暫的時間窗口，歐巴馬與民主黨手中曾經握有驚人的經濟權力。首先，他們能恣意設計一份重建「大街」的經濟刺激方案——而且做得多大都沒關係。在社會福利經費縮減數十年後，大眾忽然意見一致，認為聯邦政府需要將國內經濟拉出衰退期。這項經濟刺激方案最終成為八千億美元花費，這筆數目雖驚人，在當時卻因「太少」而廣受批評。

歐巴馬為實現重建「大街」的諾言，用了不只這招。當時各家銀行跪地求助，透過政府直接援助與擔保貸款收取了數億美元的公款，在美國、在全球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銀行因貪婪而陷入危機，政府拯救銀行時，該要求銀行給什麼回報呢？該限制銀行高層的薪水嗎？或是恢復經濟大恐慌時期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分離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抑或將造成全球危機的銀行執行長關入監牢？是否該永久將銀行國有化，當作公共信貸營運？也許在今天有些提案顯得太過極端，但我們不能忘記，這些是二〇〇九年實際發生的討論，即使在《金融時報》等較古板的刊物上也有此爭論。大型汽車公司也前往華府求助，三巨頭其中兩家公司——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與克萊斯勒汽車公司（Chrysler）——已在同一年宣告破產，當時在政府的管控下；關於這些汽車公司之命運的討論也沸沸揚揚。

那麼，讓我們先將鏡頭拉遠，看看當時可能的未來……歐巴馬獲選民授權，有能力帶來真正的改變；他有近乎無上限的資金，能設計經濟刺激方案；他有機會對美國經濟逐漸衰退的兩大部分——銀行業與汽車公司——施行必須的革新。

想想看，倘若民主黨把握他們在二〇〇九、二〇一〇年的勢力與機會，以資金援助換取銀行與大型汽車公司的配合，進行認真、實在的重整……若承諾重建大街、解決氣候變遷問題並穩定經濟而當選的歐巴馬，將銀行與汽車產業視為聯合復甦經濟的一部分，又同時與不平等、氣候變遷等議題交戰……。

更具體而言，若當初政府下令讓汽車公司重組，生產電動車、電動公車與輕軌等邁向低碳未來的車，會有什麼結果呢？在金融危機時期，美國失去了二百萬份製造業工作機會，數百家工廠倒閉；如果當初阻止這件事情發生，然後將工廠整修過、更換設備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工廠在政府徵募下加入戰爭補給行列時，也發生過類似的工業變化。

沒錯，這會是項不便宜的計畫，但政府能要求銀行從資助金撥出一部分，專門作為這場工業改革所需的貸款（在真實世界中，銀行將這筆錢積聚了起來）。經濟刺激計畫的經費能以幫助勞工參加訓練課程，讓他們有能力完全投入新工業，在這個國家的綠色經濟體系中，建造大眾運輸、能源網等基礎公共建設。歐巴馬的基礎建設經費確實給予了綠能與綠能計畫重要的支援，但乾淨的未來式大眾運輸與輕軌等基礎建設卻被偷天換日地取代了，我們獲得的是舊時不

環保的高速公路。而資助銀行與汽車公司的同時，政府完全錯失了改革的良機。即使這些公司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敗，華府的態度依舊是：銀行最在行，汽車公司最在行，我們的工作是盡快幫這些產業振作起來，回到原本就稍微扭曲的經營方式。

不是就業革命的就業革命

我們原本能走的道路很重要，因為現在阻擋我們認真改善氣候問題的，是化石燃料公司的說辭：只有我們能提供待遇優良的就業機會，並提供大家所需的能量。歐巴馬與民主黨原本有機會讓這樣的主張永遠消失的。

在同一時期，其他國家確實讓這樣的主張永遠消失了。過去十年來，德國政府將綠色經濟視為重振生產業的主要方法，在過程中創造了四十萬份工作，現在全國能源有二〇％是再生能源；而德國經濟在全歐洲首屈一指。德國的能源改革並不完整——全國對煤炭的依賴依舊過高——而且政府對其他國家施加了摶節計畫，自己卻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儘管如此，倘若美國當初跟隨德國國內經濟的腳步，現在的再生能源經濟將根深蒂固，無論川普簽署多少行政命令也無從改變現況。誰知道呢？綠色經濟帶來的製造業新工作與更好的基礎建設，也許能完全奪走川普勝選的機會。

沒錯，這樣的革新與重整需要一種少見的專注力與堅強，倘若歐巴馬上任後開始革新失敗的銀行、汽車公司與不顧後果的能源產業，他必然會遭遇難以承受的激烈反擊。人們會將他比擬為共產主義者、美國版烏戈·查維茲（Hugo Chavez）。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歐巴馬得到大幅改革的授權、他當選時人們表現出的善意，以及隨之而來的罕見經濟權力，原本能帶來經濟平等、氣候穩定的新時代。

美國錯失了良機，但我們不能只歸咎於民主黨。在歐巴馬任職總統的第一年，大多數革新派組織為布希下臺而鬆一口氣，而且十年來執政黨首次聽取革新派的意見，他們自然很開心——然後混淆了「近水樓臺」與「權力」。結果過去對政府施壓、推動大型政策革新的外部力量，在歐巴馬第一任期間不知所蹤。雖然願意努力的大有人在，但革新派沒有組織聯盟對歐巴馬施壓，沒有要求他善加利用史上獨一無二的時機，沒有要求他帶來更多工作、種族正義、乾淨的空氣、乾淨的水與更好的福利。這是天大的錯誤。偉大（並受人追念的）歷史學家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曾寫道：「真正重要的不是誰坐在白宮裡，而是誰靜坐示威——在街頭、在食堂、在政府機關、在工廠。重要的是誰在抗議，誰占據了辦公室示威；這些才是決定未來的關鍵。」

說到底，我們這些理論家與組織者在二〇〇九年尚未準備好——太多人乾等著上層帶來改變，待多數人發覺這些變化多麼不足時，機會的窗口已然關閉，茶黨已開始崛起。

回憶躍進的瞬間

震撼主義在一九八〇年代成為常態之前，顯然由金錢方面的貪念與企業違法行為衍生的危機，往往引發迥然不同的反應。這些危機激起了近代史上最重大的幾項革新。

在經南北戰爭洗禮、廢止奴隸制的美國，黑人與其他激進派盟友提出了經濟正義與更多社會權益的訴求。他們獲取了多次重大勝利，包括免費公共教育——不過在學校廢除種族隔離制之前還有一個世紀時間。

一九一一年紐約市三角內衣工廠（Triangle Shirtwaist Company）恐怖的大火奪走了一百四十六名年輕服飾製造業移工的生命，促使數十萬名勞工發起戰鬥——最終導致紐約州勞工法條全面修改、限制加班時數、新童工法規，以及健康、防火等安全規定的革新。

更重要的是，過去是基層人民對一九二九年華爾街股災的共同反應，讓羅斯福新政得以實行。一九三〇年代中期的罷工潮——卡車司機工會暴動、明尼阿波里斯市全民罷工，導致美國西岸停止運轉八十三日的沿岸勞工罷工，以及汽車工廠的弗林特靜坐罷工（Flint sit-down strike）——樹立了工會的權力，並迫使資方與勞方分享更多財富。與此同時，作為對經濟大恐慌時期之苦難的回應，大規模運動紛紛誕生，要求政府全面改善社會安全保險與失業保險等社會福利（非裔美國人與女性大多不包含在這些福利之中）。同一時期，政府施行了限制金融產業

的嚴格法規，企業無法再不受限制地獲得利潤。在工業化世界的每個角落，社會運動造成的壓力，為羅斯福新政等計畫創造出合適的環境。大膽投資基礎公共建設——公共設施、交通運輸、住房供給等——的規模，堪比今日氣候危機所需的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殘骸也成了類似的催化劑。）

在一九六九年，聖巴巴拉市漏油事件致使加州美麗的海灘遭油污污染，對環境而言是堪比華爾街股災的災難。那次震撼帶來了倡議基本改革的聲浪，現在北美洲保護空氣、水與瀕臨絕種生物的嚴格法規，多能追溯到當時人們對漏油事件的憤怒。

在這些事件中，痛苦的危機成了警鐘，人們的反應是通過有意義的法規，創造更公正、更安全的社會——當然，也須大力感謝早在衝擊事件發生前多年便為此準備的組織者。這些改革不完美，也不是全面性革新，卻是直接造就現今社會安全網，以及保護勞工與大眾健康之規範的運動。此外，人們不須透過獨裁主義的花招贏得這些勝利，這些政策廣受選民支持，根本不必在危機的掩蓋下偷偷進行，而是規模龐大的社會運動可以大聲提出的訴求。這是加深民主，而非顛覆民主。

那麼，為什麼這些危機能促使進步，而近年來的災難——卡崔娜颶風、次貸危機、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卻沒能留下革新的公共政策？

當烏托邦伸手援助

我在此舉出一個理論：在深度改革的核心，向來存在宏大夢想與世俗輸贏的相互影響。南北戰爭後與經濟大恐慌時期，勞工家庭獲得的勝利，以及一九六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人權與環境的勝利，不只是人們對危機的反應。這些是在人們放膽構築美好夢想的時期，大眾對危機的反應。人們在公開場合大聲築夢，烏托邦之夢迸出人心。

十九世紀晚期，鍍金時代的罷工者看著社會上層剝削勞工、從中賺取巨額財富，心中燃起了熊熊怒火。當巴黎的勞工奪取城市的統治權，掌權數月，美國罷工者從巴黎公社的行動獲得了靈感。他們夢想成立「合作共同體」——在這樣的世界裡，工作不過是完滿生活的一部分，人人有閒暇時間、有享受天倫之樂的時間、有欣賞或創造藝術的時間。社會主義烏托邦小說——包括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居暢銷排行榜榜首。「此現象與今天大相逕庭，今天暢銷榜上多是經典反烏托邦小說——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1984)、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的《侍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辛克萊·路易斯(Sinclair Lewis)的《不可能在此發生》(*It Can't Happen Here*)——自川普就職後，這些書籍又重新登上暢銷榜」。經濟大恐慌時期的勞工階級組織者不僅精通馬克思(Marx)的思想，還熟知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的理念——杜波依斯希望勞工階級全

員參與社會運動，受盡欺凌的人們集結成一氣，改變不平等的經濟體系。歷史學家羅賓·D·G·凱利（Robin D. G. Kelley）寫道：十九世紀末是激起「黑人主導、雙種族、民主、民粹與激進社會運動」的時期。

民權運動時期，人們奮力抗爭後贏來的勝利也一樣。民權運動超然的夢想——無論是馬丁·路德·金恩演講中所述，或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的願景——創造空間，鼓勵基層組織參與運動，最終取得實質勝利。一九六〇年代晚期到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類似的烏托邦熱潮在反文化動亂中誕生，年輕人開始質疑一切——他們奠定了女權、同性戀與環保方面的基礎。

別忘了，羅斯福總統施行羅斯福新政時，社會上充斥著革新、激進與左派好戰的思想，今天在我們看來太過極端的政策，在當時似乎是避免全面革命的唯一方法。而且在當時，革命並非空談。當專門揭發醜聞的《屠場》（*The Jungle*）作者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在一九三四年競選加利福尼亞州長時，他可說是過去的伯尼·桑德斯。辛克萊提倡左翼版羅斯福新政，他認為解決貧困問題的關鍵，就是由州政府完全負擔勞工合作社的資金。辛克萊最終獲得了近九十萬票，卻沒能當選州長。「如果你從未在歷史課學到此事，那可能不是單純的巧合。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名言指出：「人類對抗權勢的鬥爭，就是記憶對抗遺忘的鬥爭。」」

困在母體世界裡

待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襲來，過去的烏托邦夢想已經萎縮了。許多人知道在面對金融危機時，正確的反應是義憤填膺；他們知道將數兆美元白白贈與銀行、拒絕對造成危機之人提出訴訟，並要求窮人與老年人付出巨大代價，是駭人聽聞的亂象。

但在新自由主義下成長的這幾代人，卻很難想像任何異於現況的世界。這也許與記憶的力量有關。當勞工起義反抗工業時代的壓榨時，許多人還記得過去不同的經濟狀況；而其他人則積極抗爭，守護他們所知的生活——無論是即將被債權人奪走的家族農莊，或即將被工業資本主義擊潰的小規模工匠商店。這些人看過不一樣的世界，因此有能力想像——並爭取——徹底改善的未來。即使是一輩子生活在奴隸制與種族隔離制度下的人，也利用取之不盡的創意（他們經常透過祕密的藝術創作）滋養並呵護他們的自由、自治、民主之夢。普立茲獎得主與小說家朱諾·狄亞茲在二〇一六年選舉過後不久，預言了未來的艱苦時日：

我們之中有些人的祖先曾像畜牲一樣被人豢養、繁殖，這些人能清楚看見未來，因為未來的一部分就是我們的過去。我們也知道，如果我們力抗一切，即使是一無所有——連自己真正的名字都沒有的人，也能改變宇宙。我們的祖先一無所有，但他們做到了；我們擁有的更多，

我們也必須仿效先人。

這份想像的潛力——想像與現今迥異未來的這份潛力——在二〇〇八年第一聲「不」開始傳播至全球之時，就不見了蹤影。西方國家的人民幾乎不記得任何經濟系統。某些文化與族群——尤其是原住民族群——積極傳承了其他生活方式的記憶，這些是不基於土地所有權與無盡的貪念與利潤的生活方式。但缺少記憶傳承之傳統的大多數人，卻發現自己完全困在資本主義的「母體」中——我們可以要求稍微改善現況，但想像一個全然不同的經濟系統卻是難上加難。

因此，近年萌生的社會運動——從歐洲的「廣場運動」到占領華爾街，甚至是埃及的革命——都很清楚地傳達了「不」。他們對銀行家的貪婪、對摶節政策、對埃及的獨裁統治說「不」，但在這個響亮的「不」之後，他們缺了明晰、動人的願景。

在此空缺中，震撼一而再、再而三地襲來。

當前白人至上主義與厭女思想不受限制，全世界的經濟處在崩潰邊緣，殘存的公共領域即將被資本主義吞噬……顯然我們不能光在沙子裡劃清界線，不能光說「不，夠了」。我們須要做到這些，還必須規畫一條可行且激勵人心的道路，走向不同的未來。而且這個未來不能是川普崛起之前的世界（那是造就了川普的世界），它必須是我們從未到過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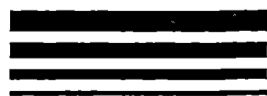
唯有重拾過去激勵了無數卓越社會運動的烏托邦夢想，我們才能想像美好的未來。我們得

拿出勇氣，彩繪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個世界即使只存在我們心中，也能給我們奮鬥、獲勝的動力。因為，就如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於一八九一年所書：「一個不包含烏托邦的世界地圖根本不值得一顧，因為它遺落了人類一直登陸的國家。當人類登陸烏托邦之時，我們將望向遠方，看見更好的國度，然後再度啟航。」

而我們該做的不只是敘述與描寫我們想要的未來——航行的一部分，就是一面前行一面建造那個未來。

這就是我在立石蘇族部落的行動（與禱告、歌聲）中，親眼見證的原則。

立石蘇族部落之鑑：勇敢夢想



川普當選後不到一個月，我來到北達科他州的立石保留區。氣象預報一場大雪將至，在我們抵達目的地之時，雪花已經開始飄落，低緩的山坡與沉重的天空同為雪白。

為阻止建造達科他輸油管的計畫，數千人聚集在立石蘇族部落保留區（Standing Rock Sioux Reservation）外圍；數日前，州長宣布了清除「保水人士」營區的打算。建商堅決想在奧阿希湖（Lake Oahe）——立石蘇族部落的唯一飲用水源——下方建造輸油管線，也計畫在密蘇里河（一千七百萬人的飲用水源）其中一段的下方建造管線。部落領袖堅稱，若輸油管線破裂，立石蘇族部落將失去安全的飲用水，部落的聖地也將被褻瀆。這個部落的拉科塔語（Lakota）抗議口號傳遍了全世界：「Mini Wiconi」——水是生命。

數月來，抗議者與私人保全及全副武裝警方發生數次衝突。在川普即將踏入白宮的時刻，北達科他州長似乎認為能暢行無阻地剷除抗議勢力。這幾個月衝擊不斷——待抗議營地清空時，會有約七百五十人被捕——當時，在我抵達立石之時，它已成為美國近年來最暴力的國家鎮壓現場。州長下令驅逐抗議者之後，許多人將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視為立石蘇族部落的「最後一搏」，包括我在內，眾多人專程前往立石與他們一同奮鬥。

令人訝異的是，超過二千名退伍軍人也來到了立石，準備與蘇族人一同抵抗自己的軍人弟兄。他們表示，自己曾立誓「服務並捍衛」美國憲法，當他們看見和平的原住民保水人士被鎮壓的影像——被警犬攻擊、在氣溫零下時被強力水柱攻擊，還有被橡膠子彈、防狼噴霧與豆袋子彈射擊——這些退伍軍人認為必須站出來對抗過去派他們上戰場的政府，盡保護人民的職責。

在我到場時，營區裡的人數已多達一萬人，眾人住在數以百計的帳篷、印地安圓錐形帳篷與圓頂帳篷中。數十個孩子在雪丘上滑雪橇，主營區充斥著鎮定而不停歇的活力。義工為數千人烹煮、分配食物，從早到晚都有卡車運送新鮮食材過來。年輕媒體人、全球知名的音樂家與好萊塢演員時時刻刻錄製影片，與大批粉絲分享最新的發展，讓人們看見雙方對峙的戲劇性畫面。較大的帳篷與網格拱頂帳篷中，關於殖民地自治化與非暴力抗爭的演講持續不斷。一群鼓手聚集在聖火旁，防止火焰熄滅。

距主營區不遠處，新來的退伍軍人以驚人的速度搭建帳篷；這是他們在阿富汗、伊拉克以

及少數人在越南戰場上練得純熟的技術。我不禁想到，上回與美軍人員長時間相處是在巴格達，當時身穿相同軍服的年輕男女被派駐一個恰巧擁有全球最大量原油礦藏的國家。很多時候，美國軍人被派去保護石油與天然氣財富，並攻擊本土與外國的原住民族；現在，看著這些軍人不帶武器地自願加入原住民抗議行動，阻止污染水資源、使氣候更不穩定的化石燃料計畫，實在令人動容。

我剛到立石時，其中一次談話就是與遠近馳名的拉科塔長老拉唐娜·勇牛阿拉德(LaDonna Brave Bull Allard)。她早在二〇一六年四月便在自己的聖石營地(Sacred Stone Camp)展開了最初的反抗，而八個月後的現在，即使為世界各地前來加入歷史性運動的人們扮演主母與領導者的角色，她依然目光炯炯、毫無疲態地站在這裡。

她告訴我，這個營區已成為數百、數千人的家與部落，也成了戰地醫院——照顧那些被警察攻擊的人，也照顧那些因川普崛起而精神上恐懼不已的人。

從生活中學習

勇牛阿拉德——立石蘇族部落的官方歷史學家——表示，最重要的是，這個營區成了一所學校。原住民族的年輕人能在此更深入連繫自己的文化，他們能在此親近自己的土地、親近傳

統禮節，前來助陣的非原住民人士也發現，這場運動需要我們多數人沒有的技能與知識，因此加入學習的行列。

「有些白人知道的事情非常少，我的孫子都不敢相信。」她不帶批判語氣地笑道。「孫子們常常跑過來說：『婆婆！白人不知道怎麼劈柴耶！我們可以教他們嗎？』我就說：『好，去教他們。』」勇牛阿拉德也耐心地將她所知的基本生存技能傳授給來訪的數百人：如何將鼠尾草製成天然殺菌劑、如何在北達科他州凶暴的暴風雪中保持身體溫暖與乾燥（每人需要最少六層防水布。」她嚴肅地說）。

她告訴我，她在這次行動中理解了一件事：雖然阻止輸油管線很重要，但在眾人集結的運動中，還有更深遠的意義。她說，這個抗議營區已成為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共同生活，與大地和睦相處的地方。對她而言，重要的不僅是實際技能；這場運動讓訪客看見原住民族經數百年種族屠殺、文化撲殺後仍然存活的傳統習俗。勇牛阿拉德對我說，這就是為什麼傳統習俗能留存至今。「我們知道這一天——部落團結的一天——總會到來……我們來這裡是為了保護大地與水源，這就是我們還活著的原因。我們活著就是為了做這件事，幫助人類回答最迫切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再次與大地一同生活，而不是與大地對立？」

她認為，人們應盡快接受這樣的教育，因為氣候已經被擾亂了。如果非原住民族不早點學會照顧地球上維繫生命的系統，我們就完蛋了。勇牛阿拉德懷揣這樣的思想，將抗議營區視為

最開始的運動。她說，等所有人擊敗輸油管線，立石蘇族部落就必須成為綠能與永續發展的楷模。

一場社會運動不僅抵抗某項政策，甚至作為楷模教導眾人前進的路途——這是此抗議行動中許多關鍵人物的理想，其中包括立石蘇族部落會議的寇迪·二熊（Cody Two Bears）。他穿著印有黑色「戰士」字樣的紅色長袖運動衫，敘說歐洲人初到美洲大陸的故事。當時，他的祖先教導這些歐洲訪客如何在嚴酷、陌生的環境生存，「我們教導他們怎麼栽種食物、保溫、蓋長屋。」但歐洲人對土地、對原住民族卻予取予求。二熊表示：「現在，情況又變糟了，所以這片土地的先民必須再次教導這個國家如何生活。我們必須朝綠色能源、再生能源發展，並利用造物主給我們的禮物：太陽和風。我們會從原住民部落開始，讓這個國家學會正確的生活方式。」

守護者的紀元

在立石，我經常思索「守護者」的意義。保水運動的領袖從一開始就堅稱，他們不是蓄意鬧事的「抗議者」，而是決意阻止更多紛爭的「水源守護者」。此外，還有身穿「服務並捍衛」T恤的退伍軍人，他們下定決心信守承諾，並認為自己應守護美洲原住民的權益。然後我又想到我自己身為守護者的職責——面對我們製造的坎坷未來，我必須守護我的兒子、他的朋友，以

及未來的孩子。

在錯誤的人手中，守護者一職可能造成致命的傷害。危急時刻來臨時，一些人從容自適地強勢介入，宣稱能保護人們不受奸邪所侵……而他們要的，「不過是」絕對的權勢與群眾的盲從。但保水營區的守護精神與那個全能父權角色天差地遠，這份守護的力量來自對人類弱點的認知，而且它不是有可能完全失敗的單方面、被動型的守護。這是一份相互的守護之力，它模糊了我們之間所有的界線，因為水源、大地與空氣守護並維持我們所有人的生命——在這些事物（抑或我們？）受威脅時，我們怎麼能不保護它們呢？當這裡的保水人士與坦克及鎮暴警察對峙，大聲念著「Mni Wiconi」時，他們給了這核心理念一道聲音：保護水源，因為水源保護我們。

退伍軍人前來協助，也是受相同的脆弱感、相同的相互守護理念驅使。在十二月五日，歐巴馬政府宣布拒絕授權將輸油管線建在部落的水庫下方。當晚，立石保留區舉行了「寬恕儀式」，數百名退伍軍人排隊乞求長老的寬恕，希望部落原諒軍方數百年來對原住民犯下的罪孽。

組織退伍軍人團至立石的主辦人之一——小韋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 Jr.）——的開場白如下：

我們之中很多人——尤其是我——曾經在過去傷害你們的單位服役。我們來到這裡，和你

們戰鬥，搶走你們的土地，簽了條約之後毀約，偷了你們神聖山丘裡的礦石，在你們神聖的山壁上炸出總統頭像。然後我們搶走更多土地，搶走你們的孩子，還試著……消滅上帝、造物主給你們的語言。我們沒有尊重你們，我們污染了你們的大地，我們用各種方式傷害了你們，但現在我們來到這裡，告訴你們：對不起。

憤怒中的道路

在淚水與焚燒鼠尾草的輕煙中，我們感受到了歷史的指尖，也看見了另一條道路：不靠宣洩來處理憤怒與悲傷的方法。經歷如此分歧、如此粗暴的選舉後，這是偌大的寬慰。過去數週，占據我生命太大部分的螢幕上，充斥著堅決不退讓的憤怒，為了找出誰或什麼是造成現在亂象的元凶，人們爭論不休，卻一直找不到結果。「川普當選是因為美國的種族歧視，就這樣！」一些人說。「才不是，是商業派民主黨員的菁英主義——伯尼當選就能解決一切問題了！」一些人大吼。「不對，他當選是因為資本主義，這是最重要的議題——種族歧視和白人至上主義只是餘興節目而已。」「你們這些愛抱怨的人、愛搞分裂的人都錯了，是身分政治毀了我們。才怪，你們這群混帳，是厭女思想。」「不對，是化石燃料產業，那些人不顧被他們搞得不穩定的地球，硬要在最後榨出大筆利潤。」這之中不乏好觀點，但最明顯的是，人們很少為改變他人的想法、

找到共通點而爭執，反倒是為了在辯論中勝出而爭論不休。

然後，不到幾分鐘，惡意全都枯竭了。這些爭執忽然變得和輸油管線建在飲用水源下方同樣莫名其妙——達科他輸油管原本預計穿過白人居多的俾斯麥市，卻因安全疑慮遭到否決。而在保水營區，所有人齊心協力地對抗地球上最強大的產業，在這樣的情況下誰的議題最重要等爭論都消失了。在立石，我們清楚地知道，這是全面的問題，是整個系統的問題。是殘害環境的資本主義，堅持在密蘇里河下建造輸油管線——「人們的意願、氣候變遷等問題關我屁事。」是灼熱的種族歧視，使得無法在俾斯麥市達成的任務得以在立石進行，種族歧視允許他們將保水人士視為害蟲，允許警方在冰天雪地中用強力水柱驅逐保水者。現代資本主義、白人至上主義與化石燃料，是同一條繩索的三股，無可分割。它們在這塊冰寒的土地上交織、纏繞。

關於這場抗爭，阿尼呀那貝族（Anishinabe）作家與組織者溫諾娜·拉杜克（Winona LaDuke）寫道：「在這一刻，極端商業權利與極端種族歧視，對上了勇氣、祈願與決心。」這是一場沒有邊界的戰役，在全球各地，一些從事神聖工作的人須面對骯髒的戰事，竭力保護脆弱的環境不受工業破壞。根據人權監察機構全球證人（Global Witness）的報告：「在二〇一五年，每週超過三人因力抗破壞性工業，捍衛他們的土地、森林與河流而失去性命……反對破壞環境的群體，越來越常遭公司的私人保全人員、國家勢力與殺手攻擊。」他們估計這些受害人中，約四〇％是原住民。

大選結束後，我一直渴望某種革新派思想家與組織者的集會——我渴望一同謀畫、團結，想辦法度過川普任職總統的四年，渴望選舉當日（或當晚）我在澳洲參與（卻被突然打斷）的會議。在我的想像中，這樣的集會發生在大學的演講廳，沒想到我會在立石找到這樣的空間——但我確實在立石的保水營區找到了。營區中，「反應」與「思索」的組合，以及勇牛阿拉德與其他領袖示範的「行動中學習」精神，正是我渴望的集會。

在立石，即使到了最後，他們也沒能阻止輸油管線的興建計畫——至少，目前沒有。川普大刺刺地背叛了條約與土地所有權，翻轉了歐巴馬的決策，未經立石蘇族部落的同意便允許（武警撐腰的）建商將輸油管線建在奧阿希湖下。在我寫這本書的同時，石油正從部落的飲用水源下方流過，管線隨時可能破裂。此事在法庭尚未辨輸贏，資助此計畫的銀行也受到不少壓力，約八千萬美元已抽離銀行（且金額持續上加）。

儘管如此，石油依然流過管線。

* * *

當時在保水營區，經長達數月的抗爭後，歐巴馬政府終於否決輸油管線建案的消息傳來時——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刻。當時我站在托卡塔·鐵眼（Tokata Iron Eyes）身旁，她十三歲，是立場堅定又活潑可愛的立石蘇族部落成員，當初幫忙開啟反輸油管線運動的創始者之一。我點

開手機的錄影功能，問她對這樣的新聞有何感想。「感覺拿回我的未來了。」她說，說完便潸然淚下，我也跟著落淚。

而現在，因為川普的關係，托卡塔又一次失去了安全感。儘管如此，川普的行為無法抹滅過去數月在立石的深刻體驗、深刻學習；我們建構了反抗的楷模，一方面對眼前將至的威脅說「不」，一方面不辭辛勞地創造出我們想要、需要的「要」之世界。

躍進的時刻：不能再亦步亦趨

「我們不能一直要求會員做出犧牲。他們失去的太多了，他們需要那些輸油管線的工作——我們總得給他們一些東西啊。」

如此哀求的，是一個大型工會的執行委員，這個工會有許多成員在加拿大從事石油與天然氣相關工作。

在場六十人的座位圍成一個大圓，人們邊聽邊不安地挪動身體。他說的是無可辯駁的事實，每個人都有權得到好工作，能源業的勞工也確實深受傷害。

但在場的人們也明白，多建一條輸油管線不只是與環保人士討價還價，而是不可能成功的挑戰——與科學、與化學討價還價。我們不可能一面建造新的化石燃料基礎建設，一面期望氣



溫能停留在安全的範圍。

這時，亞瑟·曼努埃爾（Arthur Manuel）站出來了。這位德高望重的原住民知識分子、前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賽克維派克族酋長（Secwepemc Nation）向前傾身，直視工會領袖雙眼，悄聲說：「你難道以為，只有你們做出了犧牲嗎？你知道我的族人謝絕了石油與天然氣開採公司多少錢、多少工作機會嗎？數千萬美元。」

「我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世界上存在比錢更重要的東西。」

會議室中，所有人屏息不語。這是二〇一五年五月在多倫多一場會議中，其中一次揪心的誠實對白。會議室裡是各方領袖與組織者，從西岸的海達瓜依群島（Haida Gwaii）到東岸的哈利法克斯市（Halifax），皆有各議題與族群之運動的代表人赴會。

我們聚集在此，是為了找出連結眾人危機的中心點，並描繪出完整的未來，同時克服我們眼前互相重疊、交錯的挑戰。這與立石的情況十分相似，越來越多人注意到了這些連結點，也開始提出相關的言論——例如最積極推動國內外戰爭的經濟利益共同體，正是最應該為地球暖化負責的勢力。而工會領袖所說的經濟危險，以及亞瑟·曼努埃爾（他於二〇一七年初突然去世了）提及的原住民土地所有權與大地遭受威脅的問題，也源自同一個地方：一個腐化的價值系統，一個以利潤為優先，不顧人類與地球的價值系統。也是這套系統允許美國政治流程被利慾侵蝕，以致一幫醜聞滿天飛的富豪能掌控白宮。

我們眼前有太多危機搶著要我們花時間處理，現在這些議題之間的連結都水落石出，甚至可說太過明顯。即使如此，我們在支持者的壓力下、渴求運動「獲得關注」的心態作用下、不願顯得太極端而後失敗的恐懼下，許多人學會切斷那些自然的連結，只在壁壘分明的特定「議題」內努力。反摻節政策者很少談論氣候變遷，反氣候變遷者很少談論戰爭或占領。在環保運動中，鮮少有人注意到佛格森市、渥太華等城市中奪走黑人性命的槍枝，以及這些槍枝與上升的海平面、摧毀世界各地黑人與棕色皮膚人種家園的旱災之間的關聯。當有權有勢的男人認為自己能利用與傷害女性的身體時，很少人會將之與人類恣意蹂躪地球的普遍心態畫上等號。

我們面對的眾多問題，都是同一疾病的不同症狀：這是一種支配者心態，它將許多人，甚至地球本身，視為用完即可丟棄的物品。我們之所以集結，是因為我們相信若再不團結、再堅持這樣分裂的思維模式，革新派在各方面就會持續敗戰，只能在這個急需改革的時代為殘餘的事物爭執不休。這些分歧與區隔的思想——該識別我們所面對的系統時，人們猶豫的心理——奪走了我們的潛力，也誤導了眾多人，誘導他們相信我們不可能找到永久的解決方案。

我們之所以集結，也因為我們相信能跨越這些分歧——找出並強化各項議題與運動中的共通點——我們也相信，這是我們最要緊的任務。也許從這些議題的連結點，我們能創造出數十年來最大、最積極的革新聯盟，這個聯盟不僅能挑戰系統的症狀，甚至有可能挑戰失敗的系統本身。我們毫不謙遜的目標，是除了描繪出我們不要的世界之外，也描繪我們想要的世界。

多元的與會者，也引發了不少艱難的對話；但是在過去多次合作失敗、多次失去信用之後，人們終於決定創造共同編織夢想的空間，自然是艱難無比的任務。你以為想像我們要的世界，是一件輕鬆愉快的工作嗎？錯了，這才是最困難的一關，也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我們已經看見川普一夥人在各面向推著世界倒退走，如果想對抗那樣的力量，我們只能靠從各面向推動世界前進的共同願景了。我們組織多面向計畫的實驗在加拿大開始，但這是一場國際性對話——在美國、在英國、在澳洲、在全歐洲、在世界上其他地區，越來越多人得到了相同的結論：是時候聯合組成共同的計畫，直接與擴散至各國的政治毒害對峙。我們不能光說「不」——是時候勇敢、大聲地說「要」，展現超越分界的號召力了。

人民的震撼時刻

自從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我不斷思索一個問題：如果要回應我們面對的危機，該如何做到真正革新的人民運動呢？

我曾經認為氣候科學的發現——若我們能真正瞭解這些問題——能成為催化劑，畢竟沒有比氣候危機更清楚顯現出系統缺陷的跡象了；倘若我們不改變現況，地球上將有越來越多區域不適合人類居住。我們也知道，唯有捨棄圖利企業的經濟劇本，才能有效地處理氣候變遷問

題——這也是眾多右翼理論家堅持否定氣候變遷的主因。所以在我看來，就如華爾街股災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迎來大規模社會改革的時期，關乎人類存亡的氣候危機也該成為百年難得的社經改革良機。

氣候危機的緊迫性質，也給了我們完成大任務的動力：一個由科學佐證、絕不讓步的截止期限。我必須再次聲明，我們沒有時間了。數十年來，我們不停將爛攤子留到未來處理，現在我們已經快沒有未來了——換言之，我們若希望避免災難性的全球暖化，就必須立刻開始大規模經濟與政治改革。

但我們也明白，氣候變遷並不像股市崩盤或戰爭；除了近年來逐漸成為常態的大風暴之外，氣候變遷是一種遲緩的過程，我們很容易下意識地推開這個問題，將氣候危機排到較顯而易見的日常緊急事件之後。因此，二〇一五年春天，我們並不只是為氣候危機參加多倫多的會議，而是為了頭條新聞：油價狂跌。這對埃克森美孚、雷克斯·提勒森與佛拉迪米爾·普丁而言是大問題，而對我們加拿大人來說，因政府將籌碼全押在亞伯達省昂貴的焦油狀原油上，忽然下跌的油價造成了災難性的經濟衝擊。投資者開始逃離油砂區，數萬名勞工失業，而且我們沒有後備方案——無論是創造就業機會或提高政府收入，完全沒有後備方案。

多年來加拿大人聽到的訊息是，我們必須在健康的環境與強健的經濟之間擇一——而現在，我們賠了夫人又折兵。為了得到原油，亞伯達省有大片的森林被砍伐，大片的土地被污染，

原住民土地所有權被卑鄙地背叛……而加拿大經濟卻依然慘遭重創。之所以被重創，是因為我們將籌碼押在價格如雲霄飛車般劇烈起伏、無人能控制的資源上。

因此，我們之中一些人開始討論全國會議的可行性；我們不禁好奇，油價下跌與迫在眉睫的氣候危機相加後，是否能成為催化劑，帶來我們社會與經濟在各方面所需的深層變革。我們開始想像，若我們抓緊各項危機的連接點，是否能推動大幅改善生活品質、縮小貧富差距、創造許多待遇佳的低排碳工作，以及從基礎復甦民主的政策？這將是震撼主義的反面，是「人民的震撼」，是來自底層的震撼。

於是我們寄出一封信，標題是「從價格衝擊到能源變動」，邀請全國各地、各方面的領袖參與為期兩天的圓桌會議，一起大膽建構夢想。接下來，我會分享會議上發生的種種，希望在眾人努力跨越隔閡的今日，能給各位一些幫助。

沒有政黨的政綱

人們應邀赴會了：勞工聯盟與工會領袖、大型綠色團體的理事、知名原住民與女權領袖、各方關鍵組織者與理論家——移民權利、開放技術、糧食安全、居住、信仰等等。我們能在短短數週內集結如此多關鍵人物，反映了我們所有人的認知：這回與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一樣，

是罕見的政治機會。但在這回，人們下定了決心，不會再錯失良機。

另外，為我們這場會議增添急迫性的，是將至的聯邦選舉。由極度贊成石化燃料的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領導的保守黨已掌權十年，但此時國內情勢正在變動，政局也有可能改變。然而，競選活動雖然開始了，卻沒有政黨能提出不同的願景，振奮人心。關於氣候議題，兩個主要的反對黨——賈斯汀·杜魯道奇帶領下的中立自由派，以及立場偏左的新民主黨——都走毫無新意的路線，提議建造新的油砂輸油管線；他們仍沒能誠實地考慮油價崩盤與氣候危機等問題。

所以，在我們集會時，我們決定做一件數十年來加拿大社會運動未曾嘗試過的事情：寫一篇「人民的政綱」，以此干涉全國選舉。這份「人民的政綱」將反映不只某一群體的需求，而是同時反映眾多人的意見。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機會，我們不僅能著手恢復我們與地球之間的關係，更能處理建國以來的殖民與種族創傷。

我們也謹記一件事：導致氣候與經濟不穩定的生活方式，同時也創造了其他危機。這種生活方式造成了焦慮與絕望的流行病，從近年人們對處方用藥的依賴性上升，到居高不下的自殺率，從「路怒」(road rage)到電子產品使用成癮，這些社會現象都反映了此事。所以我們自問：該怎麼建造更快樂、更健康的社會？達到此目標的手段，是否也能讓地球變得更健康呢？

簡而言之，我們設定了極高的目標。從某種生理上的層面來說，這感覺是唯一符合道德的做法。無論他們致力的方向是移民或遊民或原住民土地所有權或氣候問題，對那間會議室裡所
有人而言，這是難得一見的成敗關頭。

我們的目標是想出切合實際又激勵人心的願景，驅使選民做兩件事情：在民意調查中反對當時慘不忍睹的政府，並且將他們的名字加入我們的人民政綱，或以其他管道公開支持這場運動。這是屬於人民的空間，雖然它不屬於政治選舉的體系，人們依然可以看見我們的願景，看見我們希望能反映人民心願的願景，然後說：「要。」

當時我們認為，如果為「人民的政綱」創造足夠的衝力，它便能對我們的民意代表施加壓力。但在那之前，我們必須先寫出人人都認同的條款——而這絕非易事。

連結，而非競爭

那次聚會，有幾項潛規則，也有明訂規則。第一條，不准說「我的危機比你的危機重要」，也不准因氣候危機較急迫、影響範圍較廣，而堅稱它優先於貧窮、種族歧視或其他議題。我們沒有排出議題的優先順序，因為我們的前提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眾多危機互相影響的時代；所有的問題都很急迫，因此我們沒有一一解決的餘地。我們需要綜合性解決方案：大幅降低排碳

量，同時創造非常多有工會保護的工作，並替在現今壓榨勞工的經濟體系下被欺侮或被忽略的人們伸張正義——我們需要能做到以上幾點的解決方案。

還有一條規則是，互相尊重的衝突對我們有益，也是邁向新領域的必經過程。爭執就代表有效！

會議室裡，許多團體和許多人提到，他們過去雖也參加過聯盟，卻都是「不」的聯盟——對圖利企業的糟糕貿易協議說「不」、對嚴苛的擲節政策說「不」、對特別過分的政客說「不」、對輸油管線與天然氣液體壓裂法說「不」。但我們發現，革新進步派已經許久沒有聚集起來提出我們「要」的看法，更別提全面重整的新經濟願景。可想而知，衝突是難免，尤其因我們的集會與所有集會一樣，並不完美，少了一些本該加入討論的人。

當然，會議中也不乏輕鬆愉快的時間，大家滔滔不絕地提出關於「公正改革」的想法。白板上擠滿了人們的建議與問題：

- 免費、高品質的育兒福利。
- 少開車。
- 少工作，多音樂、花園、家庭。
- 超快列車。太陽能馬路。

我們也提出了無法在兩天內解決的問題，這些將是接下來數年的挑戰：

- 如果我們不注重所有權，又怎麼能邁向公平正義？
- 我們該怎麼超脫「我們的所有物是我們的保障」這種思維模式？安全保障來自社會、來自團結。安全保障的基礎是我和別人的連繫有多強，而不是我擁有多少東西。
- 我們該怎麼建造公共領域，讓大眾能感覺自己是它的一部分？我們都應該感覺自己是公共住宅、公共資源的所有者。
- 該如何確保看護、家中工作與土地養護等非正式與無薪工作，能在公正的改革中獲得認可與重視？
- 政府保障的基本工資該是多少？
- 氣候正義與殖民地自治化的關係密不可分，我們該如何補償被壓榨性產業與氣候變遷衝擊的人們？

在數千名難民為尋求安全而逃離家鄉的同時，我們也想到：

- 移民不是看著氣候危機，他們正身處氣候危機之中。

不是政策，而是以價值觀領導眾人

在這為期兩天的會議中，我的任務是仔細聽取各方觀點，抓出共同的主題，然後草擬人民政綱的文字，接下來所有人會有機會修改草案。這是我寫作生涯最艱巨的任務（光是和一個人共同寫作就夠困難了，更別提六十人），但在會議過程中，一些非常明確的共同主題出現了，我也得以綜合多方觀點，草擬人民的政綱。

其中一個重點是，我們現行系統是基於無盡的索取、壓榨與掠奪，我們的經濟體系無限制地壓榨勞工，在越來越短的時限內要求他們付出更多，而僱主給予的則是越來越少的保障、越來越少的工資。我們許多群體都瀕臨相似的極限：數十年來，學校、公園、運輸與其他服務的資源不斷被奪走，當地居民的時間也越來越少，無暇填補空缺。當然，我們所有人都是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我們貪得無厭地取用大地的自然資源，沒有給地球復原的時間，也很少在乎我們排放污染物的地點。我們經常將污染物排入維持生命的水系統，或排入保持氣候平衡的大氣系統。

做了一輩子工的勞工被解僱、移民被無限期監禁在糟糕的拘留所、原住民族的知識與文化被忽視與攻擊——當我們聽到這些故事時，我們知道這個對財富與短利上癮的系統，本質上必須做這些事情。這個系統將人們與地球視為應榨取得一乾二淨的資源，或將之視為眼不見為淨

的垃圾，埋到深海或監獄裡。

而當人們描述他們想要的世界時，「關照」與「照護」等字詞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形成強烈對比。我們希望能照護這片土地、保護地球的生態系統，並互相關照。在我們討論的過程中，這成了涵蓋一切的框架：我們必須從（對地球與彼此）無盡索求的系統，轉換到奠基於互相照顧的文化。我們必須理解，當我們拿取東西時，我們也得付出一些東西、付出一些關懷。這是一個人人受尊重的系統，我們不會視他人或自然界為可拋棄的物品。

「關懷與取得同意，而非強勢壓榨」成為串連整份草案的中心思想；我們必須從尊重原住民知識與權利開始，因為這些人是大地、水系與空氣的原始照護者。雖然在一開始，許多人（包含我在內）以為我們開會是為了擬定政策目標，我們後來發現這些價值觀與道德觀的變化，正是我們希望能描繪的未來地圖。

制度的細節全從這些變化而生。比方說，當我們提到「綠色工作」時，一般會想像一個戴著安全帽的工人架設太陽能電池；這確實是一種綠色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但它並非唯一。看護年長者與病患也不須燃燒太多碳燃料，創造藝術不須燃燒太多碳燃料，教學、托兒所也都是低碳行業。這些主要由女性從事的工作，一般卻不被重視、待遇不佳，而且經常成為政府刪減預算的對象。於是，我們決定刻意延伸「綠色工作」的傳統定義，涵蓋一切有助益、能豐富我們社會，且不須燃燒大量化石燃料的工作。就如一位參與者所言：「看護是再生能源，

教育也是再生能源。」簡而言之，我們試著讓人們看見用「愛的經濟」取代「破壞的經濟」的方法。

紅線

我們盡量觸及所有反映了價值觀變化的議題；這些是人們希望改變的價值觀，從歡迎移民入境，到終結那些迫使我們在「成長」與「環保、創造當地就業機會」之間選擇的貿易協議。然而，我們也決定抗拒誘惑，不列出每一個人的每一項要求。我們強調了連結所有挑戰、所有解答的框架，因為這個框架能延伸到任何實施此願景的地區或社會。

與此同時，會議室中某些團體的要求必須列入政綱。對與會的原住民代表而言，未來的
一大重點是完全施用〈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在沒有原住民族「自由、事前且足夠瞭解的同意下」，任何人都不得在原住民族土地上施工。對氣候激進主義者而言，人們必須同意不再建新化石燃料基礎建設。對工會成員而言，勞工不僅該接受新綠色工作的訓練，更應該成為規畫訓練的民主參與者。」

在會議室許多人心目中，浮現了一條抗拒懷舊之情的鮮明紅線。人民的政綱不能退回過於理想化的回憶，這個國家從過去就依賴盜竊土地、系統性經濟與針對有色人種的社會排斥，絕非人們回憶中的美好國度。我們的靈感來源，必須是我們一同描繪的未來風景。艾蓮·葛柏埃

爾 (Ellen Gabriel)——政綱草案的共同執筆之一，也是魁北克省卡內薩塔科族 (Kanichsata:ke) 的知名原住民權益倡議者——表示，對她而言，這是「人性重生」的過程。是重生，而非復活。

克莉絲汀娜·夏普 (Christina Sharpe)——關於奴隸制對今日社會之影響的《在此之後》(The Wake) 一書作者，也是塔夫茨大學 (Tufts University) 英文教授——最近參加了受人民政綱啟發的會議，提出了關於此事的重要警告：我們的任務是「連繫但不崩解」。這代表，我們可以且必須從眾人迥異的經驗與議題中找尋團結點與共同點，但我們不能將所有議題混合為難以理解、只剩最小公分母的陳腔濫調。在我們一起編織團結的願景時，個別的運動、社會大眾經歷的細節須保存完好，並經常反思。

齊心協力

從某種角度來看，我們對自己提出了問題：人們最有價值的特質是什麼？這些特質包含：慷慨、親切、溫暖與智慧。接著，我們又自問：當這些特質以公眾政策的形式呈現出來時，長什麼模樣？我們發現，這些特質體現的是「開放」。換言之，我們應培育的文化會歡迎需要幫助的人，而不是以恐懼與猜疑看待陌生人；這個文化會尊重長者與他們一生積累的知識，以及加拿大這個年輕的國家誕生前便早已存在的認知。

集會中誕生的組織領袖之一——碧洋卡·姆格尼(Bianca Mugenyi)——提出了此原則在氣候與移民方面的概述：

我們現在看到的移民人潮不過預告了未來。氣候變遷與移民存在著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們在接下來數十年，將看到海平面上升與極端天氣導致全球各地的大規模遷徙。所以，這是我們所有人需面對的問題：我們能否齊心協力？我們認為，大部分的人在聽到這個問題時，都相信我們能齊心合作。在過去一次又一次的危急時刻，我們看見人們協助群體中的同胞，也幫助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但是，我們需要移民、邊境與社會救助系統跟上時代，理解這個概念。「躍進」的重點就是與更好的自己對話。

修復能源

在今天，我們大多數人使用的能源掌握在少數公司手中，這些公司生產能源是為了為股東賺錢。他們的主要目標——他們基於信用的責任——就是創造最大的利潤，因此大部分能源公司都不願轉型到再生能源產業。這時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我們使用的能源掌握在一般人民

手中，而且是透過民主方法控制能源呢？如果我們不僅改變能源，甚至連其所有權也一起改變呢？

我們決定了，即使埃克森美孚或殼牌公司生產再生能源，我們也不想從這些公司購買能源。我們希望這些能源屬於大眾、屬於社會，或屬於能源合作社。如果我們人民能民主地控制能源系統，我們就能將營收用以改善郊區、小鎮與城市的社會福利——幼兒照護、老年照護、社區中心與運輸系統——而不是浪費在雷克斯·提勒森的一·八億美元退休金上面。由社會大眾控制能源的概念，出現在一九八〇年代的丹麥，丹麥政府制定了鼓勵、補助人民合作經營風力發電廠的政策，類似的制度在德國也廣受歡迎。（德國約一半的再生能源設施歸屬於農民、公民團體，與將近九百個能源合作社；在二〇〇〇年的丹麥，全國約八五%的風力發電機皆為農民與合作商店等小人物的所有物。）兩國的情況告訴我們，這種經營模式能為社會帶來非常多好處，而且也可以適應迅速的改革。某些日子，丹麥的風力發電廠能產生遠超過人民所需的電力——於是丹麥人將多餘的能源銷售給德國與瑞典。

這些典範——以及它們創造出來的數十萬個就業機會——激勵了我們，但我們也深受美國的案例鼓舞。在美國，低收入有色人種群體透過氣候正義聯盟（Climate Justice Alliance）等關係網，努力為那些被污染、被忽視得最嚴重的地區爭取權益，讓它們優先接收大規模轉型綠能的好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加拿大看到相同的模式：過去兩百年來，我們對髒能源的依賴對最貧困、最

無助的人造成了最嚴重的衝擊，其中大多數受害者都是原住民與移民。這些人的土地被搶走、因挖礦而污染，這些人的生活空間經常被煉油廠與發電廠污染。所以，我們除了依據德國的典範，提倡「能源民主」之外，也將修復式正義置於能源轉型運動的中心。我們希望原住民與其他前線群體（例如空氣被火力發電廠污染的移民居住區）能優先獲得政府補助，擁有並控制自己的綠能計畫——因計畫而生的工作機會、收益與技能都將留存在群體中。

基於正義的轉型，也代表高碳產業的勞工——其中許多人已將健康葬送在煤礦與煉油廠之中——必須完全投入，以民主方式轉型。我們的引導性原則是：不拋下任一名勞工。

簡而言之，我們計畫在從根本淨化這個國家的同時，利用這歷史性的時機爭取平等。當我們從化石燃料轉型到綠色能源，我們也同時能開始彌補過去對原住民的傷害；我們能大幅降低經濟、種族與性別上的不平等；我們能消除對待移工的雙重標準；我們能在水土矯正與看護等綠色產業創造出許多穩定、待遇佳的工作。當孩子不必呼吸有毒的空氣，就有機會過更健康的生活；我們逐漸老化的社會能得到更健全的社區生活；我們能減少通勤與工作時數，花更多時間陪伴親友。換言之，我們希望能創造更快樂、更均衡的社會；快樂的定義就是脫離品牌商品無止盡的消費循環（脫離幫助唐納·川普崛起的品牌經濟）。我們認為這是個好計畫，甚至大膽希望這份宣言能成為國外多面向聯盟的模範（這很不像加拿大人平常的表現）。

沒錯，我們能拯救自己

我們知道人民政綱將面對重重阻礙，其中最強阻力是節縮的邏輯——我們數十年來不斷收到的資訊是政府瀕臨破產，所以，我們何苦費神去想像一個真正公平的社會呢？我們牢記這點，與一組經濟學家密切合作，計算提升營收、賺錢以施行計畫的方法。

關鍵措施包含：終止化石燃料補助（全球總共約七千七百五十億美元）；制定交易稅，從金融業巨額收益中公平地收取一部分（根據歐洲議會的資料，此舉能為全球政府賺六千五百億美元）；提高化石燃料開採費；提高企業與富人的所得稅（這方面的空間十分充足——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全球頂層1%的億萬富豪能繳納共四百五十億美元所得稅）；累進碳排放稅（已開發國家若每排放一公噸的二氧化碳收五十美元的稅，每年估計能收到四千五百億美元）；減少軍事開支（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的數據，若全球軍事開支最高的前十個國家減少二五%花費，就能挪出三千二百五十億美元）。我們遺憾地發現，我們忘了將「關閉避稅天堂」列入清單，這有可能成為國家最大的收入來源。

數字寫得清清楚楚，這場偉大改革所需的經費近在眼前——我們需要的，是有膽爭取這些經費的政府。

所以，簡而言之，這就是我們的願景——投資那些能實質為我們改善生活品質、創造關懷

的產業，而不是高喊著偽造的「擲節」攻擊這些產業。我們下定決心，準備將正義深植這場改革的所有層面。

《生意的藝術》的相反

當我回顧撰寫政綱草案的過程，我愕然發現這與川普「我要怎麼搞死你」的生意藝術截然相反。我們之中並沒有一個人獲得他想到的一切，也沒有人如此期望；會議中不乏意見相左的時刻，但為了我們的人民政綱，所有人都讓了步，沒有人被排擠。得失往來的過程反映了我們討論中萃取而出的原則與價值：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從無盡索取的社會轉型成關懷與重生的社會，那我們所有人的關係都必須以同樣的互惠、同樣的關懷為基礎——因為，我們最珍貴的資源，就是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而這就是以霸凌換取屈從的對立面。

對「要」說「要」

經過數週推敲琢磨，我們終於完成了人民政綱；最初的與會者中，幾乎所有人都認可了這個版本。（完整版請見本書附錄。）我們也決定了名字：「躍進宣言——迎來關懷地球與彼此的

加拿大〉(The Leap Manifesto—A Call for a Canada Based on Caring for the Earth and One Another)。之所以選擇「躍進」一詞，是為了挑戰中立派的漸進主義並對它豎中指。漸進主義者自稱「謹慎」，但時至今日，氣候危機迫在眉睫，漸進式改變反而危險至極。我們所在的位置與我們必須到達的位置相隔十萬八千里，然而我們餘下的時間太過短促，已經不能亦步亦趨了——我們必須縱身跳躍。

我的伴侶亞維·路易斯(Avi Lewis)也是這份文件的共同執筆者之一，他認為：

在這份〈躍進宣言〉中，計畫的規模等同於危機的規模。我們許多人都鬆了一大口氣——我們終於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承認需要我們改變的事物有多少，我們必須以多快的速度開始革新。〈躍進宣言〉有道理，是因為它不將氣候危機視為該由工程師解決的技術問題，而將之視為系統與經濟哲學的危機。〈躍進宣言〉看透了氣候危機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我們這個時代主流的經濟思想：「開發主義」滋養永無止盡的經濟成長，其根基為不斷壯大的消費主義……我們必須改變的程度高得可怕，但這就是事實。人們心知肚明，這就是我們所需的改變。

公開此文件前，我們請了好些組織與受信任的公眾人物率先簽署它，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對，這是我們要的加拿大。」我們去對政客施壓，別再小心翼翼地保持中立了。全國知名

人物毫不猶豫地支持我們：尼爾·楊(Neil Young)、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他當時還支持我們)。小說家楊·馬泰爾(Yann Martel)寫道：這應該「由這個國家每一位街頭公告員在每一座廣場大聲宣布」。

這是一份難得的文件，就連大型組織也來簽署——綠色和平組織、樂施會、加拿大公務員工會(Canadian Union of Public Employees，全國最大的工會)、加拿大勞工大會(Canadian Labour Congress)的領袖，以及真正由基層民眾組織的團體，例如多倫多黑人生命平權組織(Black Lives Matter - Toronto)、沿岸賽里希族無非法居民運動(No One Is Illegal - Coast Salish Territories)，以及國內最大會員制倡議組織——加拿大公民議會(Council of Canadians)。一開始就認可我們的人包含各政黨支持者，也有不支持任何政黨的人，所有人都相信若主要政黨不提出對應多重危機的計畫，那這項計畫只能由選舉政治體系外的人提出。

〈躍進宣言〉公開後數日，便有數千人簽署此文件，這個數字很快地變成數萬，也有超過兩百個組織為我們背書。我們驚呆了。顯然在數十年對油砂輸油管線、政治與金錢、企業貿易協議、巨額保安帳單等事物的抗爭後，為數甚多的眾人已做好準備，為他們想要的世界集結、奮鬥。人們傾瀉而出的抗爭精神，令我想起當初在阿根廷喧鬧的競選時期聽到的口號：「選票裝不下我們的夢想。」這就是人們簽署〈躍進宣言〉時傳達的想法：是的，我會在這個有缺陷、受限制的選舉系統中投票，但請別誤會，那一票不代表我想看到的世界。〈躍進宣言〉創造出一塊

空間，供人表達選舉系統的不足——歷史走到了這一步，我們發現選舉政治經常無法反映社會大眾的夢想與迫切需求。（但在加拿大、美國與世界各地，最難的一關是將這些夢想放上選票，並盡快提出致勝的策略。）

炸毀箱籠

企業新聞界的反應從困惑（沒有政黨怎麼可能有政綱？為什麼在選舉期間從天而降？）到憤怒皆有，加拿大其中一家全國報紙聲稱〈躍進宣言〉關於「關懷彼此與地球的加拿大」的夢想是「妄語」，另一家報社稱之為「全國自殺」。

我們並不驚訝。我們早知道這項計畫無法放入主流政治討論中「可行」的箱籠；我們非常明確地在〈躍進宣言〉中表達了炸毀箱籠的打算，因為若政治的箱籠容不下人類的安全與存活，那這個箱籠一定是出了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倘若今天政治上的「可行」將注定我們走向氣候災害的明天過後，那我們必須改變政治上何為「可行」，何為「不可行」。

顯然，許多人同意我們的看法。儘管主流新聞媒體發表了疑惑與不解的報導，人們依然源源不絕地簽署文件、請我們提供〈躍進宣言〉的庭院告示牌，並在各自的城市、小鎮、學校與工會中組織當地的分會。人們也不斷將他們的「躍進」宣講會、靜坐與造勢活動的相片寄給我

們，甚至還有受此政綱啟發的歌曲錄音檔。全國民調的結果顯示，中立派與中立偏左的三個政黨——自由黨（Liberals）、新民主黨與綠黨（Green Party）——的支持者中，絕大多數同意〈躍進宣言〉的主要要求，就連加拿大保守黨（Conservatives）也有二〇%支持我們的論點。

最後，加拿大人民沒有選史蒂芬·哈珀當總理。此次選舉最大的輸家是中立偏左的新民主黨，它使用了極其謹慎的競選策略，卻被賈斯汀·杜魯道的左派自由黨擊敗了（自由黨的政見雖缺乏細節，卻有令人眼花撩亂的進步派公關）。在數月前的新民主黨大會，一群年輕代表發動了內部政變：他們說服黨員說，若當初放膽去做就不會輸了，他們也呼籲各代表正式認可〈躍進宣言〉的精神。此項決議通過了——這個大型政黨不僅考慮了外部社會運動編撰的政綱，甚至接納了這份政綱，實屬罕見。

活生生的躍進

在〈躍進宣言〉發表後數月，它成了一項活生生、不斷演進的計畫，不停擴增的支持者全體時時刻刻為它添加新的思想並修正它。我們團隊也與世界各地推行相似實驗的組織者密切合作——從我在川普當選那夜一同開會的澳洲團體，到從〈躍進宣言〉獲得靈感而發表相似宣言的歐洲綠黨聯盟，到北極努納福特（Nunavut）、美國墨西哥灣沿岸地區與布隆克斯區那些探索

如何使政綱之概要適用於當地需求的居民。就連監獄裡也有「躍進者」(Leaper)團體：在康乃狄克州一間臨時拘留所(拘留所專門關押以成人身分受審的青少年)，一群受監禁的學生忙著探索公平改革的可能性，希望能在捨棄化石燃料的過程中幫助其他年輕人遠離監牢。

我們團隊稱「活生生的躍進」運動中，我最喜歡的案例是加拿大郵政工人工會(Canadian Union of Postal Workers)。他們與全世界的郵政工作者無異，近來工作空間不斷遭受停止營業的威脅，限制信件流量、甚至是將公共郵政服務全權賣給聯邦快遞(FedEx)的聲浪不斷襲打他們。換言之，這是一如往常的擲節措施與機構私有化。然而，郵政工作者並沒有在這個有缺陷的邏輯系統下尋找最佳解，而是與「躍進宣言」團隊及公眾事業之友(Friends of Public Services)團隊合作，為全國每一間郵局制定了遠大的計畫——讓郵局成為當地的綠色改革中心。這項「寄送社區能源」(Delivering Community Power)計畫與工會長久推動的郵政銀行計畫，將郵局重新塑造成新穎的二十一世紀網路：附近居民能來郵局為電動車充電；個人與公司能繞過大銀行，從郵局得到開創能源合作事業的貸款；郵政工作者不僅能送信，還能運送當地生產的農產品，並適時關心長者的情況。這些郵政工作者將轉型為照護者與氣候工作者——而且，他們的工作用車將是加拿大國產電動車。

最初，「躍進宣言」團隊受到多方壓力，希望我們組成獨立的政黨，或以這份宣言為政綱支持現有的候選人。我們並沒有依從這些聲音，因為我們想守護「躍進宣言」的根源，不希望它

成為任一政黨的所有物。今天，尤其在川普當選之後，〈躍進宣言〉的生命力存在加拿大國內外
的人民心中，人們越來越常將我們的理念應用於當地的運動與選舉政綱。例如在雷灣——加拿
大北部一座長期依賴伐木維生的城市——當地的〈躍進宣言〉團隊決定提名一票候選人競選市
議員，他們撰寫了當地版本的宣言，計畫將城市轉化為綠色製造業的重鎮，同時解決部分人民
無家可歸的問題，並守護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權。還有，在二〇一七年三月，在賓夕法尼亞州激
烈的眾議員選舉中，知名居住地與反貧窮激進主義者茱莉·洪卡拉（Cheri Honkala）立誓創造出
「基於〈躍進宣言〉的政綱」，並舉出了「一起面對氣候變遷、不平等與種族歧視危機」的需求。

烏托邦——在眾人要求下強勢回歸

〈躍進宣言〉是政治時代精神變動的一部分，許多人都發現了，我們唯有跨越痛苦的隔閡一
齊努力、接受過去被排擠之人的領導，才能邁向我們想要的未來。我們已經走到了分隔政治的
極限，所有人在自己的角落裡努力抗爭，卻沒有看清所有議題之間的關聯，也沒有明確列出未
來道德基礎所需的思想與價值觀。

當然，認知了此事，不代表我們不須抗拒針對家庭、身體、社會、個人權益的攻擊。我們
除了抗爭以外別無選擇，就如我們除了在聯邦政府到當地學校委員會，政府各階層選舉反對派

革新分子之外，別無他法。在接下來的數月、數年，人們將亟需本書描述的各式抗爭策略：街頭抗議、罷工、法庭訴訟、庇護所，以及克服種族、性別與性傾向隔閡的聯盟將必不可少。我們也必須持續對政府機構施壓，逼它們放棄那些靠強取豪奪獲利的產業，包含化石燃料產業、監獄，到戰爭與占領。然而，即使每一場抗爭行動都獲得勝利——我們也知道，這是痴人說夢——我們仍會站在極右派崛起前的位置，而導致川普這個危險症狀的系統性危機，我們依舊沒有從根本解決。

今天有眾多社會運動領袖與知名組織者都深知此事，他們也跟著制定計畫並採取行動。黑入生命平權運動的創始者之一——艾莉西亞·賈沙（Alicia Garza）——在川普就職當晚表示：在社會運動逐漸興起的這五年之後，無論是占領華爾街、夢想者運動（DREAMers）或黑人生命平權運動……我抱持一種希望，我希望所有的運動能集結成我們有潛力形成的龐大勢力，實際統治這個國家。所以我將精神集中在此，也希望所有人都往這個方向思考。

往這個方向思考的人很多，在他們思考的同時，我們看見近幾十年社會運動所缺乏的烏托邦之夢死灰復燃。我們越來越常看到迫在眉睫的要求——時薪十五美元的基本生活工資、阻止警察殺人與將人驅逐出境的行為、依碳排放量收費等等——與邁向未來的聲浪一同出現，人們想看到的未來不僅比充滿暴力、無法持續下去的現在還要好，而且是一個美好的未來。

在美國，這份烏托邦夢想最大膽、最振奮人心的案例是「黑人生命願景」(Vision for Black Lives)——黑人生命運動在二〇一六年夏季釋出的全面變革性政綱。此政綱在超過五十個黑人主導的組織合作下誕生，它聲明：「我們拒絕接受虛假的解決方案，並相信我們能全面改變現今這個將利益擺在人民生活之前、使得眾人無法呼吸的系統。」這份政綱將警察之槍擊案與大規模監禁擺在大環境中討論：這個經濟系統一直與黑人與棕色皮膚人種為敵，使他們成為第一批遭失業、社會福利縮減與環境污染衝擊的受害者，結果為數眾多的人被正式的經濟系統遺棄、被越來越軍事化的警方施以暴行，以及被關在越來越擁擠的監獄裡。這份政綱提出一系列扎實的解決方案，包括縮減監獄的經費、讓警察撤出學校，以及將警方去軍事化。它也規畫了補償奴隸制度與系統性種族隔離受害者的計畫，其中包括免費大學教育與一筆勾銷就學貸款。當然，還有更多——政綱總共提出了近四十條政策要求，從更改稅制到瓦解銀行，各方面都有。《大西洋》雜誌報導表示，這份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從天而降的政綱「完整性堪比政黨的政綱」。

川普就職後這幾個月，黑人生命運動加深了自己與其他社會運動的連結，在「多數派」的旗幟下集結了數十個團體。新聯盟在令人心潮澎湃的一系列活動中進發，從四月四日(馬丁·路得·金恩遇刺的紀念日)持續到五朔節。「力戰種族歧視，提高基本薪資」的抗議活動風行全美，連結了種族正義與勞工力爭十五美元基本時薪的運動，以及針對移民越來越過分的攻擊。「在川普擔任總統的情況下，」新聯盟表示，「我們必須盡快拿出真正代表全體心願的願景——

所有人的經濟正義與工作平等。」

而在二〇一七年六月，代表多元選民的數千名激進分子將出現在芝加哥，參加全美護理師聯合工會主辦的第二屆年度人民高峰會（People's Summit），準備討論出多面向的「人民計畫」（People's Agenda）。在密西根、北卡羅萊納州等地區，「道德星期一」（Moral Monday）已聚集各項社會運動數年，類似的全州運動也在籌辦中。其中一位創始人——威廉·巴伯牧師（William Barber）——表示：「你要創造的不是一個『瞬間』，而是一場『運動』……我相信這裡每一場運動——道德星期一、為十五美元而戰（Fight for \$15）、黑人生命平權運動——都是希望的象徵，人們將不再沉默，而是站出來奮鬥。」

美國與加拿大的情況相同，氣候危機縮減了我們的時間，我們不得不為政治改革定下決不讓步的死線。紐約再生（New York Renews）——一個聲勢浩大、範圍廣泛的聯盟——正大力推動再生能源轉型計畫，目標是在二〇五〇年前將紐約州的能源系統全面轉型至再生能源。若更多州定下如此野心勃勃的目標，如果其他國家也跟進（瑞典的目標是在二〇四五年達成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那無論川普與提勒森多麼「努力」，地球也不會陷入氣候混亂的狀態。

我們開始看見真正能通往未來的道路——新興政治聯盟在形成的同時，便將經濟不平等連結到種族歧視與厭女主義，深度分析歧視性思想被用以維持既定系統，讓超級富豪踩在平民與地球環境背上獲利的現狀。這些政治聯盟能成為首次參與政治行動與組織抗爭之數百萬人的

家，以共同的革新計畫建立跨種族、跨世代的合作。

這些擊敗各地川普主義的計畫，遠遠超出找一位革新派救世主競選公職、盲目支持此人的範疇。眾多社會群體與運動聯合了起來，提出了一系列核心政策——任何政客若希望得到大眾的支持，就必須承諾做到這些改變。

人民政綱已經踏出了領導的第一步——政治人物只能跟隨在後。

總結

NO IS NOT
ENOUGH

伸手可及的關懷

眼下的時刻需要樂觀；我們將悲觀留給更好的時代吧。

——讓·克洛德·塞爾韋 (Jean-Claude Servais)

在本書前言，我以「震撼」一詞作為開場白，因為這是許多人在選舉日之後掛在嘴邊的詞句。然而在過去數月寫作的過程中，我不斷思索這個詞的意涵，也開始懷疑它在這個背景下的適當性。

當一個故事遭破壞，當我們完全不瞭解情況時，那就是震撼的狀態。但在這本書各面向的探討過程中，我們發現川普的出現並沒有破壞故事，反倒是諸多危險故事的結果——合乎邏輯的終點——而這一切都是我們文化長久以來敘說的多條故事線。我們的文化告訴我們：貪婪是



好事；市場就是王道；金錢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白人男性較其他群體優越；自然界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讓我們掠奪；弱勢群體是罪有應得，頂層1%住在金色高塔中也是理所當然；任何公共或公有的事物奸邪無比，不值得我們守護；我們被危險重重包圍，所以我們只應該照顧自己與最親近的人；除了現在的體系之外，我們別無選擇。

這些故事對我們之中許多人而言，存在我們呼吸的空氣本身——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川普崛起應該完全不構成衝擊才對。在一個允許超級富豪逍遙法外、沉浸在勝者為王競爭思想、所有層面都以「支配」為基礎的文化中，一名稱墨西哥人為「強暴犯」、炫耀他能亂摸女性下體，並嘲笑殘疾人士的億萬富豪總統，正是文化最合理的體現，我們早該預見他的到來。的確，許多深受西方種族歧視與厭女思想迫害的人，早就預見了今天的情形。

所以，也許人們稱為「震撼」的情緒其實是「驚恐」，更確切而言，是我們閱讀令人印象深刻的反烏托邦小說、好看的反烏托邦電影時感到的驚恐。這類型的故事往往沿著現實世界趨勢一路走下去，走到理所當然的終點，接著在終點舉起一面鏡子，發問：你喜歡你看見的世界嗎？你真的想繼續沿這條路走下去嗎？這些噩夢般的未來之所以恐怖，正是因為它們不出乎意料——它們沒有脫離我們世界潛藏的故事線，反而是給了故事一個合理的結局。我越發深信，我們應該以這樣的視角看待美國首位握有核武的真人實境總統：活生生的反烏托邦故事。川普是一面鏡子，他不僅讓美國看見了故事的面貌，更讓全世界都看清了現況。如果我們不喜歡我

們眼前的景象——顯然有眾多人不喜歡——那我們該做的事再清楚不過。

我們必須對川普提出質疑，而且不只是他，我們還得質疑不可避免地造就了川普的故事線。光是挑戰這個令人嫌惡、無知得可怕的人，不過是治標，我們必須正視那些獎勵了他、拔擢了他、幫助他成為全世界最有權勢之人的趨勢。我們必須面對那些透過真人實境節目、快速致富、億萬富豪救世主、慈善資本主義者植入我們心中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體現在被摧毀殆盡的社會安全網、暴增的監獄人口、一般化的強暴文化、毀損民主的貿易協議、不斷上升的海平面與私營公司的危機應對程序，以及分為綠區與紅區的世界。

與此同時，也許我們稍微被川普震撼到也無不可——對我們而言甚至更健康。為什麼呢？創造了川普的那些故事線向來受人挑戰，不同的故事也一直都存在，這些不同的聲音堅稱金錢並不是唯一有價值的事物，堅稱我們所有人的命運都相互交疊，也與自然界的健康狀況密不可分。川普代表的勢力從過去就必須壓抑其他更古老、不證自明的真實故事，唯有抑制了真實故事，他們才能夠違抗人們的直覺與證據，穩居主控者之位。

然而其他故事卻堅持至今，提醒了我們：雖然川普是現今新自由主義系統合理的結果，現今新自由主義系統卻不是人類故事唯一的合理結局。所以，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工作不是反抗，不是說「不」。我們當然必須說不，但我們也得捍衛夢想與規畫美好世界的空間。這不是放縱，而是我們擊敗川普主義的關鍵步驟。

扼殺內在的川普

也許你會覺得這句話有點怪，但在我看來，川普崛起也帶動了內在的一種挑戰：這件事令我下定決心扼殺內心的川普。我們從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到，華府的新政讓眾人開始試圖理解並克服自己潛藏的偏見與歧視，去除過去分隔了人與人的障礙。在我們聯手反抗與改革的此刻，這樣的內在反思再重要不過。

我們也能用其他平時很少注意到的方式，面對我們內心的「川普」——任何類似川普的習慣都算。（在此聲明，我並不是說這些省略的話語代表我們所有人都該為二〇一六年大選結果負責——這與誰投給誰、為什麼投給這個人沒有關係。）這或許是我們的關注侷限在推特一百四十字元內的貼文，使我們混淆了「追蹤人數」與朋友。或許是我們學會將自己視為市場上的品牌，而非社會中的個人的心理。或許是我們將從事相似工作者視為競爭產品，與他們爭奪稀少的市場資源，而沒有將之視為盟友的競爭心。（既然我們知道川普當選總統是因為企業建立品牌的陰險殖民式邏輯，也許是時候將這些拋在身後了。）又或許，這是我們加入群體，用殘忍、激烈的人身攻擊，一起打壓意見不同者的群眾心理。我這樣說可能會招來上述的攻擊，但你不覺得這樣的行徑與某位推特大王相像到一種可怕的地步嗎？

也可能是等待億萬富豪前來拯救我們的心態——但我們期待的這位富豪會是仁善、慷慨的

人，不僅關心氣候變遷的問題，還積極為女孩子爭取權益。這個自由派億萬富豪救世主也許與川普相差十萬八千里，但是類似的幻想依然將財富與超人畫上等號，同樣與馬阿拉歌的執政者太過接近。

如果這些衝動與故事感覺是我們天生的心理，這不代表我們是壞人；這是因為我們許多人都生活在系統裡，隨時接受「資源不夠讓所有人過上好生活，我們最好不顧一切、努力爬到頂層」的訊息。無論我們願意與否，任何消費或製造新聞媒體的人，都生活在真人實境節目、個人品牌化與時時刻刻分裂我們注意力的訊息中——也就是生活在造就了唐納·川普文化的海洋中。別懷疑，這個散發惡臭的游泳池也包含其他水域，有些人只能在沒有救生員、疾病肆虐的水域載浮載沉，但無論你位在泳池何處，想真正脫離池水仍是艱巨無比的任務。當我們認知這點，我們的任務也變得明確了：若希望改變這個世界，我們就必須有改變自己的覺悟。

好消息是，在我們「去川普化」的同時——也許是每週多花幾小時與人面對面互動，也許是為了計畫更大的利益放下自己的驕傲，也許是看清生命中無法買賣之物的價值——我們也能變得更快樂。我們將持續這樣的內心掙扎，必須花一輩子進行沒有終點的奮鬥。

抉擇

我們有兩種力抗全球右翼勢力妖言惑眾的方式，其一是全球中立派的「權勢集團」選項。這個方案承諾了更多幼兒照護、在上層留更多位子給女性與有色人種，可能還有幾塊太陽能板。但是，伴隨此選項而來的是一陳不變的擲節政策、對市場一陳不變的盲目信仰、硬是連結了無盡消費與幸福快樂的老套公式，以及無法遮覆巨大創口的小OK繃。

這個受限的願景完全無法阻止世界各地極右派崛起，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因素是：它提出的遠遠不夠。它沒能處理社會上真確的不公平，無法阻止人們尋找代罪羔羊的急迫心理，也無法給予最受右派壓迫的人們未來之希望。一個充斥著極端不平等、毫不掩飾的新法西斯主義與混亂氣候的社會，很顯然是病了；而造成這些危機的主因之一——新自由主義——作為「解藥」實在不適合到了極點。對於應擔起責任的勢力，它只說了聲微弱的「不」，卻完全沒提出值得把握的「要」。

我們之中有非常多人準備採取另一個方案：用動人心弦的「要」規畫出能實質改善日常生活的措施。我們的「要」並不畏懼「重新分配」與「彌補」等意義深重的字詞，它將堅決地挑戰西方文化關於「好生活」的公式，推翻困在消費者小泡泡裡的物質享受，推翻這種無視地球狀態與人類深層需求的作風。

也許，某方面而言，我們該感謝川普給我們這份挑戰既定系統的野心。他厚顏無恥的企業政變造成了誇張的效果，使人們意識到系統改革的重要性。如果美國工業大亨能全員搶著追隨這個男人的腳步——這個抱持醜陋憎惡、貪贓枉法、膚淺空虛的男人——如果華爾街能以喝采聲支持他讓地球焚毀、讓老人挨餓的計畫，如果新聞媒體一大部分的人能讚揚他邊吃巧克力蛋糕邊下令發射巡航導彈的「總統氣度」，那麼，也有眾多的人發現他們不想與這樣的系統扯上關係。隨著最粗俗的人物登上最崇高的地位，大規模開採、無盡濫用與丟棄的文化，也到達了崩裂點。我們能清楚看到，我們現在必須面對的是文化問題，而且不是一項一項處理既有政策，而是從根本解決問題。

我們日前在美國、法國等國家所見的左翼反對派候選人與政黨並不完美，他們提出的政綱也不完美，無法面面俱到。有些主導反對勢力的人物，提出的言論比起未來更像是來自過去的回音，而他們的政見通常也沒能反映他們希望能統治的多元化國家，至少，反映的程度不夠。然而這些看似無望的候選人與經常是新興政治聯盟的政黨，卻一次又一次險些獲得大權，一次又一次令民意調查者與權勢集團的分析師震驚不已。這證明了非常重要的事實，一個在大眾受新自由主義限制的數十年來被否定與壓抑的事實：激進革新很受歡迎——即使在兩年前，我們許多人也不敢想像它會如此廣受支持。

這是我們必須打從心底理解的事實：新自由主義的魔咒已然在人們的經驗與堆積如山的證

據下破除了。數十年無人敢提及的政見，現在幫助候選人獲得數百萬選票：免費大學教育、兩倍基本薪資、在科技許可下盡快轉型至一〇〇%再生能源系統、警察去軍事化、監獄不是年輕人該待的地方、這裡歡迎難民、戰爭使我們變得不安全。類似的言論廣受群眾支持；在這樣的鼓勵下，誰知道接下來可能迎來什麼樣的變化呢？補償奴隸制度與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力抗對女性暴力，施行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廢除監獄？民主勞工合作聯盟成為綠色工作計畫主導者？放棄以「成長」度量進步的思想？有何不可呢？長久以來限制了革新想像力的理智之牆，現在已然倒塌。

過去兩年左派數度險些獲勝，這些並不是失敗，而是深層理念重整最早期的震盪。支持激進革新的人們有可能形成多數勢力——在地緣政治學方面，與右派獨裁政治與新法西斯主義崛起同樣重要。沒錯，這些左派候選人的弱點與失誤不該使我們洩氣，反而應該為我們帶來希望。這代表我們能搭建容納更多事物的政治帳篷——重點是，我們打從一開始就必須小心地合力釘下正確的樁。現在有許多社會運動領袖堅稱，其中一個好的開始就是接受此前提：越發誇張的經濟不平等與氣候災難，都與這些依種族與性別排出人命優劣的系統脫不了關係，而維持此致命秩序的有力工具正是依膚色、信仰與性取向造成人群分裂的能力。倘若一個政治團體有膽提出以上論述，並拿出大膽將新科技與全球貿易人性化、民主化的計畫，它將迅速從右派手中奪回人民的心。這將不是陳腔濫調的復古政治，而是通往前所未見之未來、激勵人心的道路。一

個如上述多元且具前瞻性的競選模式，極可能所向披靡。

如果你認為這太過樂觀，請記得一件事：在美國，參與政治運動的人數已遠超過組織者見過的規模，這些為女權、反對驅逐移民、捍衛黑人生命的遊行抗議者人數已經打破過去紀錄。激進革新政治會議、講座、市民集會與大型集會的參與人數，已然超載。某種強大的力量正驅動人們加入政治討論，任何聲稱能預知此運動之極限的人，與預測川普落選、預言英國無法脫歐的民調專家同樣不可信。在政治分化的時代搭建廣納群眾的帳篷並非易事，人們必須誠實面對痛苦的歷史，才有可能進步。然而，在這個賭注太過恐怖、潛力太過龐大的時刻，我們除了盡力嘗試之外，又能做什麼呢？除了在新的機會出現時縱身一躍之外，又有什麼選擇呢？

例如，在共和黨首次試圖拆解歐巴馬健保的計畫失敗後，要求政府提供全民健保的運動席捲全國，人們數十年來首次廣為接納全民的聯邦醫療保險。現在，人們不顧華府的反應，堅持要加利福尼亞等大州施行此制度。

隨著川普的計畫一一因他笨拙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執行力而失敗，更多類似的反對聲音也將出現。如果北美自由貿易協議重新協商，我們多半能看見類似的「板塊」運動。川普的行為令支持他的勞工階級失望透頂，但若人們以為永遠無法更動的協議重新協商，工會與環保人士便有機會踏上前提出真正公平的貿易藍圖，並以此吸引民眾的支持。這些機會——我們將看到非常多的機會——都是實際展現除了右翼民粹主義之外，我們能有、應有的姿態。一份貨真價實

的人民政綱，一條貨真價實的人民政策要點。

最後一個小提醒：川普手下的災難資本主義者控制了美國政府一股龐大的勢力——但他們並沒有掌控一切。他們無法控制城市與州政府的作為，他們甚至大多數時候無法控制國會的作為，他們更無法控制大學、各信仰機構與工會的作為。他們（目前還）無法控制司法體系，他們無法控制其他主權國家，他們也無法控制我們作為個人或全球性團體的行為。

正因為華府上演的戲碼太過危險，我們聯手的力量在這些「無川普」空間之所作所為更是空前地重要。在二〇一六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蜜雪兒·歐巴馬（Michelle Obama）對觀眾發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言論：「當他們往下走之時，我們就得往上走。」與其說她指涉的是「行為」，不如說她只是一種「宣稱」，以及歐巴馬一家拒絕與川普一夥人共處於泥濘中的意思。現在，是時候將這個態度從「宣稱」轉到「行為」了：當他們往下走之時，所有人都必須以最高處為目標。在不受川普控制的諸多領域，我們必須設定較高的目標，以行動完成更多。我們必須為預防災難性氣候變遷而多加努力。我們必須為創造對移民與難民更友善的自由城市而多加努力。我們必須為避免軍事問題惡化而多加努力。我們必須為守護女性與LGBTQ群體之權益而多加努力。當對手陷得越來越深，我們只能飛得越來越高。

反向震撼

數十年來，上層菁英利用震撼的力量，實施噩夢般的政策。唐納·川普以為他能故技重施——他以為我們明天就會忘記他昨天說過的話（他會堅稱自己從未發表此言論），以為我們會被一連串的事件嚇得暈頭轉向，以為我們最終會化為散沙、投降，然後允許他亂摸他想摸的任何東西、掠奪他想掠奪的任何東西。

但我們從過去經驗也看見，並不是每一場危機都會使社會退步與放棄。我們還有第二個選項——當我們面對共同的嚴重威脅時，我們可以選擇集結成一體，躍出進化的一步。我們可以選擇威廉·巴伯牧師所說的：「成為當代的電擊器，震撼這個國家的心臟，然後建造一個反抗與希望、正義與愛的運動。」換言之，我們能團結、集中精力、堅毅不撓，讓自己大大吃一驚。我們能拒絕被老掉牙的震撼策略騙倒。無論我們面對多麼艱難的挑戰，我們能拒絕害怕。

本書描述的多面向企業政變是一場影響全球的危機，也許能響徹整個地質年代。

至於回應此危機的方式，完全由我們選擇。

所以，我們選第二個選項吧。

讓我們，躍進吧。

附錄

NO IS NOT
ENOUGH

躍進宣言

迎來關懷地球與彼此的加拿大

我們出發的前提是，加拿大正面對近代史上最嚴重的危機。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已承認了加拿大近代史中的暴力細節。逐漸加劇的貧窮與不平等是我們國家現今的瘡疤。加拿大在氣候變遷方面的紀錄，是對人類未來的犯罪。

上述事實震撼人心，因為它們與我們推崇的價值之間，存在戲劇性的差距，無論是對原住民權益、國際主義、人權、多元文化與環境管理等價值，都與現實相差甚遠。

今天的加拿大不是我們樂見的加拿大——但它有可能成為我們想要的國家。

我們有可能居住在完全依賴再生能源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便捷的大眾運輸支持再生能源系統，而轉型過程中創造的工作機會都系統性去除了種族與性別不平等。關懷彼此與照顧地球可能成為經濟上成長最快的分支，更多人能擁有工作時數較少、報酬較高的工作，讓我們利用多餘的時間與親愛之人共處，並在我們的社會群體中愉快生活。

我們知道完成這場偉大改革的時間不多了，氣候科學家告訴我們，這十年就是以決定性行動作為避免災難性全球暖化的最後時限。這表示我們無法再亦步亦趨地前行，因為這樣的進步無法帶我們走到我們必須抵達的目的地。

這次躍進必須從尊重原住民族的權益與所有權開始。這些人是大地最初的照護者，他們一向是守護河川、海岸、樹林與大地的先鋒，奮力與失控的工業活動抗爭。為支持他們的角色並重新建立我們與原住民的關係，我們應全盤實施〈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過去簽下的條約形成了我國的法律基礎，並約束我們「在太陽停止照耀大地、草地停止生長、河川停止流淌之前」同住在這片土地上。我們深受此條約感動，希望能使用永久不枯竭、不污染大地的能源。科技上的進展使這個夢想近在咫尺，最新研究顯示，加拿大能夠在二十年內一〇〇%從再生能源獲得電能，待二〇五〇年到來，我們就有可能得到一〇〇%乾淨的經濟系統。

我們要求所有人，現在開始轉型。

我們不再有藉口建造新的基礎建設，將未來數十年鎖死在越發加劇的開發與開採計畫中。能源開發案的全新鐵則必須是：如果你不希望它出現在你家後院，它就不該出現在任何人的後院。同樣的道理適用於石油與天然氣管線；適用於新布藍茲維省、魁北克省與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天然氣液體壓裂開採法；適用於頻繁駛過加拿大沿岸的郵輪；也適用於全球各地屬於加拿大的採礦計畫。

能源民主的時機已然來臨：我們不僅相信能源應轉型，還相信各地社區組織應集體管控這些新興能源系統。

現在的私營企業汲汲營營，國營企業則充斥著遠端操控的官僚政治。我們能創造新穎的所 有權結構，取而代之：這些新結構將由民主方式經營、支付基本生活工資，並將社區團體所需的營收留在社區內。除此之外，原住民族應首先獲得公眾資助，投入他們自己的乾淨能源計畫。目前因工業污染而面對嚴重健康問題的群體，也應該優先接受補助。

此法生產的能源不僅能照亮我們的家，更能重新分配財富、加深民主根基、使經濟成長茁壯，並開始治療開國以來對某些族群造成的創傷。

躍向零污染經濟的過程中，也將產生無數類似的「多贏」機會。我們要的是興建節能房屋、翻新現有住宅的普遍性計畫，確保收入最微薄的群體與社區能最先感受到此計畫的益處，接受工作訓練與獲得長期改善貧窮問題的機會。我們要碳密集產業的勞工獲得訓練與其他資源，確

保他們完全有能力加入乾淨能源的經濟系統。勞工應民主地參與轉型作業。由再生能源供電的高速鐵路與平價大眾運輸能連繫國內每一個地區——取代造成隔閡與危險的更多車輛、輸油管線與可能爆炸的火車。

既然我們知道此時開始躍進已嫌晚，就必須投資我們不斷衰敗的基礎公共建設，讓基礎建設能承受越來越密集的極端氣候現象。

當我們轉型到更為在地化、更以環境為基礎的農業系統時，便能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捕捉土壤中的碳，並吸收全球能源供應量突兀的波動——同時生產更健康、更平價的食物，供所有人享用。

我們要求所有干擾我們重建當地經濟的貿易協議正式終止，要求政府管制企業，並停止造成損害的開發性計畫。我們應重新衡量正義的砝碼，確保所有勞工的身分狀態有保障。我們看清了加拿大對軍事衝突與氣候變遷（造成全球難民潮的主因）的「貢獻」，因此我們必須歡迎難民與尋求安全保障、尋求更好生活的移民。

當我們轉型成與地球之極限達成平衡的經濟系統，也代表擴張我們經濟體系中原先就低碳的部分：看護、教育、社工、藝術與公眾利益媒體。我們應跟隨魁北克的腳步，制定早該定下的全國孩童看護計畫。這些多半由女性執掌的工作，是建造人性化、生命力強健之社會的凝聚劑——而面對無可避免的艱苦未來，我們將需要再強健不過的社會。

由於目前照護人們與地球的勞工多半沒有薪資可言，我們要求人們熱烈討論全面性基本年薪的可能性。此概念在一九七〇年代的曼尼托巴省誕生，此牢固的安全網確保人們不必為今日餵飽孩子，接受威脅孩子未來的工作。

我們在此聲明，「摶節政策」是一種陳腐的思想，它系統性地攻擊教育與醫療照護等低碳行業、縮減了大眾運輸的經費，並強硬地進行不顧後果的能源私有化——它已成為地球生活的一大威脅。

完成這場偉大改革的經費確實存在——我們只須以正確的政策釋出這筆錢財，例如：終止化石燃料補助。制定金融交易稅。提高資源開採費。提高企業與富人的所得稅。制定累進制碳排放稅。縮減軍事支出。以上方案均以「污染者付費」為原則，有著巨大的潛力。

有一件事再清楚不過：在私人財富空前充裕的時刻，公共資源稀缺不過是一些人偽造的危機，目的是在我們的夢想誕生前扼殺它們。

那些夢想遠遠超出了這份文件所能涵蓋的議題。我們呼籲所有競選公職者把握機會，接納全面改革的迫切需求。我們呼籲全國各地舉辦市民集會，讓所有居民聚集起來，以民主方式定義每個社區躍向新經濟系統的過程。

最終，這場從基層向上發展的重生運動，將重振政府每一階層的民主精神，迅速朝每一票都算數，將企業金錢抽離選舉政治的系統邁進。

一次處理所有問題並非易事，但這就是我們生存的年代。

油價下跌的情形暫緩了竭盡高風險科技、迅速開採化石燃料的壓力。瘋狂擴展行動的停滯不該被視為危機；它是天賜良機。

它給了我們難得的喘息時間，讓我們停下來看看自己現在的模樣——然後選擇改變自己。

因此，我們呼籲競選公職的所有人把握良機，接納改革的迫切需求。對過去受國家傷害、現在無端受苦，以及所有應獲得明亮與安全未來的人們——這是我們神聖的責任。

現在，是勇敢的時刻。

現在，是躍進的時刻。

NO IS NOT
ENOUGH

謝辭

為了在極其短暫的時限內完成此書，一批了不起的人們貢獻了心力：加拿大企鵝藍燈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 Canada）發行人露易絲·丹尼斯（Louise Denny），為本書貢獻了她聰慧過人的頭腦與生命，改進內文的貢獻數之不清。約翰·海利（Johann Hari）早在我下定決心前便堅持要我撰寫本書，他錄下多次長篇對話讓我知道書中內文已存在我心中，還為我修改了數次草稿。德瑞克·奧基夫（Derrick O’Keefe）為了編輯、查資料與指導我們，不辭辛勞。莎朗·萊利（Sharon Riley）提供了出色的資料並細心查證，一路上也少不了克莉絲汀·薛爾（Christine Shearer）、艾莉·登普斯（Allie Tempus）、凱特·阿隆諾夫（Kate Aronoff）與拉傑弗·西寇拉（Rajiv Sicora）的幫助。賈姬·裘依納（Jackie Joiner）一如往常地扮演了無人能及的指揮家。

露易絲與我十分高興能和兩位傑出的編輯合作：英國企鵝藍燈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 UK）的海倫·康福德（Helen Conford）與美國乾草書市（Haymarket Books）的安東尼·阿諾福（Anthony Arnove）；他同時也是本書的國際版權代理人。這回緊湊的時程迫使他們所有人與所有出版團隊拿出奇蹟般的作業效率，尤其是瑞克·邁爾（Rick Meier）與蒂爾德莉·莫林納（Deirdre Molina），以及不知疲倦的加拿大克諾夫出版團隊（Knopf Canada），布莉特妮·拉金（Brittany Lar-kin）與特菴·佩吉（Terra Page）、約翰·斯威特（John Sweet），以及創意總監史考特·理查森（Scott Richardson）。感謝最早刊登本書部分文字的《攔截》新聞網、《國家》（*The Nation*）與《衛報》。蜜雪兒·亞歷山大、基安格雅瑪塔·泰勒與伊芙·恩斯勒都讀了本書早期草稿，並提供了珍貴的回饋。

我的丈夫——亞維·路易斯——幫助我構思了此論點中許多部分，並贈與我完全沉浸於寫作的時間與空間。我同樣感謝麥可（Michael）、邦妮（Bonnie）與賽斯·克萊恩（Seth Klein）、感謝蜜雪兒·藍斯柏（Michele Landsberg）與史蒂芬·路易斯（Stephen Lewis）、感謝索爾·蓋（Sol Guy）、賽斯·麥法廉（Seth MacFarlane）、凱奧·馬克利（Kyo Maclear）、布利特·馬林斯（Brit Marling）、凱蒂·麥肯納（Katie McKenna）、碧洋卡·姆格尼、貝琪·李德（Betsy Reed）、安東尼·羅傑斯萊特（Anthony Rogers-Wright）、朱利安娜·塞里格（Juliana Sachrig）、凱薩琳·維納（Katharine Viner）與歐菲莉亞·懷特利（Ofelia Whitley）。感謝最棒的〈躍進宣言〉團隊與最初草擬政綱的

六十人支援、支持並啟發我。我們仍然為偉大的盟友——亞瑟·曼努埃爾——哀悼。我由衷感謝極富耐心的托馬，雖然他在過去數月沒有媽媽陪伴，卻堅稱：「唐納·川普這麼沒禮貌，怎麼可以當總統。」

不能光說 NO ——如何力抗災難資本主義，贏取我們想要的世界 / 娜歐蜜·克萊恩 (Naomi Klein) 著；朱崇旻譯 -- 初版 -- 台北市：時報文化，2017.10；320 面；21x14.8 公分 (娜歐蜜·克萊恩作品集;04)

譯自：No Is Not Enough: Resisting Trump's Shock Politics and Winning the World We Need

ISBN 978-957-13-7153-5 (平裝)

1. 政治文化 2. 政治社會學 3. 美國

570..16

106017016

No Is Not Enough: Resisting Trump's Shock Politics and Winning the World We Need

by Naomi Klein

Copyright© 2017 Naomi Kle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am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b, Malaysia.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7153-5

Printed in Taiwan.

娜歐蜜·克萊恩作品集 04

不能光說 NO ——如何力抗災難資本主義，贏取我們想要的世界

No Is Not Enough: Resisting Trump's Shock Politics and Winning the World We Need

作者 娜歐蜜·克萊恩 Naomi Klein | 譯者 朱崇旻 | 主編 陳盈華 | 編輯 林貞嫻 | 美術設計 莊謹銘 | 執行企劃 黃筱涵 | 董事長·總經理 趙政岷 | 總編輯 余宜芳 |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 240 號 3 樓 發行專線—(02)2306-6842 讀者服務專線—0800-231-705 · (02)2304-7103 讀者服務傳真—(02)2304-6858 郵撥—19344724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 79-99 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 法律顧問 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 印刷 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 初版一刷 2017 年 10 月 06 日 | 定價 新台幣 380 元 |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成立於 1975 年，並於 1999 年股票上櫃公開發行，於 2008 年脫離中時集團，非屬旺中，以「尊重智慧與創意的文化事業」為信念

